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来源期刊
AMI综合评价(A刊)核心期刊
全国高校社科名刊
中文核心期刊
第三届江苏省新闻出版政府奖

ISSN1671-4970
CN 32-1521/C

河海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Hohai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Vol.24 No.1
2022年2月25日出版

1

河海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二十四卷 第一期

二〇二二年二月



河海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双月刊

第24卷第1期

2022年2月25日出版

艰苦朴素

实事求是

严格要求

勇于探索

严愷

第五届编辑委员会

主任：徐 辉

副主任：郭继超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万国彤	王浩斌	王慧敏	方先明
史安娜	邢鸿飞	许叶军	李迎生
杨春福	吴 玲	吴 静	吴凤平
吴宇哲	张 阳	陈友华	庞庆华
施国庆	黄涛珍	黄德春	戴 锐

特约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毛基业	刘志彪	李应芳	宋林飞
陈诗一	寇 纲		

主 编：王慧敏

副 主 编：史安娜 戴 锐 吴 玲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 年重点选题方向

为深入研究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迎接党的二十大召开,深刻总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实践经验和理论创新成果,本刊 2022 年将围绕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的情况,组织刊发相关学术论文,以优秀的学术成果回馈伟大时代。

重点选题方向包括但不限于: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研究;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究;
“十四五”规划纲要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研究;
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前沿问题研究;
科技、工程、生态(环境)哲学与伦理研究;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研究;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
共同富裕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研究;
老龄化、人口结构变动与社会发展研究;
优化国土空间布局与区域协调发展研究;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绿色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研究;
智能化技术集成创新应用与数字经济研究。

投稿须知:

1. 围绕上述选题的稿件,本刊会快速审稿、择优发表;
2. 请作者通过网上投稿系统投稿,唯一投稿网址:<http://jour.hhu.edu.cn/hhdxbsk>;
3. 论文格式规范、参考文献规范及其他注意事项请参见本刊清稿要求。

本刊主要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与环境”“经济与管理”三个栏目,来稿可围绕上述主题,从不同视角展开跨学科研究。欢迎广大学者踊跃赐稿!

联系电话:025-83786376

官方邮箱:sk1999@vip.163.com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编辑部

2022-02-25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征稿简则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经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于1999年3月创刊。

1. 本刊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办刊方向,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贯彻“双百”方针,弘扬时代主旋律,理论联系实际,为教学、科研服务,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2. 本刊为社科类学术期刊,主要刊登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等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成果。本刊可供上述有关专业的研究人员、管理人员和高校师生阅读和参考。本刊优先发表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及其他重大项目的研究论文。

3. 本刊已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等数据库或网站。作者投稿时如无特别声明即被视为同意本刊通过上述媒体为读者提供服务;如有异议,请在投稿时说明。

4. 来稿要求和注意事项:

(1)文稿务求内容正确,应注重创新或学术创见;重点突出作者论文的新贡献;要求文字精炼,结构严谨,数据可靠(重要数据请注明出处);避免写成报告、讲义和学位论文的缩写形式。文稿内容不能泄露国家秘密,在政治或涉外问题上符合国家政策。

(2)文稿应提供中英文篇名、作者姓名及单位名称,并编写中英文摘要(约250个汉字)和关键词(4~6个)。

(3)文稿中的图表应设计合理、大小适当。请使用三线表。图表应排在正文引用处,先文后图表。

(4)参考文献择作者亲自阅读、本文引用、公开发表或有案可查者列出,采用顺序编码制。常用著录格式(常用参考文献类型:期刊论文[J];专著[M];论文集[C];学位论文[D];报告[R];报纸[N];电子文献[EB/OL]):

[1] 作者名(外文姓前名后). 论文篇名[J]. 期刊名,年份,卷号(期次):起止页码.

[2] 编著者(外文姓前名后). 书名[M]. 版次. 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止页码.

[3] 作者. 题名[C]//文集编者. 文集名. 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论文起止页码.

[4] 作者. 学位论文名[D]. 地名:学位授予单位,年份.

[5] 作者. 报告名[R]. 收藏地:收藏单位,年份.

[6] 作者. 题名[EB/OL]. [引用日期]. 获取和访问路径.

5. 本刊仅接受网上投稿(唯一网址:jour.hhu.edu.cn/hhdxxbsk),请勿一稿多投。作者投稿,文责自负,本刊只对稿件作文字上的修改。来稿满2个月没有收到本刊录用通知,请自行处理。

6. 本刊不收任何费用。对录用发表的文章,将按本刊与作者约定的稿酬标准支付稿酬。所付稿酬包括本简则第3条所列媒体的著作权使用费;同时向作者赠送当期样刊。

7. 本刊地址:江苏省南京市西康路1号《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编辑部

邮编:210098 电话:025-83786376 电子信箱:skl999@vip.163.com



河海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双月刊

2022 年第 1 期

目 次

□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论习近平人民幸福观的核心要义与时代价值	丁 敏, 李包庚 (1)
习近平关于青年工作重要论述的时代价值	艾楚君, 陈 佳 (11)

□ 马克思主义理论

论党对“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面领导 ——以根本依据、体制机制及能力要求为研究视角	周湘宁, 张利军 (19)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推进群众体育的价值遵循	唐 鹏, 戴志卿 (24)

□ 医疗服务专题

健康中国背景下中医药健康服务领域政策工具研究	张宏如, 邓 敏 (30)
互联网医疗服务供给的主体驱动因素	张泽洪, 熊晶晶 (38)

□ 环境与社会

风险社会治理视阈下地方政府的角色冲突及其调适	张广利, 杨壖栋, 王伯承 (47)
------------------------------	--------------------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
AMI 综合评价（A 刊）核心期刊
全国高校社科名刊
中文核心期刊
第三届江苏省新闻出版政府奖

环境传播视角下新媒体对河长制议题的建构与调解 张 杰，丁 玥，王 荣（54）

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司法适用问题研究 陈广华，崇 章（61）

□ 经济与管理

长江经济带灰水足迹与经济增长的二维脱钩分析 何伟军，孔 阳，沈菊琴（68）

资本市场开放与企业国际化战略 代 彬，邓 楠（75）

数字经济与企业风险承担：管理自主权的调节效应 郭吉涛，姚佳成（83）

防御与促进：人际和谐在员工建言行为中的作用 刘小娟，王国锋（92）

创新生态开放共享关系演化博弈与动态仿真研究 袁启刚，温 科（100）

英文摘要 （109）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投稿指南 （74）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 年重点选题方向 （封二）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征稿简则 （封三）

Contents

On the Core Meaning and Epoch Value of Xi Jinping’s Concept of People’s Happiness
..... DING Min, et al (1)

The Time Value of Xi Jinping’s Important Expositions on Youth Work AI Chujun, et al (11)

Discussing the Party’s overall Leadership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dur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Taking the Fundamental Basis, Institutional Mechanism and Ability Requirements as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ZHOU Xiangning, et al (19)

The CPC’s Values of Promoting Mass Sports in the Past Century TANG Peng, et al (24)

Study on Policy Instrument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ealth Servic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Healthy China ZHANG Hongru, et al (30)

Subject Driving Factors of Supply of Internet Medical Services ZHANG Zehong, et al (38)

Role Conflict Analysis of Local Government in Risk Society Governance ZHANG Guangli, et al (47)

The Construction and Mediation of the Issue of the River Chief System by New Medi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ZHANG Jie, et al (54)

Research on the Judicial Application of Punitive Damages for Environmental Tort
..... Chen Guanghua, et al (61)

A Two-Dimensional Decoupling Analysis of Grey Water Footprint and Economic Growth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HE Weijun, et al (68)

The Effect of Stock Market Liberalization on Firms’ Internationalization Strategy DAI Bin, et al (75)

Digital Economy and Corporate Risk Taking: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Managerial Discretion
..... GUO Jitao, et al (83)

Prevention and Promotion; The Role of Interpersonal Harmony in Employee Voice Behavior
..... LIU Xiaojuan, et al (92)

Research on Evolutionary Game and Dynamic Simulation of Open Sharing Relationship in Innovation Ecology
..... YUAN Qigang, et al (100)

论习近平人民幸福观的核心要义与时代价值

丁 敏¹,李包庚²

(1. 国防科技大学文理学院,湖南 长沙 410073; 2. 宁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宁波 315211)

摘要:人民幸福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立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人民至上”价值理念,反映时代发展的根本要求,提出人民幸福观,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内涵。习近平人民幸福观坚守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使命,以人民群众为主体、以美好生活需要为动力、以艰苦奋斗为途径、以坚持党的领导为根本保障,以共同富裕为全体人民幸福的表征,解答了为谁谋幸福、如何谋幸福的问题,形成了系统科学的人民幸福观,为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提供合法性基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价值引领、为人类社会走向共同幸福指明方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人民;幸福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4970(2022)01-0001-10

追求幸福是人的本性,如恩格斯所言,“每一个人的意识或感觉中都存在着这样的原理,它们是颠扑不破的原则,是整个历史发展的结果,……例如,每个人都追求幸福。”^[1]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追求幸福生活的奋斗史。古往今来,仁人志士不断思考探求促进人类社会水平,探求通往幸福的道路。为什么中国能从新中国成立前的民生凋敝、百业待兴到成为今天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为什么中华民族能够跳出近代以来内忧外患的悲惨绝境并短短几十年就“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为什么中国人民能够从衣单食薄的绝对贫困中解放出来,取得扶贫减贫脱贫事业“史诗般的奇迹”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新征程?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就是一部“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历史^{[2]64}。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不断深化改革开放,大力发展生产力,扫除制约民生幸福的障碍,大幅提升广大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一、习近平人民幸福观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也是习

作者简介: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ZD027)

作者简介:丁敏(1993—),女,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E-mail:2416646913@qq.com

近平人民幸福观的理论基础。准确完整理解习近平人民幸福观的具体内涵,有利于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实现。

幸福观与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密切相关。在西方哲学史上,无论是古希腊罗马时期自然主义幸福观,还是中世纪宗教幸福观,乃至近代资产阶级功利主义幸福观等,把幸福理解为空洞的快乐,或者理解为个人的自我完善、自我实现。简言之,这些幸福观都是形式化的、撇开社会制度是否正当这个前提而形成的抽象幸福论。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是在批判继承西方抽象幸福观的基础上,把人的幸福与社会发展和历史进程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幸福观。马克思主义幸福观追求的不再是幸福原则,而是实现幸福原则的制度保障。所以,在马克思看来,幸福的主体不是抽象、虚幻的人,而是“现实的人”;幸福不是纯粹的“自我意识”,而是直接现实性的存在;幸福是人民在劳动实践中创造的,但不是在劳动异化中实现的;幸福的终极状态是共产主义社会消除劳动异化,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全人类的普遍幸福。所以,为全体无产阶级谋解放、谋真正幸福的目标是马克思主义幸福观的根本价值所在,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根本价值所在。“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恰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评价的:“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为人类求解放。……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跨越国度、跨越时代的影响力,就是因为它植根于人民之中。”^[3]

毛泽东关于人民幸福的思想是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幸福观的基础上,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而形成的。他提出,“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4]在革命时期,他强调要把无产阶级革命与“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结合起来,制定《解决土地问题决议草案》等土地法规,满足农民对土地的需求,并提出在根据地实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领导农民进行生产,满足人民的生产生活需要。新中国成立后的建设时期,他继续进行土地改革,1950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彻底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实行农民阶级的土地所有制,真正实现“耕者有其田”。另外,他还引用《论语》中“百姓足,君孰与不足”,强调人民富裕与国家强盛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一化三改”的总路线,既消灭私有制生产关系,又增加工农

业生产产量,改善人民群众生活^[5]。总之,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通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实现人民幸福奠定了坚实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没有变,但人民幸福观的内容突显出“富起来”“强起来”的时代特色。粉碎“四人帮”以后,党中央果断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判断从“阶级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并确立“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使实现人民“富起来”的幸福实践有了正确方向^[6]。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三大提出了“三步走”战略,擘画了人民幸福的“小康社会”发展蓝图,使人民幸福的实现有了具体而确定的目标。江泽民同志坚持邓小平关于经济社会发展“三步走”战略,在十六大明确提出“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以造福于民^[7]。2005年,胡锦涛同志提出构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保障人民利益,确保人民安居乐业,从而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为谱写人民美好生活而努力奋斗^[8]。进入新时代,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为人民谋幸福的具体内容发生变化,习近平总书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保障、生态等5个领域的协调发展来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十九届五中全会开启了全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发展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继续推动区域协调发展、防止“中等收入陷阱”、把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相结合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保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扎实推进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可见,习近平人民幸福观在继承和汲取马克思主义幸福观和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同时期的特殊性的基础上具有了更科学、更系统、更完整的内涵。

二、习近平人民幸福观的核心要义

习近平人民幸福观以人民群众的幸福安康为出

发点和落脚点,是党的初心和使命之所系,强调党必须团结带领人民群众不断为美好生活而奋斗。其思想体现了个体幸福与社会幸福的统一、物质幸福与精神幸福的统一、奋斗幸福与目的幸福的统一、当前幸福与长远幸福的统一、潜在幸福与现实幸福的统一。习近平人民幸福观回答了什么是幸福、新的历史阶段如何实现幸福等根本问题,指明了以奋斗为途径、以党的领导为根本保障、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人民幸福观的核心内容,为扎实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提供理论遵循。

1. 人民群众是幸福的主体

幸福的主体是人民群众,又关涉每一个个人,是个体幸福与社会幸福的统一,体现人民地位至上。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为人民谋幸福”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求,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的主题和不变的初心,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共产党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为的是让人民过上好日子。”^[9] 习近平人民幸福观指明了党和国家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出发点是人民群众,落脚点还是人民群众,其实现需要凝聚人民力量,紧紧依靠人民。

幸福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人民群众。人民是幸福的主体回答了幸福“依靠谁”“为了谁”的问题。马克思把“人”理解为“现实的、历史的、从事活动的人”并将“现实的人”作为其历史观的出发点,进而阐明“历史的活动是群众的活动”,明确其追求的是“人民的现实的幸福”,体现了“人民”概念的量的规定性和质的规定性的统一。习近平人民幸福观中“人民”的概念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恰如他所表达的:“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我们力量的源泉。”^[10] 因此,一方面,人民是幸福的出发点。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解放而诞生,为人民创造美好生活而发展,人民始终是其实践的原点,是幸福的主体。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为人民谋幸福是党的初心和使命,要“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始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为人民利益和幸福而努力工作。”^[11] 另一方面,人民是幸福的落脚点,幸福由人民共享。要实现这一目标,就是把发展成果落到实处,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具体表现为:一是主体的全面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果属于个体、社会乃至每一个民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一个家庭,一个人都不能

少”^[12];二是内容的全面性,满足人民美好生活向往不仅要有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还要有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的改善以及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甚至还包括个人获得人生出彩的机会等。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曾说,社会主义的特征不是贫穷,而是共富。进入新时代,社会主义的富裕不仅是全体人民的经济富裕,还是除经济之外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协调满足。可见,新时代习近平关于全体人民富裕的思想既包括消除贫困,还包括创造多元化、多层次的需求的过程。

创造幸福要“深深植根人民”,发挥人民的根本力量。习近平总书记立足唯物史观提出,人民是“历史的剧作者”,实现幸福要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人民幸福决不是敲锣打鼓轻轻松松就能实现的,更不是靠某个英雄人物单打独斗就可以实现的,而是依靠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投身社会主义事业,才能一步步实现。自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就成为中国人民的历史任务”;进入新时代,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历史任务仍需要人民群众来实现^[13]¹¹²。另外,人民群众作为生产力中最活跃的要素,是发展生产、创造幸福的重要推动力量,即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剧中人”。习近平总书记称赞:“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真正的英雄。”^[13]³⁰² 他还特别指出,“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9] 他表示,踏上实现第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离不开无数有志青年的奋斗,离不开知识分子和劳动模范的智力支撑、创新支撑。他还勉励各行各业的青年要在自己的岗位中创造幸福:广大农村青年要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展现新形象,企业青年要在产品生产、研发中创造更多财富,广大科研单位青年要主动攻克难题,多出成果、机关青年要努力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水平和能力。所以,“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幸福需要一代代有志青年顽强拼搏、不懈奋斗,将需求转化为现实,才能实现,也如习近平总书记对青年的寄语:“梦在前方,路在脚下……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需要广大青年锲而不舍、驰而不息的奋斗。”^[14]

2. 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是人民幸福的基本内涵

美好生活需要推动物质幸福和精神幸福相统

一,并指引党为人民谋利益的工作方向,体现人民向往至上。美好生活需要是人民幸福的重要因素和动力,它源于现实矛盾和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其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为实现人民的物质幸福和精神幸福提供指导,同时也为党的工作指明方向。

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性推动人民物质幸福与精神幸福的实现。需要作为一种心理活动,是基于现实矛盾而作出的,是人们为满足自己的吃、喝、住、穿等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而产生的主观欲望,是客观与主观的统一。美好生活需要也是如此。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表明美好生活需要源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也表明了它作为一种主观欲望能推动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发现、解决。我国仍存在城乡、东西部发展不平衡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的发展不平衡,发展生产的方式仍未转向绿色生产的模式、发展效益还不能满足人民群众需要等不充分问题。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针对这些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作了一系列安排和部署,如推动中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以保证发展可持续的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来帮助贫困地区实现脱贫致富的脱贫攻坚战略以及提高维持社会稳定的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等。此外,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性,不仅注重物质幸福的实现,还注重精神幸福的发展。针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强调传承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学习借鉴世界优秀文化、以创新创造引领文化发展,以保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满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

美好生活需要指引党为人民谋幸福的工作方向。“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13]48}人民的需要对党的工作方向起决定作用。一方面,美好生活需要推动党员干部主动了解群众的需求和困难。党员干部在工作过程中,要贴近群众实际,了解群众的需要是什么。对于这一点,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3月19日接受金砖国家媒体采访时作了深刻的回答,当他被问及领导13亿人口的大国有何感受时,他回答说,中国有13亿人口,治理不易,光是把情况了解清楚就不易,只有“知道国情,知道人民需要什么,在实践中不断积累各方面经验和专业知识,增强工作能力和才干”,才

能做好人民群众的工作^[15]。另一方面,美好生活需要指引着党的工作方向。党的工作之所以具有科学性,在于要在深刻认识人民需要什么的基础上制定方针政策。2015年1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同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时讲到,党员干部做事要做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求真务实,真抓实干。2018年他在参加广东代表团审议时再次提出:“人民群众什么方面感觉不幸福、不快乐、不满意,我们就在哪个方面下功夫。”^[16]也正如巴西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罗尼·林斯教授所总结的:“中国取得巨大成就的最核心‘秘诀’就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理解人民真正的需求。”^[17]

3. 艰苦奋斗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基本途径

奋斗作为创造幸福的途径,表现为过程幸福与结果幸福的统一,体现人民力量至上。习近平关于奋斗幸福不仅强调劳动实践本身,还强调新时代劳动者应具有的一种精神状态。幸福与需要的满足相联系,而需要的满足有赖于劳动、奋斗。树立正确的奋斗幸福观,能帮助劳动群众正确处理好创造和享受、个人梦想与中国梦的关系,也能更好地享受幸福成果。

从结果看,“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18]奋斗作为劳动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它不仅强调劳动实践,还强调一种积极的劳动状态,表现为,如何劳动才能实现我国发展目标。恩格斯说:“追求幸福的欲望只有极微小的一部分可以靠观念上的权利来满足,绝大部分却要靠物质的手段来实现。”^[19]“需要—实践—新的需要—新的实践”的动态发展,揭示了人们为满足自己的不同需要而进行劳动实践的过程。人类需要的历史就是劳动实践的历史。从“满足物质生活”发展到“美好生活需要”,人的需要表现出数量、质量和层次的不同。而人的需求之所以能够被不断创造、满足、提升和实现,根本上源于劳动创造。因此,劳动是创造和丰富人们需求的基础,也是发掘和提升人们幸福的源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20]劳动是实现人民幸福的重要途径,还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发展的重要手段,“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历史的辉煌;也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今天的成就。”^[21]劳动创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重要物质基础,劳动者在劳动中改变了国家、民族、人民的面貌,为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精神动力。

从过程看,“奋斗本身就是一种幸福。”^[22]在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出现了一些扭曲劳动价值观的现象:有人把坐享其成当作目标;有人物化劳动,看不起底层劳动者;有人“凡尔赛”炫富引发社会矛盾等。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重视劳动者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根本力量作用,“那种无视我国工人阶级成长进步的观点,那种无视我国工人阶级主力军作用的观点,那种以为科技进步条件下工人阶级越来越无足轻重的观点,都是错误的、有害的。”^[23]他还提出:只有奋斗的人生才称得上幸福的人生,“全社会都要贯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重大方针。”^[21]这不仅是在破解劳动者与自身发展之间矛盾的基础上对人民主体地位的确认,强调奋斗的过程就是经历幸福的过程,还是对马克思关于劳动本身“成为人的第一需要”的坚持和追求。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如何对待劳动的重要论述,激发了劳动者的责任感、获得感,使其在劳动过程中积极展现自己的才能,实现自身发展。另外,习近平总书记还将劳动者的个人命运与社会、国家的前途命运结合起来,指明劳动者只有主动承担起时代赋予的使命,积极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才能在更高层次上实现发展、享受“自由自觉的劳动”。奋斗在抗“疫”一线的钟南山院士、努力让女孩走出大山的时代楷模张桂梅校长、把生命奉献给扶贫事业的黄文秀同志,这些兢兢业业、敬业奉献,为保障人民生命、生活负重前行的时代英雄践行了奋斗不止、为民谋利的劳动幸福观。

4. 中国共产党是保障人民幸福的核心力量

中国共产党以基本路线和制度保证人民当前幸福与长远幸福的统一,体现人民立场至上。共产党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就是为老百姓办事的,让老百姓生活更幸福就是共产党的事业^[24]。诠释了党之于人民幸福的重要意义,也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的所有力量的根源。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创造人民美好生活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既胸怀理想,又立足实际,根据我国基本国情制定基本路线,制定关系全局的战略决策,不断提升领导力,保证人民当前幸福与长远幸福的统一。

党的基本路线是保障人民幸福的政治路线。党的基本路线不同于党的各项具体的工作路线和政

策,它是党在一定历史时期指导全局的总路线、总方针、总政策的集中概括,是关乎党的事业、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问题。党的基本路线凝聚着党对一定历史时期实现人民幸福的战略目标的认识。党的十三大确立“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这个基本路线是依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来制定的,其重点是发展生产力,主要解决人与物之间的矛盾;进入新时代,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的基本路线,主要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矛盾^[25]。所以,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所制定的战略方针主要围绕如何实现每一个人的美好生活需要,如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等,从而使人民的幸福看得见、摸得着。另外,党的基本路线有利于抵制西方错误僵化思潮对实现人民幸福道路的影响。虽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已在中国成为共识,但关于“两个基本点”还存在一些争论。国内外还有一些反动派污蔑、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甚至反对改革开放。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就是对此问题的回应。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改革开放的前提,也是抵御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对中国侵蚀的盾牌,“没有四项基本原则,中国就乱了。”^[26]所以,它要求全体党员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始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为人民利益和幸福而努力工作”,不断提升自身的政治认知能力和工作能力,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敢于同诋毁党的基本路线的歪风邪气作斗争,敢于在大是大非问题上,表明态度和立场,从保证全国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能戮力同心,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为全体人民幸福而奋斗^[11]。也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正义是最强的力量。”^{[2]66}因此,党的基本路线是关乎人民群众的幸福线,体现了科学性、价值性和实践性的统一。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实现全体人民长远幸福的根本保障。实现全体人民幸福不仅要靠劳动实践,还要靠党的领导。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民族复兴必然是空想”,可以说,没

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想实现全体人民的幸福也必然是镜花水月^{[13]48}。中国共产党在百年的历史征程中,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带领人民创造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奇迹,不断满足人民对幸福生活的向往。这一奇迹不是轻松得来的,而是在发挥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和社会号召力的基础上不断实现的。其中,党的政治领导力是实现人民幸福的根本所在。政治领导力是党组织与领导对象在实践中产生的能力和影响力,它主要表现为对关系党和国家原则性、根本性问题的把握能力。在制定和实施人民幸福的方针政策的过程中,党要发挥总揽全局的作用,把准政治方向、强化政治指引,才能保证领导干部在落实民生工作上的主动性。“只有站在政治高度看,对党中央的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才能领会更透彻,工作起来才能更有预见性和主动性。”^[27]思想引领力是实现人民幸福的重要基础。思想引领力是党以理论信仰掌握群众、团结群众的能力。思想是行动的先导。随着我国社会发展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基本消灭绝对贫困,但相对贫困仍存在。如何继续保持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责任感和使命感,其前提在于思想觉悟的提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开展“两学一做”、党史学习教育等,使教育实践活动新成果切实转变为改造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行动,筑牢信仰之基,保证全体党员步调一致,朝着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共同努力。群众组织力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内在要求。群众组织力是党能够组织、动员人民群众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能力。人民幸福事业的实现必须依靠无数组织起来的人民群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一个家庭,一个人都不能少。”^[13]分散的个体并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去发展经济、解决问题。中国共产党通过严密的组织体系嵌入社会而把人民广泛组织起来,有利于14亿中国人民肩并肩、心连心,绘就实现全民幸福的画卷。社会号召力是实现人民幸福的源泉动力。社会号召力是党对人民群众的动员能力,其前提是两者利益的一致。党把人民幸福作为自己的工作方向和行动指南,才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号召社会总体力量投入到为人民谋幸福的事业当中。自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第三次分配”概念,并上升至国家战略的高度后,我国众多企业先后响应党和国家号召,特别是一些高科技企业

带头投资启动“共同富裕专项计划”,为推进全体人民幸福打下良好社会基础、提供持续动力。正如江亚洲指出:“第三次分配由社会机制主导,它有更强大的动力和足够的资源去提供文化艺术产品和服务,而这对于促进人们的精神富足和人的全面发展必将产生重大作用。”^[28]综上所述,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的提升和获得的过程都充满着对人民群众利益的价值选择和实现,这也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保障全体人民幸福的核心力量。

5. 促进共同富裕是实现人民幸福的现实追求

促进共同富裕作为实现人民幸福的具体实践途径,是将理论上对幸福的主观愿望转变为现实中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体现了人民利益至上。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反映着广大人民群众对幸福生活的向往。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完成,我国开辟出了一条与西方“始终以贫穷为前提、并且只有靠发展贫穷才能使自己得以发展的财富”^[29]截然相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在新的发展阶段,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完成,提出了要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人民谋幸福的着力点的动员令,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利益、谋幸福的价值理念,指明了把人民的幸福从理想转化为现实的道路。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反映的是人民群众对幸福生活的向往。马克思、恩格斯从唯物史观出发,揭露了资产阶级以劳动者的“活劳动”作为资本实现自我增殖的秘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构建“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新社会^[30]。在那里,“人人也都将同等地、愈益丰富地得到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发展和表现一切体力和智力所需的资料。”^{[31]326}马克思、恩格斯所勾勒的新社会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这一目标也为无产阶级政党带领人民谋幸福指明了前进方向。由此可见,共同富裕的道路就是实现人民幸福的道路,或者说,实现人民幸福的过程要在追求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实现。基于此,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人民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始终把追求共同富裕作为实现人民幸福的目标。建国初期,针对私有制给农民带来贫困问题,毛泽东论述了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观点:“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

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10]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多次强调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实现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关系人民幸福的东西。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在经济社会发展和居民财富不断增长的同时,居民收入差距呈扩大趋势,这不仅是影响持续发展的经济问题,还是影响社会稳定的政治问题。因此,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和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一方面,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以全体人民为对象,是对“先富带动后富”思路的实际展开,体现了使全体人民实现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决心;另一方面,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以多维度富裕为目标,不仅是追求物质财富的丰富,还是涵盖精神、文化、社会、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协调发展。“全体”“富裕”的统一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共同富裕的认识更加全面、系统,也体现了党中央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深刻认识和对走共同富裕道路的科学筹划。

新时代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更加注重全体人民的获得感、满足感。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虽然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就完成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的现代化过程,但是没有把握好“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之间的平衡,经济的快速增长带来的贫富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等问题影响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这一新阶段对共同富裕提出了新挑战和新要求:一方面,我国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制约了共同富裕的发展;另一方面,人民群众要求提升教育、就业、医疗、公共服务等方面的服务质量。因此,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实现全体人民幸福、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要更加注重协调性、均衡性。首先,我们依然要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来保障中国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继续“做大蛋糕”,为消弭“三大差距”提供经济基石。其次,要在“做大蛋糕”的同时更加注重以“分好蛋糕”为目标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在保证初次分配的基础上,以“小中取大原则”建立围绕全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等目标的社会保障体系,推进再分配领域的公平;以社会力量自愿原则助力贫困地区和弱势群体,推进第三次分配领域的公平正义,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

最后,要发挥党在推动共同富裕中的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32]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是中国共产党对人民作出的承诺,是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的现实表达。同时,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是一个渐进的奋斗过程,需要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群众统筹推进、久久为功。“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不能做超越阶段的事情,但也不是说在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方面就无所作为,而是要根据现有条件把能做的事情尽量做起来,积小胜为大胜,不断朝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迈进。”^[33]中国共产党在以高质量发展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过程中,调动全国范围内的各种资源,动员全社会力量,解决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扩大发展空间,消除生产要素的时空限制,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的协调性、缩小参与分配的要素的差距,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实现人与人之间发展的协调性,保证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三、习近平人民幸福观的时代价值

人民幸福的实现是一个过程,需要党和人民群众继续共同努力,扎实工作。习近平人民幸福观是对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明确为谁发展、如何发展等问题的回答,对巩固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及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有重要指导意义。

1. 增强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习近平人民幸福观以守住“民心”底线为党长期执政提供合法性基础。“人民是阅卷人”,人民幸福与否,不是以党员干部的政绩为准则,而是以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准。所以,习近平总书记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9],“民心”是党安身立命,乃至长期执政的根本所在。“合法性”是政治学领域的概念,指的是社会成员对一个政权组织的心理认同程度,即民心。也就是说,执政合法性取决于“民心”。党要赢得民心,就要永远坚守“初心”,保持“恒心”,在其执政活动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准确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不断改善民生、保障民主以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增强人民群众

对党的衷心拥护和政治认同。所以,执政合法性产生的效能不是无限的,只能在执政过程中持续一定时间。东欧剧变、苏共败亡,重要原因就是,执政党一味沉迷革命时所积累的合法性资源,而没有通过新实践继续巩固和创造新的合法性资源,最终丧失执政地位。1949年3月,为迎接新中国的诞生,中共中央把办公地点由西柏坡迁往北平,毛泽东同志称之为“进京赶考”。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党能否以史为鉴,继续保持“赶考”之心,始终坚守人民立场、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前进,是关系其长期执政的重要因素。

如今70多年已经过去,党长期执政的“赶考”仍未结束。在新发展阶段,党始终保持“赶考”心态,在工作中,要以满足人民群众在民生、民主等各个领域的需求为工作方向,从而为党长期执政赢得民意、民心基础。另外,党不断提升为人民谋幸福的执政能力,为党长期执政提供能力基础。“我们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追求老百姓的幸福。路很长,我们肩负的责任很重。”^[34]所以,为人民谋幸福,需要党立足当前阶段的发展实际,不断提升领导力,提高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能力,敢于迎接工作中的危机;不断提升执行力,在推进关系人民幸福方面的深化改革时,要敢于落实,面对矛盾敢于迎难而上,面对失误敢于承担责任,面对歪风邪气敢于坚决斗争;不断提升创造力,把学习和工作实践相结合,并根据新情况、新问题,创造性地推进工作。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只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才能让中国共产党永远年轻。”^[35]

2.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强价值共识

习近平人民幸福观不仅能指导当前阶段人民需要的满足,还能指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呈现出“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3个重要节点:新中国成立,中华民族实现站起来,人民摆脱被剥削、被压迫的命运,走上了创造幸福的光明正道;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明确提出:“我们集中力量搞四个现代化,着眼于振兴中华民族”,使中华民族富起来;党的十八大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党的十九大开启新发展阶段,并筹划分两步走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使中华民族“强起来”^{[26]357}。所以,新发展阶段是着眼“强起来”的阶段,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阶

段。之所以说它关键,是因为这一阶段面临着阻碍其目标实现的挑战,也有实现其目标的机遇。就挑战来说,国内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还没有完全得以解决;我国依旧面临来自西方大国攻击、围堵、欺凌的严峻挑战;就机遇来说,我国具有超大规模的经济体、超大规模的市场、全球最完整的产业体系、已成为全球第二大进出口国和投资来源、目的地等;求合作、谋发展仍是世界各国的共同愿望,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我国在其中占有重要席位。如何做到能抓住机遇、转危为机,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实现更大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前提。

改革开放40多年的历史表明,中国共产党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2]64}道路决定命运,审视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历经千辛万苦才找到的中国发展之路,全国各族人民要在党的坚强领导下,继续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乘势而上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在新发展阶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还面临创新不足、民生短板、城乡区域发展不协调、社会治理存在薄弱环节等问题,需要保持战略定力、培育中国精神。只要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勿忘昨天的苦难辉煌,无愧今天的使命担当,不负明天的伟大梦想,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埋头苦干、勇毅前行”^{[2]75},就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在新发展阶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还要凝聚中国力量。“人能群,彼不能群也”解释了力不足牛马的人能驭之的原因,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需要党的硬核领导力,还需要14亿中国人民的合力。所以,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教育”之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等关系民生的方针政策入手,其目的在于凝聚全国各族人民的力量,用14亿人的智慧和力量汇集起不可战胜的磅礴力量,“只要精诚团结、共同奋斗,就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人民实现梦想的步伐。”^[11]

3. 为全人类发展前途指明前进方向

习近平人民幸福观是关于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方案,为人类社会如何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世界性的普遍交往打破了各民族间的封闭状态,资本把每一个人、每一个民族都纳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系,成为相互联系的整体。马克思恩格斯曾描述了资本主义与交往的关系:“世界普遍交往彻底改变了各民族国家之间的交往方式与交往原则,推进了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进程。”^[36]随之而来的是,生产的全球化、国际化和精细化。发达资本主义与国家凭借资本、技术等优势,强势抢占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将中低端环节转移到后发国家,这样,全球分工的不同,形成以西方资本主义主导的“中心-外围”国际分工格局。钱乘旦描述为:“‘服务’集中在西方发达国家,工农业转移到非西方国家;资本通过‘服务业’即第三产业获取利润最大化,第二产业和第一产业匍匐于全球资本的控制下。”^[37]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仅控制后发国家的经济,导致贫富发展不均,还企图用强权政治干预其内政,导致后发国家政局不稳,常年处于战争状态,如美国涉中东事务,造成中东地区战争频发,人民生存困难,甚至为了解决资本引发的矛盾,公然转嫁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能源危机、生态危机等问题。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最大程度维护自身利益,大搞“逆全球化”。可见,经济全球化是资本的盛宴,逆全球化也是资本保护自身的反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总是凭借自己的经济实力以自己的意志塑造世界发展和交往范式,枉顾世界人民对社会美好生活的迫切愿望。

资本逻辑主导的现代世界市场体系,尽管创造过丰富的生产力和辉煌历史,但其毕竟是为少数大资本集团追求利益最大化服务的。在这样的世界生产基础上形成的世界交往、分工,都不符合世界历史发展趋势,也不符合人类美好生活的愿望,在政治上必然造成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矛盾和对抗。特别是当今,面临“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难题,资本逻辑下主导下的世界体系不能解决这个全球性问题。而中国共产党以“为世界谋大同”的责任担当,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为人类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和美好生活的实现提供了中国智慧。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提出一种超越资本主义“普世价值”的人类共同价值,强调“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尊重每个国家的发展利益;它还提出搭建“一带一路”合作平台,帮助其

他国家获得共享发展的机会,积极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使人类社会实现共同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超越了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倡导构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美好世界,实现共同繁荣。从而能使全人类从“虚幻共同体”走向“真正共同体”^{[13]55}。这恰恰回应了习近平人民幸福观,同时也表达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的事实和坚定决心^[9]。

四、结 语

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政党没有自身的特殊利益,它的使命就是实现最广大人民的幸福:“过去的一切运动就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31]411}中国共产党就是一个为绝大多数人谋幸福的政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9]新时代,在习近平人民幸福观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群众取得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胜利,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展望未来,中国共产党又带领人民群众踏上了实现人民幸福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中国人民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接近实现共同幸福的目标,比任何时候都更有信心、更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标志,也是人民幸福的重要内容。在新的“赶考”路上,我们要牢牢把握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目标的主动权,开创全体人民美好生活新境界。同时,作为一个具有高度人类情怀的党,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大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人类擘画并争取美好未来,恰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在人类追求幸福的道路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不能少。”^[38]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373-374.
- [2]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 [3] 习近平. 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18-05-05(002).
- [4] 毛泽东. 毛泽东文集: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67.
- [5] 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83:135.
- [6] 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13.
- [7] 江泽民. 江泽民文选: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543.
- [8] 胡锦涛. 胡锦涛文选: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285.
- [9]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21-07-02(002).
- [10] 习近平. 在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20-01-23(001).
- [11] 习近平. 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18-03-21(001).
- [12] 杜尚泽,霍小光. 脱贫攻坚战一定能够打好打赢——记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四川凉山地区群众并主持召开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座谈会[N]. 人民日报,2018-02-15(003).
- [13]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 [14] 习近平. 在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时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13-05-05(002).
- [15] 习近平接受金砖国家媒体联合采访[N]. 光明日报,2013-03-20(001).
- [16] 习近平参加广东代表团审议[N]. 人民日报,2018-03-08(002).
- [17] 瞩目中国道路 看好中国前景——外国人士热议中共十九大[N]. 人民日报,2017-10-17(003).
- [18] 习近平. 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二〇一八年新年贺词[N]. 人民日报,2018-01-01(001).
- [19]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45.
- [20] 习近平.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N]. 人民日报,2012-11-16(004).
- [21] 习近平. 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15-04-29(002).
- [22] 习近平. 在 2018 年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18-02-15(002).
- [23] 以劳动托起中国梦——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关心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纪实[N]. 人民日报,2015-05-01(002).
- [24] 开创富民兴陇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甘肃考察纪实[N]. 人民日报,2019-08-24(001).
- [25]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 人民日报,2017-10-19(001).
- [26]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27] 习近平.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确保“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开好局起好步[N]. 人民日报,2021-01-30(001).
- [28] 江亚洲,郁健兴. 第三次分配推动共同富裕的作用与机制[J]. 浙江社会科学,2021(09):76-83.
- [29]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五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57.
- [30]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787.
- [31]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32] 习近平. 深入学习坚决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确保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N]. 人民日报,2021-01-12(001).
- [33] 本报评论部. 既要尽力而为也要量力而行——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N]. 人民日报,2021-10-19(004).
- [34] 习近平. 这件事我要以钉钉子精神反反复复地去抓[N]. 人民日报,2019-04-19(001).
- [35]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中共一大会址引起热烈反响[N]. 人民日报,2017-11-02(002).
- [36] 李包庚. 世界普遍交往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J]. 中国社会科学,2020(4):4-26.
- [37] 钱乘旦. 全球化、反全球化和“区块化”[J]. 当代中国与世界,2021(1):8-11.
- [38] 习近平. 习近平出席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并发表主旨讲话[N]. 人民日报,2021-07-07(001).

(收稿日期:2021-11-09 编辑:高虹)

习近平关于青年工作重要论述的时代价值

艾楚君¹, 陈佳²

(1. 长沙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南 长沙 410114; 2. 湖南工程学院设计艺术学院, 湖南 湘潭 411104)

摘要:习近平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把握新时代青年的时代背景、群体特点、价值地位, 开立了“两个大局”交织期青年发展的新方位; 从理论、历史和现实3个向度上, 开设了“两个百年”交汇期青年成长的新道路; 充分运用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和系统思维, 开拓了重要战略机遇期青年工作的新思维; 明确青年工作的战略地位、时代主题、路径方法以及共青团改革方略, 开辟了新发展阶段青年工作的新路径; 为马克思主义青年观做出了新的贡献, 内蕴着丰厚的时代价值。

关键词:习近平; 新时代; 青年工作; 时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 D432.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4970(2022)01-0011-08

根据公开报道,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先后19次深入高校考察调研, 7次发表有关青年工作的主题讲话, 14次重要讲话中提到青年工作, 36次给青年或青年群体回信, 就青年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 形成了习近平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论述。这一重要论述是马克思主义青年观的新发展, 系统阐述了“青年工作的战略地位、中国青年运动的时代主题、青年工作的职责使命、青年一代健康成长的正确道路、青年工作的路径方法、共青团改革发展的目标任务”^[1], 内蕴着青年发展新方位、青年成长新道路、青年工作新思维、青年工作新路径4个维度的时代价值, 为做好新时代青年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一、开立“两个大局”交织期青年发展的新方位

马克思主义十分重视青年发展在实现社会变革、推动社会发展、实现奋斗目标中的重要作用, 并且将青年发展置于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具体社会条件中加以考察。习近平立足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时代背景下分析新时代青年的群体特点、判断新时代青年的价值地位, 开立了“两个大局”交织期青年发展的新方位。

1. 关于新时代青年的时代背景

新时代青年所处的时代背景是习近平关于青年工作重要论述的现实依据。新时代青年成长成才、求知问学、人生发展的黄金时期与实现“两个百年”

奋斗目标关键期历史性地叠合。首先,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人类面临的全球性挑战更加严峻”^{[2]465}。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元化和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浪潮中,不同国家意识形态、政治体制和本土文化等都将受到一定的冲击和影响;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互联网等为代表的现代高新技术加剧了社会交往的隐匿性和开放性,各种信息、价值观念、社会思潮呈指数性增长的态势深刻地影响着新时代青年的思维模式、价值观念、兴趣爱好和行为习惯。在此基础上,在应对全球性挑战、面对世界性问题、解决关键性技术、共度公共性危机以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方面的合作交流、交往互动将进一步日益加深;与此同时,别有用心的西方国家利用当代青年阅历较浅、社会认知不深、好奇心较强、价值观可塑等特点,从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来争夺青年一代、占领青年阵地的形势更加复杂和激烈,方式方法也更加多样与隐蔽。其次,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中,我国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经济总量不断提升、产业结构不断升级优化、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乡村振兴计划稳步推进……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的一系列巨大成就,为新时代青年成长成才提供了更加充足的基本保障,为新时代青年实现理想目标、施展才华、建功立业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平台,也为新时代青年工作提供了重要物质条件;与此同时,以区域、城乡、经济与社会、经济与生态等方面的发展不平衡,市场竞争、动能转化、体制机制创新等方面的不充分等为代表的社会经济不平衡不充分现象依然存在,客观上给青年成长成才的环境带来了新的挑战,也使得青年工作的任务更加艰巨。最后,从青年的现实需求和实际情况来看,青年工作在强化思想引领、推动创新创业、开展志愿服务、助力脱贫攻坚等方面都取得了实效,但随着形势的不断变化发展,青年的禀赋特点不断变化,青年的价值需求多样化,青年从业群体不断裂增,青年成长中迷茫、焦灼、困惑等深层心理情绪及其在现实中的各种表征呈现出多元化,使得青年工作面临新的挑战,呈现出复杂性和不可预测性等新问题。

2. 关于新时代青年的群体特点

新时代青年的群体特点是习近平关于青年工作重要论述的逻辑起点。历史是时代的凝固,时代是现实的历史,时代有其内在的、固有的特点,每一个时代的青年群体都烙印着鲜明的时代特征。马克思

主义立足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社会条件,全面辩证地分析不同时代青年在身心状况、心智结构、认识水平、精神气质等方面的群体特点并以此作为开展青年工作的逻辑起点。习近平坚持唯物史观,深刻把握新时代青年成长的客观环境,精准把脉新时代青年的群体特点,洞察新时代青年的优点与不足,将新时代青年成长中面临的问题予以具体化表达。

习近平肯定和赞誉新时代青年是“四可”的一代,即可爱、可信、可贵、可为的一代。新时代青年出生于改革开放以后,“年龄增长与中国社会的发展一路伴随,他们的视野更为开阔、知识更加广博、活动半径更为宽广”^[3];新时代青年面临开放的社会环境,既享受着前所未有的社会物质成果和高度发达的信息技术,也在多元文化、多样文明、多种思潮的交织碰撞和相互激荡中甄别、汲纳、借鉴着人类社会的精神文明。因而,习近平指出新时代青年“朝气蓬勃、好学上进、视野宽广、开放自信”^{[4]9},充分肯定了新时代青年在视野眼界、思想水平、认知能力、思维方式、观念兴趣、接受能力、主体意识等方面的群体特点。在“两个大局”背景下,新时代青年有着比历史上以往任何时代的青年都更开阔的视野、更扎实的学识、更敏锐的思维、更新颖的观念以及内生性的进取精神。

但是,由于在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和世界新的秩序形成的过程中,变迁与开放带来了诸多社会问题,使得青年在就业择业、婚恋交友、赡养父母、教育子女等方面存在一些客观实际困难;“三期叠加”的影响持续深化,阶层差异化难以在短期内消失,从而导致有关青年的社会热点问题不断出现,从而滋生出一些消极甚至不良的心态;再加上新时代青年是互联网的“原住民”,主体缺乏深刻的历史体悟和社会认知,使得“青年人阅历不广,容易从自身角度、从理想状态的角度来认识和理解世界”^[5],也容易“一遇挫折,就怀疑动摇,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了”^{[4]29};可以说“当代青年遇到了很多我们过去从未遇到过的困难”^[5],还存在着“在毕业求职、创新创业、社会融入、婚恋交友、老人赡养、子女教育等方面的操心事、烦心事”^[5]。习近平在时代背景下把握当代青年的身心特点、发展现状、社会心态和多元化多层次的现实需求,对新时代青年的群体特点和遇到的实际困难予以具体化的表征。

3. 关于新时代青年的价值地位

新时代青年的价值地位是习近平关于青年工作重要论述的目标旨归。青年具有体魄强健、精力充

沛、激情蓬勃、勇于进取、敢于创新等特点。马克思主义从来都把青年视为社会发展和接续事业的中坚力量,赋予了不同时代青年的价值地位。青年之于社会本质上是主客体的价值关系,即需要从青年主体担当时代大任的现实需要出发去把握青年的价值地位。

新时代青年既生逢盛世,又肩负重任,是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经历者、见证者,更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生力军;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参与者、建设者,也是中国梦建设成果的获得者、享有者。习近平对青年价值地位的考量,始终放在把握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两个大局”交织期的时代特征、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宏观视域中构建其理论架构,始终将青年的价值地位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和人类未来结合起来,赋予青年主体的价值承载。习近平提出“三有青年”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与希望,即“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2]54}。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布鲁日欧洲学院等国际场合重要演讲中还指出“青年是国家的未来,是世界的未来”^{[6]277},同时,多次强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终将在一代代青年的接力奋斗中变为现实”^{[2]54-55}。

习近平创造性地从历史逻辑的演进中考察青年成长成才的时代图景并以此彰显新时代青年的价值地位,即从新中国成立的探索、改革开放的实践、建党的历史、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发展进程、中华文明的发展史中,来考察青年一代的价值地位。习近平指出:当代青年“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时,很多人还不到60岁。也就是说,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你们和千千万万青年将全过程参与”^{[4]17}。这对新时代青年的成长阶段和所要经历的历史时期,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等重大历史事件的时间节点对接起来,勾勒出新时代青年成长的时代轨迹,从而激发青年成长成才的内生动力与责任意识。

二、开设“两个百年”交汇期 青年成长的新道路

马克思主义青年观坚持主客体的辩证统一,在历史演进和社会发展的实践逻辑中为青年的成长道路标位定向,以一定历史时期的客观社会要求和时代责任为依据,指引青年成长成才的道路选择。当

前,我国在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新征程需要凝聚起青年一代的磅礴力量,新征程赋予青年新使命,新使命呼唤青年新风貌。新时代青年担当新使命、展现新风貌,首要前提和逻辑基础是找到健康成长、全面发展的道路选择。习近平从理论向度、历史向度、现实向度对新时代青年提出了在坚定理想信念、树立爱国主义精神、担当时代责任、磨炼道德品质、练就过硬本领、立足基层一线等在青年成长成才中具有决定性、方向性、基础性作用的路径选择和具体要求,开设了“两个百年”交汇期青年成长的新道路。

1. 理论向度:在培根铸魂中擦亮人生底色

对青年进行思想理论武装和价值引领是把牢青年人生方向、筑牢青年人生根基的内在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优良传统。在继承这一传统的基础上,习近平强调,青年处于人生阶段的“拔节孕穗期”,成长成才的关键期,用科学理论武装青年,擦亮青年的人生底色,是对青年进行培根铸魂的夯基工程。

一是习近平深刻阐释了用科学理论武装青年的价值旨归。科学理论作为意识范畴和客观现实的反映,具有强大的能动作用和改造力量。习近平强调要教育引导青年对马克思主义有深刻理解和正确认识,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青年,勉励青年要在研读马克思主义的原著原文中悟真理力量,吸精神滋养,掌握并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原理和方法,认识事物、分析问题、恪守正道、明辨是非、改造世界,从而筑牢理想信仰之基,把牢人生方向之舵。二是习近平提出理想信念是精神之“钙”的重要论述。对青年提出希望和勉励时,总是首提或强调青年要树立远大理想,指出“青年的理想信念关乎国家未来。青年理想远大、信念坚定,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无坚不摧的前进动力”^[5],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中物质与意识关系的基本原理。习近平将坚定青年理想信念作为培根铸魂工程,要求青年以坚定的理想信念擦亮青春底色,激发青春动能。同时指出“当今中国最鲜明的时代主题,就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4]18},勉励青年“要树立与这个时代主题同心同向的理想信念”^{[4]18}。这一论断,将青年的理想信念进行具体化表征和形象化表达,立足时代主题、紧扣时代气息、凸显时代特色,摒弃了抽象和空洞。三是

习近平赋予了青年责任担当的时代内涵。勉励新时代青年发扬奋斗精神,勇担时代责任,注重用富有时代气息的责任观、奋斗观凝聚中国青年的力量,深刻把握青年时代责任的逻辑理路,要求青年将时代责任内化为精神品格和价值追求;还从不同时代的青年在不同历史时期担当时代责任的生动实践和具体事例中,激励新时代中国青年树立强烈的责任意识,强化责任担当行为,如充分肯定青年在奥运会等事关国家尊严的大事,新冠肺炎疫情等公共危机事件中的优秀表现和责任担当行为。将青年责任与时代使命、社会需求、现实需要等结合起来,揭示了青年与时代这一主客体的内在统一。

2. 历史向度:在历史体悟中厚植爱国情怀

新时代青年普遍缺乏深刻的历史体悟,没有经历过民族存亡的体验、血与火的考验以及艰难困苦的奋斗。习近平坚持大历史观,深刻论述爱国主义的强大精神动能,指出“历史深刻表明,爱国主义自古以来就流淌在中华民族血脉之中”^[5],将青年树立爱国主义精神、厚植爱国主义情怀作为青年的立德之源、立功之本。

一方面,习近平深刻阐释了爱国主义精神与青年立身、成才的逻辑关系,指出“对新时代中国青年来说,热爱祖国是立身之本、成才之基”^{[2]334}。坚持历史叙事方式,在有关爱国主义的重要论述中,从中华民族发展史、近现代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的宏观视域,分析近代以来爱国主义在民族独立、革命斗争、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等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厘廓了青年树立爱国主义精神的历史逻辑。习近平把握新时代爱国主义的本质,指出“爱国主义的本质就是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高度统一。”^{[2]334},丰富和深化了对爱国主义的认识,明确了当代青年对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内在逻辑的认知。另一方面,习近平勉励广大青年树立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厚植爱国主义情怀。注重用近现代史上思想家、教育家、革命家的历史叩问、家国情怀、革命精神和故事教育青年,如在全国教育大会和考察南开大学时,引用教育家张伯苓的历史“三问”。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引用杨靖宇、赵一曼、江姐、邱少云等革命先烈的事例。同时还从青年身边的典型人物中示范引领青年树立爱国主义精神,给“硬骨头六连”、内蒙古边防官兵回信,充分肯定守岛英雄王继才、嫦娥团队、神州和北斗团

队的爱国主义精神。

3. 现实向度:在实践锤炼中做到德才兼备

习近平坚持青年的成长发展需要与时代使命相适应的目标导向,要求青年追求德才兼备的成长目标。就青年加强道德修养、练就过硬本领、立足基层等涉及青年主体全面发展的重大问题做了系列重要论述,这是青年成长的路径选择,更是青年发展的具体目标,体现了认识论与方法论的高度统一,是对马克思关于青年全面发展的创新表达和现代转换。

一是涵养高尚道德。首先,习近平将马克思主义道德观与实践观相结合,强调新时代青年要在具体的道德实践中提升道德认知、涵养道德情怀、锤炼道德修为。其次,习近平注重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经常以中华经典中关于修身立德的格言警句来强调青年锤炼道德品质的重要性。最后,习近平突出“品德”的重要性,指出“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6]168},将品德纳入一个国家和核心价值观的范畴,要求广大青年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并以此夯实自身人生的根基。二是练就过硬本领。在新一轮科技和工业革命中,以新一代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量子通信、基因工程等为代表的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层出不穷,这对新时代青年的能力素质结构以及知识本领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因此,习近平在深入高校考察、与青年代表座谈中,多次指出青年要“努力掌握科学知识,提高内在素质,锤炼过硬本领”^{[2]336},要“下得苦功夫,求得真学问”^{[6]172},增强知识储备,提升专业技能,具备服务社会、建功立业的本领,努力成大才、担大任。三是标注基层导向。习近平具有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在基层一线的奋斗中不断深化认识与实践的辩证关系,厚实了实践观的思想内涵与价值意蕴,为青年选择和青年的社会实践标明了基层坐标。多次寄语和勉励青年要艰苦奋斗,选择到最基层、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在给河北保定学院西部支教毕业生群体代表、给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毕业生的回信中,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等重要场合的讲话中,都希望青年人“到基层和人民中去建功立业,让青春之花绽放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4]51}。

三、开拓重要战略机遇期青年工作的新思维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

略机遇期,作为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发展阶段客观反映的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国际形势和国际环境错综复杂,这就带来了新特征和新要求,新矛盾与新挑战。青年工作如何抓住机遇,应对挑战,需要有新的思维。

习近平关于青年工作重要论述,擘画了青年工作的具体实践,充分运用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为新发展阶段重要战略机遇期开展青年工作提供了根本思维遵循和科学方法论,开拓了重要战略机遇期青年工作的新思维。

1. 运用战略思维谋大局,把握青年工作的主动性

“战略思维体现在对青年发展与青年工作的战略地位的价值判断。习近平将青年发展置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中定位,将青年工作置于国际层面和未来视域中谋划”^[7],习近平坚持运用战略思维谋大局,牢牢把握青年工作的主动性。从历史维度来看,习近平强调,“青年工作抓住的是当下,传承的是根脉,面向的是未来,攸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1],这一论断为如何在宏大的历史视野中认知青年工作、开展青年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强调了青年工作要从大历史观出发,要看到不同历史时期青年肩负不同的历史使命与社会责任,要看到不同历史时期青年运动的不同时代主题,在此基础上从不同历史时期青年工作的主要做法、普遍经验和基本规律中得出有益的借鉴和启迪;立足于新时代这一新的历史方位,着眼于青年工作的现实,研判青年工作面临的内外环境、历史机遇与风险挑战,使青年工作符合青年特点、顺应时代主题和回应现实要求;青年工作也要面向未来,推进青年工作不可急功近利,而要作为永续发展的大计,在继承创新的基础上长远谋划。从现实维度来看,就青年工作立足现实需要、把握新时代青年和共青团工作的特点,顺势而为、抢占先进、把握主动,习近平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战略思考、谋划、决策和部署。习近平身体力行将青年工作置于党和国家事业的全局中统筹谋划推进,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家行胜于言的实践品格。青年工作要把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作为主题主线,因此,习近平关于青年工作重要论述,突出强调了青年工作要贯彻党的大政方针、基本方略,要围绕着“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来确定青年工作的理念、规划青年工作的内容、制定青年工作的线路,从而彰显青年工作的价值承载和使命

担当。从实践维度来看,青年工作必须在社会发展的逻辑运动中,把握青年特点、适应青年需要、顺应时代主题、符合现实要求,青年工作的具体实践中要有不同的脉理方法、逻辑进路,要分析兼顾不同群体、不同阶层、不同年龄青年在思想动态、价值诉求、职业期望、就业选择等诸多方面的差异化需求,从而广泛凝聚青年、有效服务青年,把握青年工作的主动性。

2. 运用创新思维添动力,体现青年工作的时代性

创新思维是一种基于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性,通过对象世界和自我世界的不断调节,促进旧事物向新事物转化的方法和策略,是一种联系性、过程性、开创性的思维方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构建新的发展格局,必须要有促进发展的创新思维。习近平强调,青年工作要运用创新思维,做到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为体现青年工作的时代性指明了方向。一是要做到因事而化,青年工作因事而化就是要走进青年、贴近青年,精准把握青年思想动态,积极回应青年关切,帮助青年释疑解惑;要使青年工作符合青年身心特点、结合青年现实需要、满足青年价值诉求。二是要做到因时而进,就是要求青年工作要做到把握时代主题,体现时代特色,创新方式方法,在社会运动的逻辑中凸显青年工作紧跟时代步伐,在时代发展的浪潮中使青年工作的思想理念、目标任务、基本原则、主要内容和方式方法及时根据时代发展,体现时代要求,做到与时俱进。三是要做到因势而新,习近平指出,“要运用新媒体新技术使工作活起来,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8]378},体现了开展青年工作要立足客观社会条件和环境形势的变化并不断创新发展,针对当代青年成长于网络信息时代、热衷于网络社交,青睐新型媒体等新的特点,创新青年工作的载体平台,有效利用媒体技术,使青年工作的方式方法、手段载体体现新发展阶段的时代性。

3. 运用辩证思维抓关键,增强青年工作的针对性

辩证思维是从事物的各个方面及其相互联系对其进行考察,从而能够在整体和本质层面完整地认识对象,在矛盾的运动变化中抓住主要矛盾,解决关键问题。习近平关于青年工作重要论述内蕴着深刻的辩证思维,为青年工作抓主要矛盾、抓关键从而促进系统优化、带动整体发展,增强青年工作的针对性提供了方法论指导。一是习近平提出青年工作“关

键是抓住3个根本性问题”的重大论断,即“把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把巩固和扩大党执政的青年群众基础作为政治责任,把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作为工作主线”^[1]。其中,根本任务是青年工作的目标旨归,政治责任是青年工作的属性指向,工作主线是青年工作的实践属性,三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旗帜鲜明地明确了青年工作的职责使命,与时俱进地开拓了青年工作职责观、使命论的新境界,深刻回答了青年工作“干什么”“为谁干”“怎么干”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指明了青年工作针对什么任务、针对什么责任、针对什么主线的方向。二是习近平关于青年工作重要论述中提出了青年工作九个方面的重点和关键,即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加强对青年政治引领、强化青年理论武装、动员青年建功立业新时代、扩大团的工作覆盖面、落实好《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落实从严治团要求、抓好团干部队伍建设和“九个方面”的重点论明确了青年工作的领导力量、政治属性、根本方向、基本遵循、价值追求,明确了青年工作的基层导向、基本力量和基本制度保障等;增强了青年工作在制度设计、理念思维、实施路径、方法策略上的针对性、指导性和实效性。三是对青年成长成才提出了“六点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多个不同场合给青年的成长成才提出了系列殷切期望、具体要求,这些期望和要求具有丰富的科学内涵,也具有内在的耦合关联,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新时代中国青年要“树立远大理想”“热爱伟大祖国”“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练就过硬本领”“锤炼品德修为”^{[2]334-337}。这六点要求是习近平对青年成长成才系列要求和期望的高度概括,也是深刻剖析新时代青年群体特点,精准标定新时代青年历史使命,把握青年成长成才基本规律和历史经验,分析青年社会文化心态方面存在主要问题的基础上,抓住新时代青年成长成才过程中的主要矛盾而提出的要求,“六点要求”既是新时代青年成长成才的基本要求,也是衡量标准,还是路径选择,对新时代青年成长成才具有极强的针对性、指导性和现实性。同时,“将青年的历史责任与中国发展趋势、社会变革指向及时代走向紧密结合,具有深刻的现实性与时代性”^[9]。

4. 运用系统思维促改革,提升青年工作的实效性
系统思维是将事物看作综合整体,并对一整体

的组合要素、层级结构、状态功能等综合考察,使得系统要素有序组合排列成各个不同的子系统,形成矢力方向一致的合力,寻求整体性推进,以提高工作的实效性。习近平反复强调要善于运用系统思维分析青年工作特点、明确青年工作目标、系统推进青年工作、形成青年工作合力,在有关青年工作的思维和决策中,彰显出系统思维方法的科学性与协同性。一是提出了“青年优先发展”论,在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中提出:“青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力军和中坚力量。党和国家事业要发展,青年首先要发展。”^[10]这是将青年发展置于经济社会发展、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这一系统中加以考察得出的重要论断,是青年工作的理论创新,使得“青年优先发展”由人的发展理念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同时,从青年思想道德、青年教育、青年健康、青年婚恋、青年就业创业、青年文化、青年社会融入与社会参与、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和青年社会保障10个重点领域提出了青年发展目标和发展措施,使青年优先发展由理念转化为系统的、具体的政策措施和工作项目。二是提出青年工作系统论,习近平指出青年工作要战略谋划、系统推进,要从教育发展、科技创新、生态环境、医疗服务、网络媒体、创新创业、就业帮扶等多重系统要素中综合考虑和把握青年工作的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统一,确保青年工作能根据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发展环境、不同发展条件,平稳而有序地进行,力求青年工作取得实效。这体现了坚持统筹兼顾的原则,也为做好青年工作提供了方法论。三是提出青年工作合力论。习近平多次强调,要形成全社会关心青年、支持青年工作的局面,指出“关心和支持青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5]。强调了全社会、全方位、多力量做好青年工作的责任担当,体现出做好青年工作需要依靠全社会共同努力、形成合力的内在需求,也彰显了青年工作要凝聚各方力量、形成强大合力的现实要求。

四、开辟新发展阶段青年工作的新路径

马克思主义青年观包含着青年工作的基本方略和策略路径。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我国发展面临的环境和条件也将发生深刻的变化,市场和资源等发展要素以及内需潜力不断释放,要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

展格局”^[11]。这就要求青年工作必须立足新发展阶段、适应新发展阶段、服务新发展阶段。习近平身体力行推动青年工作,部署共青团改革;强调和要求明确青年工作的战略地位、标定青年运动的时代主题、把握青年工作的路径方法以及确定共青团改革方略,开辟了新发展阶段青年工作的新路径。

1. 明确青年工作的战略地位

马克思主义从来都赋予青年工作在执政党事业中的重要战略地位,将培养教育青年作为确保执政党事业后继有人的战略性基础工程,将青年工作作为执政党事业的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始终肩负着教育青年、动员青年、组织青年、发动青年的历史责任和使命担当,形成了不同历史时期对青年以及青年工作地位和作用的认识”^[12]。习近平将青年工作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实践逻辑加以考量,将青年工作作为党和国家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把青年工作上升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深化了青年工作在党和国家整体事业中基础性地位、全局性影响、战略性作用的认识。习近平在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等5次座谈会、给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毕业生等青年群体的3次回信、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等10余次重要讲话中都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各级领导干部以及全社会要关心青年成长,要支持青年工作,“做青年工作的热心人”^{[4]99}。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则指出“把青年一代培养造就成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是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战略任务,是全党的共同政治责任”^[5]。同时,习近平把青年工作置身于实现奋斗目标的历史逻辑,聚焦于建设现代化强国的行动逻辑,将青年工作与党和国家整体战略布局相统一,使围绕大局、服务中心的工作主线贯穿青年工作始终,让青年成长成才的过程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进程紧密契合,充分发挥青年工作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聚焦打好‘三大攻坚战’中的生力军和突击队作用,使青年工作切实实现为党分忧、为党尽责”^[13]。明确了青年工作的战略地位,深刻阐释了青年工作对党和国家事业的重要战略价值。

2. 标定青年运动的时代主题

时代主题是凝聚力量的旗帜,是团结奋进的航标,每一个时代的社会运动总是时代主题的鲜明体

现。青年运动既是青年一代成长成才、激扬青春的生动体现,也是青年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青年运动作为社会运动的客观反映和重要组成,总是激荡起鲜明的时代主题。习近平在把握历史和社会发展中内在矛盾运动规律的基础上,分析不同历史时期青年运动的不同时代主题,赋予不同历史时期青年运动的价值逻辑,指出五四运动以来,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国青年运动把握时代主题,与时代同向同行,为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国家的富强民主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是对五四运动以来,我国不同历史时期青年运动主题的理论抽象与历史画像。同时,习近平立足新时代历史方位和新发展阶段的现实基础、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指出“新时代中国青年运动的主题,新时代中国青年运动的方向,新时代中国青年运动的使命,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同人民一道,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2]333}。这一重要论述既是对五四运动以来青年运动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的概括,也是结合历史方位和新的发展阶段对新时代青年运动时代主题的标定与确立。

3. 把握青年工作的路径方法

路径与方法是开展工作的具体形式,是落实工作理念的实践形态。习近平关于青年工作重要论述指明了青年工作的实践路径和基本方法。一是坚持党的领导,提升青年工作的领导力。坚持党的领导是青年工作的根本保证,也是青年工作必须彰显的政治属性;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确保青年工作方向不偏、道路不变,才能强化青年对党的事业的政治认同、情感认同和理性认同,进而自觉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二是突出思想引导,提升青年工作的引领力。青年工作的根本任务和政治责任内在地决定了要教育引导、团结凝聚青年并最终赢得青年。因此,青年工作要突出引领功能,采取青年易于接受、喜闻乐见的传播方式,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青年、引导青年;创新思想引领的路径方法,从理论、历史、实践等多重逻辑和多维视角,通过转换话语体系、运用符合青年接受心理特点的方式向青年讲透党的理论、讲好中国故事。三是强化服务功能,提升青年工作的服务力。习近平多次指出,要关心青年、关爱青年、支持青年、服务青年。这是党的宗旨和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在青年工作领域的体现。因此,青年工作要关照新时代青年利益诉求多样、职业结构

多元、现实压力存在的客观实际,强化服务功能,提升服务能力,帮助青年解决面临的实际困难,满足青年合理正当的价值诉求,使青年工作立足青年之所思、解决青年之所忧、满足青年之所盼。四是加强团干队伍建设,提升青年工作的组织力。团干队伍是提升青年工作组织力的“关键少数”。习近平要求和强调团干部要做青年友、不做青年“官”,指出要从思想政治、能力作风、担当精神等方面加强团干队伍建设。因此,团干部要加强理论武装、保持政治定力、锤炼优良作风、提升工作能力;能够积极应对当前青年城乡间流动性大,新兴青年群体和青年组织不断涌现,青年阶层分布多元等给组织动员青年带来的新挑战,找准组织青年、动员青年的切入点和结合点,提升青年工作的组织力,使青年工作的开展围绕着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服务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大局,彰显青年工作的职责使命。

4. 确定共青团改革的基本方略

习近平把共青团组织建设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14],就共青团自身建设和改革发表了系列重要讲话,明确了共青团改革的基本方略。一是加强政治建设,明确了共青团改革的方向性。改革的方向是决定改革内容和改革实效的根本性、关键性问题。习近平指出“党旗所指就是团旗所向”^[1]“政治性是群团组织的灵魂,是第一位的”^{[4]69},这些重要论断旗帜鲜明地指明了共青团组织的政治属性,指出了共青团组织的本质属性是政治组织。共青团组织既不同于政府机关的行政组织,又不同于社会力量自发的民间组织,也不同于专注于公益事业的公益组织,因此,其改革必须把加强政治建设作为改革的首要任务和根本方向。二是聚焦主责主业,把握了共青团改革的原则性。习近平要求共青团改革要“强三性”(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去“四化”(行政化、机关化、贵族化、娱乐化),要求共青团改革要聚焦教育引领青年、团结凝聚青年、竭诚服务青年的主责主业和工作主线;坚决克服共青团工作与时代相悖、与青年特点和现实需要脱节、与中心工作疏离的现象;着力破解阻碍共青团工作发展的顽瘴痼疾。习近平还形象地运用“公转”与“自转”的关系来形容群团组织的改革、建设中既要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又要聚焦服务青年搞好“自转”。三是坚持问题导向,突出共青团改革的实效性。习近平在有关重要讲话和同团中

央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直言不讳指出问题,如共青团组织存在“四化”倾向的问题,主责不聚焦,主线不明确等等问题。要求共青团改革要坚持问题导向,“不掩饰问题,不讳疾忌医,对症下药,刮骨疗伤,真正从思想上、工作上、制度上把这个问题解决好”^[1]。要围绕着共青团的职责使命,直面和查摆问题、攻坚克难,除病去疾,在改革中增强青年工作的实效性。四是加强基层建设,抓住共青团改革的根本性。习近平要求要提高团组织的覆盖面,激活团的“神经末梢”,创新基层团组织的组织方式、活动方式,着力提升基层团组织的活力。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代表广大青年赢得广大青年依靠广大青年 让广大青年敢于有梦勇于追梦勤于圆梦[N].人民日报,2018-07-03(001).
- [2]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 [3] 肖建国,石展.习近平关于青年教育重要论述的旨要、价值与践行[J].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3(2):13-20.
- [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青少年和共青团工作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 [5] 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9-05-01(002).
- [6]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 [7] 朱尉.习近平青年工作重要论述的生成逻辑与结构特征[J].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0,6(4):130-137.
- [8]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378.
- [9] 李佳威,包大为.新时代中国青年历史使命的理论内涵与实践指向[J].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20(3):22-30.
- [10]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N].人民日报,2017-04-14(006).
- [11] 习近平.在企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0-07-22(002).
- [12] 周育国,黄宝成.“五四”以来中国青年运动正确的历史方向[J].青年探索,2021(3):27-38.
- [13] 贺军科.如何做好新时代青年工作[J].中国共青团,2020(11):2-5.
- [14] 习近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N].人民日报,2014-02-18(001).

(收稿日期:2021-06-21 编辑:许宇鹏)

论党对“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面领导

——以根本依据、体制机制及能力要求为研究视角

周湘宁¹,张利军²

(1.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88; 2.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信息资料馆,北京 100017)

摘要:“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首要原则,就是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其依据在于,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是我们全部事业的根本基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政治稳定、社会进步、民族团结和文化繁荣等前提条件,是一项贯穿于各个历史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的政治原则,是“十四五”时期应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复杂局面的根本保障。坚持和完善党对“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全面领导的体制机制,必须在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贯彻落实“两个维护”的要求,充分发挥党总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坚持和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加强党的严密组织体系建设,继承和发展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科学制度。持续提高党推进“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需要持续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政治能力,持续提高党系统性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领导经济社会工作科学化、法治化的能力,以党的高质量建设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能力。

关键词:“十四五”规划;经济社会发展;党的全面领导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4970(2022)01-0019-05

未来30年,我国将处于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发展阶段。对我国所处历史方位作出这一战略判断的深刻依据在于,我们已经具备了在更强大物质基础上实现更为宏大目标的能力。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为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提供了政治稳定、民族团结、社会进步、文化繁荣等根本保障,是实现这一伟大跨越的根本原因。“十四五”时期是我国新发展阶段的第一个五年,始终坚持党的

全面领导,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历史与现实意义。目前学术界、理论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集中于探究其根本原因。“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的逐步推进,向我们提出了进一步研究该问题的要求。这不仅需要将根本原因从横向、纵向、长远等方面做立体式阐述,而且需要对其实践保障如体制机制、能力要求等做深入阐释。笔者旨在从上述方面对这一理论与实践要求给予回应。

基金项目:中共中央宣传部2019年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自主选题项目;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专项研究课题(20ZX37)

作者简介:周湘宁(1986—),女,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党的建设和党的学说研究。E-mail:zhouxiangning1224@163.com

一、坚持和加强党对“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全面领导的根本依据

从根本来看,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为我们全部事业构筑了牢固地基。习近平指出,“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1],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深刻洞察中国社会历史演进基础上所凝练出的宝贵智慧。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从国势衰微走向繁荣富强,就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凝聚与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磅礴之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化解阻碍实现目的的种种矛盾,克服达成目标的重重困难,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挑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世所公认的历史性成就。党的十九大强调,新时代必须“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2]14}。历史和现实已经启迪我们,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决定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决定着党和人民全部事业的未来图景,决定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决定着人类大同伟业的未来趋势。“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根本保证”^{[3]25}。

从横向来看,坚持党的领导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政治稳定、社会进步、民族团结和文化繁荣等前提条件。经济社会与政治、文化、民族、外交等工作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思维方式,统筹协调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将经济社会这个子系统纳入国家治理的复杂系统。党根据科学理论制定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充分发挥严密组织体系和强大组织能力的优势,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政治和社会稳定等前提条件,并推动经济社会与政治、文化等领域工作相互促进协调发展。就政治稳定而言,习近平指出,“在国家治理体系的大棋局中,党中央是坐镇中军帐的‘帅’,车马炮各展其长,一盘棋大局分明”^{[4]9},从而保证了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开创出各民族人民团结奋斗、繁荣发展的良好局面。党的领导是凝聚起全社会共识最为强大的向心力,是保障社会稳定最为坚固的定盘星,是推动社会进步最为强劲的发动机。党始终坚持对意识形态领域的集中统一领导,不断提升全社会的思想道德层次,不断开辟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发展境界,不断推动文化产业实现

高质量发展,有力保障了社会主义文化持续繁荣。

从纵向来看,坚持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领导是一项重大政治原则,在党的各个历史时期的理论与实践之中均有充分体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了满足革命战争所需要的物资力量,我们党十分重视“进行各项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5]。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深入乡镇村庄的社会治理体系,这样的经济社会建设成就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的作用,统筹协调各方面积极力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拨开经济社会现象的重重迷雾,洞悉世界经济社会的发展趋势,科学判断、积极适应、主动引领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提出并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深度和广度、新旧动能转换速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度等经济社会发展关键领域和重要环节均达到历史性高度,生态建设进一步加强,经济对外开放水平持续提升,经济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认为,“十三五”时期,在党的领导下,我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大幅提升,“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成就”^{[3]19}。由此构筑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进入了新发展境界的坚强支柱,进一步夯实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坚实基础。

从长远来看,“十四五”时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关键阶段,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更加不能离开党的全面领导。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中国共产党始终都是引领中国前行方向的指南针、支撑中国人民劈波斩浪的主心骨、推动中华巨轮行稳致远的压舱石。“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3]20},我们必须虑之于未有,因势利导,化险为夷。我们所取得的巨大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离不开党的全面领导,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越是巨大,就越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中国共产党诞生于内忧外患,成长于挫折磨难,在应对风险中发展壮大,在战胜挑战中磨砺成长,已经将居安思危的强烈忧患意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具备了种种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过硬本领,有能力“力争

不出现重大风险,或在出现重大风险时扛得住、过得去”^[6],有能力利用一切有利形势,团结一切能动力量,推动局面转危为安,最终推动我国经济社会朝着既定方向顺利发展。

二、坚持和完善党对“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全面领导的体制机制

第一,将“两个维护”的要求贯彻到经济社会发展一切领域、所有方面、各个环节。“十四五”规划《建议》要求,实现“十四五”规划,必须做到“两个维护”。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必须首先严格遵守,不断完善党对经济社会发展全面领导的体制机制,确保“两个维护”生动地体现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之中。始终牢记“两个维护”的各项要求,当地方利益、部门利益与整体利益不完全一致时,必须以全局观念克服本位主义,做到坚决果断、毫不犹豫地落实中央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决策部署,以研究具体的办法切实反对喊口号,以实施具有针对性的举措切实反对搞形式、走过场,以拿出经得起时间检验的过硬措施切实反对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坚持和完善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确保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件件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项项贯彻,“切实把‘两个维护’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7]。

第二,充分发挥党总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协调社会经济发展各方的核心作用。要超越不分事情大小的事务主义,坚持把重点放在把方向、谋全局和抓大事上。把方向,就是坚持要以正确政治方向科学判断“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态势,坚持以正确政治立场来积极引领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坚持以正确政治理论来塑造经济社会发展内涵,坚持以正确政治方法来评价经济社会发展效果,坚持以正确政治原则来分配经济社会发展成果。谋全局,就是要“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3][21]},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创造和争取良好的国内外条件。抓大事,就是要注重抓住和解决“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根本性、长期性、全局性的关键问题。进一步把党总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地位,落实到关于“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政策措施、工作总体部署之中,实现我国经济社会总体性、全面性、系统性发展。

第三,坚持和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先进性、全面性、系统性、连续性和整体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鲜明优势。习近平强调,“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要同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紧密结合起来”^[8]。“十四五”期间,坚持和完善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必须以系统论的思维来处理经济社会发展体制机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制度之间的关系,优化不同体制机制在国家治理结构中的定位,协调发挥不同体制机制的配套功能,立足各项制度的全局,防止顾此失彼。因此,只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在充分发挥制度体系总体作用的基础上,有效发挥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的作用,从而实现党中央“十四五”规划《建议》的所有任务。

第四,加强党的严密组织体系建设。“十四五”规划《建议》指出,“完善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有效落实”^{[3][66]}。十八大以来,党修订出台了多项党内法规,令行禁止、言出法随,为各级党组织规范运作,全体党员规范言行,提供了法规遵循,进一步锻造了党的首尾相应、上下贯通的严密组织体系。在“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中,要充分满足新的现实发展的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法规制度建设。各级党组织必须最大限度地加强党中央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集中统一领导,最大限度地激发“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创造活力。中央组织必须切实肩负“最初一公里”的使命,地方组织必须完全体现“中间段”的价值,基层组织必须充分发挥“最后一公里”的作用,党员必须有效履行“肌体细胞”的职责。各级党组织必须始终维护中央的大脑和中枢的根本地位,以严密组织体系确保党中央关于“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项决策部署得到贯彻落实。

第五,继承和发展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制度体系。在领导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中,党积累了许多科学的、行之有效的体制机制,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制度体系,“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9],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在这方面又积累了许多经过理论论证和实践检验的成功经验。“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继承这些有益成果,充分发挥它们的积极作用。中央全会每五年对过去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进行系统总结,分析判断

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内外形势,并对今后一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进行总体安排。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领导经济工作的体制机制得到进一步完善,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工作机制得以加强,为中央强化决策和统筹协调机制,小组后更名为中央财经委员会,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监管协调机制得以建立,推动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长效机制已经形成,社保兜底机制、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得以健全。党中央做出了每季度分析研究经济形势的制度安排,对城镇化发展、粮食安全、能源安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等重大问题开展专题性研究。在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各级党委持续健全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制度的前瞻性、科学性、系统性、针对性不断增强。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支柱,习近平指出,在深化改革中,要“实现体制对接、机制对接、制度对接和工作对接,确保党的领导、党的建设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得到体现和加强”^{[4]149-150}。在社会发展方面,习近平指出,脱贫攻坚任务重的地区必须“建立年度脱贫攻坚报告和督查制度”^{[4]107},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成就提供了强有力的体制机制保障。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科学制度是形成抗疫强大合力的关键所在,是确保疫情防控取得显著成就的优势所在。党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是经过实践检验的行之有效的科学制度,“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予以继承和发展。

三、持续提高党推进“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第一,持续提高党全面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政治能力。习近平强调,要“不断提高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政治能力”^[8]。政治能力是广大党员干部的第一能力,“十四五”时期,全党必须切实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全党必须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站位、开阔视野,立足两个大局,以理论的清醒保障政治的坚定性,以坚定的政治性证明理论的科学性,全面领会和贯彻党中央关于“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决策部署。全党必须深入领会政治能力的系统性,理解三种能力是一个互相联系,彼此衔接、互相促进的“三位一体”架构。以政治判断力为先

导,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自觉从政治上判断问题;以政治领悟力为枢纽,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深刻理解党中央精神实质,穿透政治现象,把握政治问题本质;以政治执行力为落脚点,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无条件地对标党中央要求,以全党工作大局为重,直面问题困难、风险矛盾,切实保障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全方位不折不扣地落地落实。

第二,持续提高党系统性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人类的经济社会是一个紧密联系、内外影响、相互交织、彼此贯通、重点突出的有机整体。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我们提供的系统观念,是我们把握和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科学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党的“十四五”规划《建议》以全面系统、重点突出的科学理念为指导,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谋长远、顾大局、保落地的统筹安排。各级领导干部要以全面把握突出重点的思维,熟悉原文、领悟原理,不断提高谋划工作的全局性、辩证性和主动性。在实际工作中,各级领导干部必须自觉运用系统观念,分析具体经济社会问题的本质和内在联系,从整体上把握经济社会的发展规律。坚持全国一盘棋,充分调动中央、地方和各方面的积极性,形成科学的国家规划体系,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各方面各环节的有效协同。提高全党理解新发展阶段、理念和格局的能力。各级党组织必须深刻理解新发展阶段是对党和人民事业所处的历史方位的科学判断,必须全面把握新发展理念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之中的指导原则地位,必须系统认识构建新发展格局,就是要更加突出强调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建构强大的国内经济循环体系,形成更高效率和更高质量的投入产出关系,提高产业转型升级质量,实现深度参与全球化和经济自立自强的有机统一。

第三,持续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工作科学化、法治化的能力。习近平强调,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提高把握和运用市场经济规律、自然规律、社会发展规律能力”^{[4]14}。各级党委领导同志要坚持理论培训和实践历练并举,持续丰富书本知识和工作经验,不断完善知识结构、增长实践才干,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灵活运用财政、税收、信贷、价格等杠杆调节经济社会活动,不断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工作科学化水平。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要求我们要不断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工作法治化的能力。一方面,用法律制度的绳索来约束权力运用,以

法治理念来引导权力实施,以法治文化来规范权力操作,让权力在法治阳光照耀下健康运行,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晴朗空间。另一方面,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强化依法治国、依法执政观念”^[10],塑造驾驭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必需的法治能力。

第四,持续提高以党的高质量建设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能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要求“把全面从严治党要求体现在党领导经济工作之中”^{[3]168},以“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2]44},来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十四五”时期,必须持续推进党的高质量政治建设,有效维护党中央的权威,从而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根本政治前提。必须持续推进党的高质量思想建设,完善党的科学理论大厦,从而有力引领经济社会巨轮保持高质量发展的正确航向。必须持续推进党的高质量组织建设,确保党的组织体系上下贯通、执行有力,从而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组织保障。必须持续推进党的高质量作风建设,将人民群众紧密地团结起来,从而凝聚起亿万人民群众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力量。必须持续推进党的高质量纪律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氛围,从而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健康社会生态。总之,党自身的建设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主体性建设,是贯彻落实《建议》提出的

“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3]66-67}之要津。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20.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

[3]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

[4] 习近平. 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

[5] 毛泽东.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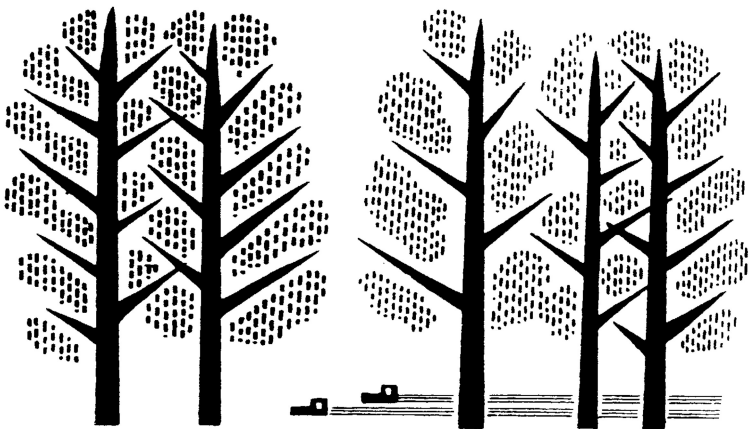
[7] 丁薛祥. 坚持和完善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N]. 人民日报,2020-11-20(006).

[8] 习近平. 深入学习坚决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确保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N]. 人民日报,2021-1-12(001).

[9]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10] 习近平. 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积极作用[J]. 求是,2020(22):4-7.

(收稿日期:2021-11-12 编辑:许宇鹏)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推进群众体育的价值遵循

唐 鹏,戴志卿

(河海大学体育系,江苏 南京 210098)

摘要:人民群众加强体育锻炼不仅是实现自身健康发展的重要方式,而且是国家强盛、社会进步的重要途径。因此,群众体育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来持续推进的事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推进群众体育始终遵循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和承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特性;始终遵循着以“人民立场”为基本尺度、以“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相统一为基本规律和以“全民健康”作为现实诉求的价值标准;始终遵循着以多元协同、区域协调、资源优化的价值实践。这对于新时代“体育强国”和“健康中国”建设具有重要的经验借鉴和理论参考价值。

关键词:建党百年;中国共产党;群众体育;价值遵循

中图分类号:D642;G8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4970(2022)01-0024-06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重视群众体育工作,关切人民福祉,持续做好群众体育工作。我国体育思想从早期的对体育本体功能认知渴求阶段,逐步演进至对体育价值审视的理性判断阶段^[1]。从而推进体育强国和健康中国建设。中国共产党创新推进群众体育工作,弘扬中华体育精神,有效开展群众体育活动,增进社会文明水平,将中国共产党优良作风及传统融入群众体育工作中,遵循了“人民性”的基本价值旨趣。这不仅增强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也进一步促成构筑高质量体育格局,从而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由此,回顾中国共产党推进群众体育工作的价值观遵循,从而为未来中国共产党推进群众体育发展提供进路,对中国体育事

业发展以及实现中国梦凸显出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推进群众体育的价值导向

所谓价值导向,指的是价值主体基于自身的价值观体系而确定的主导性价值追求和规范。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以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以及契合“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价值导向而推进群众体育。而正是基于此价值导向,中国共产党的群众体育工作成为了推动群众体育文化繁荣与发展的重要保证和根本力量。

1. 中国共产党推进群众体育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价值导向

追求幸福是人的本性。传统自然主义的幸福观

表现为“肉体无痛苦,灵魂无困扰”,而随着实践能力的提升、生存条件的改善和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人们不再局限于消极的被动幸福,而注重对客观条件的认识与克服,及自身对其的调适。亦即是说,当人的实践活动具有自觉性、实践能力发展成为社会实践时,人对幸福的追求就逐渐从自发进化到自觉,进而表现为“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2]。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推进群众体育始终把人民群众自身发展的需要作为根本出发点。鸦片战争时期,西方列强一方面利用坚船利炮对中国人民进行烧杀抢掠,另一方面利用鸦片荼毒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使得中国人民的身心受到严重摧残、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1917年,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中指出:“国力茶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3]¹。就个体功能而言,体育不仅可以锻炼人外在的生理系统,而且能够提升内在的心理认知系统,“因而增知识,因而调感情,因而强意志”^[3]⁸。新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体育运动原则主要表现为,发动人民群众通过体育运动强身健体、锻炼心智。由于这一时期的群众体育在很大程度上都服务于阶级斗争和革命战争,因而群众体育工作的现实基础较为薄弱,而且体育和休闲活动都比较简单易操作;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革命根据地逐渐形成了“赤色体育”模式。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因地制宜,积极组织人民群众参加“踢毽子、放风筝,或赛跑、跳远等简易的竞赛”^①,以锻炼人民群众的体质和心智,并培养其团结精神。新中国成立后,朱德在中华体育总会筹备会上阐述了为人民服务、“为国防和国民健康的利益服务”的群众体育理念。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并把握社会发展规律和人自身发展规律,积极组织人民群众发展生产,把改善人民的健康状况、增强人民体质、促进人民身心发展作为党的一项政治任务而推进。1954年开始,中国共产党倡导在中等以上学校、企业、军队实施“劳卫制”。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群众体育工作偏向于健身和休闲,诸如广播操人数逐年增加。进入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应有之义,习近平提出:“把发展体育事业同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结合起来,让体育设施同自然景观和谐相融”^[4],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民群众世代健康全面发展。

马克思主义的理想是实现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而建立在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基础上的独立性则是共产主义社会的重要表征。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那么为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和幸福生活奋斗,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初心。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推进群众体育始终契合马克思主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诉求,而且希望通过人的劳动能力的发展激发人的内在才能。因为,从劳动力概念的角度而言,“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5]¹⁹⁰。

2. 中国共产党推进群众体育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最高价值导向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未尽之事业,也是中国历史上各个阶级为之奋斗之事业。从农民阶级的“天国梦”到地主阶级的“实业救国梦”,再到资产阶级的“改良梦”和“共和梦”,中国人民为民族复兴殚精竭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6]。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领导下,中国人民迎来了从“民族独立梦”“人民富裕梦”到“国家强盛梦”的伟大飞跃。而人民身体素养和健康水平、体育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成为“健康中国”战略目标的背景下,“体育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标志性事业”^[7]⁴,而体育强国亦成为“中国梦”的重要内容。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的群众体育工作亦遵循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最高价值诉求。

群众体育的发展可以为中国梦提供力量和保障。“中国梦”说到底人民的梦,而发展群众体育运动、增强人民群众体质则是保证人民群众身心健康、助力中国梦实现的重要路径。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上,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阶级社会中的阶级斗争、科学技术以及社会主义的改革都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但社会发展动力的主体是人民群众,只有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汇聚民力、发挥民智,才能真正推动历史发展。而且,人民群众的生产劳动,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影响其他一切活动的前提。实现中国梦,就需要在更深层面上发挥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人民最切近的梦

①资料来源于成都体育学院体育史研究室编撰的《体育史文集》一书。

想就是获得政治解放、实现民族独立。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的群众体育工作固然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之崇高理想为指引,但同时也是基于革命之需要。苏维埃政权时期以“锻炼工农阶级铁的筋骨,战胜一切敌人”^①为工作方针的“赤色体育”模式,即是为了适应阶级斗争的需要。而在陕甘宁边区的群众体育项目中,除了一般性体育项目外,还开展军事性项目,如射击、骑马等。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人民最切近的梦想则是实现生活充裕、人民富裕。但要改变民生凋敝、积贫积弱的现状,唯有大力发展生产。所以,此时中国共产党的群众体育工作固然以为为人民服务为基本原则,以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崇高价值导向,但其直接目的则是通过提高劳动者的身体素质,从而“使人民的身体健康、国防建设和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文化建设更有利的支持和发展”^[8]。经过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人们的物质财富获得了极大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而中国人民最大的梦想亦表现为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在新时代,体育越来越成为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坚持全民健身是“助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路径^{[7][4]}。

推进群众体育发展是中国梦的应有之义。从一定意义上说,体育是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重要标志,是综合国力和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体现。就社会主义中国来说,体育强国更能助力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而“体育强国的基础在于群众体育”。在柏拉图看来,“勇敢”是人所必须具备的四种基本品质之一,是国家得之于它自己某一部分的一种品质。勇敢“是一种保持对于法定的教育所确定的可怕事物——即什么样的事物应当害怕——的信念”^[9]。亚里士多德认为一个人优秀的品质主要包括勇敢、节制和公正。而真正勇敢的人是“由于理智而冲动,为了美好才面临着危险,而他又不惧怕这些危险”^[10],是在战斗中为自己的城邦和国家争取民主与自由。因此,作为专门培养人的勇敢的体育,就不是简单的单个人的行动,也不仅仅是一种教育过程,更是一种高尚的政治公民的品质,是民族精神与灵魂的升华。

3. 中国共产党推进群众体育以“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相承接”为文化价值导向

中华民族传统的体育文化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

的重要表征,中国共产党的群众体育思想与数千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承接性。中国古代体育文化源远流长,远在商周时期教育系统中的“六艺”之“射”“御”就具有体育的性质,但其主要是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生活方式或娱乐和消遣方式,即“娱天”“娱人”和“自娱”。在儒释道文化的影响和作用下,中国古代的体育文化表现为一种注重“内在超越”的传统,其核心理念则是“天人合一”、以“和”为贵等^[11]。这就要求把人作为一个机体而寻求其各个部分和生命各项功能的和谐,不主张把人的身体做机械式的切割与划分向外的发展和竞争,甚至反对有对抗性的活动。

尽管儒家思想肯定主张肯定并面向现实世界,教人以“自强不息”的君子人格积极控制人生和治理社会,但其更多的是按照《大学》所论之“三纲领、八条目”进行个人道德修养。这在体育思想上表现为身心不二、涵养内心和德艺双修。道家则以博大精深的道论、气论为基础的生命义理学说寻求“天人合一”“自在无为”的精神境界和生存状态,这构成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养生理论。而佛教则以现实的斋戒、瑜伽术、静坐等方式实现内心宁静和身体强健。正因如此,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中“竞争”的价值观念不突出,而剧烈运动和带有损伤性的活动项目都被人们排除在外。而这些传统体育文化的特点,为中国共产党推进群众体育和创新群众体育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借鉴。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在“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群众体育口号下推进群众体育事业发展。毛泽东体育思想就继承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体育文化,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文武兼备”的思想。他指出,“清之初世,颜习斋、李刚主,文而兼武。司斋远践千里之外,学击剑之术于塞北,与勇士角而胜焉。故其言曰:‘文武缺一,岂道乎’?”^{[3][5]}习近平更是“把发展体育事业同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结合起来”,追求真正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始于下的“群众体育”。

二、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推进群众体育的价值规范

作为人类实践和现实生活中的基本尺度,价值

①资料来源于成都体育学院体育史研究室编撰的《体育史文集》一书。

规范是人们所思所想、所作所为的基本观念、基本尺度和终极追求的总和。而价值规范的确立,既要体现“真”的客观必然性,也应当展现“善”的美好诉求。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立场”作为基本尺度,始终遵循“人民的需要与社会主义建设”相适应的基本规律,同时把全民健康作为现实诉求,推进群众体育持续健康发展。

1. 中国共产党推进群众体育始终以“人民立场”为基本尺度

“尺度”是价值观的核心内涵,是关于主体需要与事物属性之间关系以及事物具有何种属性的根本原则。在历史进程中,人民是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发展的主要力量,是社会成员中的绝大多数,因而是社会的“健康肌体”。而人民原则,也就是实现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利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遵循“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秉持“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是群众体育的出发点和归属,全面表达了群众体育的本质。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推进群众体育始终坚持“人民立场”的根本尺度,将一切有利于人民群众身心健康的体育活动作为群众体育事业的重要内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基于国力羸弱、“武风不振”“民力较差”的现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以及革命之迫切需要提出群众体育工作要以服务军事化为目标,强调体育为战争和阶级斗争服务。这时期,中国革命根据地时期的俱乐部模式的群众体育工作,除了要给战争服务,还为反对封建和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而战斗。中国共产党通过俱乐部模式有效的团结各类各地群众,增强了群众斗争的积极性。发展红色革命地区的群众体育运动,养成工农群众的团结精神,促成人民群众的强健体格,服务于整个革命胜利,众多群众体育形式就凸显了军事体育的色彩。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群众体育发展主要为经济社会服务,体育场地和体育设施的建设在市场化的驱动下逐步完善、逐渐科学和规划精细,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的界限并非那么分明,但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具有较强的将体育作为一项“人民的事业”的自觉。邓小平明确提出“把体育运动普及到广大群众中去”,而且通过群众体育能够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好的劳动力,这也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给“为人民服务”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使得人民性价值规范

“可以通过不同层次、不同形式表现出来”。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于不同的利益群体和不同觉悟程度的人民群众具有不同的群众体育推进方式。对于群众体育工作者和基层群众工作者而言,健康问题则是体育工作的重点。邓小平认为,体育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是“培养人民勇敢、坚毅、集体主义精神,和向劳动人民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重要手段之一”^[12]。而对于专业运动员来说,提供更为便利的条件增长其专业技能、搭建更多平台推进竞技体育,则是体育工作的关键。但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在本质上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而且竞技体育只是特殊历史时期的群众体育、或群众体育在特殊历史时期的表现形式。一方面,群众体育不仅为竞技体育提供高素质的运动员,而且竞技体育项目都源于群众的生产生活。没有群众体育欣欣向荣和不断创新,竞技体育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另一方面,竞技体育以其专业性和高技能性推动群众体育的发展。专业运动员往往以其专业技能对群众起到榜样带动作用,为群众体育活动的发展起示范作用。

2. 中国共产党推进群众体育始终以“人与社会协同发展”为基本规律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不仅是单独的个体,更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而是类存在物,是社会性的存在。人在社会中,必然要发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关系。而正是人的社会性和社会化的个人造就了价值主体的多元化。

正因为价值主体的需要也具有多样性,因此价值标准以及反映价值标准的评价标准也具有多元性。就个人而言,不能单纯按照自己的认知模式来评价和处理问题,更不能单纯用真理一元论的思维来评价问题正确与否。但就社会而言,其与个人需要既有不一致性,也有一致性。社会价值或社会意识形态首先是基于社会化个人之需要的共同性。而在阶级社会中,全社会的共同需要基本是与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需要或意识形态是一致的。所以,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念,主要是统治阶级的价值观念。个人在选取价值观念时,必然会碰到个人与社会矛盾问题。而个人在进行具体的评价或者为选取具体的标准时,只有将个人的想法与社会规范两个方面统一起来,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才能妥善解决,评价标准才能准确地确立起来,价值标

准也才符合社会历史发展趋势。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推进群众体育一方面是为了增强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需要,另一方面更是为民族振兴和国家富强而推进群众体育,而这二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面对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现状和中国人民被“三座大山”压迫的生存状态,中国共产党领导依然肩负起民族复兴的历史重任,带领广大人民群众进行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伟大的改革开放实践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带领中国人民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在历经百年的奋斗中,中国共产党以推进群众体育为重要内容,把促进个人的发展、民族的复兴和社会进步有机统一。群众体育文化既具有事业性、公益性,同时也具有产业性、商品性。

3. 中国共产党推进群众体育始终以“人民健康”为现实诉求

尽管价值观念饱含着人们对未来应然状态的价值理想,但其仍然是立足于一定的现实状况或现实诉求。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重要体现是共同富裕,避免两极分化。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推进群众体育文化,应将追求人人健康作为工作的出发点。而创新群众体育文化就是要不分性别、不分老幼、不分民族、不分地区,在共同健康的社会理想下,追求人民健康的目标。百年来,“满足人民身体健康和生活美好需要”始终是中国共产党推进群众体育的主旋律。“体育是关系六亿人民健康的大事”^{[13]21},群众体育工作的目的是增强人民的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新时代群众体育工作的代名词就是健康和健身,而全民健身和全面建设健康中国成为国家战略更是群众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体育工作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增强人民体质,这是一个国家富强、文明的标志”^{[13]51}。通过群众体育推进体育强国和健康中国建,“有利于增强人民体质,有利于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有利于振奋我们的民族精神和提高综合国力,意义重大而深远,要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13]25}。体育强国建设就是要把体育健身同人民健康结合起来,把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同坚定文化自信结合起来。

三、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推进群众体育的价值实践遵循

中国共产党推进群众体育工作的发展,置于整

个中国进程之中,担负着人民健康和体育强国建设的使命。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着力倡导广泛开展体育健身活动,加紧体育强国的宏伟推进和建设。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促进“体育弱国”转向“体育强国”,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不懈奋斗的结果。任何一个民族的振兴,都离不开体育事业的发展。任何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度,都离不开整个体育事业的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群众体育工作的展开,始终围绕着以建设体育强国为价值实践持续创新推进。

1. 推动群众体育多元化发展

无论是在群众体育活动还是群众体育项目参加人数方面,中国共产党群众体育工作都遵循着多元化价值实践,而“多元性”主要体现在参与的对象方面。群众体育不仅是青年人的参与,更强调老年人、妇女、女童、残疾人等大众休闲娱乐的参与。健康休闲的群众体育项目备受推崇,风靡中国大地的广场舞就证明这一点。因此,随着群众体育的推进,体育不仅成了专业运动员的职业,同时也成了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而体育锻炼和健身运动也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属,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参与强身健体的体育锻炼,并将其当作健康的生活方式。无论是群众体育设施的建设和维护,还是群众体育活动的组织和发展,基层社会治理单位承办的也兴盛起来。中国共产党提供各类政策支持以外,社会多元化主体也成为中国特色。

2. 促进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协同发展

体育强国国家战略的提出,群众体育事业多样化的发展带动了整个体育格局的发展。中国特色体育事业的发展格局,呈现了“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三位一体的发展治理格局。竞技体育强调以竞争机制激发运动员身体的内在潜力,以荣誉和名次获得为外在追求。群众体育则旨在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社会各界共同推动,大众化是群众体育最大的特点。丰富广阔的群众体育和专业化的竞技体育发展,都需要体育产业的支持。就体育产业的发展而言,核心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主要力量则要靠市场机制的推动。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在全民健康、体育强国的价值导向下,在目标定位、发展规划、创新举措、物质保障等方面持续推进群众体育,坚持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协同发展。习近平关于体育强国建设的系列论述更是为“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协同发展”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体育事业提出了思想指引^[14]。

3. 重视群众体育传统性和区域性发展

在中国共产党体育强国建设战略蓝图的推动下,中国传统的群众体育活动也成为时代潮流,如慢跑、登山、气功、啦啦操和广场舞等成为群众生活的重要内容。而区域性的群众体育活动也蕴含着竞技性质,如比赛规则、荣誉奖励等机制的建立。而在少数民族中,竞争机制更是广泛存在于群众体育活动,如蒙古族的摔跤、骑马射箭等;闽南地区的舞龙舞狮、赛龙舟、划船比赛等。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创新推进群众体育工作,弘扬中华体育精神,有效开展群众体育活动,增进社会文明治理水平,将中国共产党优良作风及传统融入群众体育工作,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群众体育工作治理格局。这不仅增强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也进一步促成构筑高质量体育治理格局,从而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由此,回顾中国共产党推进群众体育工作的历史演进,讨论其焦点议题,从而为未来中国共产党推进群众体育发展提供进路。

4. 优化群众体育资源配置结构

城市社区和自然村落或乡村社区是中国共产党推进群众体育工作的两大现实单元,但随着城市化进一步发展,群众体育工作在城市社区的开展成效和普及程度越来越高于农村社区,优化城市和乡村的群众体育资源配置越来越成为中国共产党群众体育工作的重要方面。中国共产党对群众体育的资源优化配置工作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资源总量的合理配置。近年来,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政府和企业的群众体育服务供给在各地实现均衡配比,考量投入地区的均等化和科学化,遵循公平正义原则。在空间布局配置方面,进一步维护城市社区之间、农村社区之间、省份区域之间等不同人群群众体育资源的权益和资源的安排合理性。另一方面是不断加强资源配置的联动效应。区域群众体育事业发挥程度,取决于群众体育产业、群众体育物质支撑、群众体育资源的配比等因素影响。中国共产党持续完善群众体育制度,提升群众体育制度治理效能。依据各地情况,明确群众体育活动开展的特色与目标,实现群众体育产业与群众体育事业的系统联动的资源调控,不断破解城乡区域群众体育绩效管理系统不完善、群众体育多元功能不显著等一系列现实难题。此外,中国共产党还进一步推进文化资源、社会资源、科

技应用进入农村群众体育场域来助力资源优化配置^[15],推进农村地区的智能型的健康服务平台建设,引导商业企业投放资金和器材到农村地区,促进和搭建满足农村群众体育工作发展所需的智能健身健康服务平台,运用各类互联网技术满足农村地区和城市社区资源的合理调配,从而帮助城乡基本健身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群众体育资源配置结构优化。

参考文献:

- [1] 律海涛,刘为坤.中国知识分子体育思想百年演进的逻辑诠释[J].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6(5):132-140.
-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23.
- [3] 毛泽东.体育之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 [4] 习近平.坚定信心奋发有为精益求精战胜困难 全力做好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筹办工作[N].人民日报,2021-01-21(001).
- [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6] 董德福.“中国梦”的历史嬗变与实现路径[J].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39(5):106-112.
- [7] 国务院办公厅.体育强国建设纲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 [8] 冯文彬.新民主主义的国民体育[G]//体育文史资料编审协会.体育史料:第九期.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83.
- [9]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古希腊罗马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224.
- [10] 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全集:第八卷[M].苗力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270.
- [11] 黄诚胤,李国泰.体育价值研究[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17.
- [12] 国家体委政策研究室.体育运动文件选编(1949—1981)[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82:3.
- [13] 国家体育总局政策法规司.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体育[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3.
- [14] 施纯志,邹京.体育强国思想孕育:基于习近平在福建工作时期体育改革与实践考察[J].吉林体育学院学报,2021,37(2):32-37.
- [15] 张庆如.体育场域空间何以生成?——布迪厄场域理论的意义及其限度[J].体育与科学,2021,42(3):16-20.

(收稿日期:2021-11-12 编辑:许宇鹏)

健康中国背景下中医药健康服务领域政策工具研究

张宏如¹, 邓 敏^{2,3}

(1. 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中西医结合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23;

2. 南京中医药大学卫生经济管理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23;

3. 南京中医药大学江苏重大健康风险管理与中医药防控政策研究中心, 江苏 南京 210023)

摘要: 基于政策工具理论和中医药健康服务的体系结构, 针对政府在中医药健康服务领域发布的 52 份国家级政策文件, 构建了政策工具-服务体系二维分析框架, 确定了政策工具在不同服务体系内的使用情况, 总结了政策工具的分布特征; 运用文本分析对政策文件进行关键词提取和关键词距离分析, 构建了中医药健康服务高频关键词的内在关系网络, 分析了中医药健康服务的建设重点和建设力量。结果表明, 从形式上看, 政策工具较为丰富, 但结构分布不均; 从内容上看, 中医药健康服务体系的政策支持已基本形成, 中医药健康服务的供给是多主体合作的结果。未来应进一步丰富和优化政策工具的使用、完善操作层面的实施细则以及加强供给主体中服务主体协作的政策支持。

关键词: 中医药健康服务; 政策工具; 服务体系; 健康中国

中图分类号: R19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4970(2022)01-0030-08

作为我国宝贵的传统医学资源, 中医药对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1], 在促进我国健康服务业的发展过程中, 应“全面发展中医药医疗保健服务”“提升中医健康服务能力”(国发[2013]40号)。2015年, 国务院发布《中医药健康服务发展规划(2015—2020年)》, 指出加快发展中医药健康服务是全面发展中医药事业的必然要求, 是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重要任务。在一系列政策引导下, 我国中医药健康服务蓬勃发展。《2020中

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显示, 2010—2019年, 中医药服务供给能力有了显著提升, 二级以上公立综合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在我国设有中医类临床科室机构中的占比分别从 81.8%、45% 和 25.4% 增至 85%、56.3% 和 41.7%, 提供中医服务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社区卫生服务站、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在同类机构的占比分别从 80.6%、46.3%、57.3% 和 31.3% 增至 98.3%、85.9%、97.1% 和 71.3%; 服务量也有所增加, 中医类诊疗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71804076); 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重点项目(B-b/2020/01/04); 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JKFXFK-003)

作者简介: 张宏如(1983—), 男, 副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中医药养老服务模式和针灸效应机制研究。E-mail: 170947@njucm.edu.cn

通信作者: 邓敏(1986—), 女, 副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健康老龄化的制度供给研究。E-mail: dengmin@njucm.edu.cn

量占总诊疗量从 14.7% 增至 16.4% ,其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占比也分别从 5.2%、3.9% 和 30.5% 增至 9.3%、6.9% 和 41.4% ;中医医院在卫生健康部门医院诊疗人次数占比也逐年增加,从 1985 年的 12.07% 提高至 2019 年的 17.29%。但从服务人员规模来看,中医药人员数的增长相对缓慢,中医类别执业(助理)医师占同类人员总数从 1985 年的 12.2% 增至 2019 年的 16.2% ,而见习中医师和中药师(士)占同类人员总数的比例分别从 1985 年的 9.9% 和 27.4% 下降至 2019 年的 7.9% 和 26.3%。在需求与供给不断扩大的当下,机遇与挑战并存。

2019 年出台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强调“发挥中医药在维护和促进人民健康中的独特作用”,提出“到 2022 年,基本实现县办中医医疗机构全覆盖,力争实现全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设置中医馆、配备中医医师”。2021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进一步指出“健全中医药服务体系,发挥中医药在疾病预防、治疗、康复中的独特优势”。中医药的传承与创新发展是我国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内容^[2],实现上述目标需要一系列政策和措施,从组织、人才、资金、服务模式、规范等方面予以保障。本研究对各类政策工具的使用情况进行分析,

以总结成果与不足,为政策体系完善和中医药健康服务体系建设提供建议和参考。

一、文献回顾与分析框架设计

1. 相关文献回顾

政策工具是达成政策目标所采用的手段^[3],很多学者对政策工具进行了研究和分类^[4-8],其中 Rothwell 和 Zegveld 的分类方法被广泛应用于多个领域^[7,9],能够较好地体现不同政策工具的作用力,本研究也采用此分类方法,将政策工具分为供给型、需求型和环境型 3 种类型。政策工具分析是了解特定领域的政府主张和做法的重要方法^[10-11]。在中医药领域,学者们对中医药^[12]、中医药养生保健服务^[13]、治未病^[14]等领域进行了政策工具分析,或围绕中医药传承创新^[15]、中医药教育政策^[16]等某个具体主题进行探讨,关于中医药健康服务领域尚未见政策工具的研究。需注意的是,现有研究存在政策工具的归属不一致、政策工具内涵不统一等问题,这会带来政策工具统计的差别。

2. 分析框架设计

基于已有研究,形成中医药健康服务领域政策工具分类,如表 1 所示。

a. 供给型政策工具作用表现在政策对中医药健康服务产业的推动力,主要通过政府对机构、信息技术、资金、人才等要素的支持直接扩大供给。供给型政

表 1 中医药健康服务领域政策工具分类及含义

类型	名称	含义
供给型	公共服务	制定目标规划,确定责任机构和重点任务,开展试点建设、绩效考核等
	资金投入	直接对中医药健康服务领域的建设工作进行资金支持
	组织支持	直接建立服务机构或相关组织支持中医药健康服务产业发展
	人才支持	直接扩大相关领域专业人才的培养和培训
	技术支持	直接为中医药健康服务发展提供信息技术支持
环境型	税收政策	政府给予从事中医药健康服务领域企业和个人的税收减免
	金融政策	政府放宽中医药健康服务产业的贷款、投融资限制
	土地政策	政府为中医药健康服务领域企业或个体提供用地优先等政策倾斜
	舆论引导	向社会发布行业信息,引导社会风气
	规范措施	制定标准、规范、指南等规范中医药健康服务领域的相关工作
	监管措施	建立中医药健康服务领域监管机制,发布相关措施
	市场政策	精简审批,引导商业保险和社会力量加入中医药健康服务领域
需求型	价格政策	建立、健全中医药健康服务的价格机制
	消费环境	破除政策障碍,优化消费环境,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医保政策	加强医保对中医药健康服务的支付力度
	税收政策	对消费中医药健康服务的个人或企业进行税收减免或抵扣
	信息公开	发布中医药健康服务市场运行情况相关信息,引导消费
	海外推广	面向海外市场进行中医药健康服务的推广
	政府采购	政府购买中医药健康服务

策工具种类与现有研究基本保持一致,主要包括资金支持、人才支持、信息技术支持以及基础设施/机构建设。结合中医药健康服务领域的政策特点,有 3 个问题需要说明:①设施建设一般包含在用地保障一类,政策由各地政府实施,并没有直接提供支持。同时,存在新建机构/组织为中医药发展提供支持的情况,因此,将基础设施/机构建设调整为“组织支持”。②有学者将用地保障放在供给型政策工具中^[9],代表政府直接提供用地支持。但在现阶段的中医药健康服务领域中,并没有直接提供用地,仅为企业或个体提供用地优先等政策倾斜,因此更适合放在环境型政策工具中,并更名为“土地政策”。③政府发布了一系列规划等文件,发布了中医药健康服务发展的目标、任务、责任人机构等,是推动中医药健康服务快速发展的重要指导,应属于供给型政策工具的范畴,此类政策工具命名为“公共服务”。

b. 环境型政策工具作用主要表现在政策对中医药健康服务产业的影响力,政府通过发布财务金融制度、税收制度、法规管制等为中医药健康服务产业活动提供有利的政策环境,间接促进中医药健康服务产业的发展。除金融支持、规范措施(包括技术标准和标准设计)、法规管制、政策宣传外,有学者将质量评价^[8]和税收优惠^[10]也纳入环境型政策工具,这与研究对象有关。这里需要补充 3 点:①在中医药健康服务领域中,除“质量评价”外,建立不良执业记录制度、推行属地化管理等都属于监管的范畴,因此,使用“监管措施”替代“质量评价”。②关于医保的分类问题。《“十四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强调,医疗保障是减轻群众就医负担、增进民生福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制度安排。其关键作用在于对特定健康服务和产品进行不同比例的支付以调节民众的需求,目标受众是需求端,对公众需求发挥直接的拉动作用,应属于需求型政策工具,而非环境型政策工具。③在环境型政策工具中补充了市场政策和价格政策,分别代表对社会力量的引导和价格机制的完善。

c. 需求型政策工具作用主要表现在政策对中医药健康服务产业的拉动力,是指政府通过采购、外包等方式营造市场需求,减少市场的不确定性,拉动中医药健康服务产业的发展。需要说明的是试点和示范项目的分类问题,试点和示范项目的建设目标在于探索建立有利于中医药健康服务产业发展的供给机制,探索合理的服务供给模式和服务内容,而非

拉动需求,因此应该属于供给型政策工具中公共服务的范畴。

仅从政策工具角度难以准确把握中医药健康服务领域政策的变化规律和分布特征,还需要结合中医药健康服务的自身规律。根据前人对服务的定义^[17]和分类^[18],可以从服务对象、服务传递方式、服务经历要素、服务组织与顾客的关系、服务过程中的定制化程度等角度进行研究。考虑中医药健康服务的准公共产品属性,以服务目标、服务主体、服务客体(对象)、服务方式、服务内容、服务配套和服务监管等作为服务体系的分析条目,条目内涵如表 2 所示。将中医药健康服务体系和政策工具作为二维分析框架的两个维度。

表 2 服务体系的分析条目内涵

服务维度	内涵
服务目标	关于中医药健康服务体系的目标
服务主体	关于中医药健康服务体系的供给主体
服务客体	关于中医药健康服务体系的服务对象
服务内容	关于中医药健康服务的内容界定,包括中医养生保健、康复、旅游等服务
服务规范	服务规范和标准化建设等相关内容
服务监管	中医药健康服务的监管及相关内容
服务方式	
供给方式	关于中医药健康服务供给方式的相关内容
模式探索	开展试点/典型建设、探讨、审查和推广等相关内容
服务配套	
人力配套	执业、薪酬和职称等相关支持
组织配套	组织和领导等相关保障
技术配套	大数据、信息技术等相关保障
市场配套	投融资、用地、准入等相关保障
社会氛围	有关中医药文化氛围培育的内容
健康素养	有关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调查和提升等内容
其他配套	体制改革、法规体系和网络安全等其他配套内容

二、研究数据与方法

1. 数据来源

在中国工程科技知识中心政策库中以“中医药”和“健康”为主题词,检索到 1 197 份政策文件,其中国家级 749 份,对这 749 份政策逐一核查,删去重复和无关的政策文件,最后得到 43 份相关文件。在国务院政策文件库、国家卫生健康委(包括国家卫生计生委和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相关部门网站,以“中医药”“健康服务”等为关键词进行补充检索,得到 9 份与中医药健康服务相关的政策文件,表 3 为 52 份政策文件情况,其中“序号”为进行政策工具分析时对政策文件按年份给的序号。

表3 中医药健康服务领域政策文件汇总

序号	年份	发文字号	政策名称
1	2007	国科发社字[2007]77号	关于印发《中医药创新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的通知
2	2008	国中医药办函[2008]180号	关于开展“治未病”高峰论坛系列专题讲坛中医特色健康保障服务体验活动的函
3	2009	国发[2009]22号	国务院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
4	2009	国中医药办函[2009]1号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办公室关于召开第二届治未病高峰论坛的通知
5	2010	国中医药发[2010]1号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印发2010年中医药工作要点的通知
6	2010	国中医药医函[2010]15号	关于举办第三期社区中医药服务工作指南培训班的通知
7	2012	国中医药医政发[2012]31号	关于实施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工程的意见
8	2012	国中医药医政发[2012]37号	关于成立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工程领导小组的通知
9	2013	国发[2013]40号	国务院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
10	2013	国卫基层发[2013]7号	关于印发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规范的通知
11	2014	国中医药医政基层便函[2014]13号	关于报送2013年度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工程和中医药健康管理工作进展情况的的通知
12	2015	国办发[2015]32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医药健康服务发展规划(2015—2020年)的通知
13	2015	国办发[2015]84号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卫生计生委等部门关于推进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相结合指导意见的通知
14	2015	国中医药医政发[2015]32号	关于推进社会办医发展中医药服务的通知
15	2015	国卫基层发[2015]93号	关于进一步规范社区卫生服务管理和提升服务质量的指导意见
16	2016	国办发[2016]47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和规范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发展的指导意见
17	2016	国发[2016]15号	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的通知
18	2016	国发[2016]77号	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卫生与健康规划的通知
19	2016	国函[2016]146号	国务院关于同意建立国务院中医药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的批复
20	2016	国中医药医政发[2016]33号	关于印发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工程“十三五”行动计划的通知
21	2016	教职成厅函[2016]32号	关于公布首批全国职业院校健康服务类示范专业点名单的通知
22	2016	全爱卫发[2016]5号	全国爱卫会关于印发《关于开展健康城市健康村镇建设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23	2017	国办发[2017]44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层次多样化医疗服务的意见
24	2017		国家中医药局发布关于促进中医药健康养老服务发展的实施意见
25	2017	国中医药办新函[2017]153号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办公室关于进一步落实中医中药中国行——中医药健康文化推进行动有关工作的通知
26	2017	国中医药规财发[2017]30号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推进中医药健康服务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
27	2017	国科发社[2017]146号	科技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印发《“十三五”中医药科技创新专项规划》的通知
28	2017	旅发[2017]138号	国家旅游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公布首批国家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区创建单位的通知
29	2018	国办发[2018]26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的意见
30	2018	国中医药办新函[2018]156号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办公室关于印发中医药健康文化知识角建设指南的通知
31	2018	国中医药科技发[2018]10号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部关于印发《关于加强中医药健康服务科技创新的指导意见》
32	2018	中组委会办[2018]1号	关于印发《中医中药中国行——中医药健康文化推进行动2018年活动方案》的通知
33	2018	教高[2018]4号	教育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加强医教协同实施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2.0的意见
34	2019	国办发[2019]5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
35	2019	国中医药医政基层便函[2019]1号	关于做好2019年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先进单位复审工作的通知
36	2019	发改社会[2019]1427号	关于印发《促进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纲要(2019—2022年)》的通知
37	2019	国中医药办发[2019]15号	关于印发《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重点任务分工方案的通知
38	2019	国卫老龄发[2019]61号	关于建立完善老年健康服务体系的指导意见
39	2019	中国行组办[2019]4号	中医中药中国行组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2019年度中医药健康文化精品遴选活动方案的通知
40	2019	国卫老龄发[2019]60号	关于深入推进医养结合发展的若干意见
41	2020	国办发[2020]52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养老托育服务健康发展的意见
42	2020	国中医药医政发[2020]4号	关于印发中医药康复服务能力提升工程实施方案(2021—2025年)的通知
43	2020	教高[2020]6号	关于深化医教协同进一步推动中医药教育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
44	2020	国卫规划发[2020]22号	关于深入推进“互联网+医疗健康”“五个一”服务行动的通知
45	2020	国卫基层发[2020]12号	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全面推进社区医院建设工作的通知
46	2021	国办发[2021]3号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中医药特色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
47	2021	国办发[2021]36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十四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的通知
48	2021	国中医药办发[2021]3号	关于印发《中医药文化传播行动实施方案(2021—2025年)》的通知
49	2021	国卫医函[2021]126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综合医院中医药工作推动中西医协同发展的意见
50	2021	国卫办老龄函[2021]303号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印发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评分细则(试行)的通知
51	2021	国卫医发[2021]19号	关于印发加快推进康复医疗工作发展意见的通知
52	2021	发改社会[2021]893号	关于印发《“十四五”优质高效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

2. 研究方法

首先对 52 份政策文件行整理和编码,统计发文时间和发文机构的分布情况,了解中医药健康服务领域政策发布趋势与特征;然后结合政策工具理论和服务分类方法^[15],建立中医药健康服务领域的政策工具-服务体系二维分析框架,将编码后的政策文件分析单元纳入分析框架中,考察中医药健康服务领域政策工具的使用情况和分布特征;最后运用文本分析工具对政策文件进行关键词识别和距离分析,探讨政策文件中的高频关键词以及高频关键词之间的内在关联,深度解析中医药健康服务的建设重点与建设力量。

三、政策工具与文本量化分析

1. 基本信息

表 4 为 2007—2021 年中医药健康服务领域发文情况统计。从 2015 年起,中医药健康服务相关的政策数量明显增加,这可能是因为 2015 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医药健康服务发展规划(2015—2020 年)的通知》(国办发[2015]32),作为我国第一个关于中医药健康服务发展的国家级规划,该文正式明确了中医药健康服务的概念和内涵,而在此之前,探索中医药在健康领域的应用主要以“治未病”健康工程的方式进行。

表 4 2007—2021 年中医药健康服务领域发文情况

年份	发文数	年份	发文数	年份	发文数	年份	发文数
2007	1	2012	2	2016	7	2020	5
2008	1	2013	2	2017	6	2021	7
2009	2	2014	1	2018	5		
2010	2	2015	4	2019	7		

从发文部门来看,2015 年之前联合发文共 4 份,占发文总量(11 份)的 36.36%,其中 6 份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占比超过 50%;2015 年之后,联合发文达到 18 份,占总发文量(41 份)的 43.90%,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了 9 份,仅占发文总量的 21.95%。这说明中医药健康服务的发展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国务院、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和教育部等从整体规划、人才教育和培养、科技创新和转化以及产业发展的角度进行支持。

2. 政策工具分析

政策文本采用政策编号-具体条款/节点的方法进行编码,如 12-1-3-1 表示第 12 号文件中第 1 部分

第 3 点的第 1 段。将编码后的分析单元按照归属情况放入政策工具-服务体系二维分析框架中,得到中医药健康服务体系政策工具分布图,基于分布图进一步统计政策工具在不同领域的出现频率,结果见表 5。表 5 显示,52 份政策文件基本覆盖了服务体系的 8 个方面,绝大部分政策工具被使用于服务配套(48.8%)、服务内容(13.4%)和服务方式(12.9%),服务目标、服务主体、服务规范、服务客体和服务监管的政策工具使用较少,分别占 7.4%、7.0%、5.5%、2.5%和 2.5%。供给型政策工具是使用频率最高的政策工具,占比 78.1%,其次是环境型政策工具,占比 19.4%,最少的是需求型政策工具,占比 2.5%。

表 5 中医药健康服务不同领域政策工具频数统计

政策工具	服务目标	服务主体	服务客体	服务内容	服务规范	服务监管	服务方式	服务配套
公共服务	13	12	5	24	6	2	22	50
资金投入				1				5
组织支持								3
人才支持					1			9
技术支持				1			1	2
税收政策								1
金融政策								2
土地政策								2
舆论引导	2						1	9
规范措施					3			4
监管措施					1	2	1	2
市场政策		2		1			1	4
价格政策								1
医保政策						1		4
占比/%	7.4	7.0	2.5	13.4	5.5	2.5	12.9	48.8

服务配套中人力、组织、技术、市场、社会氛围、健康素养和其他配套政策的政策工具分布情况如表 6 所示。需注意的是,需求型政策工具的类型非常单一,仅使用了医保政策。

从时间轴来看,2015 年之前,主要以供给型政策工具为主,包括公共服务、资金投入、组织支持、人才支持等;舆论引导、规范措施和监管措施等环境型政策工具也得到使用,医保政策在 2009 年被使用,强调“医疗保障政策和基本药物政策要鼓励中医药服务的提供和使用”(国发[2009]22 号)。2015 年之后,税收政策、金融政策、土地政策、市场力量和价格政策等环境型政策工具被大量使用。

3. 政策文本分析

对 52 份政策文件进行整理和分词,一方面,发现存在一些常规性用词,包括“推动”“规范”“水

表 6 中医药健康服务配套的政策工具频数统计								
政策工具	人力 配套	组织 配套	技术 配套	市场 配套	社会 氛围	健康 素养	其他 配套	占比/ %
公共服务	8	8	10	9	7	5	3	51.0
资金投入	2	3						5.1
组织支持		3						3.1
人才支持	9							9.2
技术支持			1		1			2.0
税收政策				1				1.0
金融政策				2				2.0
土地政策				2				2.0
舆论引导					7	2		9.2
规范措施	1		1				2	4.1
监管措施			1				1	2.0
市场政策			1	3				4.1
价格政策				1				1.0
医保政策				4				4.1
占比/%	20.4	14.3	14.3	22.4	15.3	7.1	6.1	

平”等,需过滤删去;另一方面,存在一些专有名词被分开的情况,包括“中医药健康服务”“健康管理”“中医药健康管理”“中医特色康复”“中医养生保健”“可及性”以及一些政府机构名称,需加入自定义词表中。因此,共增加了 165 个专用词组和 143 个过滤词组后重新分词,以提高准确性。结果显示,有 237 个词组出现超过 50 次,出现频率最高的 6 个词组依次是中医药(1 583 次)、医疗(1 175 次)、健康(1 148 次)、中医(712 次)、中药(596 次)和医院(579 次)。

出现频率前 6 的组织/机构依次为医院(579 次)、国家卫生健康委/计生委(321 次)、国家中医药局/管理局(305 次)、社区(213 次)、政府(171 次)和

企业(160 次)。出现频率前 6 的服务内容依次为医疗(1 175 次)、卫生(560 次)、康复(558 次)、养老(205)、中医药健康服务(193 次)和健康服务(164 次)。

进一步对高频词做内在关联的分析,计算排名前 16 位高频词的相异矩阵(表 7)。在该矩阵中,两个关键词之间的数值越接近于 1,表明两个词之间的距离越远或相似度越低;数值越接近于 0,说明两者之间的距离越近或相似度越高。

四、结果与分析

现有关于中医药健康服务的政策,从内容上看,明确了中医药在健康服务领域的重要位置和对老年人、妇幼以及特殊人群的重要意义,强调了医疗、康复、养生保健和健康管理是其重要建设内容,并给出了明确的建设目标和原则。从形式看,中医药健康服务领域较为充分使用了各类政策工具,对服务体系的建立形成了较为全面的支持。

1. 政策工具整体较为丰富但供给型政策工具占比过高

从中医药健康服务体系的整体角度考察政策工具的分布情况,供给型政策工具占比最高,接近八成,环境型接近两成,需求型占比最小。进一步结合各类具体政策工具的使用频率可以发现,在供给型政策工具中,现阶段中医药健康服务领域的政策主要在于制定目标规划,确定责任机构和重点任务,开展试点建设和评估。直接给予资金、技术、组织和人才的支持未达到供给型政策工具的 15%,这说明对

表 7 前 16 名高频关键词的相异矩阵

高频词	中医药	健康	医疗	中医	中药	医院	卫生	康复	人才	教育	老年人	养老	保险	文化	社区	互联网
中医药	0.000	0.910	0.924	0.818	0.910	0.912	0.863	0.929	0.872	0.901	1.000	1.000	1.000	0.880	1.000	1.000
健康	0.910	0.000	0.856	0.934	1.000	0.923	0.798	0.933	1.000	0.897	0.907	0.921	1.000	0.913	0.907	0.858
医疗	0.924	0.856	0.000	0.909	1.000	0.862	0.877	0.873	0.931	1.000	0.923	1.000	0.886	1.000	1.000	0.850
中医	0.818	0.934	0.909	0.000	0.883	0.838	0.910	0.881	0.889	0.911	1.000	1.000	1.000	0.888	1.000	1.000
中药	0.910	1.000	1.000	0.883	0.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医院	0.912	0.923	0.862	0.838	1.000	0.000	0.851	0.898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卫生	0.863	0.798	0.877	0.910	1.000	0.851	0.000	1.000	1.000	0.905	1.000	1.000	1.000	1.000	0.878	1.000
康复	0.929	0.933	0.873	0.881	1.000	0.898	1.000	0.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人才	0.872	1.000	0.931	0.889	1.000	1.000	1.000	1.000	0.000	0.84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教育	0.901	0.897	1.000	0.911	1.000	1.000	0.905	1.000	0.840	0.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老年人	1.000	0.907	0.923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0.000	0.823	1.000	1.000	0.816	1.000
养老	1.000	0.921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0.823	0.000	1.000	1.000	1.000	1.000
保险	1.000	1.000	0.886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0.000	1.000	1.000	1.000
文化	0.880	0.913	1.000	0.888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0.000	1.000	1.000
社区	1.000	0.907	1.000	1.000	1.000	1.000	0.878	1.000	1.000	1.000	0.816	1.000	1.000	1.000	0.000	1.000
互联网	1.000	0.858	0.85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0.000

于中医药健康服务领域的支持还有待加强。在环境型政策工具中,政府在舆论方面较为重视,同时,激励社会力量的参与,制定标准、规范、指南并建立了中医药健康领域监管机制。但在价格、税收、金融和土地方面的政策工具使用较少。在需求型政策工具中,仅采用了医保政策。

从各类服务配套的政策工具分布情况来看,公共服务仍然是使用频率最高的政策工具,占比超过一半,剩余政策工具分布相对均匀。从内容来看,根据政策工具数量由高到低依次为市场配套、社会氛围(含健康素养)、人力配套、组织配套、技术配套以及其他配套(理论研究和科研创新等),这说明政府对中医药健康服务的各类配套是完善的,尤其重视从市场、社会舆论以及人才方面予以保障。

2. 人才和服务能力建设是政策支持的重心

服务目标、主体和客体已在政策文件中有清晰的阐述,服务方式、内容、规范、配套和监管方面也有对应的政策工具支持。中医药从医学科学进一步定义为健康服务资源。文本分析结果显示,以中医药为起点,现行政策对中医药与卫生、人才、教育、中药、健康、医疗和康复的结合比较关注。

在推进中医药健康服务发展的过程中,人才是中医药健康服务的关键资源,服务是中医药健康服务的核心竞争力。因此在现行政策体系中,中医药人才的教育、培训和管理一直是政策支持的重要领域,从2009—2012年,先后在16份政策文件中出现,充分说明政府在人才培养和管理方面的重视程度。在中医药健康、医疗和康复等服务能力建设方面,2009年以来已有多份文件给出了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此外,服务规范、服务模式探索、服务监管以及相关服务配套政策也得到极大地丰富。

3. 中医药健康服务的供给需要行政与服务主体的配合

根据文本分析结果可将中医药健康服务供给主体分为两类,第一类是行政主体,主要负责发布适当的政策和措施,支持中医药健康服务产业的发展;第二类是服务主体,直接为公众提供及时、有效的中医药健康服务。

行政主体主要包括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政府。国家卫生健康委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作为卫生事业的主管部门,对于中医药事业发展具有重要的领导作用。政府在政策文件中主要是

指各级人民政府,是中医药事业发展的重要参与主体,履行规划、购买/采购、监管等职责。

服务主体主要包括医院、社区和企业。医院出现频率远高于另两个机构,说明目前中医药资源主要集中在医院。以社区为主的基层中医药服务也一直是政府关注的重要领域,先后通过一系列文件强调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的重要性并发布相关任务,专门成立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工程领导小组。企业作为社会力量的重要部分,一直是丰富中医预防保健服务、中医医疗、中医药健康服务和中医养生保健、医养结合的重要力量。政策鼓励和支持企业举办中医坐堂诊所和医疗机构,开展中医药健康服务产品研发创新与成果转化,参与人才培养、连锁化经营和开展大数据整合。

五、政策建议

1. 加强环境型和需求型政策工具的使用

现阶段政策工具以供给型为主,环境型和需求型政策工具有待加强。这不仅体现在服务体系内,服务配套的政策工具使用也存在同样的情况。以健康养老为例,国家中医药局在2017年发布的《关于促进中医药健康养老服务发展的实施意见》中界定了中医药健康养老服务,给出了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但在政策保障方面仅强调放宽市场准入、发动市场力量以及开展试点工作,政策工具使用比较单一,支持力度有限。

不同于供给型政策工具的推动作用,环境型政策工具发挥辐射作用,主要通过改变内外部影响因素,为中医药健康服务的发展提供适宜的政策环境。环境型政策工具的使用相对丰富,但使用频率偏低,在政策工具中占比较小,未来需要结合政策目标,提高此类政策工具的使用频率,包括改善中医药健康服务在金融、税收和土地等方面的政策环境。

需求型政策工具使用频率最低,且种类单一。不同于前两类政策工具,需求型政策对中医药健康服务的发展发挥拉动作用,通过直接增加需求、改善和扩大消费市场等形式影响中医药健康服务的发展,是不可或缺的一类政策工具,未来有必要通过政府采购、改善消费市场、信息公开以及海外推广等方式增强拉动力。

2. 进一步完善操作层面的实施细则

现阶段政府在中医药健康服务的各个领域都有

宏观层面的规划或计划,在预防、保健和护理等方面,强调中医药在养生保健和疾病康复领域优势和中医药整体医学优势,建立融预防保健、疾病治疗和康复于一体的中医药服务体系和中医特色健康管理。在税收和金融方面,政府提出“加大对中医药健康养老服务企业的融资筹资支持力度”(国办发〔2015〕32号),并强调税务部门要落实小微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和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加大对中医药健康养老服务企业的融资筹资支持力度。在技术支持方面,政府强调通过科技创新推动中医药健康服务能力与水平提升,发布了中医药健康养老信息化建设和发展大数据技术、中医药健康服务技术等相关任务。在医保方面,多份文件提出完善中医药服务价格政策,探索符合中医药特点的医保支付方式。在服务监管方面,强调完善中医药服务监管机制,建立中医药健康养老服务提供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不良执业记录制度、失信惩戒以及退出机制。上述政策所提出的目标、建议或措施对于改善中医药健康服务供给环境十分关键,但对执行层面的指导作用有限,推动上述目标的实现还需要制定配套细则。

3. 加强各类服务主体合作协同的政策支持

现有政策提出两类组织在中医药健康服务领域的职责,前者通过合作与协调,为中医药健康服务提供良好、适宜的政策环境;后者充分发挥能动性,丰富中医药健康服务的供给内容和提升中医药健康服务能力。近年来政府部门之间的合作逐步加强,联合发文的频率显著提高,联合发文的内容从中医药创新发展、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逐渐扩大到人才培养、健康产业发展与文化传播等方面。此外,中医中药中国行组委会办公室和国务院中医药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也都有发文。但市场部门的合作比较薄弱,中医药健康服务的发展需要大量中医药资源的投入,现阶段主要集中在医疗机构内部,尽管政府已经出台了多点执业的政策,但作用比较有限。中医药健康服务供给需要社会力量的参与,未来需要丰富相关政策,引导和保障社区、企业与医疗机构(医院)进行合作,以建立符合中医药特点的服务体系和服务模式^[19]。

参考文献:

[1] 陈文玲,张瑾. 充分发挥我国中医药独特优势 新形势

下应加快构建中西医并重的医药卫生体制[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1(12):64-83.

[2] 杜本峰,郝昕,刘林曦. 健康中国背景下构建高质量健康管理体系发展路径[J]. 河南社会科学,2021,29(5):109-117.

[3] 黄萃. 政策文献量化研究[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21.

[4] KIRSCHEN S K. Economic policy in our time [M]. Chicago IL: Rand McNally,1964:1-88.

[5] HOOD C. The tools of government [M]. Chatham: Chatham House Pub,1986.

[6] MCDONNELL L M, ELMORE R F. Getting the job done: alternative policy instruments[J]. Educational Evaluation and Policy Analysis,1987,9(2):133-152.

[7] BRUCE D, RICHARD W. Canadian public policy: ideas, structure, process [M]. Toronto: Nelson,1992.

[8] ROTHWELL R, ZEGVELD W. Reindustrialization and technology[M]. London: Logman Group Limited, 1985.

[9] 谢青,田志龙. 创新政策如何推动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基于政策工具与创新价值链的政策文本分析[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5,36(6):3-14.

[10] 尹虹潘,刘姝伶. 新时代中国经济政策工具创新:国家级战略平台的政策工具特征分析[J]. 经济学家,2021(8):53-60.

[11] 江亚洲,郁建兴. 重大公共卫生危机治理中的政策工具组合运用:基于中央层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政策的文本分析[J]. 公共管理学报,2020,17(4):1-9.

[12] 宋晓庆,熊季霞,姚育楠. 基于政策工具的我国中医药政策研究[J]. 医学与社会,2019,32(11):4-8.

[13] 魏敏,乔婷婷,范艳存. 基于政策工具的我国中医药养生保健服务政策内容分析[J]. 中国农村卫生事业管理,2019,39(10):713-717.

[14] 吴名,范转转,向乐怡,等. 基于政策工具的我国中医“治未病”政策研究[J]. 医学与社会,2021,34(10):17-22.

[15] 邓月明,聂海洋. 基于政策工具的我国中医药传承创新政策分析[J]. 中国药房,2021,32(1):1-5.

[16] 孙靖凯,朱春雪,汪晓凡. 基于政策工具的我国中医药教育政策文本量化分析[J]. 卫生职业教育,2021,39(14):157-159.

[17] ZEITHAML V A, BITNE M J. 服务营销[M]. 5版. 张金成,白长虹,译.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

[18] 郭国庆. 服务营销管理[M]. 2版.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19] 于文明,王君平. 守正创新,振兴中医药[N]. 人民日报,2021-06-02(014).

互联网医疗服务供给的主体驱动因素

张泽洪^{1,2}, 熊晶晶¹

(1. 温州医科大学公共卫生与管理学院, 浙江 温州 325035;

2. 浙江省流域水环境与健康风险研究重点实验室, 浙江 温州 325035)

摘要:基于好大夫平台 23 万余名在线医生数据,从服务供给视角出发,应用无序多项 Logistic 回归方法分析影响服务供给的主体驱动因素。与线下医疗相比,线上医疗中在线医生的性别、年龄、职称、所属医院与来自区域等具有认知捷径属性的主体特质对服务供给的影响力更大;与线下医疗更注重医疗结果质量不同,线上医疗服务供给的主观建构更关注医疗过程质量,情感认同度高与认知认同度高更有利于促进服务供给;未来需要基于服务主导逻辑设计激励制度,建立受政府规制的在线声誉机制,吸引并激励在线医生提供数量更多、质量更高的互联网医疗服务。

关键词:互联网医疗;服务供给;在线医生;主体特质

中图分类号:R197.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4970(2022)01-0038-09

广义的互联网医疗可追溯至 20 世纪 80 年代的医疗信息化,真正形成于 2015 年,最重要的标志是 2015 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提出用“互联网+”思维与技术来促进医疗卫生等领域的深度改革和发展。重要突破来自 2018 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的意见》以及 3 个配套文件,政策开始允许互联网赋能部分核心医疗。之后,国家持续出台相关政策推动互联网医疗规范发展,如 2019 年国家医疗保障局发布《关于完善“互联网+”医疗服务价格和医保支付政策的指导意见》,2020 年国家医疗保障局出台《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医疗服务医保支付工作的指导意见》,这两个文件对制约互联网医疗服务发展的最大瓶颈问题——医保报

销问题提出了初步解决方案。2021 年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聚焦医疗等重点公共服务领域,推动数字化服务普惠应用,扩大医疗服务供给,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

上述政策文件对互联网赋能医疗的范围进行了拓展,从只可赋能预约挂号、自助缴费、自助查询等非核心医疗业务,扩展到互联网可以赋能部分医疗服务的核心业务,显然是要借助互联网的开放、共享、联通等特点,扩大医疗服务供给。当然,互联网医疗服务的供给取决于终端供给执行主体,即在线医生愿不愿意提供以及提供多少服务。已有的互联网医疗数据表明,无供给即注册成为在线医生后并不提供互联网医疗服务的在线医生占比很高,以国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BGL266)

作者简介:张泽洪(1974—),男,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医疗服务优化研究。E-mail:2411617111@qq.com

内领先的互联网医疗平台好大夫平台为例,在好大夫平台注册的 23 万余名在线医生中,共有 62843 名在线医生仅注册但从未提供在线问诊服务,占比达到 26.9%,这说明有 1/4 以上的注册医生是“僵尸”用户。当然平台中也有不少在线医生是互联网医疗服务的积极提供者,好大夫平台中提供在线问诊服务达到 500 人次以上的在线医生共有 26886 人,占比 11.5%,而且其中提供在线问诊达到 5000 人次以上的也有 2508 人,占比 1.1%,这与在线健康社区中“90-9-1”的现象一致,即 90% 的用户属于潜水状态,9% 的用户较常参与,1% 的用户是积极参与^[1],在线医生的互联网医疗服务供给情况与此相似。

上述情况说明互联网要实现扩大医疗服务供给的目的,关键是在线医生愿意提供互联网医疗服务,而在线医生自身的主体特质与其自觉的主观建构都对服务供给具有驱动作用。

一、文献综述

受互联网流量思维的影响,已有研究主要从需求侧角度围绕互联网医疗的患者在线就医行为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从供给侧角度研究互联网医疗服务行为相对较少,主要集中于以下 3 个方面:

a. 互联网医疗服务半径的拓展。胡蓉等认为互联网医疗的重要价值在于重构医疗服务模式,拓展医疗服务半径,最终打造更健康的医疗生态体系^[2]。互联网之所以能够拓展医疗服务半径,主要源于互联网的技术特性,张艺奕等认为互联网技术能够联通层级化、碎片化、不均衡化的医疗卫生资源(主要是医生资源),实现优质医生资源下沉、延伸服务半径^[3]。互联网技术的重要功能在于可以突破空间约束,汪波等从“新区域主义”的空间观进行了分析,认为互联网能够突破刚性的行政性边界,消解区域治理的行政壁垒,实现区域医疗服务由行政物理空间不均衡转向信息空间一体化^[4];朱张祥等从可及性角度提出互联网通过打破空间的限制,提高了优质医疗服务的可及性,让患者体验到互联网医疗带来的便利^[5]。

b. 互联网医疗服务个体与结构的影响。个体与结构的影响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是马骋宇等从个体的微观层面分析了努力期望、绩效期望、社会影响、便利条件、医生感知诊疗流程的复杂性和刚性、高压

工作特征等因素对互联网医疗服务行为的影响^[6]。郭薇等则从结构的中观层面分析了医院推动互联网医疗发展的动力不足、外部互联网医疗资源与内部医疗系统对接存在圈外和圈内的距离、互联网医疗的供需难以对接等因素对互联网医疗服务行为的影响^[7]。

c. 互联网医疗服务行为人的内在激励。内在激励最关键的是需要设计有效的机制来激励医生。有效的机制包括:①利益回报。王瑜超从规则角度提出要建立使医患双方均能获益的互惠规范^[8];赵人行等则从服务模式角度提出应从数据分析、个性化医疗等方面开发高附加值的互联网医疗服务模式,以确保医生、患者等利益相关方的利益^[9]。②在线评价。患者的在线评价对在线医生既有约束作用也具有激励作用,Bobicev 等提出在医生在线评价声誉得分的基础上,将患者需求与医生信息的相似度作为健康咨询服务推荐的依据^[10]。③助推成长。互联网医疗应有助于医生的职业发展,Redelmeier 等认为应为医生提供一个可搜索、可信任、可按需获取、高影响力和易于使用的互联网医疗平台^[11];Pols 等提出以特定的敏感过滤器帮助医生在治疗时间有限的情况下获取高质量的临床问题答案^[12]。

既往研究从服务半径、影响因素与行为激励等角度对互联网医疗服务行为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但忽略了互联网医疗服务供给的执行主体即在线医生自身因素的作用。而在线医生在供给服务时既会受到激励措施、制度法律等外在因素的影响,也会受到内在的自身因素的影响,如面对相同的外部环境时,有 11.5% 的在线医生积极提供互联网医疗服务,但也有 26.9% 的在线医生不提供互联网医疗服务,因此分析影响互联网医疗服务供给的在线医生自身因素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本研究从供给视角出发,应用无序多项 Logistic 回归方法对互联网医疗服务的供给进行探讨,从服务供给执行主体层面揭示供给的关键影响因素,以期为互联网扩大医疗服务供给提供参考。

二、研究假设

互联网医疗服务的供给主体是多元的,包括政府、医院、互联网医疗平台、在线医生等,其中,政府、医院、互联网医疗平台等是互联网医疗服务的“组织类”提供者,而互联网医疗服务的供给最终要由

终端“个体”的人来执行完成。换言之,互联网医疗服务的供给最终要由在线医生来提供,而在线医生自身的主体特质与其主观建构行为会影响互联网医疗服务的供给。

1. 互联网医疗服务供给的主体特质影响

在线医生主体特质主要有角色特征与群体类别特征两类。医生的角色特征与群体类别特征对传统的线下医疗具有重要的影响,而互联网医疗服务尽管本质仍是医疗服务,但毕竟有了互联网技术的赋能,其影响是否有区别,需要进一步分析。

(1) 服务供给的角色特征影响

根据角色的分类可知,有的角色属于先赋角色,如在线医生的性别、年龄,而有的角色为自致角色,如职称。

a. 性别因素的影响。互联网通常被视为典型的“男性领域”^[13]。实证研究也显示不同性别互联网使用目的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女性更倾向于将互联网作为沟通、购物工具,而男性更倾向于使用互联网搜寻信息与进行与职业相关的活动^[14]。互联网医疗服务供给就是一种专业性极强的职业活动,男医生使用互联网医疗并积极提供服务的可能性更大。因此提出研究假设 H1:与在线女医生相比,在线男医生积极提供互联网医疗服务的可能性更大。

b. 年龄因素的影响。年轻人常被称为“数字原住民”,通常能熟练使用数字技术,而年龄较大者一般被称为“数字移民”,有研究者甚至称年长者为“数字遗民”“数字难民”^[15]。中青年群体通常是互联网使用的活跃力量,而年龄超过 50 岁,互联网使用率会随着年龄的增大而降低^[16]。何雪松等研究表明,年轻医生对互联网医疗这一类新技术具有更高的认可度与使用率^[17]。因此提出研究假设 H2:与年龄大的在线医生相比,年轻在线医生积极提供互联网医疗服务的可能性更大。

c. 职称因素的影响。互联网医疗对大部分在线医生而言是兼职工作,一般具有高级职称的医生通常是单位的业务骨干,本职工作的劳动强度都很大,难有余力去积极提供互联网医疗服务;而且高级职称的医生往往收入相对较高,也缺乏追求利益回报的动力。马骋宇研究也发现,初级、中级职称的医生,其事业处于上升期,也是职业发展的黄金期,对自己的医疗服务能力与知名度有需求,有更强的意愿提供在线医疗服务^[18]。因此提出研究假设

H3:与高级职称的在线医生相比,初级、中级职称在线医生积极提供互联网医疗服务的可能性更大。

(2) 服务供给的群体类别特征影响

在线医生的群体类别特征包括在线医生所属医院、来自区域等。人会使用基于群体的图式处理信息,从而将认同基于群体成员身份的相似性之上。

a. 医院等级的影响。通常情况下,等级越高医院的医生,其医疗服务能力也会越强,所承担的医疗服务工作量也会越大。就目前情况而言,相比参与能力,互联网医疗首先需要在线医生积极参与的态度,因为与线下医疗相比,互联网医疗所要面对的主要疾病是疑难杂症之外的常见病、慢性病等,需要的是“全科医生式”的医疗服务能力。换言之,来自三级医院的在线医生有能力但没有过多精力提供互联网医疗服务,来自二级医院与一级医院的在线医生尽管医疗服务能力相对更弱,但有时也有动力去提供互联网医疗服务。因此提出研究假设 H4:与来自三级医院的在线医生相比,来自一、二级医院的在线医生积极提供互联网医疗服务的可能性更大。

b. 区域的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明显的区域不平衡特点,医疗卫生的发展同样存在区域间的显著差异。研究发现区域间医疗卫生资源配置的均等化水平近年来虽有所提高,不同层级医疗资源持续增长,但仍然处于失衡状态,东部、中部与西部地区之间的医疗卫生资源配置处于不均衡状态^[19],线下医疗人力资源的不均衡分布同样会影响到互联网医疗人力资源的分布,东中西部地区会存在在线医生资源的差距。邢梦莹研究发现互联网医疗所要依赖的互联网技术,在我国区域间也呈现出东西部的差别^[20]。据此推论,东中西部地区的在线医生提供互联网医疗服务的程度也会存在区域差异,来自东部地区的在线医生提供互联网医疗服务的可能性会高于中西部,而中部又会略高于西部。因此提出研究假设 H5:来自东部地区的在线医生相比中西部的在线医生,中部的在线医生相比西部的在线医生,积极提供互联网医疗服务的可能性会更大。

2. 互联网医疗服务供给的主观建构

供给既受到在线医生主体特质的影响,也需要在线医生积极的主观建构。对互联网医疗而言,主观建构就是要求在线医生能够为患者提供服务态度友善与服务水平有保障的互联网医疗服务,而服务态度友善与服务水平有保障的在线医疗服务,从顾

客认同视角分析,最终会体现为患者认同。关于认同的维度,根据李纯清等的总结,认同有单维结构论(认知)、二维结构论(认知和情感)和三维结构论(认知、情感和评价)^[21],而评价通常包含在认知中,因此选择认同的二维结构论,即认同包括认知和情感两个维度,其中,认知认同是指患者对在线医生医疗服务态度与服务水平可靠性的理性评判,情感认同是指患者基于在线医生的医疗服务而产生对在线医生的特定情感联结^[22]。

一般而言,在传统的线下医疗中,当医生的医疗服务态度与服务水平符合患者的需求和预期时,就能促进患者的医疗服务认同,患者认同又会促进广泛的关系型行为,患者会有更高意愿向亲戚朋友推荐该医生的医疗服务,患者与医生的长期关系也容易建立,患者对医生的忠诚度也会提高,而这又会极大地激励医生提供更多的、更好的医疗服务,形成良性循环。线下医疗对医生而言是本职工作,通常情况下会积极提供有质量保障的医疗服务去赢得患者认同,这对其职业发展具有重要价值;然而,互联网医疗服务只是在线医生的兼职工作,在线医生是否会积极主观建构而且有意愿去赢得患者认同,而患者认同是否又会对在线医生提供互联网医疗服务具有推进作用,需要进一步验证。因此提出研究假设H6:患者的认知认同度越高,在线医生积极提供互联网医疗服务的可能性越大;H7:患者的情感认同度越高,在线医生积极提供互联网医疗服务的可能性越大。

三、数据来源与研究设计

1. 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好大夫平台公开的数据。好大夫平台成立于2006年,是中国领先的互联网医疗平台之一。2020年度好大夫平台上注册的在线医生共有234 037人,其中以医师为主体,共有232 178人,除医师外,还有562名技师、412名药师、355名康复师、328名护师、104名检验师、60名心理咨询师、38名营养师,他们统称为在线医生,除了主要提供医疗服务外,还提供康复管理、检验咨询、用药指导、护理指导、心理咨询以及营养指导等综合的专业医疗服务。

2. 变量选择与变量说明

a. 因变量。以供给为因变量(参照组为无供给

在线医生),供给以在线医生提供的在线问诊量为测量指标,完全不提供在线问诊服务的在线医生为无供给,低于人均在线问诊量(303.54人次)为常规供给,高于人均在线问诊量为积极供给。

b. 自变量。供给的自变量为主体驱动因素,分为在线医生的主体特质变量和主观建构变量两类。①主体特质变量分为角色特征变量和类别特征变量两种,其中在线医生的性别、年龄与职称为角色特征变量,在线医生所属医院等级^①与来自区域为类别特征变量。具体变量名及赋值情况见表1。②主观建构变量包括情感认同与认知认同。情感认同以在线医生收到患者的感谢信数量作为测量指标,高于均值(7.63封)为高情感认同,低于均值则为低情感认同。认知认同以在线医生收到患者的心意礼物数量作为测量指标,高于均值(16.42件)为高认知认同,低于均值则为低认知认同。心意礼物是在好大夫平台上在线支付小额费用购买的暖心、鲜花、锦旗等虚拟礼物,一个心意礼物价值5元、10元、20元、100元不等,心意礼物体现的是患者在接受在线医生的医疗服务后,对其服务态度与服务水平理性计算的认同。

表1 变量名与赋值

变量	赋值	均值	标准差
供给	无供给:1;常规供给:2;积极供给:3	1.86	0.614
性别	男:1;女:2	1.37	0.483
年龄	61岁及以上:1;51~60岁:2; 41~50岁:3;31~40岁:4; 30岁及以下:5	3.13	0.596
职称	正高:1;副高:2;中级:3;初级:4	2.43	1.003
医院等级	三级医院:1;二级医院:2; 一级医院:3	1.16	0.412
所属区域	东部:1;中部:2;西部:3	1.56	0.751
情感认同	高情感认同:1;低情感认同:2	1.56	0.497
认知认同	高认知认同:1;低认知认同:2	1.60	0.491

3. 研究方法

因变量供给为多分类变量,且考虑各水平之间的发生比,自变量中的性别、所属区域,以及感谢信、心意礼物为二元或多元分类变量,职称、医院等级与年龄为有序分类变量,因此,采用无序多项Logistic回归方法研究影响供给的相关因素及其对供给的贡献水平,以期实现对供给主体驱动因素的分析。因

①来自公立医院与来自私立医院的在线医生互联网医疗服务供给差异大,但好大夫平台并没有“医院性质”这一项统计数据,受此限制,自变量未选择“医院性质”。

为无序多项 Logistic 回归可以计算不同特征组合下发生不同结果的概率,用发生比(OR)即 $\exp B$ 对多分类因变量与自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估计,当 $\exp B > 1$ 时表示该因素是供给的促进因素,当 $\exp B < 1$ 时表示该因素是供给的危险因素,当 $\exp B = 1$ 时表示该因素对供给不起作用。

四、研究结果与分析

1. 模型检验

无序多项 Logistic 回归模型的拟合度检验主要通过拟合信息、拟合度对模型进行似然比检验,模型拟合结果如表 2 所示,模型拟合的 $P < 0.05$,模型整体显著,拟合结果较好,说明无序多项 Logistic 回归模型能够用于供给的分析。

表 2 模型拟合结果

变量	模型拟合条件 (-2 对数似然值)	似然比检验		
		卡方	自由度	P
截距	5271.07			
性别	5303.06	31.99	2	0.012
年龄	8158.59	2887.52	8	0.000
职称	7458.77	2187.69	6	0.000
医院等级	6406.23	1135.15	4	0.000
所属区域	5494.39	223.32	4	0.000
情感认同	15584.48	10313.40	2	0.000
认知认同	30101.49	24830.42	2	0.000

2. 服务供给的描述性分析

在好大夫平台 234037 名在线医生中,没有提供互联网医疗服务的医生共计 62843 人,占比 26.9%,常规供给共计 141225 人,占比 60.3%,积极供给共计 29969 人,占比 12.8%;未标明性别的有 2116 人,未标明职称的有 1570 人,未标明医院等级的有 6705 人,未标明所属省份的有 7413 人。表 3 为好大夫平台在线医生服务供给情况统计。

(1) 服务供给主体特质影响的描述性分析

a. 服务供给角色特征的影响。①性别。从无供给到常规供给再到积极供给,在线男医生的占比持续上升,而在线女医生的占比持续降低,均值数据表明男医生更有可能积极供给。②职称。从无供给到常规供给再到积极供给,初级职称与中级职称的占比持续减少,而副高职称与正高职称医生的占比持续提高,尤其是正高职称医生占比提高了近 1 倍,这说明具有高级职称的医生积极供给的可能性更大,均值数据结果与研究假设相反。③年龄。从无

表 3 好大夫平台在线医生服务供给的描述性分析

类别	项目	无供给		常规供给		积极供给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性别	女	23780	38.50	52068	37.10	10365	34.70
	男	38004	61.50	88164	62.90	19540	65.30
年龄	30 岁及以下	1926	3.10	3905	2.80	246	0.80
	31 ~ 40 岁	7137	11.40	25340	17.90	4940	16.50
	41 ~ 50 岁	51652	82.20	101568	71.90	20055	66.90
	51 ~ 60 岁	1782	2.80	8864	6.30	3950	13.20
	61 岁及以上	346	0.50	1548	1.10	778	2.60
职称	初级	14590	23.60	21355	15.20	1343	4.50
	中级	22502	36.30	46857	33.30	6866	22.90
	副高	16230	26.20	41775	29.70	9852	32.90
	正高	8591	13.90	30639	21.80	11867	39.70
医院等级	一级医院	1445	2.30	2506	1.80	278	1.00
	二级医院	11173	18.30	14574	10.60	1431	5.00
	三级医院	48544	79.40	120259	87.60	27122	94.00
所属区域	西部	10944	18.00	21597	15.80	3452	11.90
	中部	16710	27.50	33323	24.30	5891	20.40
	东部	33167	54.50	81951	59.90	19589	67.70
情感认同	低认同	62786	99.90	129955	92.00	8447	28.20
	高认同	57	0.10	11270	8.00	21522	71.80
认知认同	低认同	62830	99.98	136370	96.60	8040	26.80
	高认同	13	0.02	4855	3.40	21929	73.20

供给到常规供给再到积极供给,30 岁及以下的年轻医生、31 ~ 40 岁的青年医生以及 41 ~ 50 岁的中年医生,占比都有下降,而 51 ~ 60 岁的中老年医生,61 岁及以上的老年医生的占比都持续上升,这说明 51 岁及以上的中老年医生积极供给的可能性更大,这与年轻医生积极供给可能性更大的研究假设相反。

b. 服务供给群体类别特征的影响。①医院等级。从无供给到常规供给再到积极供给,来自一级医院、二级医院的在线医生的占比都持续下降,而来自三级医院的在线医生占比持续上升,这意味着来自三级医院的在线医生积极供给的可能性更大,这与一、二级医院的在线医生积极供给可能性更大的研究假设相反。②区域。从无供给到常规供给再到积极供给,来自西部与中部地区的在线医生的占比都呈现下降趋势,而来自东部地区的在线医生的占比持续提高,这说明东部地区的在线医生积极供给的可能性更大。

(2) 服务供给主观建构路径的描述性分析

a. 情感认同的影响。从无供给到常规供给再到积极供给,情感认同度高的在线医生的占比持续上升,均值表明情感认同度高的在线医生积极供给的概率更大。

b. 认知认同的影响。从无供给到常规供给再到积极供给,认知认同度高的在线医生的占比持续上升,均值表明认知认同度高的在线医生积极供给的可能性更高。

3. 服务供给无序多项 Logistic 回归结果分析

表 4 是服务供给无序多项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Logistic 回归模型由 2 个模型组成:模型 1 为常规供给与无供给的比较,模型 2 为积极供给与无供给的比较。

(1)服务供给主体特质影响

服务供给角色特征影响方面,性别、年龄、职称等在线医生的角色特征对供给有显著性影响,但与研究假设并不完全一致。

a. 性别与供给程度正相关,男性在线医生积极供给的程度要高于女性在线医生。表 4 中发生比数值表明,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条件下,在线男医生积极供给的概率是在线女医生的 1.042 倍,原因可能是:①女医生工作之余,往往将更多的时间留给家庭,面对工作与生活的冲突时,对于互联网医疗服务这一非本职工作,会将其重要性排在生活之后;②仍存在一定的认知偏见,总体而言,患者更信任男医生的医

疗服务水平,而权威的男医生多于女医生的现实又加重了这一认知偏差,患者在互联网医疗时会优先选择男医生就医。不过,在常规供给模型中,性别对常规供给没有显著性影响,这说明相比在线女医生,在线男医生积极供给的可能性更大,但总体优势并不明显。研究假设 H1 成立。

b. 年龄与供给程度总体呈现正相关关系,从发生比分析,与 30 岁及以下的年轻医生相比,51 岁及以上的中老年医生积极供给的发生比显著高于年轻医生,前者分别是后者的 1.834 倍与 1.944 倍;31 ~ 40 岁的青年医生无论积极供给还是常规供给的发生比都显著高于年轻医生,前者分别是后者的 2.141 倍与 1.324 倍。值得关注的是,41 ~ 50 岁的中年医生积极供给与常规供给的发生比显著低于年轻医生的发生比。总体而言,31 ~ 40 岁的青年医生与 51 岁以上的中老年医生积极供给的概率更高,而 41 ~ 50 岁的中年医生积极供给的可能性更低,原因可能是中年医生在单位往往是业务骨干又常兼任医院管理工作,工作压力很大,没有时间与精力提供互联网医疗服务。另外,年龄大的在线医生积极供给的可能性更大,这与研究假设相反,原因可能是互联

表 4 好大夫平台在线医生服务供给无序多项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常规供给				积极供给			
	回归系数	标准误	P	expB	回归系数	标准误	P	expB
截距	0.278	0.069	0.000		-3.002	0.135	0.000	
性别(参照组:女)								
男	0.002	0.010	0.837	1.002	0.041	0.016	0.010	1.042
年龄(参照组:30 岁及以下)								
61 岁及以上	-0.020	0.070	0.782	0.981	0.606	0.101	0.000	1.834
51 ~ 60 岁	0.142	0.042	0.001	1.152	0.665	0.080	0.000	1.944
41 ~ 50 岁	-0.419	0.031	0.000	0.658	-0.252	0.073	0.001	0.777
31 ~ 40 岁	0.280	0.033	0.000	1.324	0.761	0.075	0.000	2.141
职称(参照组:初级)								
正高	0.872	0.018	0.000	2.391	2.565	0.036	0.000	12.996
副高	0.598	0.015	0.000	1.819	1.866	0.034	0.000	6.465
中级	0.330	0.015	0.000	1.391	1.104	0.034	0.000	3.017
医院等级(参照组:一级医院)								
三级医院	0.354	0.062	0.000	1.424	0.460	0.114	0.000	1.585
二级医院	-0.172	0.063	0.007	0.842	-0.692	0.117	0.000	0.500
所属区域(参照组:西部)								
东部	0.182	0.014	0.000	1.200	0.530	0.022	0.000	1.698
中部	-0.002	0.016	0.893	0.998	0.083	0.026	0.001	1.087
情感认同(参照组:低情感认同)								
高情感认同	1.070	0.010	0.000	2.914	1.209	0.010	0.000	3.349
认知认同(参照组:低认知认同)								
高认知认同	1.838	0.018	0.000	6.285	1.962	0.018	0.000	7.116

网的使用对年龄大的在线医生而言并不困难,因为医生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群体,依据刘骏等的观点,教育程度会影响人对互联网的使用深度,教育程度越高的人越有意识使用互联网技术解决问题^[23];此外,年龄大的医生其医疗服务水平更容易获得患者的信任,因为年龄大的医生经验更丰富。研究假设 H2 不成立。

c. 职称与供给程度正相关,职称越高的在线医生积极供给程度越高。具体而言,正高职称医生积极供给与常规供给的发生比分别是初级职称医生的 12.996 倍与 2.391 倍,副高职称医生和中级职称医生的这一比例分别为 6.465 倍、1.819 倍和 3.017 倍、1.391 倍。即同等条件下,正高、副高职称和中级职称医生比初级职称医生更可能积极供给,而且发生比随着职称的提高而增大,说明积极供给发生比随着职称的提高而增大。原因在于职称越高越容易获得患者的认可与接纳,因为职称通常代表具备相应的素质、能力,而互联网医疗就是一种线上的“坐堂行医”,互联网医疗服务的开展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患者的就医选择,职称越高越容易获得患者的选择,从而提供更多的互联网医疗服务,换言之,职称越高的在线医生,积极供给的可能性越大。假设 H3 不成立。

服务供给群体类别特征影响方面:①医院等级与供给程度正相关。具体而言,来自三级医院的在线医生积极供给与常规供给的发生比分别是来自一级医院在线医生的 1.585 倍与 1.424 倍,即在同等条件下,来自三级医院的在线医生比来自一级医院的在线医生更可能积极供给。不过,二级医院的在线医生无论是积极供给还是常规供给都低于一级医院的在线医生,这与研究假设相反。原因可能是在医疗改革背景下,尤其在分级诊疗政策实施中,三级医院属于“顶天”,代表区域内最高医疗服务水平,而一级医院是“立地”,也受到国家医疗改革,如分级诊疗政策实施带来的改革红利,而处于“夹心饼干”状态的二级医院,既不“顶天”又不“立地”,患者的认可度与接纳度较低。总体而言,在线医生积极供给会受头部效应的影响,即等级最高的医院对积极供给的形成才会有显著影响。假设 H4 部分成立。②所属区域与供给程度正相关,东部地区的在线医生积极供给的程度高于西部地区的在线医生。具体而言,来自东部地区的在线医生积极供给与常

规供给的发生比分别是西部地区在线医生的 1.698 倍与 1.200 倍,即同等条件下,东部地区的在线医生比西部地区的在线医生更可能积极供给;中部地区情况不同,中部地区在线医生积极供给的发生比是西部地区在线医生的 1.087 倍,而对常规供给没有显著性影响,这说明中部地区在线医生相比西部地区在线医生积极供给的概率并不高。假设 H5 部分成立。

(2)服务供给主观建构路径影响

表 4 结果表明,情感认同与认知认同对积极供给具有显著性影响,与研究假设 H6、假设 H7 一致。

a. 情感认同与供给程度正相关,情感认同度高的在线医生积极供给的程度要高于情感认同度低的在线医生。从发生比分析,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条件下,情感认同度高的在线医生积极供给与常规供给的概率分别是情感认同度低的在线医生的 3.349 倍与 2.914 倍。这说明与情感认同度低的在线医生相比,情感认同度高的在线医生更可能积极供给。假设 H6 成立。

b. 认知认同与供给程度正相关,认知认同度高的在线医生积极供给的程度要高于认知认同度低的在线医生。从发生比分析,认知认同度高的在线医生积极供给与常规供给的概率分别是认知认同度低的在线医生的 7.116 倍与 6.285 倍。这说明与认知认同度低的在线医生相比,认知认同度高的在线医生更可能积极供给,而且比情感认同度的影响力更大。假设 H7 成立。

可见,情感认同与认知认同对供给都具有显著性影响,这说明要扩大供给,需要在线医生自觉的主观建构以提高医疗服务水平与改善服务态度,从而获得患者更高的情感认同与认知认同,进而带来互联网医疗服务供给的提高。

五、结果讨论

表 4 数据结果显示,在互联网医疗服务供给的形成路径中,在线医生本身的主体特质与其自觉的主观建构都对服务供给的形成具有驱动作用。

1. 服务供给主体特质的认知捷径属性

与线下医疗相比,线上医疗中在线医生的性别、年龄、职称、所属医院与来自区域等具有认知捷径属性的主体特质对服务供给的影响力更大。韦慧民等的观点表明,人会基于认知捷径如依靠来自于群体

成员的身份、角色信息等快速认知其能力等特质^[24]。在线医生尽管也是医生,而且是来自医院的医生,但互联网医疗服务是非接触式诊疗,缺少体格检查、检查检验等流程,使其所能提供的服务项目有限,按照《互联网诊疗管理办法(试行)》规定,目前互联网诊疗只能开展部分常见病、慢性病复诊和“互联网+”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换言之,互联网医疗并不需要面对急危重症与疑难杂症。而面对严重程度不同的疾病,患者决策涉入度是不同的。通常情况下病情越严重,患者决策涉入度会越高,患者会倾向于搜集更多的医生信息、医疗信息,还会在医疗服务过程中进行再判断,此时,认知捷径信息的影响力会更小;反之,当病情不严重,患者决策涉入度会低,此时,在线医生的年龄、性别、职称、所属医院等级、来自区域等认知捷径信息的影响力会更大。与线下医生相比,在线医生的职称、所属医院等级等认知捷径信息对其积极供给的影响力会更大。

2. 服务供给主观建构的过程质量倾向

通过供给的主观建构分析,在线医生也如线下医生一样,需要一定的医疗服务水平以及友善的医疗服务态度,但在具体内涵上,两者是有显著区别的,线下医疗更会注重医疗结果质量,而线上医疗更关注医疗过程质量;在医疗服务水平方面,线下医生的医疗服务水平体现在最终要让患者认为疾病得到治愈或好转,而线上医疗的服务水平更主要体现为能够给出明确的诊断与治疗方​​案,而不是模糊判断下的责任推卸,如要求患者到线下检查或线下面诊等;在医疗服务态度方面,线下医疗对服务态度要求最多的是耐心、友善等,而线上医疗因为是非接触式,而且往往是异步完成的,即患者在线上问诊后,等待医生的线上回复,回复时间因人而异,这与线下医疗是同步沟通不同,由此导致线上医疗中患者对在线医生的及时回复成为主导性需要,对服务态度有决定性影响。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1. 研究结论

a. 供给会受到在线医生主体特质的显著影响。性别对供给仅有微弱影响,男性与女性在线医生供给的差异很小;年龄对供给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中老年在线医生与青年医生积极供给的可能性更高,而中年医生相比年轻医生,积极供给的概率更低;职

称对供给具有显著性影响,职称越高,积极供给的概率越高;医院等级对供给的影响仅体现为头部效应,来自二级医院的在线医生与来自一级医院的在线医生相比,积极供给的可能性还更小;区域对供给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东部地区,东部地区的在线医生积极供给的发生比最高。

b. 供给需要在线医生自觉的主观建构。情感认同度高与认知认同度高的在线医生积极供给的可能性更大,供给需要在线医生自觉的主观建构以提高医疗服务水平和改善服务态度,从而获得患者更高的情感认同与认知认同。

c. 与线下医生相比,在线医生的职称、所属医院等级、来自区域等具有认知捷径属性的主体特质对供给的影响力更大;与线下医疗更注重医疗结果质量不同,线上医疗供给的主观建构更关注医疗过程质量。

2. 政策建议

a. 基于服务主导逻辑设计激励制度。服务主导逻辑强调用户思维,互联网医疗的用户不仅包括患者,也包括在线医生。依据服务主导逻辑,要吸引并激励职称高、三级医院与东部地区的在线医生提供数量更多、质量更优的在线医疗服务,互联网医疗的价值主张应当与在线医生的价值主张相一致,满足在线医生合理的价值诉求,一方面,需要注意在线医生普遍性的价值诉求,如互联网医疗要有助于在线医生获得更好的工作绩效、提高自己的医疗服务水平、有助于职业发展、提升自己的知名度与美誉度、构建医生个人品牌、获得相应的薪酬等;另一方面,也需要注意不同在线医生的个性化价值诉求,不同职称、不同等级医院、不同区域的在线医生对参与在线医疗所能获得的薪酬回报、职业发展等各具体维度所赋予的权重会有差异,这就需要更精准化、个性化满足不同诉求,如职称高且年龄大的在线医生,职业发展的激励作用通常会大大减小,而应满足这些在线医生更为个性化的需求。

b. 建立政府规制下的在线声誉机制。要激励在线医生提供的互联网医疗服务确保过程质量,这恰好是具有开放、共享、留痕等特性的互联网的优势,利用互联网留痕、共享等特性而建立在线声誉机制,对于激励在线医生提高互联网医疗服务过程质量即改善服务态度、提高医疗服务水平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互联网医疗的在线声誉机制,与李子林

等提出的“公众档案记忆建构”功能异曲同工^[25],在线医生的医疗服务水平、服务态度等情况都能够通过在线声誉机制而“昔日重现”,由此,互联网医疗应建立在线点评机制,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互联网医疗也会存在如网购点评中的虚假评价、诱导评价等问题,因此,需要政府加强对在线声誉虚假评价的处罚以遏制失真评价,这是确保在线声誉机制可信性的重要措施。政府应对互联网医疗平台诱导评价等欺诈性点评行为进行规范约束,打破部门间数据壁垒,前端放开放活、后端管住管好,构建事中事后监管体系,从而提高真实在线评价的概率,进而依法依规加强互联网医疗平台监管,探索建立在线医疗监管框架,健全互联网医疗统计监测体系,构建与互联网医疗发展相适应的数字规则体系。

参考文献:

[1] 许云红,李仕林,许云丽. 在线健康社区不同级别用户的参与行为研究:基于增长模型视角[J]. 情报杂志, 2020,39(8):137-144.

[2] 胡蓉,陈惠芳,徐卫国. 移动医疗服务中医患互动对患者感知价值的影响:以知识共享为中介变量[J]. 管理科学,2018,31(3):75-85.

[3] 张艺奕,查振刚. 探索医疗供给侧改革之路:从“互联网+”开始[J]. 中国医院管理,2016,36(7):1-3.

[4] 汪波,赵丹. 互联网、大数据与区域共享公共服务:基于互联网医疗的考察[J].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39(3):122-128.

[5] 朱张祥,刘咏梅. 青年群体从传统就医渠道向移动医疗转移使用研究[J]. 管理学报,2016,13(11):1728-1736.

[6] 马骋宇,王启桢. 在线医疗服务平台医生采纳行为及影响因素研究[J]. 中国卫生政策研究,2018,11(6):68-73.

[7] 郭薇,薛澜. 互联网医疗的现实定位与未来发展[J]. 探索,2016(6):142-148.

[8] 王瑜超. 在线医疗社区用户健康隐私信息披露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J]. 信息资源管理学报,2018,8(1):93-103.

[9] 赵人行,李晓龙. 互联网医疗发展环境、目标及展望[J]. 学术交流,2018(2):127-132.

[10] BOBICEV V, SOKOLOVA M, OAKES M. What goes around comes around: learning sentiments in online medical forums[J]. Cognitive Computation,2015,7(5): 609-621.

[11] REDELMEIER D A, KRAUS N C. Patterns in patient access and utilization of online medical records: analysis of my chart[J]. Journal of Medical Internet Research, 2018,20(2):e43. DOI:10.2196/jmir.8372.

[12] POLS D,BRAMER W M,BINDELS P,et al.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search filters to identify articles on family medicine in online medical databases [J]. Annals of Family Medicine,2015,13(4):364-366.

[13] 王素芳,付磊,沈默. 第二道数字鸿沟在当代大学生群体中的表现、成因及启示[J]. 图书情报知识,2021(1):125-135.

[14] 耿晓梦,喻国明. 数字鸿沟的新样态考察:基于多层线性模型的我国居民移动互联网使用沟研究[J]. 新闻界,2020(11):50-61.

[15] 徐芳,马丽. 国外数字鸿沟研究综述[J]. 情报学报, 2020,39(11):1232-1244.

[16] 何泉吟. 美国数字鸿沟解读[J]. 统计与决策,2009(13):140-142.

[17] 何雪松,罗力. 互联网医疗的应用现状和发展趋势[J]. 中国卫生政策研究,2018,11(9):71-75.

[18] 马骋宇. 在线医疗社区服务利用及转化研究:以好大夫在线为例[J]. 中国卫生政策研究,2016,9(11):70-73.

[19] 陶春海,郭同济,许可. 我国医疗卫生资源配置均等化水平测度[J]. 统计与决策,2019,35(24):42-46.

[20] 邢梦莹. 我国现阶段数字鸿沟及其测度[J]. 中国出版, 2019(7):47-50.

[21] 李纯青,潘玉梅,王肖利. 消费者:企业认同的概念、量表开发及检验研究[J]. 预测,2020,39(3):82-89.

[22] 杨德宏,苏雪梅. 顾客认同理论研究述评及综合研究框架构建[J]. 中国流通经济,2011,25(3):95-99.

[23] 刘骏,薛伟贤. 城乡数字鸿沟测度指标体系及其实证研究[J]. 预测,2012,31(5):68-73.

[24] 韦慧民,龙立荣. 组织中人际初始信任研究述评[J]. 心理科学进展,2008(2):328-334.

[25] 李子林,王玉珏,许佳欣. 公共卫生事件公众档案记忆建构研究[J].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22(3):52-57.

(收稿日期:2021-11-12 编辑:熊水斌)

风险社会治理视阈下地方政府的角色冲突及其调适

张广利¹,杨墉栋¹,王伯承²

(1.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上海 200237;

2. 上海海事大学马克思主义海洋文明与中国道路研究中心,上海 201306)

摘要:处理好政府、市场、社会三者关系,尤其是明确地方政府在社会风险治理中的角色目标和特点,是提高其风险治理能力的关键。当前研究大多为政府角色的应然研究,相对忽视地方政府的“特殊利益”,公益性与自利性角色在不断地交织博弈。以X市某镇政府安置房产权纠纷事件为例,实证分析地方政府在风险治理中所表现出来的角色特点及其冲突变化,发现其具有“合作-监管”“合谋-放任”“回避-控制”“协商-治理”4种角色形式,且存在于地方政府风险治理的不同阶段。因此,需合理定位地方政府在社会风险治理中的角色及要求,并对地方政府行为进行制度性规制和调适。

关键词:风险治理;地方政府;角色冲突;纠纷事件

中图分类号:D6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4970(2022)01-0047-07

厘清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是转型期中国实现风险社会有效治理的关键所在,其中政府角色合理定位是处理好与市场、社会关系的前提。李军鹏提出,在“十四五”时期,建设“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必须以系统观念深刻认识政府治理体系在基本现代化阶段的新任务、新角色、新职责和新维度^[1]。张广利则认为,现代风险的多元综合型治理模式是以政府为主导的^[2],不同政治、经济、社会运行模式决定了政府所需扮演的不同角色,而政府的角色又决定了政府的职能及其行为表现^[3]。钟伟军认为,中国地方政府在社会风险

治理中的角色定位具有鲜明的角色冲突特色,在“不出事”逻辑指导下,地方政府有时表现出无原则的“兜底”行为^[4]³⁷,有时又是态度强硬甚至采用暴力镇压的社会控制者^[5]。风险社会中,影响公众社会安全感水平的因素涵盖多方面,但根本在于政策制度^[6],其导致地方政府在风险治理过程中常常从仲裁者、观察者转变为风险冲突方。

在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条件下,社会行动所具有的模式不同于工业社会的低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条件下的模式^[7]。然而在以不确定的人为主导的风险社会中,政府的任何行为本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6ZDA08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19YJC840039)

作者简介:张广利(1962—),男,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社会风险、社会政策与社会治理、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E-mail: guanglizhang@ecust.edu.cn

身就会引发社会风险,这与单独依赖政府资源和行为的治理模式日趋不相适应,亟需对原先“保姆型”政府角色进行调整。金太军等从依法治国、集体行动、现代化治理、政府与市场关系视角,阐述了社会治理新常态下的政府角色定位^[8]。赵华等则认为,政府在社会风险治理中应遵循特定的价值追求,其应是新治理理念倡导者、风险治理的核心枢纽、风险治理制度的建立和维护者、风险信息的疏导者、公民权利的维护者^[9]。田亮等从市场和社会两个维度论述了地方政府在“邻避冲突”中的角色定位^[10]。而且,国家对地方政府的角色有明确的期待,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11]。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风险治理环境,地方政府应把社会治理的重心放在建立各种有效的利益表达机制和协调机制上,由强势的“管理者”逐渐转为柔性的、平等的“合作者”。同时,在元治理理论看来,政府要在治理中起到方向引领者、深度协调者、行为规范者和运行监督者的作用,最终实现协同治理的辅助和共振^[12]。

以上研究都为政府在社会风险治理中的角色定位提供了一定借鉴意义,然而这些论证大多为政府角色“应然”研究,将政府角色更多定位为公益性。已有研究表明,政府具有自利性,在风险治理中不可避免地会表现出理性主义的特点,因而其角色定位是公益性与自利性的复杂交织。此外,这些研究背后基本隐含着在社会风险治理中,政府是超然于市场、社会的绝对主导者和管理者,与市场、社会呈“金字塔”形关系,而现实中政府既可能是风险治理者、仲裁者、观察者,也可能是风险事件的冲突方,与市场、社会呈现出复杂的平行网络关系(图1)。在风险社会视阈下,地方政府的角色定位会因多重因素的影响而发生变化甚至是角色冲突,厘清地方政

府在社会风险治理中的角色特点是进一步规范其角色正确定位的前提。因而,以X市某镇政府安置房产权纠纷为例,实证分析地方政府在社会风险治理中所表现出来的角色冲突及其角色变化的内在逻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地方政府角色的分析框架

地方政府角色,指的是政府在其职能范围内做出符合社会预期的行为模式。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13],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明确提出要“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14]。可见,“社会治理共同体”必然包含着政府、市场、社会这三大部门,也意味着社会治理的主体由单一走向多元,是旨在协调社会关系、激发社会活力、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发展的复杂系统。因此,要将政府角色置于社会治理共同体背景下考察,政府角色定位,既是处理好与市场、社会关系的前提,又深受市场与社会发展变化影响。从“社会治理共同体”角度看,地方政府角色可以分为“合作-监管”“合谋-放任”“协商-治理”与“回避-控制”等4种角色,其中前两者侧重于“政府-市场”关系,后两者侧重于“政府-社会”关系。

1. “合作-监管”角色

地方政府作为中央政策的执行机关、利益代表和沟通桥梁,在处理和市场、社会的关系上,率先表现出“合作-监管”的角色。针对盛行于英国早期的重商主义政府干预理论,亚当·斯密于1776年将政府角色定位为“守夜人”,认为政府除提供公共物品、安全秩序,应尽可能远离市场^[15]。但亚当·斯密的“小政府”并没有经受住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最终被凯恩斯的政府干预主义取代。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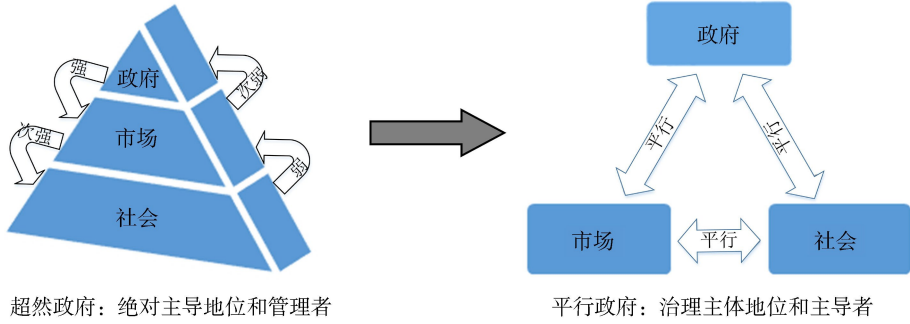


图1 政府、市场、社会三者关系

府在这一时期扩大了其职能边界,通过与市场积极合作介入经济社会发展,即政府将自身角色定位为与市场的“合作-监管”。

2. “合谋-放任”角色

地方政府作为本地区的管理者、利益代表,服务于地域社会的发展,也必然表现出和其他主体的“合谋-放任”角色。布坎南在公共选择理论中提出政府“经济人”假设,即政府与公众之间更多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有其自身的利益和效益追求,而无法成为纯粹的公共利益“代表者”,因而在处理与市场的关系中,政府也有可能为了自身利益而扮演“合谋-放任”角色,进而损害公共利益。

3. “协商-治理”角色

在风险社会的冲击下,越来越多的突发事件与潜在风险使得政府越来越难以单独应对;同时从社会维度看,政府在风险治理中“一家独大”还可能导致权力过于集中的腐败^[16]。约翰·洛克的分权理论、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理论为对政府权力进行外部监督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即政府统治的合法性是建立在公民民主参与基础上的。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精英主义民主、多元主义民主等民主思潮相继兴起,公民对民主政治权利的吁求也日趋强烈。为弥补多元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弱化公共部门能力的缺陷,协商民主理论强调在多元社会中,通过各利益相关者积极参与协商来实现决策和立法过程中的共同利益,其核心是协商及共识,具体内涵包括价值多元性、公开理性、平等协商、全民参与^[17],即政府在与社会互动中的角色定位应为“协商-治理”,通过尊重公民权利,保障其参与权、知情权、监督权等来规避社会风险。

4. “回避-控制”角色

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伴生的社会矛盾与冲突日益多元化、复杂化,随着中央强调将“维护社会稳定”作为政府官员能力和晋升考核指标,地方政府受压力型体制、政治锦标赛等体制影响,在社会管理方面往往遵循“不出事”逻辑,其包含三层含义:第一,将社会管理简化为地方不发生冲击社会秩序的重大事件;第二,是一种纯粹的结果导向,为了维持住表面稳定,地方政府可以不惜代价、无底线地采用各种手段,如暴力控制、经济贿赂等;第三,“不出事”是指不出“大事”,其大小不在于社会影响力,而在于上级政府对该事件的关注程度^{[4]37}。换言之,地方政府在风险社会治理中为避免其不在政治生涯中

被淘汰,对风险事件常常表现出“回避-控制”角色。

综上,在风险社会治理视阈中,地方政府在市场维度体现出“合作-监管”“合谋-放任”角色,而在社会维度又将自身定位为“协商-治理”“回避-控制”角色。这4种角色一般不会单独出现,而是随着内外因素的变化而呈现两两组合相伴状态,形成6种组合(图2)。其中,地方政府角色冲突主要表现在市场维度、社会维度内部角色间冲突,即“合作-监管”与“合谋-放任”,“回避-控制”与“协商-治理”之间冲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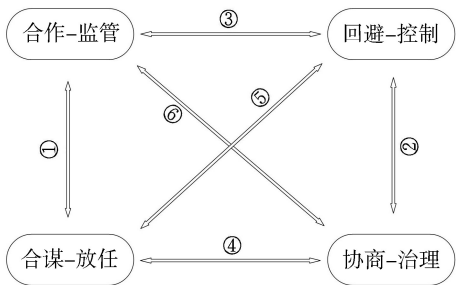


图2 地方政府角色冲突分析框架

二、地方政府风险治理过程中的角色冲突

为厘清地方政府风险社会治理中的角色冲突及其角色变化的内在逻辑,运用深度访谈调查法,实证分析X市某镇政府安置房产权纠纷中的政府角色冲突。整个事件涉及主体涵盖政府职能部门、社会公众、房产公司,其缘起、发展、治理过程能较为全面地体现出政府在不同阶段处理与市场、社会关系过程中的角色变化特点。

产权纠纷缘起于X市镇政府安置房建设严重供大于求的状况。为抑制X市房价过快上涨、调控旧区改造和市政动迁用房的刚性需求,X市、区两级政府开始建设用于旧城改造和市政动迁的中低价普通商品房,并制定《X市配套商品房和中低价普通商品房管理试行办法》,其中规定中低价商品房购房条件必须是动迁户或安置户。但在安置房实际建设规划中,该市某镇由于未能精确上报该镇预期重大项目数,导致房屋建设总计1041套,而实际动迁户和政府安置户总数却只有187户,住房实际安置比例不到20%。2007年经该镇政府请示,区人民政府下发抄告单,原则上同意在确保满足动迁户用房前提下,允许将安置商品房多余房源扩大供应给预案动迁户和本镇渔民无房及本镇骨干企业用作职工宿舍,由此

埋下该镇安置房产权纠纷隐患,而地方政府在此次纠纷事件风险治理中也表现出明显的角色冲突。角色冲突,源于个体同时扮演两个及以上,或被要求扮演与其价值追求不一致的角色行为^[18]。其具体表现为:一是角色内部冲突,即个体所扮演的同一角色内部矛盾;二是角色之间冲突,即同一个体所扮演多个不同角色间冲突;三是角色外部冲突,即两个及两个以上个体之间的角色扮演冲突^[19]。具体而言,地方政府的角色冲突主要体现为角色之间的冲突(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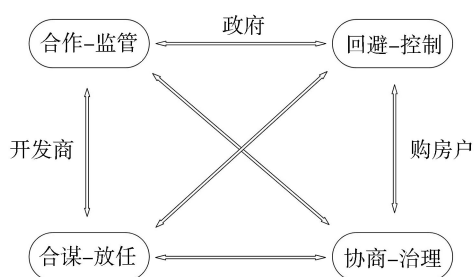


图3 X市某镇政府安置房产权纠纷中的政府角色冲突

1. “合作-监管”与“合谋-放任”角色冲突

政府的职能之一是向社会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X市政府提供中低价普通商品房是履行其公共职能的表现。然而在公共事务日益复杂化的今天,政府不能、也无法做到全能包揽一切,中低价安置房的提供有赖于政府与市场合作,即政府作为投资方与房地产开发商共同投资建设,同时委托房产公司全权负责房屋的销售、产证办理等事宜。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同时对房产公司负有监督责任,尤其是在购房对象资格界定上。

房产公司负责人认为:“我们受政府委托出售安置房,并对购房资格进行初步界定,开具办理产证所需的五联单交由政府相关职能部门进行盖章、审核。”

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审核房产公司开具的五联单,是履行其监督职责的重要方式之一。但在实践中,地方政府角色往往容易从“合作-监管”滑向“合谋-放任”。在安置房建设严重供大于求情况下,2007年区政府允许将安置商品房多余房源扩大供应给预动迁户、本镇渔民无房户及本镇骨干企业用作职工宿舍。然而,该文件的下发本身就违背《X市配套商品房和中低价普通商品房管理试行办法》规定,同时文件并未对预动迁户、骨干企业的界定标准进行明确而详细的规定,给镇政府和房产公司留下了非常大的政策执行自主空间。

从制度上看,我国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行政

分权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央与地方之间原有的责任权力模式。虽然中央赋予地方政府大量自由裁量权和经济利益,以充分发挥其发展地方经济、进行地方社会管理的积极性,但中央在地方政府人事任命和选拔上依旧具有绝对控制权,因而地方政府并不是纯粹的公共利益“代表者”,地方政府首先是中央政府的“代表者”,这就为地方政府在发展地方经济、社会管理过程中提供了压力机制和特殊利益动力机制,周黎安用“行政发包”“政治锦标赛”来解释这一现象。从地方政府自身来看,其本身具有“经济人”特点,而在我国特有的自上而下的压力型体制下,地方政府在享有较大自主权同时必须扮演好中央所期待的角色,为上级政府发包下来的大量经济社会发展任务承担起重要职责。这就进一步加强了地方政府原本强烈的理性经济人动机,尤其是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政府更是积极获取财政收入。在扩大安置房销售对象后,由于文件并未对预动迁户及骨干企业进行界定,最后凡有营业执照的企业法人、凡上海户籍居民均可购买安置房。

X镇人民调解中心负责人指出:“此次最规范的购房对象应当是动迁户,然而到目前为止,相当多的动迁户并没有动迁协议,拆多少房子,什么时候拆,应当安置多少人,多少面积,均没有相关材料。此外,真正的预动迁户可按区政府文件购买中低价普通商品房,然而实际销售的预动迁户与真正预动迁户的含义并不同,在没有工程项目情况下,房产公司也将部分本地居民作为预动迁户,导致预动迁户遍地开花。”

房产证的办理需要五联单,房产公司违规为不具备购房资格的房主开具五联单,而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并未对房产公司开具的五联单进行严格的二次审核及监督规范,导致没有动迁协议的预动迁户、外地户籍企业主等不符合购房条件的主体均拿到五联单,进而使五联单丧失了作为产证办理凭证的合法性。

房产公司负责人表示:“我们将开具的五联单递交给相关职能部门盖章时,他们并没有对购房对象提出任何异议。现在发生产权纠纷,职能部门也应当负责任。”

换言之,在这个过程中地方政府在经济利益驱动下事实上扮演了“合谋-放任”角色,这与其被社会所期待的“合作-监管”角色相冲突。

2. “协商-治理”与“回避-控制”角色冲突

2011年,X市政府结合经济社会发展等各方实

践制定了《X市动迁安置房管理办法》,同时明确废止《X市配套商品房和中低价普通商品房管理试行办法》,这一政策调整的最大变化就是新出台文件明确禁止中低价普通商品房交易,导致336户还未来得及办理产证的房主无法在法律上获得对房产的所有权,使得他们面临孩子无法入学、房产无法正常交易等由产权纠纷引发的一系列后续问题。风险社会治理赋予了政府新型社会责任,要求政府对社会冲突予以积极的正面回应。风险社会中,双方潜在收益及风险感知,往往是社会冲突爆发的关键^[20],因此,当社会风险萌芽时,公众与政府的信息及力量不对称,政府若不能予以积极回应,就有可能进一步扩大公众的收益风险感知,进而采取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应对方式来推动社会风险升级。因此,加强公众参与度、保障其知情权和监督权,有利于降低社会冲突带来的风险。换言之,当社会风险产生之际,地方政府应积极扮演“协商-治理”角色将社会风险及时扼制在萌芽状态中,避免其进一步升级而引发社会冲突。

产权纠纷发生后,相关房主不断上访房产公司和镇政府,希望有关部门能予以解决问题。然而随着中央将“社会稳定”作为考核地方政府官员社会管理能力的重要指标,在现行压力型体制以及“一票否决”淘汰机制下,地方政府在风险社会治理中遵循“不出事”逻辑,即利用隐瞒、妥协、压制等各种手段来避免社会冲突。面对房主的不断“闹事”,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均采用了“消极回避”措施——即维持现状,未办理产证的房主继续持有住房,但无法办理产证,试图将该问题遗留给下一任政府来解决。

在调研中,一建筑企业主表示:“我们去市信访办上访,但被告知只能找镇政府自行解决;我们找区房管局,他们却和我们吵起来,责怪我们购房时没对房产属性进行了解,现在办不出产证,应该由我们自己负责。”

此外,镇政府又对相关意见领袖进行软控制,采用迂回方式阻止其联合其他房主将事情闹大。

有企业主提及:“我们找律师维权,但没有一个律师敢接案,说这是政府的事,我们也没办法。”

在镇政府“回避-控制”角色扮演下,未办理产证房主由于发现其无法寄希望于镇政府解决产证问题,其个人收益风险感知被进一步放大,进而联合起来到X市政府静坐示威,造成较大社会影响力,市政府开始向镇政府施压解决产证问题。

“没有人告诉我们购房条件,房产公司、镇政府一直鼓励我们购买该片住房,我们就是听说这是政

府投资建设的住房才敢买的,如果我们知道购房资格规定,我们肯定不会买的。”“就觉得自己被政府骗了,我们买了房却不给我们办理产证,这让我们特别没有安全感。”“我现在只要求政府帮我们办理房产证,其他解决方案我一概不接受。”

此时,镇政府一方面继续扮演着“回避-控制”角色,另一方面开始扮演“协商-治理”角色。镇政府设置人民调解委员会来接待上访房主,研究出两种解决方案:一是政府回购住房,但这意味着地方政府会面临巨大财政支出压力,且回购的住房无法二次销售;二是上级政府政策开口为房主办理产证,同时镇政府又组织“稳评”机构就两种方案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将评估报告作为争取上级政府为房主办理产证的重要依据。最终为避免社会冲突,上级政府同意政策开口——为房主办理产证。在这个过程中,地方政府的“协商-治理”角色具有两个特点:

一是“不出事”的“兜底”逻辑。为平复房主不满情绪以避免风险事件进一步扩大,地方政府能违背现有地方政策规定,随意进行政策开口。

当被问及是否可采用法律途径时,有政府负责人表示:“不能告房产公司,否则政府也脱不了关系,最好是上级政府能特殊情况特殊处理,帮房主把产证都办理出来,这样政府也没有经济压力。”

二是政府并没有摆脱“回避-控制”角色,政府并不直接面对房主上访,而是让第三方机构从中斡旋,同时只允许“稳评”机构从个别意见领袖了解情况,而禁止第三方组织进行大规模入户调查。

有负责人表示:“入户调查就像捅马蜂窝,现在倒还没出什么大事,一旦入户调查,这些房主反而开始趁机捣乱。”

地方政府在应对风险事件时,一开始在“不出事”逻辑下往往会表现出“回避-控制”角色,这一角色常常导致风险事件进一步升级,直到上级政府为维护社会稳定而向下施压,地方政府才会被迫扮演“协商-治理”角色,但同时他们并没有放弃“回避-控制”这一角色。由此可见,地方政府基于自身经济、政治等利益考量,自身很难有主动扮演“协商-治理”角色的内在驱动力,而是在外力迫使下同时扮演两个相互冲突的角色。

三、风险社会视阈下地方政府角色冲突的调适

在风险社会视阈下,虽然地方政府的角色冲突

表现为市场维度上“合作-监管”与“合谋-放任”、社会维度上的“协商-治理”与“回避-控制”,但是本质上是地方政府与市场、社会呈现出复杂的网络关系。因此,需要在风险话语下对地方政府、市场、社会三者的关系进行重塑与再造,进而实现风险治理的市场化、社会化、大众化。

1. 地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协调

政府主导各种项目建设的根本在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我国的优势即存在一定意义上的市场对国家与政府的依附性,表现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素来被置于国家的干预与控制之下。在风险社会的语境下,第一,地方政府树立正确的利益观,在新发展阶段和新发展理念的引领下,特别是要以国家利益为主,服从中央统筹安排,加强信息沟通,建立畅通的利益表达渠道,兼顾地方利益的实现;第二,建立科学合理的政策体系,健全公共政策执行的监督体系,避免地方政府对市场的粗暴干预;第三,准确定位地方政府在风险治理中的角色,强化对市场的引导和支持,发挥市场在风险治理过程中的应有作用。

政府引导资本介入,实施第三方治理模式需要进一步规制第三方治理市场,同时政府需加大监管力度。譬如,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提出的坚持“谁污染环境、谁破坏生态谁付费”原则,明确“建立吸引社会资本投入生态环境保护的市场化机制,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原则,并且在法律法规中有进一步的体现,特别是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明确规定: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承担的风险治理责任和应当接受的社会代价。

2. 地方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协调

民众的“闹大”策略固然在某种程度上向政府宣示了自身的力量,保障和维护了其正当权益,但却带来社会秩序的极大紊乱;政府“不出事”的机会主义策略快速平息事态,短时期内避免了更严重的危机,却非风险规避的长久之计。把国家与社会对立起来,坚持国家本位抑或社会本位其结果只能是“零和博弈”,因此,从“二元对立”走向“良性互动”,协调国家社会关系、大力发展社会组织,增强社会自主性等方面入手,才能真正实现风险规避。在地方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上,地方政府“服务者”角色的缺位影响了社会和谐有序,这也是未来地方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共生的重要面向。

此外,就地方政府而言,央地关系、政府职能设置、基层治理与政策导向上存在的问题也会影响市场经济的稳定与统一。不同于常态化的治理,人类社会进入风险社会后,一切确定性的事物都易于被解构,针对突发不确定性风险的治理,如何弥合“强中央、弱地方”带来的“弱治理”问题,中央对地方的赋权和分权可以考虑从经济领域向社会领域延伸,特别是在应急管理等领域,形成风险应对策略的社会化与大众化态势。

3. 市场与社会的关系协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国家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同时也衍生了大量的社会风险,其重要原因之一即在于缺乏市场与社会的关系协调,并且在“政经一体化”的形塑下,市场易成为政府的“附庸”,进一步导致市场与社会矛盾的弥散,并演化为基层政府与社会公众之间面对面的矛盾或冲突。因此,传统观点认为,市场、社会和政府三者之间的关系,严格来说是两个关系:一个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另一个是政府和社会的关系,这在无形之中也忽视了市场与社会关系协调的重要性与可能性。

各类社会抗争或冲突现象,如果缺乏中间过渡机制减压或化解,将使得基层政府直面“官民对抗”的状况。由于民众组织化程度相对较低,多数利益诉求是以个体化而非组织化的形式进行表达。因此,面对分散的个人,地方政府可以保持绝对的强势;同时无组织的个人力量相对“庞大的”市场来说又是极其薄弱的,进退维谷,普通民众甚至只能进行所谓的悲情抗争,以表达其诉求,这也是社会风险的重要来源。在坚定政党政治正途的前提下,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调适和扭转政党政治发展走向^[21],因此风险治理要与时俱进,调适地方政府、市场、社会三者的关系,达到风险治理的可调目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22],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的“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促进共同富裕”^[23]的新发展理念,这都为协调风险社会视域下市场与社会的关系提供了契机。

四、结 语

风险社会对政府社会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然而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并非是简单的

“金字塔”形,而是互相影响的网络态势,政府既可能是风险治理者,也可能是风险制造者,因而其在风险社会中的角色定位也会随着与市场、社会互动关系的变化而发生改变。从市场和社会维度看,政府角色定位具体包括“合作-监管”“合谋-放任”“回避-控制”“协商-治理”,这些角色往往相互组合,同时出现在地方政府风险治理行动中。

在我国现行体制特点下,地方政府不可避免地具有理性经济人和政治人特性,有其自身特殊的利益价值追求,因而难以成为纯粹的公共利益“代表者”,同时也是上级及中央政府的“代言者”和自身利益的“代言者”,其在社会风险治理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角色定位冲突,主要表现在“合作-监管”与“合谋-放任”、“回避-控制”与“协商-治理”之间。相互冲突的角色有时是以先后顺序存在、有时同时并存于地方政府风险治理行动中。因此,地方政府要合理定位其在社会风险治理中的角色,提高风险治理能力,不能仅仅寄希望于地方政府的自觉行动力,而更多地需要从体制和制度上对其行为进行规制和调适。

潘光旦先生曾从社会学的视角阐释了“位育”。“位育”虽然来源于《中庸》,但《中庸》里的“位”是指天与地各安其位,“育”是指万物在天地间生长发育。潘光旦演绎的“位育论”则是一种“社会位育”,其中的“位”是说每个人都要各安其位,即“安其所”,待在自己应该待的位置,这样社会就有了秩序。风险社会视域下地方政府角色冲突的调适,需要市场与社会也在风险治理的过程中扮演相应的角色。“育”是“遂其生”,即在自己的位置与环境发育成长,社会就变得和谐了。在风险语境中,出现了诸多基层治理困境——市场失灵、社会发育不良,政府已然不是超然于市场、社会的绝对主导者和管理者,三者各安其位,地方政府、市场、社会发挥各自的作用,才能持续地推动人类社会的和合文明和共生发展。

参考文献:

- [1] 李军鹏.“十四五”时期政府治理体系建设总体思路研究[J].行政论坛,2021,28(2):41-47.
- [2] 张广利.创新风险治理模式应着重关注现代风险[J].人民论坛,2019(5):28-35.
- [3] 彭澎.政府角色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 [4] 钟伟军.地方政府在社会管理中的“不出事”逻辑:一个

- 分析框架[J].浙江社会科学,2011(9):36-41.
- [5] 李琼.边界博弈视角下城市风险预警与防控[J].贵州社会科学,2021(3):73-80.
- [6] 杨埔栋,李琼.风险情境中社会安全感与公共政策变迁——基于X市环境整治政策的调查分析[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2):103-112.
- [7] 张康之.风险社会中决策与行动的统一[J].求索,2021(4):40-46.
- [8] 金太军,鹿斌.社会治理新常态下的地方政府角色转型[J].中国行政管理,2016(10):11-15.
- [9] 赵华,陈淑伟.论政府在社会风险治理中的价值追求与角色变革[J].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3(3):51-54.
- [10] 田亮,郭佳佳.城市化进程中的地方政府角色与“邻避冲突”治理[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5):61-67.
- [11]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56-57.
- [12] 李瑞.新形势下科技创新治理复杂性及“元治理”体系构建[J].自然辩证法研究,2021(5):60-67.
- [13]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N].人民日报,2019-11-01(001).
- [14]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N].人民日报,2020-10-30(001).
- [15] ADAM S.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M].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Inc., 1982.
- [16] LORD A, JOHN E, EDWARD Dalberg-Acton. Essays on freedom and power[M]. Glencoe: The Free Press, 1948.
- [17] 张玉亮,路瑶.协商民主视角下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导控目标及实现策略[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0):28-33.
- [18] KAHN R L, WOLFE D M, QUINN R P, et al. Organizational stress: studies in role conflict and ambiguity[M]. New York: John Wiley, 1964.
- [19] 丁水木.社会角色论[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
- [20] 马克·霍华德·罗斯.冲突的文化——比较视野下的解读与利益[M].刘萃侠,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 [21] 黄恩华,张师平.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中国政党制度的嬗变逻辑——基于政治发展的分析视角[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1):18-24.
- [22]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N].人民日报,2013-11-13(001).
- [23]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N].人民日报,2021-11-12(001).

(收稿日期:2021-11-12 编辑:高虹)

引用本文: 张杰,丁玥,王荣. 环境传播视角下新媒体对河长制议题的建构与调解[J].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24(1):54-60.

DOI:10.3876/j.issn.1671-4970.2022.01.008

环境传播视角下新媒体对河长制议题的建构与调解

张 杰¹,丁 玥¹,王 荣²

(1. 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江苏 南京 211100; 2. 江苏广播电视总台, 江苏 南京 210008)

摘要:河长制作为环境议题,在新媒体环境下,牵扯到多种行动者之间的复杂联动关系。研究选取三类新媒体平台作为研究对象,以实际资料为基础,将人民网、中国生态文明网和微博大V的河长制议题报道作为样本,以实际资料为基础建立一个研究模型,探讨三类河长制议题建构过程的现状与问题,分析新媒体对河长制议题进行建构的过程。研究发现,3个新媒体行动主体的议题建构能力和方式相互补充,各有侧重。新媒体作为媒介行动者,应扮演调解感知角色和行使调解行为的功能,更好发挥自身功能,从而使得多元行动者的行动得以协调,推动河长制议题的有效建构和传播。

关键词:环境传播;河长制;新媒体;议题建构;调解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4970(2022)01-0054-07

一、引 言

“河长制”是国家推行环境保护协调治理的重要政策。该制度发轫于2007年暴发的无锡太湖蓝藻危机。此次水源地污染事件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影响,迫使无锡当地政府开始寻找治理水污染的新模式^[1]。无锡市随即开始了在流域治理机制上的地方制度创新,尝试要求各级政府的主要负责人担任辖区内重要河流的“河长”,以负责河道、水源地等环境资源治理与保护。由于“河长制”在地方治水过程中取得了良好收效,逐渐在全国范围内扩大影响,并最终上升为国家意志,之后,云南、河南、河北、福建等地在治理水污染过程中纷纷效仿并不断进行

创新实践。鉴于河长制政策的重要性,此议题也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在目前针对河长制的研究中,大多数学者着眼于追求完善法制与制度创新的现实目标 and 需求,基于其他视角的研究屈指可数。

相当多的研究从环境保护法的视角解读河长制,探寻“河长制”的法律依据,分析其法律短板,可见其存在一些制度内生困境、职非法定的困境、与现行水资源管理体制存在矛盾之处,考核问责制存在异化风险。在基于该视角的研究中,尤其在推进法治层面的产出较多,针对当前河长制实施过程中的制度不足和落实推广提出一些环境法制建议和思考^[2];在河长制的具体建构中,应构建法律保障机制、协调机制体系,体系化设计考核问责机制^[3],在

基金项目: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018SJD1141);河海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B17020437);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1&ZD316)

作者简介:张杰(1975—),男,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传播社会学研究。E-mail:zhang75jie@gzhu.edu.cn

公众参与前提下不断完善河长制实施的监督考核机制^[4]和公众参与激励机制^[5]，“解决中国严峻水环境问题应把着力点放在充分拓展公众的参与途径，加强民间互动，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公民在水环境治理中的关键作用。”^[6]

另外一个比较集中的研究领域是在河长制的政策实施方面。河长制在运行过程中暴露出跨区域治理的一些共性问题^[7]，如当前河长制出现治理机制泛化^[8]，政策采纳具有明显的政治周期性^[9]和“应急的过渡性”^[10]，其中“因事设岗”来增设“河长”尚且存疑^[11]。总体而言，河长制从“有名”到“有实”仍然存在相当差距^[12]。因此，一部分研究对河长制的发展沿革进行梳理，认为其作为一项制度创新需要不断地再创新、再提升^[13]，并对其长期推行提出对策建议^[14]。如将“河长制”视为一项水环境治理中的行政机制创新^[15]，从制度创新层面入手提出对策；在具体实践中，应突出基层河长胜任力构成要素^[16]，规范考核和评价机制^[17]，推动河长制改革。政府应该通过完善河长制中公众参与河湖治理的制度设计，规范行为，完善河长制的信息公开制度，以培育公众积极的心理因素，进而不断促进公众参与河湖治理^[18]。

可见，河长制作为一项国家政策，其效果很大程度上在于公众的参与，单从法理层面推广河长制实施收效甚微，更为迫切的是加快形成全社会的水环境保护意识。而媒介，特别是对于公众知晓和参与河长制议题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是河长制议题建构与传播的行动主体。“跨界治理是最大的问题，河长制除了加强流域治理的跨部门协同合作，更要注重地方政府和大众媒体的宣传^[19]。”从本质上来说，促进政府、媒介与公众之间关于河长制议题的协商式沟通，这是一种传播学的思考角度，然而目前为止，传播学研究中对于新媒体对河长制议题的建构研究严重缺乏。

在当下中国，新媒体的发展为参与式、协同式的环境传播与政策制订提供了现实的契机，新媒体所建构的河长制的议题空间成为不同行动主体围绕水环境问题进行多元参与的话语空间。从环境传播视角出发，讨论这个空间的议题建构路径的现状，审视其不足，并指出其理想状况，对于深化对环境传播如何将自然问题转变为现实问题，以及如何实现环境议题的多元有效参与无疑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际价值。

环境传播与媒介视角相联系已引起研究者们的关注，在公共领域、政治领域、新闻领域都有涉及。一类研究从风险社会角度入手，关注媒体生产与建构的环境新闻研究，或剖析当今中国新闻媒体（报纸和影视）在进行环境传播时，针对风险议题开展的新闻所发挥的功能与面临的困境^[20]，或以环境建构主义为理论框架，对新媒体中环境议题是如何实现信息传递和环境问题建构展开研究^[21]，可以说，这种研究路径最接近原初意义上对环境传播的理解。在此基础上，我国学者关注宏观政策与民主转型，通过结合中国语境下具体环境事件与议题对话西方理论，把握环境议题建构的内在规律和深层逻辑，关注议题框架中话语权下移^[22]，试图以社会政治视角理解中国环境传播议题的媒介呈现。最后，环境传播在新闻领域的业务研究，也获得了一些关注。但是具体到河长制议题的媒体建构和参与，目前依旧是空白，这也就构成了本研究的视角创新。

依据环境问题是多元主体参与治理的共识，笔者将采用内容分析法和文本分析法，分析在环境传播视角下河长制议题的新媒体建构过程。同时依据“多元主体”所代表的不同行动主体选取三类不同性质的新媒体平台，力图探寻主流媒体网站、环保组织平台及新浪微博大V在河长制议题报道中各自的规律和侧重点，并从“调解”的理想型出发，讨论新媒体在河长制议题中应该扮演的角色和功能以及优化路径。

以人民网为代表的主流官媒平台、中国生态文明网为代表的环保组织平台和以微博大V为代表的公众网络参与平台的意见领袖三种不同行动主体进行研究。将从报道形式、媒体倾向和报道内容3个部分对不同行动主体所代表的新媒体建构的河长制议题进行内容分析。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是在2016年12月下发的《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这一关键时间节点，将在上述三大载体内抽取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2年有关“河长制”的所有报道为例，进行编码、统计分析。通过对报道的数量、体裁、立场、信息来源、报道主题、所涉及的河长制议题归类等方面的分析，对比人民网、中国生态文明网及微博大V在河长制议题上的不同特点与共通之处，在此基础上对环境传播视角下河长制议题建构提出思考与建议。

在样本的选取上，以新闻标题作为搜索对象，以

“河长制”为关键词,分别通过人民网、中国生态文明网和微博大V的个人微博主页进行检索,选取所有与河长制议题相关的新闻报道,并将每一条新闻作为分析单位,根据议题相关性,除去相同的新闻报道,最终分别从人民网中获取样本121篇,中国生态文明网获取样本116篇,微博大V(公众环境马军、生态梦人)获取样本18篇。

二、河长制议题新媒体建构过程分析

1. 新媒介在河长制议题建构中的参与

依据汉尼根的划分,对河长制议题建构过程展开分析,从议题集成、议题表达和议题整合3个方面进行论述。

(1) 河长制的议题集成

所谓的议题集成指的是议题的最初生成及对议题科学的命名和详细的描述的过程。河长制议题作为由环境问题衍变成环境议题,从对其最初的界定与命名来看是地方在河道保护治理上的制度名词;后来被党中央纳入了国家政治制度,并对其责任与落实进行了制度划分;最终通过不同的新媒体平台对河长制议题的建构与报道,使得河长制议题不仅仅停留在国家意志层面,更作为一种环境保护运动形态融入公众生活,甚至细分出了“民间河长”这一议题。

(2) 河长制的议题表达

河长制本身就是由地方策略上升到国家制度的一次治理创新,笔者在其议题合法化方面不做多余赘述。不同行动主体所依赖的新媒体传播通道具有先进的技术性和互动性,因此在议题表达上能够及时根据民意反应与舆论导向,增加或删减报道内容以求得与公众的情感共鸣,议题报道受情感驱动明显。以微博大V为代表的多数议题表达,包含众多“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表述,这并非是议题报道者个人的情绪宣泄,而是希望通过叙事激起公众的情感共鸣,加速议题的新媒体扩散范围,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并鼓励他们及时公开的表达个人对环境议题的看法与诉求。

2018年10月23号,微博大V“公众环境马军”转载了一篇由环保组织官微报道的“全国31省区市1725处水源地,共发现7306项环境问题”水环境新闻,在这篇报道中不仅详细列举了具体的环境问题与生态情况,更是以大量的文字、图片描述了各地水环境治理成效差的重要事实。除了“公众环境

马军”本人发表了评论性看法:“河长制,真正推动落实到位了吗?”之外,在这条微博的转载与评论区,部分公众表达愤怒,斥责当地环保部门的不重视与不作为,在水环境保护问题上有“踢皮球”的懈怠作风。借助微博这一自媒体平台,批评与建言献策两种倾向的舆论声音最多,公众自发营造出感情色彩强烈的“民间舆论场”,对于河长制治理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3) 河长制的议题整合

新的媒介传播手段赋予公众对公共议题表达的即时性和自主性,科技手段促成的参与平台成为公共讨论的聚集地。河长制作为公共议题,在对其进行建构的过程中,主流媒体、环保组织平台和微博大V通过不同的报道策略的选择与议题类别的设置,从议题整合分析出发各有不足:主流媒体的权威性报道,使得河长制议题建构较为单一;环保组织平台的环境行动主张明显,在河长制议题公众参与建构上也有所欠缺;而微博具有自媒体平台信息的碎片化特征,难以系统地表达河长制议题的完整意义,且公众诉求表达后不能第一时间使政府知情,民意“向上”反馈建设不足。

(4) 议题动员

环保议题的完整建构路径中,最重要的环节就是动员。经过新媒体平台大量持续的跟踪式报道,借助意见领袖的特别关注和助推作用,往往能够使环境议题得到进一步扩展,环境议题得到动员。新媒体报道中只有引入意见领袖们基于严峻的环境现状做出的权威解读,才能动员公众参与,群策群力共同治水。

2. 河长制议题新媒体建构过程

在梳理河长制议题的建构路径时发现,河长制议题建构中河长制信息与政策、区域行动、示范整治举措、民间河长倡议这4个主题在议题推广过程中不断深化。将三大新媒体平台这四类主题报道按照时间顺序进行统计,以河长制信息与政策为主题的报道共有102篇,以区域行动主题的报道共有70篇,以示范整治举措为主题的报道共有38篇,以倡议科普为主题的报道虽然有45篇,但并不全是以“民间河长”为主题的议题动员。结合三大新媒体平台河长制议题归类的数据分析,且部分主题报道包含的议题并非单一呈现,所以最终统计的“民间河长倡议”主题的报道共有66篇。不同主题在时

间推移上呈现出随着河长制议题的逐步推进而变化的趋势,呈现路径也与河长制议题的建构路径相互影响、共生共存。

在围绕“河长制制度”的报道中,不断对河长制概念进行解读与界定,规范了这一制度的具体要求与法律地位,这也成了河长制议题最初集成的建构阶段。在这个阶段内,大多是对政府文件报告的转述与传播,完成了对河长制议题的政策性界定;随后大量的议题通过对区域行动取得正面或负面影响进行集中报道,对河长制推行过程中的典型事件进行重点宣传以寻求注意,或是在合法性主张内对河长制相关示范整治举措进行评析,使得河长制议题在新的主题下积聚了大范围的注意力,寻求注意及合法化主张这两个过程即议题表达,完成了河长制议题建构的第2个过程。

无论是议题集成或者是议题表达,都是对河长制议题的诉求层面分析,而真正的将河长制议题做到广泛推行的是最后一个层面,也就是议题动员过程的深化。对河长制议题进行去中心化与去制度化的剥离后发现,“民间河长”这一议题呈现的是河长制议题发展演变的动员支持最终形态。

至此,有关河长制议题的呈现路径与建构路径的演变进程基本契合。河长制作为新生的环境议题,其议题的建构过程是一个“下达”再到“上传”的循环过程,这样的循环过程也正体现了河长制议题新媒体推广存在的曲折性,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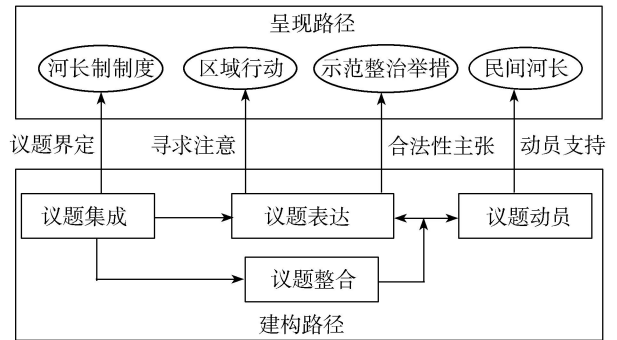


图1 河长制议题建构过程

三、新媒体对河长制议题建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综上论证表明,三大新媒体平台对河长制议题均是具有建构作用的,影响着公众的感知。但当前我国公众的河长制参与行为并没有达到媒介预期的

建构感知后的动员效果,甚至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与媒介进行的河长制议题报道不成正比。以三大新媒体为代表的媒介在河长制议题的建构中各自存在不足,除了在具体的调解感知过程中仍有欠缺外,根据考克斯的“调解者”概念定义,对于调解的另一层面——“行为”的影响呈现较弱。

1. 议题建构单一,环境风险感知建构不足

三大新媒体平台对河长制议题的议题建构多集中在通讯与消息上,因为通讯和消息是河长制这类作为国家层面的制度推广首选的报道体裁。但这两类体裁在修辞与叙事方法上比较程式化和单一化,往往在对事件的细节报道上比较匮乏,受众很难对空泛的政策报道产生共鸣以及对河长制加深认识,因此传播效果大打折扣。从报道内容来看,报道主要集中于国家政策、法规研究扩充等信息,更新时效随政策出台而变化,二次加工较多,创新撰写内容较少,并且三大新媒体平台对深入的综合性河长制专题报道较少,没有成立专门的“河长制保护频道”等专题策划,使得公众对于河长制的了解处于被动接收的状态,无法自主在平台上找到专题位置详细了解。

2. 不均衡的议题设置,多元主体感知建构缺失

三大新媒体平台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议题失衡,对于议题建构中的多元主体参与未做到充分重视。在河长制议题报道中,政府作为治理的主力,为河长制发声无可厚非,但大众的意见与行动未得到媒体的充分重视,即便是偶有发声,也沦为政府的陪衬,成为相关治理措施、政策法规的被动接受者。媒体强制设置的“主流意见”垄断版面,不同的观点意见在强压之下日益单薄,使得不同主体的话语感知在议题呈现中缺失。缺乏了环境专家等权威人士对河长制议题的科普及问题的解答,长远来看对于河长制议题报道的科学性和专业性无法保证。以人民网为代表的多数新媒体平台忽略了环境议题的其他关涉主体的声音,使受众处于不平衡的议题环境中,对河长制推广的重要性预估也难免有失偏颇。

3. 议题调解局限,未形成统一的信息讨论平台

互动性强是新媒体区别于传统媒体的一大传播特性,新媒体可以运用多种形式进行信息传播。但在当前的河长制议题新媒体建构中,三大新媒体平台均未打破“传者—受众”这种单一的传播模式,未能充分借助互动性这一传播优势进行河长制议题报道,在扩大河长制议题的传播范围上仍有局限。除

微博大V外,其余二者新媒体平台在河长制议题热点话题上与公众进行即时互动几乎为零。仅有感知部分的调解,而忽略了对行为调解这一环节的加强,使得多方在互动问答过程中对河长制议题产生新认识只能是空谈。当前我国网络媒体虽开设了各种形式的互动平台,网民可以就环境问题进行互动,但针对河长制的公众信息讨论平台尚未完全建立,影响了新媒体推动河长制议题的互动行为的进一步发展。

4. 报道程式化,环境教育“调解行为”能力弱

当前的河长制议题受主流媒体影响较大,报道风格程式化,缺乏受众吸引。显然,这体现出的是当前的环境教育的议程缺失,在“调解感知”功能建构尚未完善的影响下,媒介对于各主体的“行为调解”功能更是薄弱,当环境冲突一旦产生,只能使政府和公众矛盾的激化。在河长制议题上,仅仅靠政策下达及政府推进还远远不够。如果媒介不能在公众环境教育议程上多做努力,忽略公众“行为调解”的重要性,会引发更为严重的社会危机。

四、作为环境议题多元行动主体的“调解者”： 新媒体的理想角色展望

环境传播应具备调解感知和调解行为两方面,从此次研究数据来看,目前我国媒介连调解感知这部分的各平台联动尚且不足,对于调解行为的帮助只能寄期望于今后环境传播的发展来逐步完善。通过媒体平台的调停,民间和政府可能展开对话与框架整合,理性协商,这是一种调解感知后多元主体得以在真正的交流平台中展开对话,才有可能真正借助环境传播手段去调解各主体间的行为。当前我国正是欠缺了这样的调解平台,才使得多元主体意见反馈时间长,问题得不到及时的调解,直至引发环境冲突才能受到政府重视展开治理。

借鉴西方环境传播发展中的成功模式,对照我国媒介建构过程中的实际现状,对当前我国新媒体中的河长制议题建构提出理想的媒介“调解感知”角色与媒介“调解行为”功能应该如何的剖析,从而为推进河长制这一重要政策的媒介议题建构更有效果提供一种学理和理想型意义的思考与借鉴。

1. 新媒体在河长制议题建构中“调解感知”角色的理想塑造

在媒介“调解感知”的作用下,大量环境议题向社会传递,对多元主体关系的“调解”的探讨,从另

一个角度来说也是“调解行为”的不同途径的思考,毕竟真正的“调解行为”需要建立在多元对话平台上。而当前的研究数据表明,国内的“调解感知”尚未做到各平台联动,这个结果与西方学者的理论假设是不一致的。笔者试图对我国新媒体议题建构中理想角色塑造展开描述,对我国媒介“调解感知”的完善提供思路,若今后暴发严重的水环境危机或是环境冲突时,有助于不同新媒体平台对照反观当前存在的缺失,更好地面对环境冲突。

(1) 河长制议题多元主体关系的“调解”者

新媒体在河长制议题的建构过程,已经不仅仅属于环境报道范畴本身,而是涉及政府与精英群体、政府与公众、精英群体与公众的多方信息交换和意见的互动,是各个主体对于环境议题的共同建构。在此视角下,当研究以新媒体传播为代表的环境传播时,更应该以罗伯特·考克斯提出的居间“调解”身份看待新媒体在河长制议题建构中的理想角色。

(2) 公共批评和问责的沟通调解者

西方历史上,几乎所有类型的媒介都被用来批评腐败的政客及其他强权者。有了社会化媒介之后,公共监督与批评的范围大大扩展了。这种监督让环境破坏分子感到羞愧,让破坏环境的行为得以向政府、企业、违法经营者问责。我国的新媒体平台也应充分利用互动性强的优势传播河长制议题,在这一过程中,新媒体应积极动员公众参与到话题讨论中,让环境问题能够得到更加妥善的解决。相较传统媒体而言,新媒体应该增强舆论监督的时效性和影响力,在传播政府意志的同时,形成公众的广泛参与,应加强舆论监督的设置。总而言之,新媒体要重视舆论监督,加强舆论引导力度,在政府和公众之间搭建沟通的桥梁。

(3) 环境信息和各种声音的教化调解者

当不同的利益群体出现的不同诉求产生了分歧和矛盾时,单从政府制度保证层面是无法解决的。所以民众需要了解、倾听来自专家学者、环保达人、公众人物等社会精英群体的多方分析解读,以消除社会恐慌,深化对河长制议题的了解。因此,新媒体应从自身的功能与责任出发,通过对精英群体观点有效传播,引导公众多角度理性思考,在精英群体与公众之间搭建教化与被教化的双向平台。

2. 河长制议题信息联动平台的发起人

通过媒体的使用,西方公众加深了对于科学的

理解,也使得普通市民能成为他们所在社区的环境问题的目击者。这与当前我国的新浪微博等新媒体平台所呈现出的特征有所吻合,但国内社会化媒介发展相对落后。西方的社会化媒介也经常用于动员支持者和普通大众支持各种各样的环保事业。通过社会化媒介建立一个交流关系,通过关系的培养,为跟随者提供参与、支持正在进行的活动的信息与机会。鼓励公众通过所谓的自下而上的网站,经由其他人积极介入的社会化媒介发起行动,打造适用于我国国情的环境诉求通道。

在飞速发展的互联网技术影响下,多种立场多种性质的新媒体应尝试碰撞并融合发展,在当前新媒体环境下,不同媒体间的合作融合,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各平台的河长制议题报道量,也有助于信息在各媒体间的流动,从而增强河长制议题的曝光频率,多维度地引发受众关注。新媒体应该为水环境保护等问题积极吸取西方成功经验,发挥“感知”调解的作用。在促进环境决策的民主与科学履行好调解职责,进而推动河长制长足进步与发展,这是对照西方理论设想下的多元主体“调解”的展望,也是新媒体在河长制议题建构中的理想角色。

五、环境传播视角下新媒体 “调解行为”的优化路径

媒介的角色与媒介的功能密切相关。拉斯韦尔认为环境监视、社会协调和社会遗产继承是媒介主要的社会功能。在吸收了拉斯韦尔的观点的基础上,美国学者赖特所称的“社会化”,是指对于社会群体来说,媒介在传播知识、价值及其行为规范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即环境传播凭借其潜移默化、循序渐进的方式实现其教育功能,进一步影响人们的具体行为。这其实也与考克斯的“调解”概念不谋而合。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考克斯的调解理论在我国当前国情下需要分两步完成。当媒体进一步完成“感知”调解后,接下来就是进一步促进多元主体的“行为”调解。在此过程中,媒体不仅是环保理念的传播者或推动者,也应该作为环境保护的践行者,加快构建多元对话的感知调解平台,促使多元主体在面对具体的环境问题时能达成统一意见,形成合力发挥各主体间的能动作用,完成社会动员。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由“意识—行动”的转换,从而使河长制议题得以全面推行。

1. 依附多元话语空间开展社会协商

在传统意义的环境传播中,媒介能够进行公开批评和揭露,有时甚至可以将环境问题转化为舆论和政治压力,迫使环境破坏者改变做法,从而起到监视环境状况、约束相关利益团体的作用^[23]。此外,由于环境问题的复杂性,环境传播中的环境权益表达机制必然会在不同程度上有所欠缺,媒介对此具有一定弥补作用,是提高环境风险社会能见度的有力武器。

河长制议题要成功地完成社会建构过程,重要的一点即是新媒体需借助其广泛的传播范围和视觉的、听觉的多重冲击力来使河长制议题深刻融入公众的日常生活。随着公众对周边水环境治理与河长制实施的落地化关注不断提高,新媒体要以实时指导、传递的方式更为明确地向受众告知哪些是偏离行为,哪些行为是对水环境整治有益的行为,从而更好地将河长制信息传递给受众,被受众所理解和接受,与受众间建立联系,搭建平等的话语空间,从而影响受众行为。

同时,新媒体应致力于为不同的利益群体提供意见交流和表达的空间,在这种多元化的意见交流的空间内制造更多能够有效实现对河长制传播起到推动的阐释性议题。新媒体要加强自身对河长制议题框架的选择,使公众的知情权得到保障。所以新媒体应加快完整构建公共话语空间开展与各方的社会协商,更好施行河长制推广。

2. 多元主体合力促进环保教育发起环境动员

媒介的作用就是促使环境文化理念与环境保护意识能够逐渐成为社会主流价值观,促进社会的生态治理。作为环境文化的倡导者,媒介的主要任务就是向受众传达环境事实信息和环境知识信息,从而让公众环保知识普及程度有所加深、公众既有环境价值有所提高、公众介入环保行为实施有所推进^[24]。形成可持续的发展模式需要全民行动,需要媒介不断引导最终提升公众的环境教育。河长制议题本身有很强的专业性,并同时涉及地理学、环境学、生态学、社会学等多个领域。多元主体间应共同协作向公众进行环境教育,促进公众环境教育的深化。

完成对公众的环境教育后,更重要的是呼吁公众加入具体的环境行动中来,进一步影响行为,也就是进行所谓的环境动员。传统的社会动员主要依赖

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模式与传统媒体的动员模式,缺乏制度性与可持续性。对于中国来说,新媒体应充分发挥构建社会认同、推动社会动员的作用。新媒体属性特征为自下而上的社会动员模式提供了有效的传播路径,应在环保政治和公众之间充当情绪提升的调解环节。而环保组织也可以利用新媒体平台的关系网络、互动优势和聚合力量,广泛地唤醒社会各界的环保意识,更便捷地动员公众及组织积极地参与到河长制议题建构中。

参考文献:

[1] 郭顺,高清. 广西河长制的实施现状及环境法制思考 [J]. 广西教育学院学报,2019(1):79-84.

[2] 刘超. 环境法视角下河长制的法律机制建构思考[J]. 环境保护,2017,45(9):24-29.

[3] 姜斌. 对河长制管理制度问题的思考[J]. 中国水利,2016(21):6-7.

[4] 许佳君,李萍. 河长制建设中的公众参与激励机制——以德清“生态绿币”为例[J]. 水利经济,2021,39(2):68-71.

[5] 白冰,何婷英. “河长制”的法律困境及建构研究——以流域管理机制为视角[J]. 法制博览,2015(27):60-61.

[6] 程志高. 整体性治理视角下跨域治理的制度创新与绩效优化——以河长制为例[J]. 治理现代化研究,2021,37(4):79-88.

[7] 陈涛. 治理机制泛化——河长制制度再生产的一个分析维度[J].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21(1):97-103.

[8] 梅正午,刘文章,孙玉栋. 基于 31 个省份事件史分析的河长制创新与扩散的影响因素[J]. 中国环境科学,2021,41(6):2956-2963.

[9] 王书明,蔡萌萌. 基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的“河长制”评析[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21(9):8-13.

[10] 刘超,吴加明. 纠缠于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河长”制:制度逻辑与现实困局[J]. 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12,25(4):39-44.

[11] 鞠茂森. 关于河长制工作差距和加强河长履职的思考[J]. 水利经济,2020,38(3):51-54.

[12] 周建国,熊烨. “河长制”:持续创新何以可能——基于政策文本和改革实践的双维度分析[J]. 江苏社会科学,2017(4):38-47.

[13] 左其亨,韩春华,韩春辉,等. 河长制理论基础及支撑体系研究[J]. 人民黄河,2017,39(6):1-6.

[14] 朱卫彬. “河长制”在水环境治理中的效用探析[J]. 江

苏水利,2013(10):7-8.

[15] 汪群,傅颖萍,钱慧丽. 基层河长胜任力模型构建的实证研究[J].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23(3):80-88.

[16] 何琴. “河长制”的环境法思考[J]. 行政与法,2011(8):78-82.

[17] 朱赛林,朱玉春. 河长制框架下公众参与河湖治理行为分析[J]. 中国农村水利水电,2021(11):16-23.

[18] 任敏. “河长制”:一个中国政府流域治理跨部门协同的样本研究[J].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5(3):25-31.

[19] 郭小平. 环境传播——话语变迁、风险议题建构与路径选择[M].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3.

[20] 高芳芳. 环境传播:媒介、公众与社会[M].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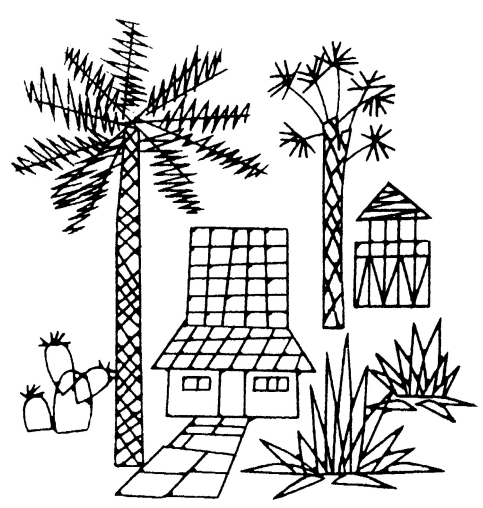
[21] 周瑞金. “新意见阶层”在网上崛起[J]. 炎黄春秋,2009(3):52-57.

[22] 戴佳,曾繁旭. 环境传播,议题、风险与路径[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

[23] 王莉丽. 绿媒体[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24] 杨楠. 环境新闻传播教育功能的固有特性[J]. 国际新闻界,2008(9):47-50.

(收稿日期:2021 - 10 - 14 编辑:张志琴)



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司法适用问题研究

陈广华,崇 章

(河海大学法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8)

摘要:《民法典》第1232条对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作出规定,但惩罚性赔偿的请求权主体,赔偿金归属和计算标准均未涉。通过梳理文献并结合我国首例适用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案例,探析环境侵权的内涵和环境侵权行为的特殊性。可知: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属于特殊的民事责任,不应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同质化”。在请求权主体方面,民事公益诉讼中不应附带提起惩罚性赔偿诉讼;赔偿金应归属于被侵权人,不应纳入地方财政预算,同时应构建以基础金额加惩罚金额的计算标准。

关键词:民法典;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

中图分类号:D9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4970(2022)01-0061-07

惩罚性赔偿制度引入环境侵权领域,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其早在2003年就有学者提出,如高利红认为恶性环境侵权案件应适用惩罚性赔偿^[1]。据杨立新在其著作中回忆,2010年施行的《侵权责任法》起草之初,对于将惩罚性赔偿引入环境侵权领域就有两种不同的声音。有的认为侵权责任范围内惩罚性赔偿的适用不应区分领域,有的认为应当在个别领域如产品责任、环境侵权中适用。最终仅引入产品责任的惩罚性赔偿^[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1232条规定了环境侵权领域的惩罚性赔偿制度^①。这一创造性的规定顺应了习近平总书记用最严格制度和最严密法治保

护环境的生态文明理念^[3],与《民法典》确立的“绿色原则”遥相呼应。

我国惩罚性赔偿制度涉及消费者权益、知识产权、食品安全、产品责任和环境侵权等多个领域,除《民法典》外,还分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等单行法中。各领域的惩罚性赔偿制度相辅相成、互相借鉴,但又相对独立,背负着各自不同的立法目的与使命,且规定较散,没有形成统一、明确的适用标准^[4]。《民法典》仅就环境侵权领域的惩罚性赔偿制度作出原则性规定,权利主体及赔偿金归属并不明确,惩罚性赔偿金计算标准不一,过于依赖法官的自由裁量,从而造成

基金项目:江苏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校外研究基地——水利法治研究中心项目(2017ZSJD004)

作者简介:陈广华(1970—),男,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民商法、侵权责任法及部门法社会学研究。E-mail:lawegh@163.com

①《民法典》第1232条规定,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

裁判结果的不确定性。所以在司法实践中对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如何作出具体的规制是当下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环境侵权行为之法律分析

1. 环境侵权之内涵

我国对环境侵权领域的研究起步较晚,环境法相关的学术论文和著作较少,学者们对环境侵权这一概念没有达成统一、明确的共识。有的学者如曹明德将其定义为因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侵权行为^[5]。而有的学者认为环境侵权不同于一般侵权的特别之处在于其利用环境作为媒介,如王明远认为环境侵权是指作为媒介的环境受到污染而造成他人损害的事实^[6]。也有学者则引用了在我国还未正式确立,但在国际社会得到普遍认可的“环境权”概念。环境权指公民享有的在适宜环境中生存和合理支配资源的权利^[7]。吕忠梅认为环境侵权行为侵害的是作为公民一项新兴基本权利的环境权^[8],其性质是公民与生俱来的一项人权。蔡守秋认为侵害公众的环境利益就是侵害公众的环境权^[9]。

域外学界对环境侵权理论的认识也不尽相同。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学者将环境污染问题统称为“公害”。日本学者如原田尚彦强调因人为行为导致环境污染从而造成的损害都是公害^[10]。我国台湾学者如邱聪智则认为公害强调的是“一般公众”而非特定人群遭受损害的事实^[11]。而在英美法系国家,强调的是行为人违反法定义务的不法性^[12]。

正如《民法典》将环境侵权行为区分为污染环境 and 生态破坏,环境侵权行为不仅侵犯了他人私益,往往还涉及公益。有的行为造成生态破坏却没有污染环境,依然导致了他人合法利益的损害,甚至侵害了公共利益。所以,研究环境侵权领域的惩罚性赔偿,不能用以偏概全的眼光来定义环境侵权的概念,仅将环境侵权看成是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中的一种,而应将两者综合考虑进行分析。

2. 环境侵权行为之特殊性

相较于传统侵权行为,环境侵权行为的特殊性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不平等性。民法调整平等主体间的法律关系,但环境侵权中双方当事人往往处于不平等地位。如在产品责任侵权领域,消费者受到损害后可以产品的标签信息中快速、精准地找到产品的生

产者、销售者等相关信息,从而采取维护自身利益的法律手段,生产者和销售者也会考虑其品牌声誉的影响而对侵权后果进行妥善处理。而在发生环境侵权问题时,由于环境侵权行为的相对隐蔽性以及侵权人的曝光度过低,往往需要借助一定的技术手段才能找到污染源头,受害人无法快速、精确地找到侵权人,维权也就无从谈起。

此外,环境侵权领域的不平等性还体现在地方保护主义。侵权人时常是一些大型企业,享受着当地政府给予的优惠政策。在一些以 GDP 增长作为主要政绩的政府环境监管部门,其监管不力也让受害人的维权难上加难。

第二,不确定性。传统的侵权行为中受害人一般是明确的。如产品责任和食品安全领域中,受害人是特定的消费者;旅游合同纠纷中,受害人是合同的相对人。但在环境侵权领域中,受害主体往往不是某一特定的个体,而是一个群体或者不特定的人。甚至某些环境侵权行为不仅侵害了私人利益,还侵害了公共利益,这意味着国家也有可能成为环境侵权的受害主体^[13]。这种情况下,通常由地方人民政府生态环境等主管部门来代表国家对侵权人予以处罚或向其提出损害赔偿。

环境侵权行为导致的损害后果同样具有不确定性,而传统侵权领域中的损害后果一般是直观的、可量化的。如产品责任领域中的损害是指因产品自身已知的缺陷导致,他人人身、财产受到的损害。环境侵权行为则需要借助环境为媒介来造成损害,如大气污染、水质污染、噪音污染等,从而导致难以认定环境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害后果。

第三,滞后性。环境侵权行为之所以区别于其他一般的侵权行为,还因为环境具有一项特殊的能力——自净能力。环境受到轻微的污染时,会通过一些生物、化学、物理反应来缓慢消除污染物从而达到自我净化。但当污染物超过其自身的承载力时,环境便会遭到破坏,这导致了环境侵权造成的损害具有滞后性。例如,一些企业在取得有效的排污许可证等行政许可的情况下,生产经营的过程是合法的,但是其对环境造成的污染在很长一段时间后才逐渐显现出来,这无疑是给环境侵权行为披上了“合法”的外衣,使传统的救济机制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二、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之性质辨析

1. 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是一种特殊的民事责任

英美法系国家(地区)和大陆法系国家(地区)对惩罚性赔偿的性质看法不一,从而对其适用的态度也大相径庭。英美法系国家(地区)奉行的是法律实用主义,认为惩罚性赔偿是对受害者损害的一种填补^[14]。而大陆法系国家(地区)则对公法和私法有着明确的划分,认为惩罚、报复功能本应是公法的权力,惩罚性赔偿不能代替公法来执行其功能,所以大陆法系国家(地区)一般不予采用^[14]。

我国学者对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认识也存在争议。有学者认为私法领域的环境侵权案件,可用传统的环境侵权救济制度予以保障。在受到环境侵权行为的侵害后可以向侵权人提起环境侵权诉讼,甚至一并提起精神损害赔偿^[14]。也有学者认为环境侵权领域的惩罚性赔偿制度混淆了私法与公法的功能,在公法领域针对环境侵权已有环境刑事诉讼和环境行政执法来保障公益,因此将惩罚性赔偿引入环境侵权领域实无必要^[15]。

基于对环境侵权特殊性的考量,《民法典》中确立的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当属私法领域,是一种特殊的民事责任。首先,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注重对私权的调整。鉴于环境侵权的特殊性,环境侵权人侵害的权益可以分为民法调整的人身、财产权以及环境公共利益,然而我国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确立和完善体现了对于生态环境公共利益的保护,因此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应当是对于造成私益严重损害后果的一种惩罚制度,调整的是私权领域的关系。其次,在《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体系中,第1229条至第1233条是保护私益的侵权责任,而第1234条和第1235条^①是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侵权责任,保护的是公益。最后,公法上对环境侵权的救济主要依靠环境刑事诉讼和环境行政执法。然而,刑法的宗旨是为了惩治犯罪,并不能成为保护生态环境的直接手段。行政处罚虽有一定惩罚效果,但生态环境的保护不应过分依赖公权力,因此我国制定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对于生态环境公益损害有了严格的法律救济体系。《民法典》第1232条将惩罚性赔偿引入环境侵权领域是由于环境侵权中受害主体与侵权人的地位存在不平等性,即惩罚性赔偿体现了公法注重维护弱势群体合法利

益的特性,弥补了环境侵权领域被侵权民事主体在该法律关系中地位的不平等,既是对环境破坏行为的警示,又弥补了双方民事主体法律地位上的不平等。但这并不意味着将公法中惩治犯罪的权力赋予了特定的民事主体,因为惩罚性赔偿的适用仍由法官严格按照法律规定来予以裁量。

2. 不应将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同质化”

因权属规定不明确,惩罚性赔偿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同质化”的现象开始在实务中出现。如全国首例适用环境惩罚性赔偿条款案件和全国首例环境惩罚性赔偿适用劳务代偿公益诉讼案件里,均为在民事公益诉讼中附带提起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这也印证了二者逐渐“同质化”的趋势。但其在立法目的、权属关系、法律适用等方面皆有不同,不应将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同质化”。

环境侵权行为可能包含对私益的损害,也可能包含对公共利益的损害。对于公共利益的损害应当由相关行政机关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从而予以相应的保护修复,而对于私益的损害应当是一般环境侵权行为,适用私法上的有关规定。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正是对被侵权人的私益造成严重损害后才可适用的制度,因此应当严格适用于私法领域的相关规定。

一方面,国内其他领域的惩罚性赔偿也都明确规定了针对私益侵害才可适用,因此其请求权主体均为特定的民事主体。如在产品责任领域,法律明确规定受到人身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惩罚性赔偿^②;在商品房买卖领域,惩罚性赔偿的请求权主体为房屋买受人^③同样在消费者权益领

①《民法典》第1234条和第1235条规定了违反国家规定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生态环境能够修复的,国家规定的机关或者法律规定的组织有权请求侵权人在合理期限内承担修复责任,以及有权请求侵权人赔偿下列损失和费用。

②《侵权责任法》第47条规定:明知产品存在缺陷仍然生产、销售,造成他人死亡或者健康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

③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条规定导致商品房买卖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无法取得房屋所有权的买受人可以请求解除合同、返还已付购房款、利息以及赔偿损失,并可以请求出卖人承担不超过已付购房款一倍的赔偿责任的三种情况。第9条规定买受人可以请求返还已付购房款及利息、赔偿损失,并可以请求出卖人承担不超过已付购房款一倍的赔偿责任的三种情况。

域^①和食品安全领域^②,惩罚性赔偿的权利主体均为作为特定民事主体的消费者。

另一方面,对于生态环境公共利益的损害我国已经有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体系予以规定,且考虑到惩罚性赔偿的特殊性,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应当严格限制在侵害私益权利的范围内,即故意对被侵权人人身或财产造成严重损害后果的,被侵权人才可提起。

因此,在适用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时,不应将其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混同。

三、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规定之不足

1. 请求权主体不明确

《民法典》第1232条对惩罚性赔偿权利主体的描述为“被侵权人”,而具体所指,法律规定并不明确^[16]。从体系解释的角度,在食品安全领域和消费者权益领域,提起惩罚性赔偿的权利主体均为与侵权行为有直接利益关系的消费者。同样,环境侵权领域提起惩罚性赔偿的权利主体理应与环境侵权行为有着直接的利益关系。

但在司法实务中对于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的权利主体范围争议不断,从而导致惩罚性赔偿金的请求权主体问题始终无法得到解决。多数学者认为其权利主体应包含人民检察院或法律规定的组织。在全国首例适用《民法典》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的案例里^③,检察院在对被告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同时一并提起惩罚性赔偿。最终获得判决支持后,惩罚性赔偿金被用于生态环境修复。如果不对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的请求权主体加以限定,或许日后会在更多的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中将惩罚性赔偿金与生态环境修复费用相混淆。

2. 赔偿金归属不明确

学界对惩罚性赔偿金的归属有截然不同的看法。有学者认为惩罚性赔偿一般都高于诉讼人的预期利益,过高的惩罚性赔偿金如果全部归属于诉讼人不利于民事诉讼的发展^[16]。如碰到“碰瓷”现象,即受害人明知侵权行为发生的情况下为了获利并没有及时止损,从而获得高额的不当得利。其实,结合其他领域的惩罚性赔偿来看,这样的观点是有待商榷的。也有学者认为可以将部分惩罚性赔偿金纳入地方财政预算或生态损害修复基金,用于生态环境的修复^[14]。实务中,还出现了法院经过协商,判决

被告以提供环境公益劳动的方式承担部分惩罚性赔偿的案例^④。为了避免惩罚性赔偿的恣意适用,当下亟需进一步解决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金的归属问题。

3. 赔偿金计算标准不明确

《民法典》强调了“相应”的惩罚性赔偿,但赔偿范围和赔偿金的计算标准并未明确。由此惩罚性赔偿金的判决就过于依赖法官的自由裁量,不同法官各自对“相应的”有不同理解,无法对惩罚性赔偿数额形成统一、明确的计算标准,从而造成“同案不同判”的判决结果。

综观我国惩罚性赔偿体系,惩罚性赔偿数额的计算一般有固定赔偿额法和最高赔偿额法。采取固定赔偿额法的,如食品安全领域惩罚性赔偿的数额为十倍价款或三倍损失。固定赔偿额法的优势是简单明了、易操作。但若在环境侵权领域中采用固定赔偿额法,损害的基础数额过高时,数额巨大的惩罚性赔偿会让企业不堪重负,长此以往不利于经济的发展。而采取最高赔偿额法的有商品房买卖领域和消费者权益领域,前者规定惩罚性赔偿数额不超过已付购房款一倍,后者规定惩罚性赔偿数额在损失的二倍以下。限定最高赔偿额一方面可以有效预防侵权人被巨额赔偿置于死地,但另一方面也削弱了其应有的惩罚、遏制犯罪作用。是故,环境侵权领域的惩罚性赔偿需结合环境侵权的特殊性来作出进一步阐释。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2009修正)第49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

②《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也引进了惩罚性赔偿的规定。该法第96条第二款规定: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销售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的赔偿金。

③2021年元月4日,江西省浮梁县人民法院环境资源法庭判决了我国首例适用《民法典》第1232条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条款的案件(源:中国裁判文书网;案号:(2020)赣0222民初796号)。该案中,浮梁县人民检察院作为公益诉讼起诉人在对被告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同时一并提起惩罚性赔偿,最终获得判决支持,惩罚性赔偿金连同生态环境修复费用被一并用于生态环境修复。

④在全国首例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适用劳务代偿公益诉讼一案中(源:中国裁判文书网;案号:(2021)鲁02民初69号),青岛市检察院就被告买卖野生动物、破坏生态行为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经过协商,法院判决被告以提供环境公益劳动的方式承担部分惩罚性赔偿。

四、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之完善

1. 请求权主体的限定

人民检察院或者法律规定的组织不应纳入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的请求权主体。首先,从体系解释分析,《民法典》第1229条至第1233条是针对私益侵害的规定,权利主体为特定的民事主体。而第1234条和第1235条则是针对公益侵害的规定^[17],权利主体是法律规定的国家机关或社会组织。不应将两种针对不同利益侵害的法律规定的权利主体进行混淆,更不应将私益救济的惩罚性赔偿适用于救济环境公益的民事公益诉讼中,否则会造成法律效果上的混同。其次,从目的解释分析,《民法典》将惩罚性赔偿引入环境侵权领域,其目的是私法对生态环境的保护。而人民检察院或者法律规定的组织作为权利主体背后代表的是国家。生态环境的保护应以其保护的权益性质不同而予以区分,在对于私益部分的保护中,公权力的介入会挫伤老百姓通过法律诉讼救济私益的积极性,不利于全面依法治国的推动。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应该严格遵守两者各自的法律规定,不能恣意适用。最后,从《民法典》第1234条的规定中可以看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应以生态环境修复责任为主^[18]。而修复环境并不是惩罚性赔偿的主要功能,惩罚性赔偿更多是强调其具有的赔偿、惩罚、遏制功能。不应把惩罚性赔偿与环境修复费用混为一谈,将惩罚性赔偿用于生态环境的修复,而应加以区分二者,使其物尽其用。且法律明确规定生态环境修复费用需要结合过错程度来综合考虑^①,这充分说明在计算生态环境修复费用时就具有一定的惩罚性,在此情形下倘若仍然判决惩罚性赔偿金,侵权人的合法权益将难以得到保障。

综上,不应将人民检察院或者法律规定的组织纳入环境侵权领域惩罚性赔偿的权利主体中。

2. 惩罚性赔偿金归属的确定

(1) 惩罚性赔偿金不应纳入地方财政预算或生态损害修复基金

有学者建议,可以将部分惩罚性赔偿金纳入地方财政预算或生态损害修复基金,这样既能防止受害人获得高额赔偿,又可以用来修复生态环境^[14]。这种观点混淆了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金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是不可取的。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金不应纳入地方财政预算或生态损害修复基金。

地方财政预算或生态损害修复基金都以国家政府为背景,是国家公权力的一种体现。《民法典》第1235条规定了生态环境损害的赔偿责任,而在相关司法解释中,地方政府可以作为原告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②。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一般会被纳入当地地方财政预算或生态损害修复基金中被用来修复环境。而环境侵权领域惩罚性赔偿作为一种特殊的民事责任,虽具有一定维护公共利益的作用,但究其性质,仍是私法赋予特定民事主体的一种私权利。二者有着不同的目的和路径^[19],不应将其混淆,更不能将惩罚性赔偿金等同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一并纳入地方财政预算或生态损害修复基金,否则不利于社会长远的发展。

况且,环境侵权行为的发生本身就意味着作为国家公权力象征的生态环境部门存在监管不力,惩罚性赔偿的出现也算作是对政府监管不力的一种弥补^[20]。面对环境侵权时,公权力与私权利应充分发挥各自优势,达到相辅相成的效果^[21]。如果将部分惩罚性赔偿金上交至国家,由公权力支配,则会严重挫伤老百姓的诉讼积极性,适得其反。所以,惩罚性赔偿金不应纳入地方财政预算或生态损害修复基金。

(2) 惩罚性赔偿金应归属于作为特定民事主体的被侵权人

首先,《民法典》第1232条是针对私益侵害的法律规定,惩罚性赔偿金理应由作为特定民事主体的被侵权人支配。为避免“碰瓷”现象的常态化,可以通过严格控制惩罚性赔偿金的计算标准来防止数额的畸高,但不能因小失大,对惩罚性赔偿金的归属进行限制。同样,在个案中即使出现了“碰瓷”现象,也不能将其认定为不当得利。在消费者权益领域,消费者“知假买假”的行为仍然应受到法律的保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司法解释,“知假买假”的消费者有权要求侵权人承担惩罚性赔

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5]1号)第23条规定,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可以结合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范围和程度、生态环境的稀缺性、生态环境恢复的难易程度、防治污染设备的运行成本、被告因侵权行为所获得的利益以及过错程度等因素进行参考。

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试行)》则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原告作出了详细的规定。省级、市地级人民政府或者受国务院委托的部门可以作为原告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

偿^①。而在环境侵权领域,即使受害是以营利为目的,但法律在惩罚性赔偿的构成要件中并没有对受害人须尽一定注意义务作出规定,所以将其认定为不当得利有失偏颇。

其次,从对环境侵权责任的法律关系分析来看,被侵权人可分为直接被侵权人和间接被侵权人。根据文义解释,直接被侵权人作为提起惩罚性赔偿的权利主体,应是环境侵权行为导致损害后果发生的直接受害者。因其人身、财产受到侵害,自然有权向侵权人提起惩罚性赔偿。当然,如直接被侵权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无法自己行使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的权利,则可由其法定代理人代为行使。再者,根据目的解释,为了全面保护被侵权人的合法权益,被侵权人还应包括间接被侵权人。所谓间接被侵权人,指的是依赖直接被侵权人生活的人。其因环境侵权行为导致唯一生活来源受到重大影响,日常生活无法继续,理应成为提起惩罚性赔偿的权利主体。

最后,在惩罚性赔偿金的判决中有这样一种观点,法院可以在判决惩罚性赔偿的同时,将部分惩罚性赔偿金直接纳入专门的基金中,用来划拨给日后同样因该侵权人的侵权行为而提起惩罚性赔偿诉讼的被侵权人,这样既提高了诉讼效率也有助于对私益侵害的全面救济^[22]。这种观点忽略了环境侵权领域惩罚性赔偿的“自诉性”^[14],法院应严格遵循民事诉讼中的处分原则和“不告不理”原则,不得在当事人提起诉讼之前预先作出判决。

3. 惩罚性赔偿金额确定

英美法系国家在惩罚性赔偿金额方面的实践经验对我国环境侵权领域惩罚性赔偿金额的确定有一定借鉴意义。在英国法官判决惩罚性赔偿案件时,一般会从以下4个方面来考虑惩罚性赔偿的数额:一是侵权人的财产情况;二是判决惩罚性赔偿后受害人的获利;三是侵权人的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关联程度;四是侵权人的主观动机^[23]。美国法院在确定惩罚性赔偿金额时则需要考虑惩罚性与补偿性赔偿数额比例、最高额限制以及赔偿额归属限制这3个方面^[24]。我国环境侵权领域可以参考英美法系确定惩罚性赔偿数额时考虑的因素,结合自身的特殊性,从基础金额和惩罚金额两个方面来综合考量。

(1) 惩罚性赔偿的基础金额

根据《民法典》第1232条的规定,造成损害后

果是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的构成要件之一。我国惩罚性赔偿体系中,其他领域的惩罚性赔偿并不都强调造成损害后果的严重性,如食品安全领域中的消费者,即使没有遭受实际损害仍然有权提出惩罚性赔偿,这是我国立法对食品安全问题低容忍度的体现。但是在环境侵权领域,为了维持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利益之间的平衡,不应任意使用惩罚性赔偿。否则,在侵权人遵守法律规定的情况下仍对其使用惩罚性赔偿就成为了一种苛责。所以在环境侵权领域中适用惩罚性赔偿,必须要有损害事实的发生。而惩罚性赔偿的首要功能就是赔偿受害人的损失,因此在计算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金时,应从客观条件出发,以受害人的身心、财产损害为基础,结合侵权人、受害人的财产情况以及后续恢复正常生活所需的合理支出,作为惩罚性赔偿的基础金额。

(2) 惩罚性赔偿的惩罚金额

《民法典》第1229条和第1232条在损害后果的认定上有截然不同的态度,前者只规定“造成他人损害”,而后者则规定了“造成严重后果”。相较于补偿性赔偿而言,环境侵权领域的惩罚性赔偿在损害后果上更强调了严重性,使其适用更为严格。那么,如何评判“造成严重后果”呢?这就需要结合受害人的身心健康状况、财产损失、日常生活能否继续等情况来综合判断。也可以参考环境刑事法律的相关规定来认定,如2013年最高院发布的司法解释中对如何认定严重后果有详细规定^②。与损害后果的严重性相对应,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应体现出其应有的区别于补偿性赔偿的惩罚功能,这部分金额就是惩罚金额。惩罚金额的考量依赖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法官应围绕基础金额,综合侵权人的主观动机、悔过程度、是否愿意采取补救措施等主观情况来确定惩罚金额。

考量主观动机时就需要考虑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主观要件上的“故意性”。《民法典》第1232条将构成要件描述为“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其直

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条:因食品、药品质量问题发生纠纷,购买者向生产者、销售者主张权利,生产者、销售者以购买者明知食品、药品存在质量问题而仍然购买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②2013年最高院发布的《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中规定的第9至17种情况和第3条中规定的第1至12种情况。

接使用了“故意”二字,说明构成惩罚性赔偿主观必须具有“故意性”。对环境侵权行为持直接故意的认定相对容易。一般违反法律规定作出的环境侵权行为都具有主观上的直接故意性,如在明知没有排污许可证的情况下仍然违法排污,从而造成对他人合法利益的损害。对间接故意的认定则需要结合具体的案件情况来综合认定,基于环境侵权行为的特殊性,可从对侵权行为的认知能力、侵权行为的持续时间和是否为累犯这3个方面来综合考虑。例如,因排污管道偶尔发生损坏或无法预料的故障而造成他人损害,不应认定为其具有间接故意;但损害发生后没有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对他人造成长时间持续性的损害时,则应认定为其具有间接故意。当侵权行为人的故意程度较高时,法官理应增加惩罚性赔偿的惩罚金额,从而增加犯罪成本来对其起到惩罚、警示的作用。同理,法官可以结合侵权人的悔过程度,如是否积极采取补救措施等情况来调整惩罚性赔偿的惩罚金额。

此外,惩罚赔偿金额的调整范围可以参考消费者权益领域和商品房买卖领域的惩罚性赔偿,限定为不超过基础金额的一倍。有学者建议惩罚金额的调整范围为三至五倍^[3],但其并没有考虑到环境侵权领域的特殊性。在环境侵权领域,任意加大惩罚性赔偿的金额会打破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利益之间的平衡。

综上所述,基础金额加上惩罚金额就是最终的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金额。

五、结 语

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生态环境保护问题日益紧迫。《民法典》第1232条将惩罚性赔偿引入环境侵权领域这一创举反映了立法者严惩环境犯罪、捍卫人民环境权益的决心。至此,我国环境法律责任体系得到极大完善,形成了救济环境私益的惩罚性赔偿制度以及救济环境公益的民事公益诉讼、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然而在司法实践中,我们仍需通过不断摸索,严格按照立法中的旨意对环境侵权领域的惩罚性赔偿相关法律条文进行适用,才能最大程度发挥其应有的功效。

参考文献:

[1] 高利红,余耀军.环境民事侵权适用惩罚性赔偿原则之

- 探究[J].法学,2003(3):106-112.
- [2] 杨立新.侵权责任法条文背后的故事与难题[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
- [3] 丁卫华.中国生态文明的制度自信研究[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22(5):9-15.
- [4] 白江.我国应扩大惩罚性赔偿在侵权责任法中的适用范围[J].清华法学,2015,9(3):111-134.
- [5] 曹明德.环境侵权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 [6] 王明远.环境侵权救济法律制度[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
- [7] 蔡守秋.环境权实践与理论的新发展[J].学术月刊,2018(11):89-103.
- [8] 吕忠梅.环境权入宪的理路与设想[J].法学杂志,2018(1):23-40.
- [9] 蔡守秋.从环境权到国家环境保护义务和环境公益诉讼[J].现代法学,2013(6):3-21.
- [10] 原田尚彦.环境法[M].于敏,译.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 [11] 邱聪智.公害法原理[M].台湾:三民书局,1987.
- [12] 徐平.环境刑法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
- [13] 竺效.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救济的实体公益[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6,30(2):23-31.
- [14] 陈学敏.环境侵权损害惩罚性赔偿制度的规制——基于《民法典》第1232条的省思[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20(6):57-69.
- [15] 王笑寒.生态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法律适用问题[J].山东社会科学,2021(3):169-173.
- [16] 谢海波.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责任条款的构造性解释及其分析——以《民法典》第1232条规定为中心[J].法律适用,2020(23):134-140.
- [17] 王利明.《民法典》中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的亮点[J].广东社会科学,2021(1):216-225.
- [18] 李丹.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请求权主体的限定[J].广东社会科学,2020(3):246-253.
- [19] 申进忠.惩罚性赔偿在我国环境侵权中的适用[J].天津法学,2020,36(3):42-47.
- [20] 赵鹏.惩罚性赔偿的行政法反思[J].法学研究,2019,41(1):41-55.
- [21] 徐以祥.论生态环境损害的行政命令救济[J].政治与法律,2019(9):82-92.
- [22] 邸新淇.论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之适用[J].哈尔滨学院学报,2020,41(11):57-60.
- [23] 王军.侵权行为法比较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 [24] 王利明.美国惩罚性赔偿制度研究[J].比较法研究,2003(5):1-15.

(收稿日期:2021-04-07 编辑:许宇鹏)

长江经济带灰水足迹与经济增长的二维脱钩分析

何伟军^{1,2},孔阳¹,沈菊琴³

(1.河海大学商学院,江苏南京 211100;2.三峡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北宜昌 443002;

3.河海大学农业科学与工程学院,江苏南京 211100)

摘要:基于环境库兹涅兹曲线(EKC)和Tapio脱钩模型,首先测算长江经济带11省(市)2003—2018年的灰水足迹,然后构建计量模型探究灰水足迹与经济增长的EKC形态,最后结合EKC拐点和改进后的Tapio模型分层次进行二维脱钩分析。结果显示:长江经济带灰水足迹省际差异显著,除云南外,其余10省(市)灰水足迹总体呈下降趋势;长江经济带灰水足迹EKC呈N形变化,两个拐点处的人均GDP分别为3.67万元和10.34万元,农业比重和对外开放程度对灰水足迹具有显著正向影响;除江西、重庆、贵州三地出现“伪脱钩”外,其余8省(市)的灰水足迹与经济增长共出现7种二维脱钩状态;经济发展水平低的上游省份实现了更多的弱脱钩类型,而经济发展水平高的下游省份实现了更多的强脱钩类型。

关键词:灰水足迹;水污染;经济增长;脱钩理论;EKC假说

中图分类号:TV2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4970(2022)01-0068-07

一、引言

实现环境压力(资源消耗、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脱钩是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注重点。学术界将环境压力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非同步动态变化关系称为“脱钩”。常用的脱钩分析方法有OECD脱钩模型^[1]、Vehmas脱钩指数^[2]、Tapio模型^[3],鉴于Tapio模型既克服了基期选择对脱钩结果的影响,又通过引入弹性系数实现了脱钩状态的细分,因而使用更

为广泛^[4]。在进行水污染与经济增长脱钩分析时,大部分研究都是基于水污染物浓度^[5-6]或污水排放量^[7-8]进行分析,很难准确量化实际水污染。为此,荷兰学者Hoekstra等基于虚拟水与生态足迹概念提出了水足迹^[9],其中的灰水足迹实现了用水量指标衡量水污染程度,将其引入脱钩分析可以兼顾水量和水质双重属性。然而,现阶段的脱钩研究存在两个不足:一是未在脱钩分析前进行“伪脱钩”^①检验;二是无法区分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的相同脱钩状

基金项目:河海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学生项目);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KYCX21_0445);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19ZDA089)

作者简介:何伟军(1965—),男,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水资源技术经济及管理研究。E-mail:weijunhe@ctgu.edu.cn

通信作者:沈菊琴(1963—),女,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环境会计与生态补偿研究。E-mail:jqshen@hhu.edu.cn

①参考“伪回归”概念,笔者采用Person相关系数对Tapio脱钩进行改进,当资源环境压力与经济增长在统计上不相关时,讨论其脱钩状态没有意义,称为“伪脱钩”。

态。因此,在进行灰水足迹脱钩分析时,有必要在“伪脱钩”检验的基础上,对不同经济水平下的相同脱钩状态进行有效区分。

早在脱钩理论之前,环境库兹涅兹曲线(EKC)就已用于探究环境污染与人均收入之间的非线性变化^[10]。由于易于理解且方便量化,EKC假说被广泛用于研究CO₂^[11]、大气污染物^[12]和水污染^[13]。经典EKC呈倒U形,但当研究对象或样本不同时,EKC也可能出现U形、N形、倒N形(S形)^[14-15]。值得注意的是,脱钩理论和EKC假说之间具有很强的内部关联,均可用于研究环境污染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变化关系。高新才等曾运用Tapio模型与EKC假说探究西部省份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16],但该研究只是将两种方法单独使用,无法进行不同经济水平下的二维脱钩分析。夏勇等创造性地将EKC方程和Tapio脱钩指数公式联立使用,分别探究工业SO₂排放、CO₂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二维脱钩关系,研究发现EKC拐点处的人均GDP与强、弱脱钩临界点处的人均GDP近似相同^[17-18]。这两项研究对区分不同经济水平下的相同脱钩状态具有启示作用,但均未考虑“伪脱钩”问题。截至目前,尚无学者结合EKC假说和Tapio模型进行水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二维脱钩分析。

综上所述,在分析水污染与经济增长的脱钩状态时,现有研究存在以下三点不足:第一,未能准确量化实际水污染;第二,未进行“伪脱钩”检验;第三,未建立不同经济水平下的二维脱钩分类标准。长江经济带是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和水污染治理的重要区域,为了打破水污染对该地区经济发展的制约,亟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的指导下,制定针对性的区域发展政策。基于此,基于该区域2003—2018年的灰水足迹测算结果,通过面板回归模型探究灰水足迹EKC类型,将“伪脱钩”和EKC拐点处的人均GDP引入Tapio脱钩模型,构建灰水足迹与经济增长的二维脱钩分类标准并进行脱钩分析。

二、研究方法数据来源

1. 研究方法

(1) 灰水足迹法

参考文献[9,19-20]可知,灰水足迹(GWF_{total})包括农业灰水足迹(GWF_{agr})、工业灰水足迹

(GWF_{ind})和生活灰水足迹(GWF_{dom})。由于水污染物种类多、浓度差异大,在计算灰水足迹时仅考虑其中最主要的污染物,计算公式如下:

$$GWF_{total} = GWF_{agr} + GWF_{ind} + GWF_{dom} \quad (1)$$

第一,农业灰水足迹。农业灰水足迹(GWF_{agr})包括种植业灰水足迹(GWF_{pla})和养殖业灰水足迹(GWF_{bre})^[19-20]。氮肥是种植业水污染的最大来源,牛、羊、猪和家禽粪便、尿液中的化学需氧量(COD)和总氮(TN)是养殖业水污染的最主要来源。在计算灰水足迹时,同类型污染物产生的灰水足迹进行加总,不同类型污染物产生的灰水足迹取最大值^[19-20]。计算公式如下:

$$GWF_{agr} = \max[GWF_{bre(COD)}, (GWF_{pla(TN)} + GWF_{bre(TN)})] \quad (2)$$

$$GWF_{pla} = \frac{\alpha N_{Appl}}{C_{TN,max} - C_{TN,nat}} \quad (3)$$

$$GWF_{bre} = \max(GWF_{bre(COD)}, GWF_{bre(TN)}) \quad (4)$$

$$GWF_{bre(i)} = \frac{L_{bre(i)}}{C_{i,max} - C_{i,nat}} \quad (5)$$

$$\text{其中 } L_{bre(i)} = \sum_{h=1}^4 N_h D_h (f_h p_{hf} \beta_{hf} + u_h p_{hu} \beta_{hu})$$

式中: α 为氮肥淋溶率; N_{Appl} 为氮肥施用总量; $C_{TN,max}$ 为总氮的水质标准浓度; $C_{TN,nat}$ 为总氮的自然本地浓度^[19-20]; $GWF_{bre(i)}$ 为第*i*类污染物的养殖业灰水足迹; $L_{bre(i)}$ 为第*i*类污染物的排放量;*i*为总氮或化学需氧量;*h*为牛、羊、猪和家禽; N_h 、 D_h 、 f_h 、 u_h 、 p_{hf} 、 p_{hu} 、 β_{hf} 、 β_{hu} 分别为*h*的数量、饲养周期、日排粪量、日排尿量、单位尿的污染物含量、单位粪便的污染物含量、单位粪便的污染物流失率、单位尿的污染物流失率^[19-20]。

第二,工业灰水足迹。COD和氨氮排放量(NH₃-N)是工业废水中的主要污染物, GWF_{ind} 计算公式如下:

$$GWF_{ind} = \max(GWF_{ind(COD)}, GWF_{ind(NH_3-N)}) \quad (6)$$

$$GWF_{ind(k)} = \frac{L_{ind(k)}}{C_{k,max} - C_{k,nat}} \quad (7)$$

式中: $GWF_{ind(k)}$ 为第*k*类污染物的工业灰水足迹; $L_{ind(k)}$ 为工业废水中第*k*类污染物的排放量;*k*为污染物COD或NH₃-N。

第三,生活灰水足迹。生活污水与工业污水都属点源污染,主要污染物均为COD和NH₃-N,计算公式如下:

$$GWF_{dom} = \max(GWF_{dom(COD)}, GWF_{dom(NH_3-N)}) \quad (8)$$

$$GWF_{\text{dom}(k)} = \frac{L_{\text{dom}(k)}}{C_{k,\max} - C_{k,\text{nat}}} \quad (9)$$

式中: $GWF_{\text{dom}(k)}$ 、 $L_{\text{dom}(k)}$ 分别为生活污水中第 k 类污染物的灰水足迹、排放量。

(2) EKC 假说

考虑到 EKC 类型多变,将灰水足迹 EKC 方程设定为如下更为通用的三次函数形式^[12]:

$$GWF_{jt} = \alpha_0 + \alpha_1 g_{jt} + \alpha_2 g_{jt}^2 + \alpha_3 g_{jt}^3 + \alpha_m Z_{m,jt} + \varepsilon \quad (10)$$

式中: GWF_{jt} 、 g_{jt} 分别表示 j 省 t 年的灰水足迹、人均实际 GDP; α_0 为截距项,表示人均实际 GDP 以外的其他解释变量不变时的灰水足迹平均值; α_1 、 α_2 、 α_3 分别为一次项、二次项、三次项的系数; ε 为随机误差; Z_m 为控制变量。当 $\alpha_1 > 0$ 、 $\alpha_2 < 0$ 、 $\alpha_3 = 0$ 时,灰水足迹与人均 GDP 呈倒 U 形关系;当 $\alpha_1 < 0$ 、 $\alpha_2 > 0$ 、 $\alpha_3 = 0$ 时,呈 U 形关系;当 $\alpha_1 > 0$ 、 $\alpha_2 < 0$ 、 $\alpha_3 > 0$ 时,呈 N 形关系;当 $\alpha_1 < 0$ 、 $\alpha_2 > 0$ 、 $\alpha_3 < 0$ 时,呈倒 N 形(S 形)关系^[12]。EKC 拐点即方程(11)的极值点,令 $\partial_{GWF}/\partial_g = 0$ 得,

$$g = \frac{-2\alpha_2 \pm \sqrt{4\alpha_2^2 - 12\alpha_1\alpha_3}}{6\alpha_3}$$

通过大量权威文献阅读,最终选取环境治理能力、农业占比、人口密度、对外开放程度和水资源禀赋等作为控制变量。具体变量介绍如表 1 所示。

表 1 控制变量及其相关假设

变量名称	变量含义	假设
环境治理能力	环境治理投资占 GDP 的比重	环境治理能力对 GWF 起抑制作用 ^[21]
农业占比	第一产业产值占 GDP 的比例	农业占比对 GWF 起促进作用 ^[22]
人口密度	单位面积年末常住人口	人口密度对 GWF 起促进作用
对外开放程度	进出口贸易额占 GDP 的比例	对外开放程度对 GWF 起抑制作用
水资源禀赋	人均水资源量	水资源禀赋对 GWF 起促进作用 ^[22]

(3) 二维 Tapio 脱钩模型

灰水足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 Tapio 脱钩弹性系数计算公式如下:

$$D_t = \frac{(GWF_t - GWF_{t-1})/GWF_{t-1}}{(GDP_t - GDP_{t-1})/GDP_{t-1}} \quad (11)$$

式中: D_t 为第 t 年的脱钩弹性系数; GDP_t 、 GWF_t 分别为第 t 年的实际 GDP 和灰水足迹; GDP_{t-1} 、 GWF_{t-1} 分别为第 $t-1$ 年的实际 GDP 和灰水足迹。强脱钩是

最理想的脱钩状态,表示水污染随经济增长而减少;弱脱钩是第二理想的脱钩状态,表示水污染增速小于经济增速^[4]。这两种状态下,单位 GDP 水污染均在下降。联立 EKC 方程和 Tapio 模型进行数理推导^[18],探究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的灰水足迹脱钩状态细分方法。

令 $r = g_t - g_{t-1}$,由于 $GDP_t = g_t p_t$,假设同一省市相邻两年的年末常住人口维持不变,则

$$p_t = p_{t-1} = p \quad (12)$$

$$G_{t-1} = g_{t-1} p_{t-1} = (g_t - r)p \quad (13)$$

式中: g_t 为第 t 年的人均实际 GDP; p_t 为第 t 年的年末常住人口; r 为相邻两年人均实际 GDP 变化量。则有

$$D_t = \frac{[(\alpha_1 - \alpha_2 r + \alpha_3 r^2) + (2\alpha_2 - 3\alpha_3 r)g_t + 3\alpha_3 g_t^2](g_t - r)}{\alpha_0 + \alpha_1(g_t - r) + \alpha_2(g_t - r)^2 + \alpha_3(g_t - r)^3} \quad (14)$$

研究区间内,长江经济带各省(市)未出现经济负增长,因此仅考虑 $\Delta GDP > 0$ 的情况。设:

$$f(g_t) = [(\alpha_1 - \alpha_2 r + \alpha_3 r^2) + (2\alpha_2 - 3\alpha_3 r)g_t + 3\alpha_3 g_t^2](g_t - r) \quad (15)$$

$$h(g_t) = (\alpha_1 - \alpha_2 r + \alpha_3 r^2) + (2\alpha_2 - 3\alpha_3 r)g_t + 3\alpha_3 g_t^2 \quad (16)$$

令 $D_t = 0$,即 $f(g_t) = 0$ 则有 $h(g_t) = 0$ 或 $g_t = r$ 。当 $g_t = r$ 时, $g_{t-1} = 0$,这与实际不符。

当 $h(g_t) = 0$ 时,两个极值点对应的人均实际 GDP 为

$$\begin{cases} g_{t,1} = \frac{(3\alpha_3 r - 2\alpha_2) + \sqrt{4\alpha_2^2 - 3\alpha_3^2 r^2 - 12\alpha_1\alpha_3}}{6\alpha_3} \\ g_{t,2} = \frac{(3\alpha_3 r - 2\alpha_2) - \sqrt{4\alpha_2^2 - 3\alpha_3^2 r^2 - 12\alpha_1\alpha_3}}{6\alpha_3} \end{cases} \quad (17)$$

由于相邻两年的人均 GDP 变化较小,可将其近似看成零,即 $r = 0$ ^[18],对比发现,EKC 方程的两个极值点和强弱脱钩临界点处的人均 GDP 相等。参考夏勇等^[17-18]以及 EKC 定义,将 EKC 拐点处的人均 GDP 视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高低的分类标准,引入 Tapio 脱钩分类标准,得到如表 2 所示的 12 种二维脱钩状态。其中,“高经济水平-强脱钩”是最理想的二维脱钩状态,表示达到高经济水平时,灰水足迹随着经济增长而减少。

表 2 二维脱钩状态分类标准 ($\Delta GDP > 0$)			
脱钩状态	$g_L < g_L^*$	$g_L^* < g_L < g_R^*$	$g_L > g_R^*$
强脱钩 (SD)	低经济水平- 强脱钩 (L-SD)	中经济水平- 强脱钩 (M-SD)	高经济水平- 强脱钩 (H-SD)
弱脱钩 (WD)	低经济水平- 弱脱钩 (L-WD)	中经济水平- 弱脱钩 (M-WD)	高经济水平- 弱脱钩 (H-WD)
扩张连接 (EC)	低经济水平- 扩张连接 (L-EC)	中经济水平- 扩张连接 (M-EC)	高经济水平- 扩张连接 (H-EC)
扩张负脱钩 (END)	低经济水平- 扩张负脱钩 (L-END)	中经济水平- 扩张负脱钩 (M-END)	高经济水平- 扩张负脱钩 (H-END)
		伪脱钩	

注： g_L^* 和 g_R^* 分别为 EKC 左拐点和右拐点处的人均 GDP，是经济水平发展高低的阈值。

2. 数据来源

灰水足迹计算所需要的氮肥淋失率、污染物的排放标准浓度、自然本底浓度、畜禽粪便排泄量、粪便污染物含量及饲养周期等基准数据来源于文献[19]；污染物 COD、氨氮标准值来源于《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 8978—1996)。污水排放量、畜禽养殖量、化肥施用量、水资源禀赋、人口密度和环境治理投资等指标数据来源于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的历年统计年鉴和环境年鉴,农业占比是通过计算农业增加值与 GDP 的比值得到。

三、实证结果分析

1. 灰水足迹相关结果分析

长江经济带各省(市)2003—2018 年的灰水足

迹测算结果见表 3。不难发现,长江经济带灰水足迹省际差异显著,除云南外,其余 10 省(市)的灰水足迹总体呈现波动下降趋势。其中,上海灰水足迹始终最低,从 2003 年的 65 亿 m³ 减少到 2018 年的 26.7 亿 m³;四川灰水足迹始终最高,最大值为 382.9 亿 m³,最小值为 312.2 亿 m³。从水足迹均值来看,上海、重庆、贵州和浙江的灰水足迹较低,都小于 140 亿 m³,而四川、湖南、江苏、湖北和云南的灰水足迹较高,均超过 210 亿 m³。上海和浙江的人均 GDP 分别排在第一位和第三位,其对应的灰水足迹分别排名倒数第一和倒数第三;江苏和湖北的人均 GDP 分别排名第二和第四,其灰水足迹分别排名第三和第四,这表明省级的灰水足迹与经济发展水平并非严格负相关。究其原因,灰水足迹受经济规模和农业比重等多个因素共同影响,其中经济发展水平可以通过提高环境治理投资和污水处理技术来减少水污染,但无法直接决定灰水足迹的高低。

2. EKC 假说检验及拐点分析

由表 4 中结果(5)可知,在控制了环境治理能力、农业比重、人口密度、对外开放程度和水资源禀赋等 5 个变量后, g 、 g^2 和 g^3 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17.11、-3.154、0.15,且在 1% 的统计性水平上显著。由式(10)求导可知,灰水足迹与人均实际 GDP 之间呈现 N 形变化,两个拐点处的人均 GDP 依次为 3.67 万元、10.34 万元。夏勇等^[17-18]结合 Tapio 模型和 EKC 假说分别探究 SO₂ 和 CO₂ 与经济增长之间

表 3 长江经济带 11 省(市)的灰水足迹

单位:亿 m³

年份	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江西	湖北	湖南	重庆	四川	贵州	云南
2003	65.0	249.3	137.8	202.1	145.5	238.4	291.1	97.3	382.4	147.9	185.4
2004	54.4	263.1	138.4	196.5	154.4	239.3	304.7	100.2	380.1	151.3	192.8
2005	57.6	281.6	144.7	197.1	158.4	242.6	316.9	100.9	377.9	157.7	196.6
2006	57.1	275.5	143.6	185.6	159.2	238.3	319.3	99.8	382.9	161.2	197.5
2007	55.5	258.6	135.0	163.6	142.7	227.1	285.2	89.1	349.5	127.2	189.3
2008	51.4	252.6	132.4	162.4	141.5	231.1	285.2	90.4	350.1	128.5	189.5
2009	46.4	249.4	128.2	162.9	144.2	235.3	285.7	92.7	355.0	129.9	193.7
2010	42.4	243.9	123.5	162.0	145.5	236.0	279.4	92.5	352.8	129.4	196.8
2011	40.8	250.4	141.6	184.5	159.1	242.6	262.2	101.6	351.3	135.3	232.8
2012	39.3	243.0	137.4	184.2	160.1	245.1	261.4	100.8	346.9	133.1	235.2
2013	38.2	235.1	132.6	183.7	160.4	242.7	261.7	100.4	344.2	132.8	236.3
2014	36.4	228.5	125.7	182.0	160.7	239.7	262.6	100.6	348.3	137.3	239.2
2015	33.6	221.6	117.7	180.2	161.7	233.2	258.6	100.5	346.1	140.7	237.1
2016	30.9	218.2	108.8	174.0	159.9	216.6	242.3	97.8	337.8	136.5	238.1
2017	30.3	219.6	105.6	162.7	152.8	200.5	232.5	90.3	318.2	135.6	245.2
2018	26.7	206.0	100.9	152.2	152.1	194.9	226.3	88.6	312.2	130.4	243.1
均值	44.1	243.5	128.4	177.2	153.6	231.5	273.4	96.5	352.2	138.4	215.5
排名	11	3	9	6	7	4	2	10	1	8	5

的二维脱钩关系,两项研究均得到倒 U 形变化结果,并将 EKC 拐点值作为门槛值,前者的拐点值为 26903 元,后者为 7999.5 美元。借鉴上述做法,将灰水足迹 EKC 拐点处的人均实际 GDP 视为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水平高中低的判定标准。农业比重和对外开放程度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农业比重越高对灰水足迹具有促进作用,从而验证了表 1 中的假设;对外开放程度同样促进了灰水足迹,这与长江经济带进出口产品类型有关,表明该地区水密集型产品出口较多。

表 4 灰水足迹的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1)	(2)	(3)	(4)	(5)
g	1.921	19.06***	19.07***	16.90***	17.11***
g^2	-1.273**	-3.339***	-3.356***	-3.140***	-3.154***
g^3	0.0638*	0.145***	0.146***	0.149***	0.150***
环境治理能力		2.656	2.563	4.192	4.326
农业比重		4.319***	4.120***	4.027***	4.015***
人口密度			-0.000962	-0.00168	-0.00185
对外开放程度				316.9***	316.5***
水资源禀赋					-0.00234
常数项	196.3***	111.6***	116.5***	105.6***	110.5***
观测值	176	176	176	176	176
省市个数	11	11	11	11	11
R^2	0.304	0.396	0.397	0.426	0.429

3. 灰水足迹与经济增长的二维脱钩分析

长江经济带 11 省(市)2003—2018 年灰水足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二维脱钩状态如表 5 所示,江西、重庆、贵州三地的灰水足迹与经济增长之间出现“伪脱钩”,其余 8 省市共出现 7 种不同类型的二维脱钩状态。

表 5 长江经济带 11 省(市)灰水足迹与经济增长的二维脱钩分析

时期	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江西	湖北	湖南	重庆	四川	贵州	云南
2003—2004 年	M-SD	L-WD	L-WD	L-SD	伪脱钩	L-WD	L-WD	伪脱钩	L-SD	伪脱钩	L-WD
2004—2005 年	M-WD	L-WD	L-WD	L-WD	伪脱钩	L-WD	L-WD	伪脱钩	L-SD	伪脱钩	L-WD
2005—2006 年	M-SD	L-SD	L-SD	L-SD	伪脱钩	L-SD	L-WD	伪脱钩	L-WD	伪脱钩	L-WD
2006—2007 年	M-SD	L-SD	M-SD	L-SD	伪脱钩	L-SD	L-SD	伪脱钩	L-SD	伪脱钩	L-SD
2007—2008 年	M-SD	M-SD	M-SD	L-SD	伪脱钩	L-WD	L-WD	伪脱钩	L-WD	伪脱钩	L-WD
2008—2009 年	M-SD	M-SD	M-SD	L-WD	伪脱钩	L-WD	L-WD	伪脱钩	L-WD	伪脱钩	L-WD
2009—2010 年	M-SD	M-SD	M-SD	L-SD	伪脱钩	L-WD	L-SD	伪脱钩	L-SD	伪脱钩	L-WD
2010—2011 年	M-SD	M-WD	M-EC	L-WD	伪脱钩	L-WD	L-SD	伪脱钩	L-SD	伪脱钩	L-WD
2011—2012 年	M-SD	M-SD	M-SD	L-SD	伪脱钩	M-WD	L-SD	伪脱钩	L-SD	伪脱钩	L-WD
2012—2013 年	M-SD	M-SD	M-SD	L-SD	伪脱钩	M-SD	M-WD	伪脱钩	L-SD	伪脱钩	L-WD
2013—2014 年	M-SD	M-SD	M-SD	L-SD	伪脱钩	M-SD	M-WD	伪脱钩	L-WD	伪脱钩	L-WD
2014—2015 年	H-SD	M-SD	M-SD	L-SD	伪脱钩	M-SD	M-SD	伪脱钩	L-SD	伪脱钩	L-SD
2015—2016 年	H-SD	M-SD	M-SD	M-SD	伪脱钩	M-SD	M-SD	伪脱钩	M-SD	伪脱钩	L-WD
2016—2017 年	H-SD	H-WD	M-SD	M-SD	伪脱钩	M-SD	M-SD	伪脱钩	M-SD	伪脱钩	L-WD
2017—2018 年	H-SD	H-SD	M-SD	M-SD	伪脱钩	M-SD	M-SD	伪脱钩	M-SD	伪脱钩	M-SD

注:二维脱钩状态排序中,H-SD>M-SD>L-SD>H-WD>M-WD>L-WD。

从上、中、下游来看,2003—2018 年上游省(市)的灰水足迹与经济增长之间共出现了 3 种二维脱钩状态,其中 16 次 L-WD、10 次 L-SD、4 次 M-SD;中游省(市)出现了 4 种二维脱钩状态,其中 11 次 L-WD、3 次 M-WD、6 次 L-SD、10 次 M-SD;下游省(市)共出现 7 种二维脱钩状态,7 次 L-WD、2 次 M-WD、1 次 H-WD、12 次 L-SD、32 次 M-SD、5 次 H-SD、1 次 M-EC。对比发现,上游实现了更多的 L-WD,且脱钩状态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变化规律;下游实现了最多的 L-SD、M-SD 和 H-SD,且 M-SD 和 H-SD 呈现增加趋势,脱钩状态呈现向好趋势。究其原因,这与下游具有更高的环保技术水平和更多的环保治理投资密切相关。

从省级层面来看,2003—2018 年安徽和四川在绝大部分年份实现了 L-SD,上海、江苏和浙江在绝大部分年份均实现了 M-SD;经济落后的云南在绝大部分年份实现了 L-WD 且未能实现 1 次 H-SD;经济水平较高的湖北实现了 6 次 M-SD 和 6 次 L-WD。综上所述,经济水平高的省(市)更容易实现 H-SD 或 M-SD,经济水平低的省(市)更可能实现 L-WD。从变化趋势来看,从 2013 年开始,长江经济带越来越多的省(市)实现了 M-SD,尤其是中下游省(市),与此同时,出现 L-WD 的省(市)显著减少,2018 年各省均未出现 L-WD。从 2014 年开始,更多省(市)达到高经济发展水平,其灰水足迹随着经济增长而减少。这与 2014 年国务院印发《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密切相关,该意见重

点提出“强化长江水资源保护和合理利用,稳步提高长江流域水质”,促进了灰水足迹实现强脱钩。

四、结论与建议

一方面,长江经济带灰水足迹省际差异显著,除云南外,其他 10 省(市)的灰水足迹总体呈下降趋势。长江经济带的农业比重和对外开放程度显著促进灰水足迹,而环境治理能力、人口密度和水资源禀赋对灰水足迹未产生明显作用。

另一方面,除重庆、贵州和江西出现“伪脱钩”外,长江经济带其余省(市)2003—2018 年的灰水足迹与经济增长实现了强脱钩或弱脱钩,其中强脱钩次数呈波动增加趋势且整体多于弱脱钩。经济发展水平高的下游地区实现了更多的高经济水平-强脱钩或中经济水平-强脱钩,而经济水平越低的上游地区实现了更多的低经济水平-弱脱钩;从 2013 年开始,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且水污染治理效果明显,有更多省(市)实现高经济水平-强脱钩。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在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水生态文明思想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为指导的前提下,可以从以下两个层面加快推动区域水资源与经济可持续发展。

就中央政府而言,第一,要成立长江经济带乃至长江流域水污染协同治理小组,协调配置治理资金、技术和人力;第二,以“双控目标”为指导,加强跨省断面水质检测力度,完善污染联防联控,强化污染追责机制;第三,坚持“节水优先、系统治理”,将二维脱钩结果纳入水生态补偿主客体划分标准,建立健全长江流域横纵向生态补偿机制,切实提高长江流域水环境承载力;第四,对于不同脱钩类型的省(市),要明确其发展重点:鼓励“低经济水平-弱脱钩”型和“中经济水平-弱脱钩”型地区兼顾经济发展和水环境保护;鼓励“高经济水平-弱脱钩”型地区加大水污染治理技术研发投入力度,重点扶持“低经济水平-强脱钩”型地区发展经济。

就省(市)政府而言,第一,要开展排污清单管理,严控辖区内生活生产污水排放量及排放浓度,并加大监督惩处力度;第二,持续增加政府环境治理投资,设置水生态环境功能修复专项资金和横向生态补偿基金,促进水污染持续高效治理;第三,鼓励和扶持企业自主研发污水治理技术,提高污水重复利用率,加快编制企业污染排污负面清单,淘汰落后产

能;第四,坚持“以水定产”,在水环境承载力下优化区域产业结构和空间布局,特别是加快开展农业产业跨区域及区域内结构和布局优化,提高绿色农业技术研发及推广力度,推动农业高效生态发展。

参考文献:

- [1]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to measure decoupling of environmental pressure from economic growth[EB/OL]. (2002-08-28) [2021-01-20]. <http://www.olis.oecd.org/olis/2002doc.nsf/LinkTo/sg-sd>.
- [2] VEHMAS J, LUUKKANEN J, KAIVOOJA J. Linking analyses and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s for aggregated material flows in the EU [J].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06, 15(17): 1662-1673.
- [3] TAPIO P. Towards a theory of decoupling: degrees of decoupling in the EU and the case of road traffic in Finland between 1970 and 2001 [J]. Transport Policy, 2005, 12(2): 137-151.
- [4] KONG Y, HE W J, YUAN L, et al. Decoupling analysis of water footprint and economic growth: a case study of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from 2004 to 2017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2019, 16(23): 1-16.
- [5] 郭承龙, 张智光. 污染物排放量增长与经济增长脱钩状态评价研究[J].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13, 32(3): 94-98.
- [6] 张兆方, 沈菊琴, 何伟军, 等. “一带一路”中国区域水资源利用效率评价——基于超效率 DEA-Malmquist-Tobit 方法[J].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20(4): 60-66.
- [7] 李宁, 孙涛. 环境规制, 水环境压力与经济增长——基于 Tapio 脱钩弹性的分解[J]. 科技管理研究, 2016, 36(4): 258-262.
- [8] 章恒全, 陈卓然, 张陈俊. 长江经济带工业水环境压力与经济增长脱钩努力研究[J].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19, 38(2): 13-18.
- [9] HOEKSTRA A Y, CHAPAGAIN A K, ALDAYA M M, et al. The water footprint assessment manual: Setting the global standard[M]. London: Earthscan, 2011.
- [10] GROSSMAN G M, KRUEGER A B. The inverted-U: what does it mean? [J]. Environment &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96, 1(1): 119-122.
- [11] 胡宗义, 刘亦文, 唐李伟. 低碳经济背景下碳排放库兹涅茨曲线研究[J]. 统计研究, 2013, 30(2): 73-79.
- [12] 王勇, 俞海, 张永亮, 等. 中国环境质量拐点: 基于 EKC

- 的实证判断[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6,26(10):1-7.
- [13] 李志涛,黄河清,张明庆,等. 鄱阳湖流域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关系研究[J]. 资源科学,2010,32(2):267-273.
- [14] 朱悦. 辽宁省环渤海地区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水平计量模型研究[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4,24(S1):65-68.
- [15] 鲁晓东,许罗丹,熊莹. 水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EKC假说在中国八大流域的表现[J]. 经济管理,2016,38(1):20-29.
- [16] 高新才,马丽. 基于脱钩和 EKC 理论的西部地区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关系研究[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35(6):117-122.
- [17] 夏勇,钟茂初. 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脱钩理论及 EKC 假说的关系——兼论中国地级城市的脱钩划分[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6,26(10):8-16.
- [18] SONG Y, ZHANG M, ZHOU M. Study on the decoup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CO₂ emission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based on two-dimensional decoupling theory: a case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J]. Ecological Indicators,2019,102:230-236.
- [19] 韩琴,孙才志,邹玮. 1998—2012 年中国省际灰水足迹效率测度与驱动模式分析[J]. 资源科学,2016,38(6):1179-1191.
- [20] 刘红光,陈敏,唐志鹏. 基于灰水足迹的长江经济带水资源生态补偿标准研究[J].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19,28(11):2553-2563.
- [21] 贺志文,向平安. 湖南省灰水足迹变化特征及其驱动因子分析[J]. 中国农村水利水电,2018(10):19-26.
- [22] 孙才志,韩琴,郑德凤. 中国省际灰水足迹测度及荷载系数的空间关联分析[J]. 生态学报,2016,36(1):86-97.

(收稿日期:2021-05-10 编辑:张志琴)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投稿指南

1. 注册

通过“用户登录区”的“作者登录”进入作者区,点击作者区的新用户注册,填写个人信息,填写完毕提交后,您将收到注册成功的电子邮件,请按电子邮件提示激活账户后方可登录。

2. 投稿

在网站首页输入您的 email 和密码,以作者身份登录,进入投稿页面。按照页面提示填写全部投稿信息后提交即可(如不需要推荐审稿人或回避审稿人,可跳过)。建议投稿作者就是论文的通讯作者,以方便联系。

3. 查询稿件目前的处理情况

登陆系统后,进入稿件查询即可。

4. 修改稿件

关于稿件信息,在编辑部未对稿件进行任何处理时,您还可以在稿件查询处随时修改稿件信息。

一经处理,必须经编辑部进行退修操作才可以对稿件进行修改,在提交修改稿时,请直接以作者已申请注册的 email 和密码登录我们的网站,在[稿件管理]菜单下[上传/下载修改稿]子菜单,点击后请找到该稿件编号对应的稿件,请先下载(打开)原文,查阅编辑部是否有直接的批注或修改;修改稿或补充的内容再通过[修改]功能上传回来即可。请不要再使用投稿功能投此稿,否则会被视为新稿件,已有的审稿结果将作废。

5. 修改作者信息

文章的作者信息可以直接在稿件查询处随时修改。

6. 登记费用信息

稿费的收款日期可登陆系统在相关栏目登记。

7. 查询文章被引情况

稿件发表后,您可以常浏览我刊网站,查看您的文章被引情况。

资本市场开放与企业国际化战略

代彬^{1,2}, 邓楠¹

(1. 四川外国语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重庆 400031; 2. 四川外国语大学国别经济与国际商务研究中心,重庆 400031)

摘要:以沪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资本市场开放对我国企业国际化战略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发现:资本市场开放对上市公司国际化范围、国际化速度、有规律国际化节奏存在正向影响。研究显示,国际化董事会显著调节了资本市场开放与企业国际化战略之间的关系;资本市场开放通过改善信息环境或者缓解融资约束的途径影响企业国际化战略,且这种作用机制在信息环境较差、融资约束较大的企业中更为显著。应坚持资本市场进一步开放,使得金融体系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

关键词:资本市场开放;国际化战略;国际化董事会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4970(2022)01-0075-08

近年来,新兴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程度扩大,中国也在逐步地推动资本市场开放。我国资本市场建立以来,对促进实体经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为进一步深化资本市场改革、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创造了良好基础和条件^[1]。为构建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实现资本市场更高水平的发展,我国证监会先后启动了合格境外投资者制度、“沪港通”等政策机制。与此同时,在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加速融合的进程中,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和存量截至2018年末已分别位居全球第二、第三位。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在“走出去”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跻身海外市场。国际化战略作为企业战略决策中的重要一环,是企业依据自身资源能力及外部环境做出的一种战

略选择。不同的国际化进程蕴涵异质的经营绩效或资源成本,资本市场开放作为提高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方式,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企业国际化战略,自然是一个有待回答的重要问题。

由于各国之间的制度环境、资本市场、金融开放等因素各不相同,国内外学术界对于资本市场开放的经济效应还未形成一致意见,但“沪港通”制度的实施为探讨资本市场开放与企业国际化战略的关系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准自然实验”场景。因此,笔者采用双重差分法(difference in difference, DID)实证检验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国际化战略的影响,克服了双向因果等内生性问题的困扰。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9BGL059);重庆市教委人文社科研究重点项目(21SKGH130);重庆市教委科学技术研究重点项目(KJZD-K202000902)

作者简介:代彬(1982—),男,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国际财务管理研究。E-mail:daibin@sisu.edu.cn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说

1. 文献综述

与本研究联系紧密的文献大致可分为关于资本市场开放经济后果的研究以及国际化战略的影响因素研究。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指出,经济金融发展能够改变一国的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一国资本市场自由化程度会给该国企业带来实质的经济利益^[2]。“沪港通”是我国开放背景下极具代表性的创新性制度,现有研究普遍认为“沪港通”机制的开启有助于改善公司信息环境^[3]、提升公司治理水平^[4]、增强股价对标的企业投资的引导作用^[5]、提升企业研发创新能力^[6-7]、抑制非效率投资^[8]。不过尚无文献关注“沪港通”制度对企业国际化战略这一重要决策的影响。有学者基于我国出口市场研究发现,“沪深港通”的实施显著促进了上市公司的出口倾向和出口规模,降低了其进入国际市场的生产率门槛^[9]。

企业国际化战略的相关研究可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国外学者基于发达国家跨国企业的国际化行为,逐步发展出了交易成本理论、国际生产折中理论、制度基础观等用以解释企业跨国经营等问题。国际化战略伴随着高风险和高收益,相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新兴市场企业的国际化仍处于后来者地位,面临更复杂易变的外部环境及内外部资源差异^[10],缺乏有效识别国际市场信息和机会的能力^[11]。为进一步探讨企业是如何进行国际化扩张这一动态过程的,Vermeulen等将企业国际化战略划分为3个维度,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企业国际化扩张过程,即国际化范围、国际化速度及国际化节奏^[12]。具体来说,基于交易成本理论,国际化范围的扩张意味着企业要将研发、营销等成本分摊到多个单位,要适应不同复杂市场的消费者偏好并调整多个海外子公司的组织架构。不仅如此,有限理性意味着企业决策是不完善的,快速国际化通常面临更大的风险^[13],企业想要克服贸易壁垒获取国际市场竞争优势,需要具备强大的风险管控能力。与此同时,国际化节奏要求企业同时把控多个市场的国际化经营幅度。面对潜在的国际化风险,企业需要大量收集、分析信息,应对各种问题或冲击,尽可能保证国际化扩张步伐契合国际市场发展趋势^[14]。有规律、持续性的国际化节奏促使企业保持稳定的扩张模式,有助于企业

吸收国际化经验、发挥学习效应调整“思维地图”,整合海外子公司不断适应国际环境^[15]。而不规律、间断性的国际化企业缺乏灵活的扩展吸收能力而局限在现有组织架构、系统文化和思维模式中。总的来说,既然企业的优势和国际化动因各异,那么以“沪港通”为代表的资本市场开放机制如何影响企业国际化战略呢?现有研究并不能得出准确答案,也尚无文献探讨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国际化战略尤其是对企业国际化范围、国际化速度与国际化节奏三动态维度的影响。

2. 资本市场开放与企业国际化战略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沪港通”实施后外资股东的进入能够强化企业国际竞争优势、分散国际经营风险、降低投融资成本,并通过以下途径来影响企业的国际化战略。

一方面,资本市场开放增加了企业获取稀缺资源、有效信息的可能性,企业更有能力实施国际化等价值创造活动。已有研究发现,新兴市场企业的国际化进程仍处于后来者地位^[16],国际市场的风险性和不确定性是阻碍这些企业国际化扩张的重要因素。资本市场开放使得资源资金更好地配置在生产经营活动中,交易成本降低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可投资公司的积极溢出效应,缓解了信息不对称^[17]。对于那些市场知识有限、资源资金缺乏的国际化企业来说,开放背景有助于企业更好地捕捉国际市场的高质量信息,整合东道国资源禀赋,通过有效信息和知识转移等途径创造竞争优势,在多个海外市场寻求新的发展机遇,即资本市场开放可能会正向影响企业国际化范围。不仅如此,更为透明的信息环境也有助于企业快速克服贸易壁垒和制度障碍,把握多个国际市场中的消费者需求,从而缓解国际化扩张中普遍存在的不确定性,帮助企业维持规律的国际化节奏。另一方面,资本市场开放有助于挤出部分信贷资金,增加企业融资渠道,增强企业国际多元化意愿^[18]。企业国际化进程具有周期长、范围广等特点,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和固定成本。而在我国,银行信贷、财政补贴通常向国有企业、国家战略行业倾斜^[19],民营企业 and 中小企业应对绿地投资或跨国并购后的运营管理、资源整合等问题能力不足,资金、管理等条件制约不仅阻碍着民营企业国际化的实施与推进,也极大限制了企业开展跨国活动的倾

向性。开放背景能为企业打开多元融资渠道,增强企业在金融市场的融资能力^[2]、促进研发投入^[20],为企业把握国际市场机会提供资源保障^[21-23],此时企业感知的国际化收益大于国际化风险,也就更倾向开展跨国经营活动。

综上所述,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国际化战略的影响是一个有待验证的话题。因此,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 H1: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国际化范围、国际化速度、有规律国际化节奏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3. 国际化董事会的调节作用

基于高阶梯队理论,现有文献普遍认为,管理层在战略决策时常受到个体视野及价值观认知的影响^[24]。金融开放背景下,越来越多具有先进治理理念、国际化视野的境外投资者进入上市公司。董事会的主要职责在于管理制定政策、为企业提供资源,具有国际化背景的董事常与外资股东具有纽带关系,受其委托而作为利益代表^[25]。据统计,2019 年 A 股上市公司中具有国际背景(海外工作、教育)的董事占比接近一半。考虑到我国具有典型的“人情社会”特征,文化价值观差异会导致管理层产生不同战略偏好,对决策质量产生异质影响。在探讨资本市场开放与企业国际化战略之间关系时,有必要探讨董事会结构的治理作用^[11]。相较于本土董事,国际经验丰富的董事地方关联少、学派关系浅,擅长利用先进的治理结构和基于专业的知识管理决策。具有国际背景的技术管理人员更善于应对不同的文化、制度和竞争环境,克服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心理距离”,做出卓越的战略决策表现^[26]。在此基础上,国内投资者普遍认为国际化董事释放了股价上涨的信号,更倾向于追随其进行投资决策。不仅如此,持全球化导向观点与开放态度的国际化董事具有多元文化视角和全球化的视野思维,在企业治理中表现出较强独立性,通过构建非正式网络、加强监督等行为促使企业在价值增长活动中充分识别、组织、解释和利用国际市场信息^[27],为国际化战略选择奠定基础。以上分析表明,国际化董事会可能在资本市场开放与企业国际化战略之间发挥显著的调节作用。综上,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 H2:国际化董事会能够正向调节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国际化范围、国际化速度、企业国际化节

奏的影响。

二、研究设计

1. 样本筛选与数据来源

选取 2010—2019 年的 A 股上市企业作为初始样本,通过万得、国泰安数据库手工搜集整理得到相关数据,并根据以下原则进行数据处理:剔除全部金融类、A+H 股及 ST、*ST 等样本;剔除 2014 年及之后上市、2014 年 11 月 17 日之后新增或调出的沪港通标的股;剔除主要财务指标缺失、海外销售收入和海外子公司不符合国际化定义及核心高管发生重大变更的样本;为排除异常值影响,对连续变量在前后 1% 的水平上缩尾处理。进一步地,通过采用 1:1 不允许重复抽样、卡尺值为 0.05 的 PSM 最近邻配对法构造处理组和控制组得到样本集。经上述处理,最终得到 3 998 个非平衡面板数据。

2. 模型设定

运用如下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基础回归分析:

$$scope = \alpha + \beta_0 did + \beta_1 treat + \beta_2 post + \sum control + firm_{FE} + year_{FE} + \varepsilon \quad (1)$$

$$speed = \alpha + \beta_0 did + \beta_1 treat + \beta_2 post + \sum control + firm_{FE} + year_{FE} + \varepsilon \quad (2)$$

$$rhythm = \alpha + \beta_0 did + \beta_1 treat + \beta_2 post + \sum control + firm_{FE} + year_{FE} + \varepsilon \quad (3)$$

其中

$$did = treat \times post$$

式中:scope、speed、rhythm 分别为被解释变量国际化范围、速度及节奏;did 为“沪港通”政策时间虚拟变量 post 与实验组虚拟变量 treat 的交互项,即为双重差分模型关注的核心解释变量,具体地,treat 为“沪港通”标的虚拟变量,若样本企业在 2014 年 11 月被纳入“沪港通”标的范围则 treat 取值为 1,否则为 0;post 为时间虚拟变量,“沪港通”启动时点及之后年度取值为 1,否则为 0;control 为一组控制变量,包括企业规模、企业年龄、董事会规模等;模型均控制了公司固定效应 firm_{FE} 和年度固定效应 year_{FE};α、β₀、β₁、β₂、ε 均为系数。若模型(1)(2)(3)中 did 系数 β₀ 为正,则表明“沪港通”机制能显著促进企业的国际化范围、国际化速度及不规律国际化节奏。

3. 变量说明

(1) 企业国际化战略

借鉴 Vermeulen 等^[12,28]的研究,将企业国际化

战略分为国际化范围、速度与节奏 3 个纬度:①国际化范围(scope):企业在 t 年成立海外子公司所跨越的国家或海外地区数目;②国际化速度(speed):企业海外销售收入的平均增长率;③国际化节奏(rhythm):企业海外销售收入平均增长率的变动情况。具体公式如下:

$$\ln(OI_t) = b_1 + b_2t + \sigma \tag{4}$$

式中:t 为时间;ln(OI_t) 为海外销售收入的自然对数;b₁、b₂为回归系数。采用 5 年内[t,t+4]二者回归系数 b₂的反自然对数来衡量企业的国际化速度,该值越大说明企业加速进行国际化战略。采用 b₂标准偏差的反自然对数来衡量企业的国际化节奏,该值越大说明企业倾向于不连贯的国际化节奏。

(2)其他变量

参考已有研究,国际化董事会(gb)以哑变量(gb1)和比例(gb2)衡量^[25]。此外,在控制变量中加入其他可能影响企业国际化战略的因素,变量的具体定义如表 1 所示。

三、实证结果分析

1. PSM 结果

考虑到“沪港通”机制作为政府主导的经济政策,其试点地区并非随机选择,在样本选取方面可能

存在选择偏差问题。参考现有文献和“沪港通”标的选样方法,本文整理出适当协变量对样本进行匹配,利用 logit 模型估计倾向得分,再进行政策效果分析。表 2 结果可知 PSM 配对效果良好。

2. 描述性统计

表 3 报告了主要变量的统计特征,结果可知各项变量均较为正常。多重共线性与相关性检验结果也显示,各变量间不存在明显共线性。

3. 基础回归结果

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国际化战略的实证结果如表 4 所示。首先,表 4 第 1 列中 did 的系数为 0.456,在 5% 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资本市场开放后引进外资确实能促使企业进入多个国际市场以把握机会,即资本市场开放正向影响企业国际化范围;其次,第 2 列中 did 的系数为 0.525,在 5% 的置信水平下正显著,说明随着资本市场进一步开放,企业通过加速国际化进程获取竞争优势,即资本市场开放正向影响企业国际化速度;最后,第 3 列中 did 的系数显著为-0.247,表明资本市场开放后企业更倾向于连贯、规律的国际化扩张模式,即资本市场开放正向影响企业有规律国际化节奏。综上所述,研究假说 H1 得到验证。

表 1 主要变量及定义

变量分类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说明
被解释变量	国际化范围	scope	企业当年拥有海外子企业所在国家或地区的数目
	国际化速度	speed	企业海外销售收入在一定时间内的平均增长率
	国际化节奏	rhythm	企业海外销售收入在一定时间内增长率的变动情况
解释变量	“沪港通”标的	treat	样本属于沪港通标的公司,则取值为 1,否则为 0
	“沪港通”时间	post	样本属于被调入沪股通标的当年及以后年份取值为 1,否则为 0
其他变量	是否存在国际化董事	gb1	存在外籍董事取 1,否则取 0
	国际化董事比例	gb2	外籍董事人数占董事会总人数的比重
	分析师跟踪	analyst	跟踪分析上市公司的分析师人数
	融资约束	ww	ww 指数衡量企业融资约束
	产权性质	soe	若为国有控股则取 1,否则取 0
	企业规模	size	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企业现金流量	cash	企业年末货币资金数量
	资产负债率	lev	负债总额与资产总额的比例
	董事会规模	bsize	董事会的总席位数
	成长机会	growth	主营业务收入较上年的增长率
	两职合一	dual	若 CEO 同时兼任董事长则取 1,否则取 0
	独董比例	ddz	董事会中独立董事占比
	股票换手率	turn	企业股票年均换手率
	经营活动现金流	cfota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与年末总资产的比值
	托宾 q 值	tobinq	企业的托宾 q 值
	行业与年份	Industry&Year	行业与年度虚拟变量

表 2 PSM 匹配结果

变量	单位	是否匹配	处理组均值	控制组均值	偏差	<i>t</i> -test	$p> t $
size		否	23.961	22.566	95.9	37.90	0
		是	23.892	23.897	-0.5	0.23	0.820
cash		否	21.958	20.554	90.0	16.15	0
		是	21.897	21.923	-1.3	0.73	0.465
lev	%	否	0.5082	0.5344	-12.1	-5.45	0.003
	%	是	0.5084	0.5091	-6.1	0.42	0.675
cfota	%	否	0.0674	0.0380	-6.2	-1.25	0.008
	%	是	0.0674	0.0699	1.7	0.21	0.294
turn		否	3.9150	4.2887	37.4	37.03	0
		是	3.8615	3.8589	-0.9	-0.31	0.758

注:只要 $P>0.05$ (或 $|t|<1.96$),就无法拒绝原假设,即可视为通过了平衡性检验。

表 3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scope	3998	2.101	0	0.995	0	4.934
speed	3998	1.158	1.000	0.646	1.003	7.702
rhythm	3998	1.055	1.074	0.344	0	2.112
gb1	3998	0.630	1.000	0.483	0	1.000
gb2	3998	0.096	0	0.124	0	0.889
analyst	3998	1.843	1.946	1.111	0	3.871
uw	3998	-1.028	-1.032	0.078	-1.341	-0.762
size	3998	22.747	22.658	1.438	16.520	28.947
lev	3998	0.531	0.530	0.211	0.073	0.986
cash	3998	20.677	20.651	1.497	16.380	24.882
turn	3998	1.172	1.215	0.808	-5.140	3.701
cfota	3998	0.045	0.046	0.093	-3.076	1.127

表 4 基础回归结果

变量	scope	speed	rhythm	scope	speed	rhythm	scope	speed	rhythm
did	0.456**	0.525**	-0.247**	0.497*	0.133***	-0.046***	0.169	0.122***	-0.029***
	(0.200)	(0.234)	(0.096)	(0.275)	(0.038)	(0.010)	(0.298)	(0.042)	(0.010)
gb1				0.548***	0.045*	-0.013			
				(0.173)	(0.024)	(0.008)			
gb1did				0.493*	0.099**	-0.031**			
				(0.294)	(0.041)	(0.012)			
gb2							4.222***	0.325**	-0.001
							(0.947)	(0.133)	(0.001)
gb2did							4.734***	0.281	-0.004**
							(1.343)	(0.191)	(0.002)
_cons	6.009	-7.467	-6.827***	-21.147***	-1.607*	-2.642***	-22.435**	-2.243*	-2.691***
	(3.909)	(4.928)	(2.389)	(7.012)	(0.873)	(0.715)	(9.051)	(1.154)	(0.766)
C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nds&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3998	3998	3998	3920	3920	3920	3920	3920	3920
R ²	0.279	0.065	0.086	0.093	0.018	0.088	0.122	0.022	0.079

注: * 表示 $p<0.1$, ** 表示 $p<0.05$, *** 表示 $p<0.01$; 括号内为系数估计值的标准误; C 为控制变量合集, Inds&Yes 为行业、年度固定效应。下同。

4. 调节效应分析

通过在基础回归模型中构建国际化董事会 (gb) 与“沪港通” (did) 的交互项进行调节效应分析, 结果如表 4 第 4~9 列所示。从国际化范围看,

第 4、第 7 列中 gb1did 和 gb2did 的系数均正向显著, 表明国际化董事会正向调节了资本市场开放与企业国际化范围的关系。从国际化节奏看, 第 6、第 9 列中 gb1did 和 gb2did 的系数均显著为负, 揭示国际化

董事会能削弱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国际化有规律节奏的正向关系。可能的解释是,国际化董事会倾向于认为市场动态变化需要企业保留较高的应对弹性,更愿意追求不规律的国际化节奏。从国际化速度看,第5列中 *gb1did*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而第8列中 *gb2did* 的系数虽为正但不显著,表明国际化董事会正向调节了资本市场开放与企业国际化速度的关系,但随着董事会国际化程度的增强,企业可能偏好于逐步减缓国际化速度,这与前文逻辑一致。综上,资本市场开放后持长期导向态度的国际化董事会能促使企业追求更大范围、更快速度及节奏不规律国际化带来的潜在收益,假设 H2 得到验证,同时也支持了多元化背景董事的咨询和管理效应。

5. 稳健性检验

稳健性检验如下:首先,利用匹配后样本进行平行趋势检验;其次,采用安慰剂检验,将“沪港通”实施时间分别向前、后平推1~2年;再次,考虑到可能的内生性问题,将国际化三纬度分别滞后1期、2期;最后,采用更换国际化战略衡量指标、剔除2014年和2016年样本、更换PSM匹配方法等进行稳健性检验。以上结果均显示研究结论是稳健的。

四、影响机制和异质性分析

1. 影响机制分析

由前文可知,资本市场开放加快了信息流通,企业能更好地挖掘及处理有关国际市场的信息,分析师预测准确性^[29]和股票知情交易水平提高,融资压力和资金缺口得以缓解,即信息环境、融资约束可能是资本市场开放影响企业国际化战略的重要渠道。

因此,以分析师跟踪(*analyst*)、融资约束(*ww*)作为中介变量进行中介效应分析。借鉴温忠麟等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30],首先,检验“沪港通”(*did*)对被解释变量企业国际化战略的回归系数,结果如表4第1、2、3列所示,均为显著;其次,以分析师跟踪数量(*analyst*)和融资约束(*ww*)为被解释变量、“沪港通”(*did*)为解释变量,检验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信息披露、融资约束水平的回归系数;最后,以国际化战略(*scope*、*speed*、*rhythm*)为被解释变量,将分析师跟踪(*analyst*)、融资约束(*ww*)纳入模型(1)(2)(3)中,检验中介效应是否存在。

具体结果见表5。从信息环境来看,第1列为中介效应检验的第二步,结果显示“沪港通”*did*系数为0.294且显著为正,说明“沪港通”开通后上市公司的分析师跟踪数量显著上升,为市场提供了更多准确有效的研究报告。第2、3、4列为第三步,“沪港通”*did*的系数和分析师跟踪(*analyst*)的系数均显著,说明资本市场开放确实会通过改善企业的信息质量影响国际化战略。从融资约束来看,第5列为中介效应检验的第二步中,“沪港通”*did*与融资约束(*ww*)显著负相关,表明“沪港通”开通后国际资本的流入为企业提供了更多融资机会,缓解了融资不足。第三步的列7、8、9中,“沪港通”*did*与融资约束(*ww*)的系数均显著,表明融资约束在“沪港通”影响企业国际化的过程中发挥了中介效应。

进一步地,以企业加入“沪港通”前一年的分析师跟踪数量、融资约束水平是否大于同年度行业中位数作为分组依据进行分组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沪港通”*did*对国际化范围(*scope*)的影响显著

表5 影响机制检验

变量	第二步				第三步			
	<i>analyst</i>	<i>scope</i>	<i>speed</i>	<i>rhythm</i>	<i>ww</i>	<i>scope</i>	<i>speed</i>	<i>rhythm</i>
<i>did</i>	0.294 *** (0.099)	0.677 * (0.398)	0.743 *** (0.252)	-0.314 * (0.179)	-0.011 *** (0.004)	0.187 ** (0.095)	0.130 ** (0.061)	-0.120 *** (0.042)
<i>analyst</i>		0.018 ** (0.008)	0.077 * (0.046)	-0.013 * (0.017)				
<i>ww</i>						-1.466 *** (0.505)	-0.437 * (0.260)	-0.602 ** (0.242)
<i>_cons</i>	-7.781 ** (3.585)	5.822 *** (4.767)	-3.920 (7.466)	-5.429 * (3.267)	0.536 *** (0.110)	-0.831 (0.537)	-7.916 ** (2.143)	0.268 (0.260)
<i>C</i>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Inds&Yes</i>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N</i>	3069	3069	3069	3069	3476	3476	3476	3476
<i>R²</i>	0.069	0.176	0.128	0.275	0.433	0.214	0.029	0.058

体现在原本信息质量较差(分析师人数较少)、融资约束较强的企业组别中,即资本市场开放会促使企业更多地利用提升信息披露水平、获取资本流入等途径开展国际化经营,这与前文逻辑较为一致。

2. 异质性分析

长期以来,我国金融政策给予了国有企业更多支持和照顾。为考察不同产权类型中“沪港通”对企业国际化战略的异质性影响,依据产权性质进行分组检验。结果如表 6 所示,第 5、6 列表明“沪港通”*did* 在民营企业组的作用效果更好。可能解释是,民营企业一般受国际市场的约束和壁垒相对更少,其国际化速度和节奏反应更为灵敏,能更为准确地把握资本市场开放后易于传递的“硬信息”。

竞争充分信息假说认为,市场竞争作为一种外部治理机制对企业战略决策至关重要。为考察不同竞争程度下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国际化战略的影响,采用收入熵指数(*EI*)来衡量企业所在行业的竞争程度并分组检验。结果如表 6 所示,“沪港通”*did* 对企业国际化范围的影响在低市场竞争行业中更明显。可能的解释是,高度竞争的市场使得企业之间的可替代性、流动性增强,经营风险增大。国际化活动具有不确定性,此时的管理层更倾向于控制风险、维持现状、审慎决策。而市场竞争较低时,管理层更能敏锐的捕捉信息,利用资本市场开放带来的红利,在保障自身比较优势和核心竞争力的同时实现优势共享。

五、结论与启示

要做到“以内促外,内外并举”,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竞争优势和投资潜力,离不开有效的资本市场支撑。资本市场开放是一国接轨国际、将国际资源“引进来”的重大举措,有助于缓解资源错

配、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改善金融“脱实向虚”^[24]。与此同时,鼓励企业“走出去”是我国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根本之道和重要选择。

基于这一背景,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沪港通”对企业国际化战略的影响。研究表明,资本市场开放能促进企业国际化范围的扩大、国际化速度的提高、国际化节奏的规律性。进一步研究发现,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国际化的影响受到国际化董事会的调节作用。资本市场开放主要通过改善信息环境、缓解融资约束来影响企业国际化战略,且这一作用机制主要体现在信息质量较差、融资约束较强的企业中。

本研究具有如下的政策启示:首先,研究表明“沪港通”显著影响了企业的国际化战略。当前国内供需环境与国际资本流动密不可分,政府应继续坚持资本市场的逐步开放,有序放松外资机构持股限制,让资本市场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其次,研究发现具有丰富国际化资源的董事会有助于企业提高国际化进程中的风险管控能力,这提示可通过合理吸纳国际化董事来改善企业决策质量。最后,研究揭示资本市场开放引入的境外投资者能发挥其比较优势,提升公司信息披露水平和信息获取等方面的能力。因此,政府当局应在推动资本市场逐步开放的同时加强对境外投资者的引导及监管,以更好地激发其公司治理功效。

参考文献:

[1] 王肇,宋磊. 资本市场更好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路径探索[J]. 理论探讨,2021(5):106-112.
[2] MITTON T. Stock market liberalization and operating performance at the firm level[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6,81(3):625-647.
[3] 陈运森,黄健峤. 股票市场开放与企业投资效率:基于

表 6 “沪港通”影响国际化范围的分组检验

变量	scope		scope		scope		scope	
	信息质量差	信息质量好	低融资约束	高融资约束	民营企业	国有企业	高竞争市场	低竞争市场
<i>did</i>	0.142 * (0.076)	0.037 (0.100)	-0.139 ** (0.068)	0.180 *** (0.055)	0.510 * (0.263)	0.332 (0.352)	1.026 (0.455)	0.067 ** (0.266)
<i>_cons</i>	-16.206 (13.317)	-12.217 (10.210)	-10.431 ** (2.241)	-3.851 ** (1.818)	-4.553 *** (0.748)	-4.400 *** (0.890)	1.407 *** (14.601)	7.851 *** (8.043)
<i>C</i>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Inds&Yes</i>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N</i>	2001	1053	1315	2155	2537.000	1444.000	1052.000	2873.000
<i>R²</i>	0.232	0.378	0.196	0.333	0.125	0.112	0.118	0.224

注:因篇幅限制,只报告了国际化范围的回归结果,国际化速度、国际化节奏结果均一致。

- “沪港通”的准自然实验[J]. 金融研究,2019(8):151-170.
- [4] 邹洋,张瑞君,孟庆斌,等. 资本市场开放能抑制上市公司违规吗?——来自“沪港通”的经验证据[J]. 中国软科学,2019(8):120-134.
- [5] 连立帅,朱松,陈超. 资本市场开放与股价对企业投资的引导作用:基于沪港通交易制度的经验证据[J]. 中国工业经济,2019(3):100-118.
- [6] 马妍妍,俞毛毛,程京京. 资本市场开放促进企业创新了么?——基于陆港通样本的微观证据[J]. 财经论丛,2019(8):39-52.
- [7] 朱琳,伊志宏. 资本市场对外开放能够促进企业创新吗?基于“沪港通”交易制度的经验证据[J]. 经济管理,2020(2):40-57.
- [8] 连立帅,朱松,陈关亭. 资本市场开放、非财务信息定价与企业投资——基于“沪深港通”交易制度的经验证据[J]. 管理世界,2019(8):136-154.
- [9] 杨晓亮,耿伟,李冬. 资本市场开放与中国上市公司出口边际——基于沪深港通交易制度实施的准自然实验[J]. 经济管理,2021(3):14-27.
- [10] LI P Y. Top management team characteristics and firm internationalization: the moderating role of the size of middle managers [J].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017,27(1):125-138.
- [11] 钟熙,宋铁波,陈伟宏,等. 促进抑或阻碍? 董事会资本对企业国际化战略的影响研究[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8,39(3):77-91.
- [12] VERMEULEN F, BARKEMA H. Pace, rhythm, and scope: process dependence in building a profitabl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02,23(7):637-653.
- [13] CHETTY S, JOHANSON M, MARTIN O. Speed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conceptualization, measurement and validation[J].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2014,4:633-650.
- [14] MOHR A, BATSAKIS G. Internationalization speed and firm performance: a study of the market-seeking expansion of retail MNEs [J].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Review, 2017,57(2):1-25.
- [15] WU H, CHEN J, JIAO H. Dynamic capabilities as a mediator linking international diversification and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firms in an emerging economy [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2016,69(8):2678-2686.
- [16] 陈伟宏,钟熙,蓝海林,等. 范围、速度与节奏——高管过度自信对国际化战略的影响[J]. 管理评论,2021(3):231-243.
- [17] WEN J, FENG G F, CHANG C P, et al. Stock liquidity and enterprise innovation: New evidence from China[J]. European Journal of Finance,2018,24(9):683-713.
- [18] DENG P, ZHANG S. Institutional quality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emerging market firms: focusing on Chinese SMEs[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2018,92(C):279-289.
- [19] LIN H, ZENG S, MA H, et al. Does commitment to environmental self-regulation matter? An empirical examination from China[J]. Management Decision,2015,5:932-956.
- [20] 王秀丽,齐荻. 资本市场开放提高企业投资效率了吗——基于“陆港通”的多期双重差分法实验证据[J]. 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18(6):92-106.
- [21] 陈运森,黄健峤,韩慧云. 股票市场开放提高现金股利水平了吗?——基于“沪港通”的准自然实验[J]. 会计研究,2019(3):55-62.
- [22] 钟覃琳,陆正飞. 资本市场开放能提高股价信息含量吗?——基于“沪港通”效应的实证检验[J]. 管理世界,2018(1):177-187.
- [23] APANARD P, WANVIMOL S.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and banking crises: a cross-country analysis [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Finance,2010,10(2):263-292.
- [24] GIANNETTI M, LIAO G, YU X. The brain gain of corporate boards: evidence from China [J]. Journal of Finance,2015,7:752-770.
- [25] 代彬,王敬远. 国际化董事会与企业金融化:“生搬硬套”还是“灵活处置”[J]. 金融经济研究,2021(3):124-141.
- [26] NIELSENA B B, NIELSENA S. The role of top management team international orientation in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decision-making: the choice of foreign entry mode[J]. Journal of Word Business,2011,46:185-193.
- [27] 杜兴强,谭雪. 国际化董事会、分析师关注与现金股利分配[J]. 金融研究,2017(8):192-205.
- [28] CHEN H, LI X, ZENG S. Does state capitalism matter in firm internationalization? Pace, rhythm, location choice, and product diversity[J]. Management Decision,2016,54(6):1320-1342.
- [29] GAO K J, LIN W F, YANG L. The impact of analyst coverage and stock price synchronicity: evidence from brokerage mergers and closures [J]. Finance Research Letters,2019,33(1):101-190.
- [30] 温忠麟,张雷,侯杰泰,等. 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及其应用[J]. 心理学报,2004(5):614-620.

(收稿日期:2021-09-05 编辑:张志琴)

数字经济与企业风险承担:管理自主权的调节效应

郭吉涛,姚佳成

(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管理学院,山东 济南 250353)

摘要:数字经济作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增长的核心动力,对微观企业投资决策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基于2011—2019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提升了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管理自主权在数字经济与企业风险承担关系中发挥了正向调节作用,其中组织自主权、特殊情境自主权会发挥正向调节作用,而环境自主权的调节作用不显著;数字经济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提升作用在新兴优势行业中更强。

关键词:数字经济;风险承担;管理自主权;新兴优势行业

中图分类号:F014.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4970(2022)01-0083-09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原有的“投资驱动发展模式”已难以适应现阶段的发展要求。《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0年)》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对GDP的增长贡献高达67.7%,俨然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在此背景下,我国政府高度重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提出要“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增强实体经济的经济活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赋能^[1]。企业作为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浪潮中受到了深远的影响。数字经济通过改善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降低高管决策非理性程度等途径^[2-4],丰富了企业的可支配资源,提升了管理层决策有效性。

其中,风险承担作为企业的一项重要决策,依赖于外部资源的有效供给和管理层的自主意愿。而较高的风险承担水平有助于企业实现价值增长、保持较高的整体增长率^[5],促进技术进步进而提高社会生产率^[6]。然而与发达国家相比,目前我国企业风险承担意愿仍不足^[7],这制约了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因此,探究数字经济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以改善企业风险承担不足的顽疾,对经济增速放缓的中国来说无疑是一剂良药。

完备市场理论认为,企业应投资所有净现值为正的项目,企业自身能力和管理层意愿无法影响企业决策^[8]。但现实中并不存在完备的市场条件,管理层出于个人利益考虑、受限于个人权力大小,可能放弃一些高风险但净现值为正的风险性项目,即企

基金项目:山东省重点研发计划(软科学项目)(2021RKY01003);山东省高等学校“青创科技计划”(2019RW3035)

作者简介:郭吉涛(1974—),男,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技术经济及管理研究。E-mail:guojitao-009@163.com

业风险承担水平会受管理层决策自由度等因素的影响。而管理自主权决定了管理层决策时拥有的可选方案和自由度,是联系外部环境与微观企业的一条纽带^[9],为研究数字经济时代下微观企业行为提供了新视角。拥有较高管理自主权的高管对企业决策更有话语权,其个人意愿更能体现在决策行为中。一方面,高管可运用数字技术带来的信息便利进行选择信息披露,利用信息优势规避监督,这鼓励了高管享乐主义和不作为行为;另一方面,高管更有能力克服组织惯性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集中企业资源承担高风险高收益项目。因此,管理自主权势必会在数字经济与企业风险承担关系中发挥作用,但发挥何种作用目前尚不明确。由此,探究数字经济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及管理自主权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具有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文献综述

学术界对企业风险承担的相关研究源于对企业家精神的探讨。Schumpeter 首次提出,企业家愿意承担风险去追求未来收益^[10]。但不同企业间风险偏好存在差异,风险承担水平衡量了企业为追求高收益而愿意承担的风险^[11]。学术界主要从以下 3 个方面来探究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因素。从政策层面来看,胡育蓉等研究发现紧缩的货币政策会显著降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12];张娆等则考察产业政策对企业风险承担影响的差异性,发现受产业政策支持行业内的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显著高于未受支持的企业^[13]。在企业层面,余明桂等分析产权性质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发现国有企业民营化会提高其风险承担水平^[14];包晓岚等研究发现,客户越集中越稳定,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就越高^[15]。在高管层面,何威风等基于委托代理理论,使用数据包络分析法衡量企业管理者能力,结果显示管理者能力越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越低^[16]。

上述研究丰富了企业风险承担影响因素的研究视角和理论依据,但少有学者从企业风险承担能力及意愿角度,进一步探究数字经济对企业风险承担的直接作用。目前学术界对数字经济发展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层面。温珺等实证研究发现数字经济会提升区域创新能力,且这种提升作用在东部地区最弱^[17];钟文等研究发现数字经济通过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这一重要机制,进而促进了我国区域协

调发展^[18];杨慧梅等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通过增加人力资本投资、优化产业结构两个途径提升了全要素生产率^[19];刘军等利用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发现智能化推动了经济增长,且这种推动作用在东部地区更强^[20]。同时,另有学者探究数字经济对微观企业的影响。如杜传忠等实证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呈倒 U 形^[21];陈晓红认为数字经济背景下数字技术的运用推动企业协同创新^[22];祁怀锦等发现,数字经济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和管理者决策行为的非理性程度提高了公司治理水平^[4]。

管理自主权正逐渐成为影响企业决策的重要情境因素^[23],决定了管理层决策时拥有的可选方案和自由度,势必会影响数字经济对企业风险承担决策的作用。一般而言,管理自主权低的高管会受到诸多限制,对企业决策的影响力会减弱,而管理自主权高的高管更有能力整合企业资源,进而显著影响企业决策^[24]。已有研究多关注管理自主权在微观企业层面发挥的作用,例如连燕玲等从组织、任务环境和制度层面来探讨管理自主权对经营期望与战略变革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25];杨林等将管理自主权划分为环境自主权、组织自主权、特殊情境自主权 3 个维度,剖析各维度对高管团队经验、动态能力与企业战略突变这一研究链条的调节作用机理^[23]。此外,少部分学者则关注管理自主权在宏观外部环境与微观企业关系中发挥何种作用,如张三保等研究发现,管理自主权在区域制度差异与企业风险承担框架中发挥了中介作用,且管理自主权越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越高^[26]。

纵观上述研究,学者们已注意到数字经济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技术创新、治理水平等方面产生的积极影响,这些因素可能改变企业风险承担能力及意愿,进而影响企业风险承担行为,然而鲜有学者直接探究数字经济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并将管理自主权引入数字经济与企业风险承担分析框架中。笔者将延续这一研究,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从企业风险承担角度进一步完善数字经济与微观企业间的研究链条,并探讨管理自主权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为数字经济的微观经济效应提供经验证据。

二、研究假设

1. 数字经济与企业风险承担

企业风险承担行为在决策中具体表现为承担高风险高收益项目^[27],这些项目具有启动成本高、持

续投入大、研发周期长等特征^[6],需要资金、技术和人才基础。企业拥有足够资源意味着企业有能提高风险承担水平,但是否选择高风险高收益项目还取决于管理层决策。数字经济一方面可改善外源融资环境和企业内部环境,提升企业风险承担能力;另一方面通过优化决策系统和强化监督力度两种方式提高管理层风险承担意愿,进而共同推动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提高。

首先,数字技术与传统金融行业的深度融合催生了数字金融新业态,实现了金融资源的“增量补充”和“存量优化”^[28]。传统金融市场上存在大量未被有效吸纳的个体投资者,而数字技术的运用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蚂蚁金服等金融创新不断涌现,有利于充分挖掘个体投资者的投资潜力,进而降低金融服务的门槛^[3],拓宽金融市场的资金来源,实现金融资源的“增量补充”。然而,金融机构与企业间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融资过程的关键还取决于金融机构能否准确评估企业信用。数字经济时代下,云计算、大数据和数据挖掘技术可实现不同金融主体间信息的快速匹配,对企业实行较为精确的风险评估^[29],准确对各企业进行信用评价,从而更好地为优质企业供给资金。同时,网络沟通平台增加了投资者和企业间的沟通途径,企业为了顺利融资也会主动披露项目相关情报。因此,数字经济与传统金融市场的融合降低了金融机构与企业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缓解了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28],有效提升了金融机构的借款意愿,实现了金融资源的“存量优化”。

其次,数字经济通过优化企业要素配置和提升技术能力两个途径提高了企业风险承担能力。一方面,数字技术将企业各流程解析重构,赋能企业提升效率。借助数字化技术,企业可立足消费者需求进行同质化解构、提升产品设计效率、制定差异化定价策略^[30]、推动财务流程再造和精细化管理,这改善了企业绩效,提高了企业抗风险能力,进而激发企业释放更多资源投入研究开发等风险活动。另一方面,数字技术打破了时间空间壁垒、丰富了就业选择,提升了市场上劳动要素的配置效率^[31]。各种数字平台能通过双向选择为企业的风险承担项目供给相应人才,更便捷、高效地满足企业的人才需求以支撑其风险承担行为。同时,信息资源的溢出效应会加速知识的扩散,并通过集成共享和创新协同效应推动企业自主创新,提高企业技术创新水平^[22],为

高风险项目的成功实施奠定了技术基础。

最后,数字经济通过科学决策与有效监督两个途径提高了管理层的风险承担意愿。管理层选择高风险高收益项目会面临失败后业绩不佳、行业内个人能力评价降低等风险。因此,管理层出于个人私利可能会放弃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这违背了企业价值最大化原则。传统的组织边界抑制了企业与外部的信息交流,而数字经济时代下,信息传递的载体演化为穿透组织边界快速传播的数据^[32]。数字技术的运用加快了数据的搜集、处理速度,这降低了管理层的信息搜寻成本,拓宽了信息获取的广度和深度,进一步优化了管理者的决策环境,降低了风险承担项目失败的可能性,缓解了高管与企业的利益冲突。当企业获取信息更便捷多元时,企业内部信息也更容易被外界识别。来自各领域的海量数据使得利益相关者在评价管理层绩效时不再仅仅简单依据财务报表,而是基于多维度的数据来评估。通过分析企业内部数据和第三方数据^[4],股东等利益相关者可以更全面地评估管理层绩效,这无疑会遏制管理层放弃高风险高收益项目的不作为行为,进而提升管理层风险承担意愿。

因此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H1: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

2. 管理自主权的调节效应

拥有较高管理自主权的管理者能显著影响企业决策,有助于其应对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外部环境变化。借鉴杨林等的研究结果^[23],从环境自主权、组织自主权、特殊情境自主权这3个维度来探讨管理自主权在数字经济和企业风险承担关系中发挥的调节作用。

环境自主权是指企业所处外部环境给予的管理层在决策时的行为自由度。其中,市场丰腴度作为决定企业环境自主权的关键因素^[33],会进一步影响企业提升风险承担水平的自由度和意愿,最终在数字经济与企业风险承担关系中发挥调节作用。数字技术的运用能帮助企业从市场中获取资源和发展机会^[25]。而市场丰腴度越高,企业外部环境资源就越丰富,这为企业选择高风险高收益项目提供了一种战略缓冲,鼓励了管理层的探索性行为,有助于企业运用数字技术从市场中获取更多的资源和发展机会,进一步增强了管理层的风险承担意愿,从而强化

了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风险承担的促进作用。因此,市场丰腴度会正向调节数字经济与企业风险承担的关系。

组织自主权是指组织结构、组织惯性等组织内部特质赋予的管理者在决策时的自由度。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高管组织层面的自主权,已有研究表明 CEO 兼任董事长会减少对高管的约束,提升高管决策自由度^[34]。因此,存在两职兼任现象企业的高管拥有较高的组织管理权,组织层面授予其更大的权限去整合组织可支配资源进行探索性行为,进而承担一些高风险项目。同时,两职兼任使管理者受董事会限制大大减少,更有能力克服组织惯性、打破对以往传统模式的依赖,推动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实现封闭式企业向开放式企业转变^[35],为数字经济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提供配套的组织环境保障。

企业产权性质等特殊情境^[36]会影响企业管理层决策过程中的自主权。鉴于国有经济占据着国民经济的主导地位,因此考虑产权性质主导下的特殊情境自主权对数字经济与企业风险承担关系的影响更具现实意义。国有企业高管多为政治任命,受政府约束较多,拥有的特殊情境自主权较低^[33],这会弱化数字经济对企业风险承担的促进作用。一方面,国有企业拥有政府隐性担保,更容易获得银行贷款、政府补贴和政策扶持^[13,37-38],拥有资金相对充足,这导致数字经济带来的资金增量对国有企业风险承担水平难以产生显著影响。另一方面,国有企业管理者在决策时需考虑保障地区就业、维护社会稳定等政治目标,更倾向于规避高风险高收益项目,在风险承担意愿上显著低于非国有企业管理者^[13]。这种维稳倾向使数字经济对高管风险承担意愿的促进作用在国有企业中无法充分发挥,因此数字经济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效果在非国有企业中更强。

综上所述,提出以下假设:

H2a:环境自主权会正向调节数字经济与企业风险承担关系。

H2b:组织自主权会正向调节数字经济与企业风险承担关系。

H2c:特殊情境自主权会正向调节数字经济与企业风险承担关系。

H2d:管理自主权会正向调节数字经济与企业风险承担关系。

三、研究设计

1. 数据来源

以 2011—2019 年中国沪深 A 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考察了各省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数字经济发展评价体系中数字金融指标采用了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其余 13 个指标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上市企业样本来源于 CSMAR 国泰安数据库,并进行如下筛选:①剔除金融行业;②剔除研究期间内,相关数据缺失的公司;③剔除 ST、PT 类公司;④为避免极端值的影响,对样本主要连续变量在 1% 以下和 99% 以上的数据进行了 Winsorize 处理,最终获得了 8506 个观测值的面板数据,使用 stata15.0 对数据进行分析。

2. 模型设定与变量定义

考虑到样本数据为静态面板数据,可采用固定效应、随机效应和混合 OLS 回归等方法进行实证分析。首先进行 LR 检验判明混合 OLS 回归和固定效应哪个回归效果更好。LR 检验显示 P 值显著为 0,因此拒绝原假设,固定效应比混合 OLS 回归更合适。接着进行豪斯曼检验检测随机效应和固定效应的回归效果,结果显示 P 值为 $0.0304 < 0.05$,因此拒绝原假设,即随机效应不合适,固定效应更好。

首先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建立固定效应模型如下:

$$RiskT = \alpha_0 + \alpha_1 Dige + \alpha_2 Control + u + \varepsilon \quad (1)$$

式中: $RiskT$ 为企业风险承担水平; $Dige$ 为各省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Control$ 为一系列控制变量; u 为行业固定效应; ε 为随机扰动项; α_0 为常数项; α_1 、 α_2 为相应回归系数。

被解释变量 $RiskT$ 为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已有文献测算企业风险承担的方法大致可以分为四类:业绩表现、政策行为、生存状况和态度指标^[39]。从业绩表现来测算相对全面和准确,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借鉴 John 等的做法^[5],用企业盈利波动来衡量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借鉴翟胜宝等的方法,在企业各盈利指标中选取总资产回报率 (Roa) 进行测算^[40],具体公式如下:

$$RiskT = \sqrt{\frac{1}{n-1} \sum_{i=0}^n (Adj_Roa - \frac{1}{n} \sum_{i=0}^n Adj_Roa)^2} \quad (2)$$

式中: Adj_Roa 为经行业调整后的 Roa , Roa 为息税前利润($EBITDA$)和当年末总资产的比值。

解释变量 $Dige$ 为各省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目前学术界对如何测算数字经济还未形成统一标准,因此学者们大多采用多级指标进行综合构建,例如张永恒等将数字经济分解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化应用、数字化发展潜力 3 个二级指标^[41];丛屹等以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业务规模、数字设备应用 3 个指标来测算不同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31]。因此在已有研究基础上,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化生产应用、数字化生活应用和数字化发展潜力 4 个方面来测算各省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构建了包含 14 个具体指标的评价体系,见表 1。评价体系确定后,以熵权法生成各指标权重,得到各省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数。

$Control$ 为一系列可能会影响企业风险承担的控制变量。借鉴文献[13,42-43],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有:①盈利能力 Roa ,用息税前利润与总资产的比值表示;②资产负债率 Lev ,用总负债与总资产的比值表示;③企业规模 $Size$,用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表示;④无形资产比率 IA ,用无形资产净额占总资产的比例表示;⑤股权集中度 $Ownership$,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表示;⑥企业资本性支出 Cap ,用企业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长期资产支付现金的自然对数表示;⑦董事会规模 $Bsize$,用董事会总人数的自然对数表示;⑧管理费用比率 MF ,用管理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例表示;⑨高管薪酬激励 $Compensation$,用高管薪酬水平的自然对数值表示;⑩高管股权激励 $Option$,用高管持股数与总股数的比值表示。省份

层面的控制变量:各省份经济发展水平 $PGDP$,用各省份生产总值的自然对数表示。

四、实证结果

1. 描述性统计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特征如表 2 所示。样本中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 0.071 5、0.000 5,最大值是最小值的 143 倍,这说明我国不同企业间的风险承担水平存在很大差异;均值和中位数分别为 0.007 3 和 0.004 7,中位数左偏,这说明样本中风险承担水平偏低的企业更多,还有较大提升空间。各省份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 32.244 2、9.625 1,说明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情况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

2. 数字经济与企业风险承担

数字经济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回归结果显示(限于篇幅表格省略),在添加控制变量且控制行业特征后,数字经济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回归系数在 1% 显著性水平上为正。由此可知,数字经济发展会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假设 H1 得到验证,同时也证实了前文分析的合理性,数字经济通过影响企业风险承担能力及意愿进而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

3. 管理自主权调节效应检验

(1) 环境自主权调节效应检验

市场丰腴度是决定企业环境自主权的关键因素。市场丰腴度高意味着企业可从外部市场获得更多的资源和发展机会,影响着管理者决策时拥有的自由度和可选范围。参考连燕玲等的研究思路^[25],用企业所处行业当年平均销售增长率 $Mgrow$ 衡量

表 1 数字经济发展评价体系

目标层	要素层	指标层	指标衡量方式	单位
数字 经济 发展 水平	发展潜力	直接收益	软件业务收入/各省份 GDP	%
		资金投入强度	研发内部经费支出中高科技产业占比	%
		劳动投入强度	研发人员全时当量中高科技产业占比	%
	生产应用	参与水平	有电商交易活动的企业占比	%
		经营效益	电子商务销售额/各省份 GDP	%
		生产投入	每百人使用计算机数	台
	生活应用	宽带生活	互联网宽带普及率	户/人
		网络生活	互联网普及率	%
		移动生活	移动电话普及率	部/百人
		互联网消费	快递收入/各省份 GDP	%
		数字金融	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基础设施	传输基础	光缆长度/人	km/万人
		承载能力	移动电话交换机容量/人	户/人
		人员配备	城镇单位就业人员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占比	%

表 2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数	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标准差	中位数	单位
<i>RiskT</i>	8 506	0. 007 3	0. 071 5	0. 000 5	0. 008 9	0. 004 7	
<i>Dige</i>	8 506	17. 934 3	32. 244 2	9. 625 1	5. 395 1	16. 666 1	
<i>Roa</i>	8 506	0. 011 2	0. 061 4	-0. 018 8	0. 012 5	0. 009 3	%
<i>Lev</i>	8 506	0. 416 9	0. 869 6	0. 052 6	0. 203 4	0. 403 7	%
<i>Size</i>	8 506	22. 166 2	25. 823 1	19. 950 4	1. 201 0	22. 023 0	
<i>IA</i>	8 506	0. 047 1	0. 292 8	0. 000 0	0. 047 2	0. 035 6	%
<i>Ownership</i>	8 506	35. 264 9	74. 820 0	10. 500 0	14. 292 8	33. 285 0	%
<i>Cap</i>	8 506	17. 911 3	22. 188 5	11. 068 8	2. 030 3	18. 133 5	
<i>Bsize</i>	8 506	2. 130 9	2. 639 1	1. 609 4	0. 193 5	2. 197 2	
<i>MF</i>	8 506	0. 103 0	0. 450 5	0. 008 9	0. 075 3	0. 087 0	%
<i>Compensation</i>	8 506	14. 291 6	16. 124 9	12. 765 7	0. 642 0	14. 261 2	
<i>Ooption</i>	8 506	0. 073 9	0. 611 8	0. 000 0	0. 141 6	0. 001 7	%
<i>PGDP</i>	8 506	10. 468 9	11. 404 3	8. 160 7	0. 655 5	10. 434 6	

企业所处市场的丰腴度,作为企业环境自主权的代理变量。将数字经济与市场丰腴度交互项加入模型中,构建模型:

$$RiskT = \beta_0 + \beta_1 Dige + \beta_2 Dige \times Mgrow + \beta_3 Mgrow + \beta_4 Control + u + \varepsilon \quad (3)$$

式中:*Mgrow* 为市场丰腴度; β_0 为常数项; β_1 β_2 β_3 、 β_4 为相应回归系数。回归结果如表 3 第 1 列所示,可知交互项 *Dige*×*Mgrow* 的回归系数不显著,即环境自主权调节效应不成立,假设 H2a 未得到验证。

(2) 组织自主权调节效应检验

借鉴温忠麟等的调节效应检验方法,当调节变量为类别变量、自变量为连续变量时,进行分组回归检验调节效应^[44]。用 *CEO* 两职兼任现象 (*Dual*) 衡量组织层面的自主权^[33]。存在两职兼任现象的企业 *Dual* 赋值为 0,反之则赋值为 1。表 3 第 2、3 列报告了分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在存在两职兼任现

象的企业中,数字经济对企业风险承担的促进作用在 1%上显著;而在不存在两职兼任现象的企业中,该促进作用在 5%上显著。两组样本中回归系数发生了变化,为了进一步检验组间系数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借鉴连玉君等的方法^[45],采用 SUEST 检验来判断,结果显示 $p=0. 020 7$,组间系数差异在 5%上显著。比较回归系数可知数字经济对企业风险承担的促进作用在存在两职兼任现象的企业中更强,即组织自主权会正向调节数字经济与企业风险承担的关系,假设 H2b 得到验证。

(3) 特殊情境自主权调节效应检验

鉴于产权性质是我国企业面临的重要特殊情境之一,用企业所有制性质衡量企业特殊情景下的自主权^[33],国有企业赋值为 0,非国有企业赋值为 1。根据产权性质不同进行分组回归,表 3 第 4、5 列报告了分组回归结果,由此可知数字经济对企业风险承担的

表 3 管理自主权调节效应检验

变量	1 全样本 <i>RiskT</i>	2 存在两职兼任 <i>RiskT</i>	3 不存在两职兼任 <i>RiskT</i>	4 国有企业 <i>RiskT</i>	5 非国有企业 <i>RiskT</i>	6 全样本 <i>RiskT</i>
<i>Dige</i>	0. 000 07 *** (3. 706 51)	0. 000 15 *** (3. 545 53)	0. 000 05 ** (2. 246 17)	0. 000 00 (0. 173 21)	0. 000 11 *** (4. 400 49)	0. 000 06 *** (3. 423 19)
<i>Dige</i> × <i>Manage</i>						0. 000 10 *** (4. 189 71)
<i>Dige</i> × <i>Mgrow</i>	0. 000 00 (0. 076 99)					
<i>Constant</i>	0. 024 21 *** (7. 245 24)	0. 020 41 *** (2. 728 84)	0. 024 62 *** (6. 779 42)	0. 024 34 *** (4. 442 03)	0. 028 36 *** (6. 065 32)	0. 025 08 *** (7. 506 75)
<i>Controls</i>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Industry</i>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Observations</i>	8 506	2 272	6 234	3 037	5 469	8 506
<i>R-squared</i>	0. 115 50	0. 117 00	0. 129 50	0. 128 30	0. 122 70	0. 117 90

注: 括号内为 *t* 值; *、**、*** 分别表示在 10%、5% 和 1% 水平下显著。下同。

促进作用在国企中不显著;而在非国企中,该促进作用在1%上显著。SUEST 检验显示 $p=0.0038$,组间系数差异在1%上显著。比较回归系数可知数字经济对企业风险承担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更强,即特殊情境自主权会正向调节数字经济与企业风险承担的关系,假设 H2c 得到验证。

(4) 总管理自主权调节效应检验

管理自主权的测算方法主要有使用代理变量和主观评价两种^[9]。前者将环境、组织、特殊情境等不同维度的自主权综合合成总的管理自主权指数;后者则通过对管理者进行问卷调查或专家评价等方式,直接测量其主观上拥有管理自主权的高低。借鉴连燕玲等^[25,46]的研究思路,将管理者拥有的环境自主权、组织自主权、特殊情境自主权3个单指标进行标准化后进行加总,得到综合的管理自主权指数(*Manage*)。考虑到两职兼任(*Dual*)取值与组织自主权存在负向关系,因此将 *Dual* 取相反数后再加总。*Manage* 取值越大,代表管理者拥有的管理自主权越高。将交互项 *Dige*×*Manage* 加入模型中以检验其调节效应,得到如下模型:

$$RiskT = \gamma_0 + \gamma_1 Dige + \gamma_2 Dige \times Manage + \gamma_3 Manage + \gamma_4 Control + u + \varepsilon \tag{4}$$

式中:*Manage* 为总管理自主权; γ_0 为常数项; γ_1 、 γ_2 、 γ_3 、 γ_4 为相应回归系数。表3第6列汇报了管理自主权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由表3可知,交互项 *Dige*×*Manage* 对 *RiksT* 的回归系数在1%显著性水平上为正,即管理自主权会正向调节数字经济与企业风险承担的关系,假设 H2d 得到验证。

4. 稳健性检验

目前学术界对如何测算数字经济指标并未达成一致,使用一种方式来测算数字经济指标可能导致结论不稳健,因此采用更换解释变量的方法来进行稳健性检验。数字经济发展伴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迭代升级,目前我国数字通信技术已从最初的2G跃升到5G,各省电信业务持续高速增长。因此借鉴张永恒等的研究结果^[41],使用各省份电信业务占GDP的比重作为数字经济的代理变量重新进行回归。回归结果显示(限于篇幅表格略去)与上文一致,证明了前文结论的稳健性。

5. 进一步分析

随着我国经济增速放缓,自主创新能力不强^[47]、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和产业结构失衡等长期性

问题逐渐凸显。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大力发展新兴优势行业,做到“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新兴优势行业作为政府关注的重点,承担着推动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任务,在发展模式、资源配置等方面显著区别于其他行业,数字经济是否对所有行业的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都会产生同等影响尚不可知。根据证监会行业分类,新兴优势行业包括医药制造和信息传输等10个行业,其余行业为非新兴优势行业,据此将样本分为两组进行分组回归。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不管是否为新兴优势行业,数字经济都提升了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然而比较回归系数发现,与非新兴优势行业相比,数字经济对新兴优势行业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的促进作用更强。考虑到新兴优势行业多为技术密集型行业,企业内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较完善,组织文化更开放包容,员工对数字技术的接受程度更高、学习能力更强,这强化了数字经济对其风险承担水平的促进作用。因此,数字经济发展更有利于新兴优势行业企业的长期价值增长,有助于实现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

表4 分组回归结果

变量	1	2
	新兴优势行业 <i>RiskT</i>	非新兴优势行业 <i>RiskT</i>
<i>Dige</i>	0.00008 *** (2.64719)	0.00007 *** (2.85222)
<i>Constant</i>	0.01813 *** (3.77627)	0.02491 *** (5.63932)
<i>Controls</i>	Yes	Yes
<i>Industry</i>	Yes	Yes
<i>Observations</i>	3516	4990
<i>R-squared</i>	0.09030	0.13560

五、结论与建议

以2011—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实证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会显著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数字经济通过改善外源融资环境、企业内部环境提高企业风险承担能力,并通过优化决策和强化监督力度来提升管理层风险承担意愿,共同推动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提高,且这种促进作用会受管理自主权的正向调节。分析管理自主权的各维度发现,组织自主权、特殊情境自主权会正向调节数字经济对企业风险承担的促进作用,而环境自主权在这一过程中调节效应不显

著。从组织自主权角度看,较高的组织自主权赋予了管理层组织层面更大的权力,管理者在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更有能力克服组织惯性,为数字经济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提供配套的组织环境保障,由此将风险承担意愿转化为风险承担行为,强化了数字经济对风险承担的促进作用。从特殊情境自主权角度看,国有企业高管在风险承担决策时具有维稳倾向,其风险承担意愿更低,因此数字经济对管理层风险承担的促进作用在国有企业中难以充分发挥。而非国有企业在金融市场中面临着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融资成本更高,因此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资金增量对非国有企业无疑是雪中送炭,而难以对国有企业风险承担决策产生较大影响。从环境自主权角度看,我国正处于产业结构调整 and 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产业融合加速,行业边界逐渐模糊,跨行业经营成为企业重要战略选择之一。企业跨界经营初期面临着极高的行业壁垒,需占用主行业部分资金来立足新市场,这种外部环境剧烈变化和“输血行为”可能导致企业无法充分发挥行业内资源协调能力,进而导致市场丰腴度对这一过程的调节作用不显著。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发现,与非新兴优势行业企业相比,数字经济对新兴优势行业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的促进作用更强,这说明数字经济的发展更有利于新兴优势行业企业的长期价值增长,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基于以上结论,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夯实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政府应加大对数字经济发展的财政支持力度,投入建设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中心和 5G 等新型公共数字基础设施,夯实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外部技术根基,盘活全国一盘棋。活用税收减免、财政补贴等优惠政策打消企业的后顾之忧,扶持部分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通过典型示范作用引导其他企业积极进行数字化转型以实现产业数字化,助力企业改善风险承担不足的顽疾,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一剂良药。

第二,优化企业内部结构,注重管理层多元化能力建设。在融资渠道层面,活用数字金融等新渠道缓解融资约束,提升自身的融资能力;管理层应活用云计算、大数据等数字技术优化自身决策环境以实现科学决策;股东等利益相关者应运用数字技术降低与管理者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提升内部监督机制

的效率。同时,考虑到管理自主权对这一进程的正向调节作用,应优化组织结构给管理者适度“松绑”,以提升其决策影响力,鼓励高管整合企业资源破除组织惯性在组织内部推行数字技术,为企业数字化转型营造良好的内部环境。

第三,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国有企业高管绩效评价方式,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进程。一方面,鉴于国有企业高管激励不足导致数字经济对企业风险承担的促进作用无法充分发挥,政府应对国有企业管理层的任命、激励等制度重新进行顶层设计,实行政治目标和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的双重绩效考核,鼓励管理者积极参与市场竞争,让国有企业在数字经济时代重新迸发经济活力;另一方面,积极搭建数字平台等市场沟通渠道,提高市场上企业信息披露质量,鼓励投资者“用脚投票”,进一步推动新兴优势行业的长期价值增长,压缩富裕产能行业的生存空间,缓解其对新兴优势行业的资源挤占效应,推动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

参考文献:

- [1] 赵涛,张智,梁上坤. 数字经济、创业活跃度与高质量发展——来自中国城市的经验证据[J]. 管理世界,2020 (10):65-76.
- [2] 黄群慧,余泳泽,张松林. 互联网发展与制造业生产率提升:内在机制与中国经验[J]. 中国工业经济,2019 (8):5-23.
- [3] 万佳彧,周勤,肖义. 数字金融、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J]. 经济评论,2020(1):71-83.
- [4] 祁怀锦,曹修琴,刘艳霞. 数字经济对公司治理的影响——基于信息不对称和管理者非理性行为视角[J]. 改革,2020(4):50-64.
- [5] JOHN K , LITOV L , YEUNG B .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risk-taking [J]. The Journal of Finance , 2008 , 63 (4) : 1679-1728 .
- [6] 李文贵,余明桂. 所有权性质、市场化进程与企业风险承担[J]. 中国工业经济,2012(12):115-127.
- [7] 张洪辉,章琳一. 产权差异、晋升激励与企业风险承担[J]. 经济管理,2016,38(5):110-121.
- [8] 周晨,田昆儒. 债务契约与企业风险承担:影响效果及机制检验[J]. 财经理论与实践,2021,42(2):73-81.
- [9] 张三保,张志学. 管理自主权:融会中国与西方、连接宏观与微观[J]. 管理世界,2014(3):102-118.
- [10] SCHUMPETER J A .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 inquiry into profits, capital, interest and the business cycle [J].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 Publishing,1934,25(1): 90-91.
- [11] LUMPKIN G T,DESS G G. Clarifying the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construct and linking it to performance[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96,21(1):135-172.
- [12] 胡育蓉,朱恩涛,龚金泉. 货币政策立场如何影响企业风险承担——传导机制与实证检验[J]. 经济科学,2014(1):39-55.
- [13] 张尧,路继业,姬东骅. 产业政策能否促进企业风险承担? [J]. 会计研究,2019(7):3-11.
- [14] 余明桂,李文贵,潘红波. 民营化、产权保护与企业风险承担[J]. 经济研究,2013,48(9):112-124.
- [15] 包晓岚,宋明亮,李思呈. 客户关系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J]. 科学决策,2020(8):44-66.
- [16] 何威风,刘巍,黄凯莉. 管理者能力与企业风险承担[J]. 中国软科学,2016(5):107-118.
- [17] 温琨,阎志军,程愚. 数字经济与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J]. 经济问题探索,2019(11):112-124.
- [18] 钟文,郑明贵. 数字经济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J].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38(4):79-87.
- [19] 杨慧梅,江璐. 数字经济、空间效应与全要素生产率[J]. 统计研究,2021,38(4):3-15.
- [20] 刘军,史梦雪,招玉辉. 智能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J].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23(4):44-50.
- [21] 杜传忠,张远. 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机制研究[J]. 证券市场导报,2021(2):41-51.
- [22] 陈晓红. 数字经济时代的技术融合与应用创新趋势分析[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4(5):1-8.
- [23] 杨林,和欣,顾红芳. 高管团队经验、动态能力与企业战略突变:管理自主权的调节效应[J]. 管理世界,2020,36(6):168-188.
- [24] 杨林,顾红芳,李书亮. 高管团队经验与企业跨界成长战略:管理自主权的调节效应[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8,39(9):101-119.
- [25] 连燕玲,周兵,贺小刚,等. 经营期望、管理自主权与战略变革[J]. 经济研究,2015,50(8):31-44.
- [26] 张三保,张志学. 区域制度差异,CEO 管理自主权与企业风险承担——中国 30 省高技术产业的证据[J]. 管理世界,2012(4):101-114.
- [27] AMIHUD Y, LEV B. Risk reduction as a managerial motive for conglomerate mergers[J]. The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1981,12(2):605-617.
- [28] 唐松,伍旭川,祝佳. 数字金融与企业技术创新——结构特征、机制识别与金融监管下的效应差异[J]. 管理世界,2020(5):52-66.
- [29] 黄浩. 数字金融生态系统的形成与挑战——来自中国的经验[J]. 经济学家,2018(4):80-85.
- [30] 魏泽龙,谢排科,张琳倩. 创新扩散视角下数字化创新特征对市场绩效的影响研究[J]. 科学与管理,2020,40(2):1-9.
- [31] 丛屹,俞伯阳. 数字经济对中国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J]. 财经理论与实践,2020,41(2):108-114.
- [32] 戚聿东,肖旭. 数字经济时代的企业管理变革[J]. 管理世界,2020(6):135-152.
- [33] JIATAO L I , TANG R. CEO hubris and firm risk-taking in China: the moderating role of managerial discretion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10,53(1):45-68 .
- [34] CRAI G, CROSSLAN D, DONAL D, et al. How national systems differ in their constraints on corporate executives: a study of CEO effects in three countries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07(28):767-789.
- [35] 李小忠. 数字经济发展与企业价值提升——基于生命周期理论的视角[J]. 经济问题,2021(3):116-121.
- [36] FINKELSTEIN S, HAMBRICK D C, CANNELLA B. Strategic leadership: theory and research on executives, top management teams, and board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
- [37] 余明桂,潘红波. 政治关系、制度环境与民营企业银行贷款[J]. 管理世界,2008(8):9-21.
- [38] 孔东民,刘莎莎,王亚男. 市场竞争、产权与政府补贴[J]. 经济研究,2013,48(2):55-67.
- [39] 王菁华,茅宁. 企业风险承担研究述评及展望[J]. 外国经济与管理,2015,37(12):44-58.
- [40] 翟胜宝,张胜,谢露,等. 银行关联与企业风险——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管理世界,2014(4):53-59.
- [41] 张永恒,王家庭. 数字经济发展是否降低了中国要素错配水平? [J]. 统计与信息论坛,2020,35(9):62-71.
- [42] 赖黎,唐芸茜,夏晓兰,等.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降低了企业风险吗? ——基于短贷长投和信贷获取的视角[J]. 管理世界,2019(10):160-171.
- [43] 张敏,童丽静,许浩然. 社会网络与企业风险承担——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管理世界,2015(11):161-175.
- [44] 温忠麟,侯杰泰,张雷. 调节效应与中介效应的比较和应用[J]. 心理学报,2005(2):268-274.
- [45] 连玉君,廖俊平. 如何检验分组回归后的组间系数差异? [J].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17,35(6):97-109.
- [46] 董静,邓浩然. 董事长军旅背景、管理自主权与战略变革——来自 A 股上市公司的证据[J]. 管理工程学报,2021,35(4):29-39.
- [47] 黄德春,苗艺锦. 创新驱动下环境规制与长江经济带制造业转型关系研究[J]. 水利经济,2021,39(1):1-5.

(收稿日期:2021-07-27 编辑:张志琴)

防御与促进:人际和谐在员工建言行为中的作用

刘小娟¹,王国锋²

(1.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上海 201620;2. 电子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四川 成都 611731)

摘要:建言作为一种重要的组织公民行为受到很多组织管理学者的关注,然而基于恐惧和顺从的建言动机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基于个体动机视角,研究不仅关注亲社会型建言,也关注防御型建言和默认型建言等行为,考察防御定向和促进定向对员工建言行为的影响机制,探讨人际和谐的中介作用以及心理安全感的调节作用。对 17 家民营企业 550 个员工的实证研究表明:人际和谐在调节定向与建言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即其中的避免破裂维度中介防御定向与防御型建言、默认型建言之间的关系,而促进和谐维度中介促进定向与亲社会型建言之间的关系;心理安全感负向调节避免破裂与防御型建言、默认型建言的关系。

关键词:建言行为;调节定向;人际和谐;个体动机;心理安全感

中图分类号:C93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4970(2022)01-0092-08

先前,建言往往被看作是一种积极的、具有挑战性的组织公民行为^[1-3],直到 Dyne 等基于动机将建言分为了亲社会型、防御型和默认型三类^[4]。亲社会型建言基于协作动机,出发点是使他人或组织受益,具有积极性和挑战性特征;防御型建言源于恐惧动机,目的是自我保护,不再具有挑战性;默认型建言基于顺从动机,被动地与他人保持一致,不再具有挑战性和积极性,属于低效能的意见表达。现有研究多关注亲社会型建言,而对防御型建言和默认型建言的形成机制关注不够。对建言行为前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个性特质^[3,5-6]、领导行为^[7-8]、团队氛围^[9-10]和组织情境^[11-12]等方面,而少有从个体动机角度进行解释。

调节定向理论认为,不同的个体追求快乐、回避痛苦的方式是不同的,存在着促进定向和防御定向两类基本动机^[13]。促进定向个体更关注从无收益到有收益的变化过程,对有无收益更加敏感;而防御定向个体更关注从有损失到无损失的变化过程,对有无损失更加敏感^[14]。作为一种普遍的动机原则,调节定向影响着人们的认知评价、决策判断和行为策略等基本心理过程。建言行为既存在风险,也存在收益,因此,个体对风险和收益的感知和偏好,将影响着建言是否发生以及发生建言的类型。可以推断,调节定向对个体建言行为产生很强的预测作用。现有文献对调节定向影响建言行为的机制研究还需更多探讨。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20YJA63006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72172024)

作者简介:刘小娟(1975—),女,讲师,博士,主要从事跨文化管理、组织行为研究。E-mail:231325539@qq.com

Vallerand 将动机自上而下分为整体、环境、情景 3 个层次,它们自上而下逐级产生影响,且整体动机通常不会直接影响情景动机^[15]。本文借助动机层次理论为视角,笔者提出调节定向通过人际和谐影响员工建言行为,且心理安全感会调节人际和谐与建言行为的关系。笔者旨在系统探讨在中国文化情境下调节定向、人际和谐与建言行为之间的关系,结合动机层次理论分析调节定向对员工建言行为的具体影响机制。

一、理论与假设提出

1. 人际和谐在调节定向与建言行为间的中介作用

调节定向理论将个体自我调节的动机分为促进定向和防御定向两类^[13],促进定向个体更关注的是如何从现状“0”转变为更好的状态“+1”;防御定向个体更加关注如何保持(或恢复)令人满意的现状“0”而不是更糟糕的状态“-1”^[16]。当前组织行为领域对调节定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员工绩效^[17]、组织承诺^[18]、工作积极性^[19]、创造力^[20]等方面,将建言行为与调节定向结合起来的研究较少,而且对调节定向如何影响建言行为的机制研究少有涉及。

人际和谐是东南亚国家社会交往和互动中遵循的最基本的原则,和谐思想对中国人际交往的影响非常深刻。Leung 将人际和谐分为促进和谐和避免破裂^[21]。促进和谐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所倡导的和谐思想更为接近,将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视为重要目标,聚焦于人际关系带来的积极结果,反映了个体对真正和谐的认同和追求。避免破裂与自我保护、避免冲突更相关,将人际关系作为维护自身利益的一种手段,更加关注紧张人际关系带来的消极后果^[22]。

Vallerand 将动机自上而下分为整体、环境、情景 3 个层次^[15],逐级产生影响。整体动机指个体与外部环境互动的一般动机取向,相对稳定和持久,体现为人格特质,调节定向属于整体动机^[23]。环境动机指个体在某一活动领域中的动机取向,比如教育、人际关系、休闲领域。在人际关系领域的人际和谐动机可以归属于环境动机^[24]。情景动机指个体在某一情景中具体的动机状态。在具体建言情景中,亲社会型建言基于协作动机,防御型建言基于恐惧动机,默认型建言基于顺从动机^[4]。因此,调节定向、人际和谐、建言动机 3 个层次的动机自上而下逐级影响,即调节定向影响人际和谐,人际和谐影响建

言动机。各层面的动机都会产生相应的层面结果^[15],建言行为是建言动机的产出结果。人际和谐会中介调节定向与建言行为之间的关系。

防御定向个体有明显的保守倾向,宁愿放弃重大收益,也要避免损失,偏好采用警惕策略。对消极结果更敏感,更在意行为后果是否有损失^[25]。防御定向作为整体动机,会影响环境动机。因此,在人际互动环境中,防御定向个体会产生避免破裂的动机,将人际关系作为维护自身利益的一种手段,与人交流更谨慎,表现出更多防卫和退避^[26]。

避免破裂个体在人际关系中表现出的谨慎、防卫和退避,本质上来说,是出于自我保护和避免冲突。防御型建言基于恐惧动机,出于自我保护目的;默认型建言基于顺从动机,为了避免冲突。恐惧动机、顺从动机都属于情景动机。避免破裂影响恐惧动机和顺从动机。而防御型建言、默认型建言分别是建言情景中恐惧动机、顺从动机的结果。因此,根据 Vallerand 动机层次理论以及上述分析^[15],提出如下假设:

H1:避免破裂在防御定向和防御型建言中起中介作用,也即防御定向通过避免破裂影响防御型建言。

H2:避免破裂在防御定向和默认型建言中起中介作用,也即防御定向通过避免破裂影响默认型建言。

促进定向个体有明显的冒险偏好,会更在乎行为结果是否有收益^[25]。人际互动中,为了获得持续的收益,促进定向个体会积极建立长期良好的人际关系。这正是 Leung 提出的促进和谐的内涵,反映了个体对真正和谐的认同和追求^[21]。促进和谐个体追求真正意义上的和谐,在碰到冲突的时候,不会刻意回避,会更积极与人真诚交流^[26],多体现双赢的处理方式^[27]。因此,亲社会型建言是基于协作的动机,其出发点是使他人或组织受益。根据 Vallerand 动机层次理论^[15],提出如下假设:

H3:促进和谐在促进定向和亲社会型建言中起中介作用,也即促进定向通过促进和谐影响亲社会型建言。

2. 心理安全感的调节作用

心理安全感指员工在工作中能够自由地表现自我,而不担心对自我形象、地位、职业造成负面影响的心理感知^[28]。避免破裂作为环境动机对情景层

面的建言动机会产生影响,进而正向影响防御型建言和默认型建言。当避免破裂个体心理安全感较高时,会感知到较低的人际风险,降低个体恐惧动机和顺从动机,减少防御型建言和默认型建言。因此,根据以上分析,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4:心理安全感负向调节避免破裂与防御型建言之间的关系,即心理安全感越低,避免破裂与防御型建言之间的正向关系会更强。

H5:心理安全感负向调节避免破裂与默认型建言之间的关系,即心理安全感越低,避免破裂与默认型建言之间的正向关系会更强。

促进和谐作为环境动机也会对情景层面的建言动机产生影响,进而正向影响亲社会型建言。亲社会型建言属于积极的挑战性行为,建言内容包括:提出对组织有利的建设性意见、对组织存在问题提出合理建言,以及对企业有利但上级反对的事情,也会努力去说服上级^[4]。亲社会型建言面临较高的人际风险。高心理安全感的促进定向个体,会感知到较低的人际风险,从而产生更多的亲社会型建言。众多学者研究表明,个体心理安全感正向影响员工建言行为^[29-30]。这些学者采用的建言构念都属于角色外行为,与亲社会型建言内涵一致。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6:心理安全感正向调节促进和谐与亲社会型建言之间的关系,即心理安全感越高,促进和谐与亲社会型建言之间的正向关系会更强。

基于上述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提出整合性研究模型,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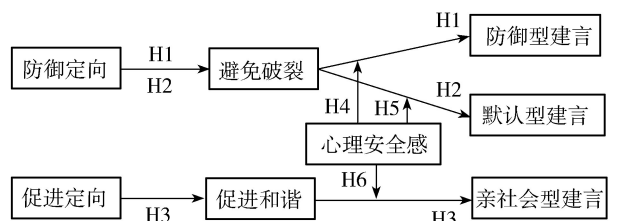


图1 整合性研究模型

二、研究方法 及 研究设计

1. 样本及数据收集

样本来自浙江、江苏、上海、重庆、广东、福建6省市共17家民营制造业的员工,通过被调查企业的26名协调人(高层管理人员或部门经理)进行问卷发放和回收。调查对象都属于这26名协调人管辖

的范围。问卷调查分两次进行,时间间隔2周。第1次调查自变量、中介变量、调节变量和被试者基本信息;第2次调查因变量。第1次调查共发出问卷550份,收回531份,剔除无效问卷后剩余427份,有效问卷回收率80.41%。第2次向相同的调查对象共发出问卷550份,收回490份,剔除无效问卷后剩余405份,有效问卷回收率82.65%。有效问卷中,对两次调查均有填写的员工进行匹配,共匹配成功329份。

2. 变量测量

本研究涉及的变量均采用在中国文化情境下经过验证的测量量表,量表采用Likert 5点计分法,由1~5表示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

调节定向采用Neubert等开发工作调节定向问卷(WRF)^[17],测量促进定向、防御定向均为9个题项,典型条目如“为了获得成功,我不惜在工作中冒风险”“我致力于准确地完成所承担的工作任务,以增强工作安全感”。研究中促进定向、防御定向分量表的α分别为0.747、0.820。

人际和谐采用Leung开发的人际和谐量表^[27]。测量促进和谐的有13个题项,典型条目如“懂得与人和谐共处才能成大事”;测量避免破裂的共有8个题项,典型条目如“为了保持和谐,可能要放弃办事的公平原则”。避免破裂、促进和谐分量表的α分别为0.842、0.899。

员工建言行为采用Dyne等提出的建言和沉默行为的量表^[4],亲社会型建言、防御型建言、默认型建言各5题,典型条目如“只要对企业有利,我会大胆地表达自己的建议”“为了保护自己,我会和上级保持一致”“对于与我职责无关的事情,我一般会附和上级的观点”。默认型建言、防御型建言、亲社会型建言分量表的α分别为0.821、0.837、0.867。

心理安全感采用李宁等提出的心理安全感问卷^[31]。包括5个题项,第1个题项正向记分,“我在工作中,不需要总是小心翼翼”;其他4个题项反向记分,比如“在我的工作环境中,总是有些人在我的背后搞鬼,让我在工作上的努力白费”。该量表的α为0.802。

控制变量。性别、年龄、学历、组织任期^[32]等变量可能影响员工建言行为,本文将上述变量作为控制变量。控制变量测量尺度:性别(1=男性、2=女性),年龄(1=25岁及以下、2=26~35岁、3=36~45岁、4=46~55岁、5=55岁及以上),学历(1=高

中及以下、2=大学专科、3=大学本科、4=硕士研究生、5=博士研究生),在本单位累计工作时间(1=2年及以下、2=3~6年、3=7~10年、4=10年以上)。

三、数据分析与结果

1. 变量区分效度及同源方差检验

使用 Mplus 7. 0 对变量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假设模型(八因子模型)拟合效果良好(卡方 $\chi^2=852.688$, 自由度 $df=436$, 卡方自由度比 $\chi^2/df=1.956$, 近似误差均方根 $RMSEA=0.054$, 标准化均方根误差 $SRMR=0.056$, 比较拟合指数 $CFI=0.915$, Tucker-Lewis 指数 $TLI=0.903$), 说明假设模型可以接受。同时, 假设模型拟合优于其他嵌套模型的拟合效果(七因素模型-单因素模型), 说明本研究的八个变量之间有较好的区分效度。

2. 变量描述性统计

表 1 给出了各研究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促进定向与防御型建言(相关系数 $r=0.165$, $p<0.01$)、与默认型建言($r=0.145$, $p<0.01$)、与亲社会型建言($r=0.152$, $p<0.01$)正相关, 防御定向与避免破裂($r=0.254$, $p<0.01$)正相关, 避免破裂与防御型建言($r=0.267$, $p<0.01$)、与默认型建言($r=0.248$, $p<0.01$)正相关, 促进定向与促进和谐($r=0.165$, $p<0.01$)正相关, 促进和谐与亲社会型建言($r=0.395$, $p<0.01$)正相关, 心理安全感与防御型建言($r=-0.302$, $p<0.01$)、与默认型建言($r=-0.263$, $p<0.01$)负相关。

3. 中介效应检验

由表 2 可知, 防御定向显著预测避免破裂($B=0.468$, $p<0.001$), 防御定向、避免破裂同时进入回

归方程(模型 2), 防御定向不能显著预测防御型建言($B=-0.145$, $p>0.05$), 避免破裂显著预测防御型建言($B=0.265$, $p<0.001$)。因此, 避免破裂在防御定向和防御型建言之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 H1 得到了验证。防御定向、避免破裂同时进入回归方程(模型 3), 防御定向不能显著预测默认型建言($B=-0.173$, $p>0.05$), 避免破裂显著预测默认型建言($B=0.245$, $p<0.001$)。因此, 避免破裂在防御定向和默认型建言之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 H2 得到验证。

从表 2 的 Bootstrap 方法检验结果看, 防御定向对防御型建言的间接正向影响显著($B=0.124$, $SE=0.040$; 95% 的置信区间为 $[0.060, 0.216]$, 不含零), 即避免破裂中介了防御定向与防御型建言之间的关系, 进一步支持了 H1。防御定向对默认型建言的间接正向影响显著($B=0.115$, $SE=0.037$; 95% 的置信区间为 $[0.054, 0.202]$, 不含零), 即避免破裂中介了防御定向与默认型建言之间的关系, H2 也得到了进一步支持。

从表 3 的回归分析结果看, 促进定向显著预测促进和谐($B=0.321$, $p<0.01$)(模型 4), 促进定向、促进和谐同时进入回归方程(模型 5), 促进定向显著预测亲社会型建言($B=0.158$, $p<0.05$), 促进和谐显著预测亲社会型建言($B=0.276$, $p<0.001$), 因此, 促进和谐在促进定向和亲社会型建言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H3 得到验证。

从表 3 中 Bootstrap 方法检验结果看, 促进定向对亲社会型建言的间接正向影响显著($B=0.089$, $SE=0.028$; 95% 的置信区间为 $[0.039, 0.147]$, 不含零), 即促进和谐中介了促进定向与亲社会型建言之间的关系, 进一步支持了 H3。

表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	平均值 <i>M</i>	标准差 <i>SD</i>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性别	1.149	.357	1											
2 年龄	2.116	.689	-.021	1										
3 教育程度	2.131	.840	.037	-.321 **	1									
4 工作时间	2.842	1.390	.035	.513 **	-.118 *	1								
5 防御定向	4.419	.480	-.034	-.085	.002	-.001	(.820)							
6 促进定向	3.267	.524	-.108 *	-.167 **	.262 **	-.084	.206 **	(.747)						
7 避免破裂	3.124	.843	.053	.067	.002	.014	.254 **	.196 **	(.842)					
8 促进和谐	3.890	.768	-.022	.136 *	-.101	.087	.437 **	.165 **	.497 **	(.899)				
9 默认型建言	2.710	.761	.050	.096	-.024	.105	-.043	.145 **	.248 **	.108	(.821)			
10 防御型建言	2.663	.772	.005	.049	-.004	.028	-.017	.165 **	.267 **	.133 *	.721 **	(.837)		
11 亲社会建言	4.047	.617	-.146 **	.158 **	-.175 **	.096	.325 **	.152 **	.124 *	.395 **	-.059	-.067	(.867)	
12 心理安全感	3.769	.911	-.011	-.021	.095	.041	.182 **	-.079	-.114 *	-.022	-.263 **	-.302 **	.083	(.802)

注: $N=329$, * $p<0.05$, ** $p<0.01$, *** $p<0.001$; 对角线中括号内数值为对应变量的信度系数。

表 2 避免破裂的中介作用分析结果

变量类型		模型 1:避免破裂		模型 2:防御型建言	模型 3:默认型建言
控制变量	性别	.153 (.127)		-.029 (.116)	.063 (.114)
	年龄	.157 (.080)		.015 (.074)	.023 (.073)
	教育水平	.034 (.057)		.003 (.052)	-.007 (.051)
	工作时间	-.030 (.038)		.010 (.035)	.048 (.034)
自变量	防御定向	.468 *** (.094)		-.145 (.090)	-.173 (.088)
	避免破裂			.265 *** (.051)	.245 *** (.050)
统计量	R^2	.079		.080	.085
	F	5.543 **		4.666 **	4.979 **
中介变量:避免破裂		B	SE	LL95% CI	UL95% CI
防御定向对防御型建言的间接影响		.124	.040	.060	.216
防御定向对默认型建言的间接影响		.115	.037	.054	.202

注: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差; B 为非标准化系数; SE 为标准误差;CI 为置信区间;LL 为置信区间下限;UL 为置信区间上限; $N=329$, * $p<0.05$, ** $p<0.01$, *** $p<0.001$ 。下同。

表 3 促进和谐的中介作用分析结果

变量类型		模型 4:促进和谐		模型 5:亲社会型建言	
控制变量	性别	.017 (.117)		-.205 * (.086)	
	年龄	.133 (.074)		.063 (.055)	
	教育水平	-.107 * (.053)		-.107 * (.040)	
	工作时间	.017 (.035)		.013 (.026)	
自变量	促进定向	.321 *** (.083)		.158 * (.063)	
	促进和谐			.276 *** (.041)	
统计量	R^2	.067		.213	
	F	4.607 **		14.497 ***	
中介变量:促进和谐		B	SE	LL95% CI	UL95% CI
促进定向对亲社会型建言的间接影响		.089	.028	.039	.147

4. 被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参照 Preacher 等的建议^[33],心理安全感对防御定向与防御型建言的间接关系的调节作用是否成立,需要检验 4 个条件:第一,防御定向对避免破裂具有显著影响;第二,防御定向与心理安全感的交互项对避免破裂有显著影响,或者避免破裂与心理安全感的交互项对防御型建言有显著影响;第三,避免破裂对防御型建言有显著影响;第四,当个体的心理安全感高低不同时,避免破裂对防御定向与防御型建言之间关系的中介效应强度不同。同理,心理安全感对防御定向与默认型建言的间接关系的调节作用是否成立,以及心理安全感对促进定向与亲社会型建言的间接关系的调节作用是否成立,均需要满足上述 4 个条件。

表 3 的检验结果表明,条件一和条件三得到了满足,即防御定向对避免破裂有显著影响,避免破裂对防御型建言有显著影响。为了检验条件二和条件四,根据 Edwards 等的建议^[34],采用 Bootstrap 方法,通过 Hayes 编制的 Process 宏进行分析^[35],再抽样

次数仍然设定为 5 000 次,取样方法为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法,结果见表 3 ~5。

表 4 防御定向对防御型建言、默认型建言的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变量类型		模型 1： 避免破裂		模型 2： 防御型建言	模型 3： 默认型建言
控制 变量	性别	.159 (.125)		-.031 (.111)	.061 (.110)
	年龄	.155 (.079)		.030 (.071)	.039 (.070)
	教育水平	.046 (.056)		.034 (.050)	.020 (.050)
	工作时间	-.027 (.037)		.014 (.033)	.051 (.033)
自 变 量	防御定向	.515 *** (.094)		-.083 (.089)	-.134 (.089)
	心理安全感	-.137 ** (.051)		.179 (.176)	.274 (.175)
	避免破裂			.249 *** (.051)	.240 *** (.050)
调 节 项	防御定向 $\times$ 心理安全感	-.194 (.110)			
	避免破裂 $\times$ 心理安全感			-.128 * (.053)	-.146 ** (.053)
统计 量	R^2	.115		.165	.155
	F	5.937 ***		7.873 ***	7.307 ***
避免破裂对防御定向与防御型建言关系的中介效应		B	SE	LL95% CI	UL95% CI
心理 安全 感	-1 SD	.253	.082	.111	.435
	M	.128	.040	.062	.222
	+1 SD	.045	.036	-.003	.145
避免破裂对防御定向与默认型建言关系的中介效应		B	SE	LL95% CI	UL95% CI
心理 安全 感	-1 SD	.257	.082	.120	.445
	M	.123	.037	.061	.211
	+1 SD	.036	.032	-.005	.130

表 5 促进定向对亲社会型建言的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变量类型		模型 4:促进和谐	模型 5:亲社会型建言		
控制变量	性别	.019(.117)	-.205*(.086)		
	年龄	.132(.074)	.063(.054)		
	教育水平	-.104(.054)	-.118*(.040)		
	工作时间	.015(.035)	.112(.026)		
自变量	自促进定向	.326**(.083)	.179**(.063)		
	心理安全感	.014(.046)	-.070(.183)		
	促进和谐		.272***(.041)		
调节项	促进定向 x 心理安全感	-.113(.078)			
	促进和谐 x 心理安全感		.038(.046)		
统计量	R^2	.073	.228		
	F	3.591**	11.793***		
促进和谐对促进定向与亲社会型建言关系的中介效应		B	SE	LL95% CI	UL95% CI
心理安全感	-1 SD	.102	.037	.044	.189
	M	.089	.027	.041	.147
	+1 SD	.068	.043	.003	.174

表 4 结果显示,避免破裂与心理安全感的交互项对防御型建言的负向影响显著 ($B = -0.128, p < 0.05$), 满足条件二。并且,在心理安全感处于较低以及均值水平时,避免破裂的中介作用显著(分别为 0.253 和 0.128), 95% 的置信区间都不包含零;当心理安全感处于较高水平时,避免破裂的中介作用变弱并且不显著($0.045, 95\% \text{ CI} [-0.003, 0.145]$ 包括零)。可见,心理安全感高低不同时,避免破裂对防御定向和防御型建言之间关系的中介作用强度不同,满足条件四。根据以上分析,4 个条件都得到满足,因此心理安全感对防御定向与防御型建言的间接关系的调节作用成立,同时,从避免破裂与心理安全感的交互项对防御型建言的负向影响显著可以看出,心理安全感负向调节避免破裂与防御型建言之间的关系,即心理安全感越低,避免破裂与防御型建言之间的正向关系会更强,H4 得到了支持。

同理,关于心理安全感对防御定向与默认型建言的关系的调节,由表 4 可知,避免破裂与心理安全感的交互项对默认型建言的负向影响显著 ($B = -0.146, p < 0.01$), 满足条件二。并且在心理安全感处于较低以及均值水平时,避免破裂的中介作用显著(分别为 0.257 和 0.123), 95% 的置信区间都不包含零;当心理安全感处于较高水平时,避免破裂的中介作用变弱并且不显著($0.036, 95\% \text{ CI} [-0.005, 0.130]$ 包括零)。因此心理安全感高低不同时,避

免破裂对防御定向和默认型建言之间关系的中介作用强度不同,满足条件四。根据以上分析,四个条件都得到满足,因此,心理安全感对防御定向与默认型建言的间接关系的调节作用成立,同时,从避免破裂与心理安全感的交互项对默认型建言的负向影响显著可以看出,心理安全感负向调节避免破裂与默认型建言之间的关系,即心理安全感越低,避免破裂与默认型建言之间的正向关系会更强,H5 得到了支持。

由表 5 可知,促进和谐与心理安全感的交互项对亲社会型建言的影响不显著 ($B = 0.038, p > 0.05$), 条件二未得到满足,因此,心理安全感对促进定向与亲社会型建言的间接关系的调节作用不成立,H6 没有得到支持。

为了更直观地展现调节作用,分别对心理安全感加减一个标准差,将样本分成高心理安全感和低心理安全感,调节效果如图 2 和图 3 所示。图 2 表明,拥有低心理安全感的个体,避免破裂对防御型建言的正向影响作用更大,H4 再次得到支持。图 3 表明,拥有低心理安全感的个体,避免破裂对默认型建言的正向影响作用更大,H5 再次得到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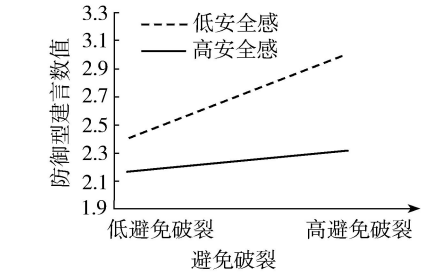


图 2 心理安全感在避免破裂与防御型建言间的调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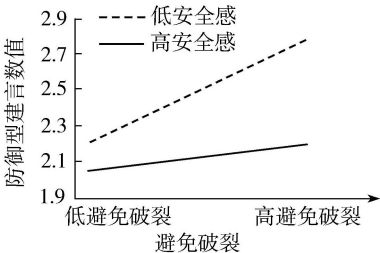


图 3 心理安全感在避免破裂与默认型建言间的调节

四、结论与讨论

1. 研究结论

以中国民营制造业的企业员工为研究对象,在中国管理情景下,从个体动机视角探索研究影响建言行为的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人际和谐在调节定

向与建言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心理安全感负向调节避免破裂与防御型建言、默认型建言的关系。

对于心理安全感正向调节促进和谐与亲社会型建言的关系,即心理安全感越高,促进和谐与亲社会型建言之间的正向关系会更强,该假设没有得到验证。持有促进和谐的个体追求真正意义上的和谐,在碰到冲突的时候,不会刻意回避,会更积极与人真诚交流^[26]。对组织存在问题提出合理建言,甚至对企业有利但上级反对的事情,也会努力去说服上级。也就是说,促进和谐个体在进行亲社会型建言时,不会过多关注人际风险。因此,H6 未得到实证检验支持。

2. 理论价值

一方面,研究发现了调节定向对建言行为影响的具体机制。Neubert 等的研究促进定向作为中介变量,正向影响帮助行为^[17]。陈思等的研究促进定向作为调节变量,显著影响建言行为^[36]。然而调节定向是如何影响建言行为,鲜有探讨。本文从个体动机视角,借助 Vallerand 的动机层次模型探索研究影响建言行为的机理^[15]。经过实证研究发现,人际和谐在调节定向与建言行为之间起着中介作用。该研究发现,不仅丰富了从动机视角对建言行为的影响研究,而且建立了调节定向通过人际和谐影响建言行为的新的研究路径,也推进了 Dyne 等提出的三类建言行为在中国管理情景中的研究,为更加清晰认识影响这三类建言行为的机理提供了新的视角^[4]。

另一方面,揭示心理安全感在人际和谐与建言行为之间的调节作用。个体心理安全感对员工建言行为有显著的预测效果^[29-30],然而这些研究中采用的建言构念都属于角色外行为,忽视了建言行为中防御型建言、默认型建言的维度。同时,心理安全感如何调节人际和谐与建言行为这一关系,现有文献还缺乏研究。本文研究发现,个体心理安全感负向调节避免破裂与防御型建言、默认型建言之间的关系,拓展了人际和谐对建言行为影响边界的认知。

3. 实践意义

本研究揭示了人际和谐中介调节定向对员工建言行为的影响,实践中可以从提高人际关系互动质量来获得更多的亲社会型建言。组织要建立简洁、真诚、宽容的人际交往理念^[37],通过培训提高员工对建言重要性的认知,引导员工形成真正和谐的人际关系,提高人际互动质量,促进和谐动机以获得更多亲社会型建言,弱化避免破裂动机以减少防御型

建言和默认型建言。

另外,基于心理安全感的调节作用,实践中可以通过提高个体心理安全感水平来影响员工的建言行为。管理者可以从个体、同事、领导、组织 4 个方面来提高员工的心理安全感水平。一是甄选招聘主动性人格的员工。二是从制度和文化上引导员工之间产生更多地互助行为,以提高同事信任水平和减少职场排斥^[9]。三是更多采用利于建言产生的领导类型,包括变革型领导、真实型领导、道德领导、谦卑型领导等。四是推进建设高承诺人力资源管理体系。

4. 局限性与未来展望

受限于样本数据可得性,本研究尚有如下局限:首先,样本来源的地域和行业比较集中,会影响研究结果的外部效度;其次,仅从个体微观视角进行分析,未能形成多层次的研究,这些可在今后研究中改善。

参考文献:

- [1] VAN DYNE L, LEPINE J A. Helping and voice extra-role behaviors: evidence of construct and predictive validity[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98, 41(1): 108-119.
- [2] BATEMAN T S, ORGAN D W. Job satisfaction and the good soldi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ffect and employee "citizenship"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83, 26(4): 587-595.
- [3] LEPINE J A, DYNE L V. Voice and cooperative behavior as contrasting forms of contextual performance: evidence of differential relationships with big five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and cognitive ability [J].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01, 86(2): 326-336.
- [4] DYNE L V, ANG S, BOTERO I C. Conceptualizing employee silence and employee voice as multidimensional constructs[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2003, 40(6): 1359-1392.
- [5] CRANT J M, KIM T Y, WANG J. Dispositional antecedents of demonstration and usefulness of voice behavior [J].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Psychology, 2011, 26(3): 285-297.
- [6] 马贵梅,樊耘,颜静,等.员工—组织匹配对建言行为影响机制的实证研究[J].管理工程学报,2015,29(3): 51-61.
- [7] 夏福斌,林忠.向上建言遭受同事消极对待:发生条件与机制研究[J].商业经济与管理,2021(6):28-37.
- [8] KNOLL M, WEGGE J, UNTERRAINER C, et al. Is our knowledge of voice and silence in organizations growing? building bridges and (re) discovering opportunities [J].

- German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2016, 30(3/4): 1-34.
- [9] 孙健敏, 尹奎, 李秀凤. 同事信任对员工建言行为影响的作用机制研究[J]. 软科学, 2015, 29(11): 93-96.
- [10] 尹奎, 孙健敏, 张凯丽, 等. 职场友谊对建言行为的影响: 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J]. 管理评论, 2018, 30(4): 132-141.
- [11] 张晓恹, 王云峰. 组织公正如何激发组织活力? ——群体层面公正氛围对建言行为的影响及机制研究[J].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18, 40(6): 116-128.
- [12] 金星彤, 林忠. 人际公正跨层次垂滴效应研究——一个具有中介作用的模型[J]. 中国软科学, 2017(12): 127-140.
- [13] HIGGINS T E. Beyond pleasure and pain[J].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97, 52(12): 1280-1300.
- [14] 杨文琪, 李强, 郭名扬, 等. 权力感对个体的影响: 调节定向的视角[J]. 心理学报, 2017, 49(3): 404-415.
- [15] VALLERAND R J. Toward a hierarchical model of intrinsic and extrinsic motivation [J].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1997, 29(8): 271-360.
- [16] HIGGINS E T, PINELLI F. Regulatory focus and fit effects in organizations [J]. Annual Review of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and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2020, 7(1): 25-48.
- [17] NEUBERT M J, KACMAR K M, CARLSON D S, et al. Regulatory focus as a mediator of the influence of initiating structure and servant leadership on employee behavior [J].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08, 93(6): 1220-1233.
- [18] MARKOVITS Y, ULLRICH J, DICK R V, et al. Regulatory foci and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J].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2008, 73(3): 485-489.
- [19] 李磊, 尚玉钊, 席酉民. 领导语言框架、下属特质调节焦点与下属工作态度[J]. 管理科学, 2011, 24(1): 21-30.
- [20] 尚玉钊, 李磊. 领导行为示范、工作复杂性、工作调节焦点与创造力[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15, 36(6): 147-158.
- [21] LEUNG K. Negotiation and reward allocations across cultures[C]//EARLEY P C, EREZ M. New perspectives on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San Francisco: The New Lexington Press/Jossey-Bass Publishers, 1997.
- [22] LEUNG K, KOCH P T, LU L. A dualistic model of harmony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conflict management in Asia[J].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02, 19(2): 201-220.
- [23] PERVIN L. Handbook of personality: theory and research [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99, 35(5): 920-935.
- [24] VALLERAND R J. Deci and Ryan's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a view from the hierarchical model of intrinsic and extrinsic motivation[J]. Psychological Inquiry, 2000, 11(4): 312-318.
- [25] CROWE E, HIGGINS E T. Regulatory focus and strategic inclinations: promotion and prevention in decision-making [J].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1997, 69(2): 117-132.
- [26] 张志学, 姚晶晶, 黄鸣鹏. 和谐动机与整合性谈判结果[J]. 心理学报, 2013, 45(9): 1026-1038.
- [27] LEUNG K. Harmony and conflict: a cross-cultural investigation in China and Australia[J].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2011, 42(5): 795-816.
- [28] KAHN W A. Psychological conditions of personal engagement and disengagement at work[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90, 33(4): 692-724.
- [29] 刘敏, 余江龙, 黄勇. 感知被上级信任如何促进员工建言行为: 心理安全感、自我效能感和权力距离的作用[J].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 2018, 35(12): 18-27.
- [30] 徐悦, 段锦云, 李成艳. 仁慈领导对员工建言的影响: 自我预防和自我提升的双重路径[J]. 心理与行为研究, 2017, 15(6): 839-845.
- [31] 李宁, 严进. 组织信任氛围对任务绩效的作用途径[J]. 心理学报, 2007, 39(6): 1111-1121.
- [32] LEPINE J A, VAN DYNE L. Predicting voice behavior in work groups[J].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1998, 83(6): 853-868.
- [33] PREACHER K J, RUCKER D D, HAYES A F. Addressing moderated mediation hypotheses: theory, methods, and prescriptions[J]. Multivariate Behavioral Research, 2007, 42(1): 185-227.
- [34] EDWARDS J R, LAMBER T. Methods for integrating moderation and mediation: a general analytical framework using moderated path analysis [J]. Psychological Methods, 2007, 12(1): 1-22.
- [35] HAYES A. Introduction to mediation, moderation, and conditional process analysis: a regression-based approach [M].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2013.
- [36] 陈思, 李锡元, 陆欣欣. 基于调节焦点作用的员工建言行为动机研究[J]. 管理学报, 2016, 13(4): 551-559.
- [37] 刘生敏. 员工权力距离对其抑制性建言的影响: 真实型领导的调节作用[J].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 2016(19): 46-55.

(收稿日期: 2021-07-14 编辑: 张志琴)

创新生态开放共享关系演化博弈与动态仿真研究

袁启刚¹,温科^{2,3}

(1.河海大学商学院,江苏南京 211100;

2.山西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后,山西太原 030006; 3.邯郸学院经济管理学院,河北邯郸 056005)

摘要:从单系统和双系统角度分别建立创新生态开放共享关系演化博弈模型,并对其进行动态仿真。研究发现,单系统中,相对于创新资源总量,创新资源价值在开放共享资源比例影响开放共享创新收益过程中的作用更强;双系统中,合作共享关系由“双方共赢”向“零和博弈”转变;“非理性因素”会使开放共享意愿短期形成并消失;相对于“主动控制感”,“被动压迫感”更激发创新主体开放共享的意愿;相对于“违约收益”的促进效应,“违约成本”对于开放共享关系的削弱效应更强;“搜寻成本”越高,开放共享意愿越强;创新生态发展与开放共享意愿间具有非对称“倒三角”结构关系。

关键词:创新生态;开放共享;演化博弈;动态仿真

中图分类号:F27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4970(2022)01-0100-09

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而要实现双循环发展格局,必须在创新生态中形成相适应的循环,即实现创新生态的开放共享,促进创新资源、要素的流动以及主体的互动,在大力发展“补短板”式科技创新模式的同时,形成关键技术的自主可控局面,克服经济发展的研发和消费“两头在外”特征。而开放程度不足、共享成本过高以及开放与共享矛盾加深已成为我国国家、区域、产业以及企业层面的创新生态的共性问

题;要解决以上问题,必须要明晰创新生态开放共享的博弈关系。鉴于此,笔者在提出开放式创新、开放式创新生态、共享式创新以及共享式创新生态含义的基础上,从单系统的视角,分析创新生态内部不同创新主体间开放共享的动态博弈关系,从双系统的视角,分析不同创新生态的创新主体间开放共享的动态博弈关系,并研究以上关系对创新收益的影响。笔者从单系统和双系统的视角切入研究,对于全方位进行创新生态开放共享关系的理论研究和整合具有积极意义,也对于国内区域、产业以及企业创新生态不同创新主体间如何有效开展开放共享关系具有

基金项目:河北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青年拔尖人才项目)(BJ2020214);河北省博士后科研项目(B2021001051);河北省社会发展研究课题(20210201014)

作者简介:袁启刚(1979—),男,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博士,主要从事产业和区域创新发展研究。E-mail:yuanqg@cec.com.cn

一定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一、相关研究综述

现阶段国内外对于创新生态开放共享关系的研究较少,而其理论基础主要体现在开放式创新、开放式创新生态、共享式创新、共享式创新生态等方面。

1. 开放式创新

2003年,Chesbrough首先从充分利用创新资源的视角提出开放式创新是企业应充分利用企业的内部和外部资源进行技术开发和创新活动,并采取内部和外部两种渠道将技术成果进行商业化^[1]。Laursen等进一步提出实现创新资源充分利用的重要前提是知识信息的自由流动,并将“企业外部的创新资源内部化”以及“企业内部的创新资源外部化”分别称之为内向型和外向型开放式创新^[2]。之后,Lichtenthaler提出创新知识信息流动的过程细分为知识的开发、保持和利用等阶段,这实质上是将开放式创新看作是一系列活动的集合体^[3]。在国外研究的基础上,国内学者展开全面分析,如任之光等对开放式创新与创新绩效的关系进行分析^[4];刘志迎等就开放式创新的影响因素和动力源进行研究^[5]。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第一,在研究开放式创新问题时,需要从技术、实践和认知等方面对开放式创新的内涵进行述评和总结;第二,开放式创新的主要作用是降低创新主体的交易成本,缩短创新成果的转化周期,提高创新活动的效率,其与传统式的创新活动即封闭式创新具有本质区别;第三,开放式创新的实质是创新资源能够在组织之间自由流动、优化配置和有效利用,进而提高创新有效性的过程,其中,创新知识资源的流入和流出,可以提高企业的内部创新速度,同时在利用外部创新资源的基础上提升自身的市场份额。

2. 开放式创新生态

West等较早提出开放式创新生态的内涵,即核心创新主体在系统的价值网络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并且其能够对各种内外部资源进行综合和协调,然后通过协同、共享等方式满足其他创新主体对创新资源的需求^[6]。除了协同、共享关系外,Rohrbecket等揭示出竞争关系在开放式创新生态中的作用^[7]。Moskowitz等则进一步提出核心创新主体整合创新资源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创新资源的合理和自由流动,进而使创新主体在不确定性的环境下持续保持

竞争优势^[8]。吕一博等对开放式创新生态运行的驱动因素进行了探索研究^[9]。之后,解学梅等基于案例分析方法,分别就开放式创新生态的演化机理、价值创造机制展开了讨论,并得出了具有现实意义的结论^[10]。总体来说,国外研究偏重于理论,国内研究通过实践分析进一步弥补了国外研究的空白。

综合以上研究,笔者认为开放式创新生态是指在开放式创新环境中,各个创新主体通过开放式创新活动形成有效的竞合关系,进而促进资本、知识等创新资源流动,最终形成能够使各创新主体共享价值观、合作共赢的创新生态。

3. 共享式创新

国内外对于共享式创新的研究较少,由于“共享”行为必然带有“合作”行为,笔者在借鉴合作式创新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梳理共享式创新的内涵。Fusfeld等对于合作创新的研究较早,他们认为,合作创新是企业为了完成共同的目标投入各自特有资源而形成的契约安排,是一种基于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以及特定用途资源而形成的共同行为^[11]。这种对于合作创新的研究揭示了契约重要性,强调了影响合作创新的内外部因素,即内部因素是指合作各方本身所拥有的特定资源,外部因素是指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笔者认为共享式创新是指拥有共同目标的创新主体面对共同的外部环境而进行创新分工与合作的过程,它是以双方的契约关系为基础,以资源互补为前提,并按照契约内容分担风险、分享收益。

4. 共享式创新生态

国内外有关共享式创新生态的研究较少,与其相关的领域主要体现在创新生态的“共生”问题上,且集中在国内。如张利飞从产业角度较早地揭示了创新生态的“共存共生”特征^[12];李煜华等提出优化共生环境是创新升天系统协同创新发展的重要途径^[13];欧忠辉等指出创新生态由多个共生单元组成,系统发展单元间互惠共生的结果^[14];李晓娣等则从区域角度提出了创新生态的共生特征^[15]。

总体来说,可以发现以上研究一是认为“共生”是创新生态的重要特征;二是“共生”是创新生态的组成部分;三是“共生”是创新生态发展的主要原因。因此,笔者认为共享式创新生态是指基于自然资源禀赋、政策法规、教育文化、社会经济发展等共享环境要素,系统中的创新主体间能够通过共享创新资源形成各种共享创新模式、建立各种共享关系

和构建各种共享创新平台,进而有效地连接创新链、产业链和价值链,提升创新资源利用效率,降低创新资源利用成本,推动创新主体和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基于以上研究综述,可以发现,开放与共享是创新生态运行中密切联系的两个方面,而已有研究一是分别就创新生态“开放”或“共享”的含义或概念进行分析,二是就创新生态“开放”或“共享”与创新行为、创新收益的关系进行探讨,但大都将创新生态的“开放”与“共享”关系分割开来,忽略了两者间的互动机制,也忽略了影响创新生态“开放”与“共享”的影响因素,这不利于深入研究开放式或共享式创新生态与创新行为和收益的关系。因此,研究学术价值与实践意义主要包括以下方面,一是研究创新生态间开放共享与创新收益间的关系;二是通过博弈演化模型和仿真方法分析创新生态开放共享关系建立的条件和影响因素;三是就如何有效地建立开放共享关系提供建议。

二、创新生态开放共享的博弈关系分析

1. 创新生态开放共享的关系本质

创新生态中开放共享关系是一种合作关系,创新主体间基于交易成本、合作收益、自身需求、合作关系中的地位位势等因素,一是决定是否建立开放共享关系;二是在关系建立中开放共享何种创新资源,评估自身需要何种创新资源,自身的创新资源是否符合合作方的需要;三是评估自身的学习能力是否能够有效吸收合作方提供的创新资源;四是合作方是否与自身处于同一创新生态中,不同系统间的创新主体建立开放共享关系的条件是否有所不同。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创新生态开放共享关系需要创新主体根据客观条件进行评估后决定是否建立,其本质一种演化博弈关系。因此,笔者将从“系统内部不同创新主体之间”以及“不同系统的创新主体之间”两个方面对开放共享的演化博弈关系进行分析。

2. 系统内部不同创新主体之间的开放共享演化博弈关系分析

(1) 建立以下前提条件

条件 1:选取创新生态中的两个主体进行建模分析。

条件 2:各主体可在创新资源的开放共享中得到自身的利益,并对这种利益所包含的价值非常清楚,这种价值是递减并满足线性要求的。

条件 3:为了更好地体现开放共享关系的动态性,在创新资源的开放共享过程中仅考虑可变成本,并且各主体的可变成本相同。

条件 4:各主体根据自身情况决定创新资源的开放共享比例。

(2) 根据条件 1 定义参数

j_1, j_2 分别为创新主体 1 和 2 开放共享的创新资源比例; Q_1, Q_2 分别为创新主体 1 和 2 拥有的创新资源总量; c_{21} 为创新主体 1 从创新主体 2 获得的最大的创新资源价值,其中“价值”是指创新资源对于创新主体需要的满足程度; c_{12} 为创新主体 2 从创新主体 1 获得的最大的创新资源价值; C 为创新主体双方开放共享创新资源所花费的成本; q_i 为创新主体拥有的第 i 种创新资源; a_i 为创新主体的第 i 种创新资源对其需求主体的价值; a_{i1} 为创新主体 2 的 q_i 对于创新主体 1 的价值; a_{i2} 为创新主体 1 的 q_i 对于创新主体 2 的价值; z_1, z_2 分别为创新主体 1 和 2 开放创新资源后获得的收益; c, d 分别为直线方程的截距和斜率。

根据条件 2,可得:

$$a_i = c - dq_i \tag{1}$$

对于创新主体 1:

$$a_{i1} = \frac{Q_2 + 1}{Q_2} c_{21} - \frac{q_i}{Q_2} c_{21} = \frac{Q_2 + 1}{Q_2} c_{21} - j_2 c_{21} \tag{2}$$

同理

$$a_{i2} = \frac{Q_1 + 1}{Q_1} c_{12} - j_1 c_{12} \tag{3}$$

根据条件 3 和条件 4,创新主体 1 和 2 对其创新资源进行开放共享后可得收益分别为

$$z_1 = c_{21} Q_2 j_2 + \frac{c_{21}}{2} j_2 - \frac{c_{21}}{2} Q_2 j_2^2 - Q_1 j_1 C \tag{4}$$

$$z_2 = c_{12} Q_1 j_1 + \frac{c_{12}}{2} j_1 - \frac{c_{12}}{2} Q_1 j_1^2 - Q_2 j_2 C \tag{5}$$

根据以上运算结果可得创新主体 1 和 2 创新资源开放共享后的支付矩阵,如图 1 所示。

		创新主体2	
		共享	不共享
创新主体1	共享	Z_1, Z_2	$-Q_1 j_1 C, Z_2$
	不共享	$Z_1, -Q_2 j_2 C$	$0, 0$

图 1 创新主体间创新资源开放共享演化博弈矩阵

图1中, Z_1 指创新主体1在共享创新资源比例为 j_2 时的收益。

$$Z_1 = c_{21}Q_{2j_2} + \frac{c_{21}j_2}{2} - \frac{c_{21}}{2}Q_{2j_2}^2 \quad (6)$$

$$\text{同理 } Z_2 = c_{12}Q_{1j_1} + \frac{c_{12}j_1}{2} - \frac{c_{12}}{2}Q_{1j_1}^2 \quad (7)$$

由于净收益不能为0,因此 j_1 的取值范围为 $0 \leq j_1 \leq \frac{c_{21}(Q_2+1)}{2Q_1C} \leq 1$, j_2 的取值范围为 $0 \leq j_2 \leq \frac{c_{12}(Q_1+1)}{2Q_2C} \leq 1$ 。综合 j_1 和 j_2 的取值范围可得:

$$\begin{cases} 0 < \frac{c_{21}}{C} \leq \frac{2Q_1}{Q_2+1} \\ 0 < \frac{c_{12}}{C} \leq \frac{2Q_2}{Q_1+1} \end{cases} \quad (8)$$

由以上计算结果可得,创新主体间创新资源的开放共享如果要顺利开展,必须在共享资源量和共享成本之间满足相应的数量关系;只有当创新主体能够从合作方得到的收益大于成本时,才可能会选择合作;当然,也可能由于信息不对称会选择不合作。

3. 不同系统的创新主体之间的开放共享博弈关系分析

(1) 建立前提条件

条件1:根据哈博曼合作—绩效模型, $K_i bs^{1+\varepsilon}$ 表现为创新主体因参与系统间开放共享活动所获得的绩效,选择两个系统的主体进行建模分析,其中 K_i 、 K_j 分别为系统 i 和系统 j 中某个创新主体参与系统间开放共享活动收益的分配比例; b 为主体影响因子,表示创新主体的情绪、价值观以及性格等“非理性因素”; ε 为系统影响因子,其值越大表示创新生态越完善; s 为系统中参与合作的创新主体的个数。

条件2:系统 i 中某个创新主体吸收开放共享活动中资源共享和技术溢出所带来创新知识产生的收益为 $\lambda_i(\alpha+\beta)K_i$,其中, λ_i 为系统 i 中某个创新主体的创新资源吸收能力系数,其值越大表示创新资源吸收能力越强,创新主体越能够有效识别自身需要的创新资源; α 为创新资源共享深度系数,其值越大表示合作双方能够开放共享对方核心创新资源的程度越深; β 为创新资源溢出系数,其值越大表示合作双方能够无偿获得对方创新资源的可能性越大。

条件3: R_s 系统中某个创新主体在参与系统间开放共享活动时由于违约而单独获得的创新收益,

其值越大表示由于违约所获得的收益越大。

条件4: c_0 为违约金赔偿金额,其值越大表示金额越多; C_i 为系统 i 中某个创新主体进行开放共享活动的成本,表示开放共享活动中的各种交易成本,其值越大表示成本越高。

条件5:在系统间进行开放共享活动的参与成员中,系统 i 中某个创新主体选择共享与不共享策略的概率为 p 和 $1-p$,系统 j 中某个创新主体选择共享与不共享策略的概率为 q 和 $1-q$ 。

(2) 计算系统间进行开放共享活动的支付函数

两个系统创新主体之间进行开放共享活动,其收益主要包括主体原有收益、系统间进行开放共享活动的分配收益和由创新资源共享和溢出所增加的收益;两个系统在进行开放共享活动的过程中,由于违约造成一方不共享时,其收益主要包括主体原有收益、由创新资源共享和溢出所增加的收益、合约解除后单独创新收益以及违约金赔偿;两个系统双方不进行开放共享活动时,仅有原来的收益。综上所述,可得出系统间创新主体开放共享活动的博弈支付矩阵,如图2所示。

		系统j创新主体	
		共享	
系统i 创新主体	共享	U_{YY}, U_{YY}	U_{YN}, U_{NY}
	不共享	U_{NY}, U_{YN}	U_{NN}, U_{NN}

图2 双系统主体开放共享演化博弈的收益矩阵

$$\begin{cases} U_{YY} = R_i + K_i bs^{1+\varepsilon} + \lambda_i(\alpha + \beta)K_i - C_i \\ U_{NY} = R_i + \lambda_i(\alpha + \beta)K_i + R_s - c_0 - C_i \\ U_{YN} = R_i + \lambda_i(\alpha + \beta)K_i + c_0 - C_i \\ U_{NN} = R_i \end{cases} \quad (9)$$

式中: U_{YY} 表示系统 i 创新主体和系统 j 创新主体都采取共享策略时各自获得的收益, U_{YN} 和 U_{NY} 分别表示系统 i 创新主体采取共享策略和系统 j 创新主体不采取共享策略时获得的收益, U_{NN} 和 U_{NN} 分别表示系统 i 创新主体不采取共享策略和系统 j 创新主体采取共享策略时获得的收益, U_{NN} 表示系统 i 创新主体和系统 j 创新主体都不采取共享策略时各自获得的收益。

根据式(9),可得系统*i*中某个创新主体采取共享和不共享策略时,其期望收益为 $\mu_{i1}=qU_{YY}+(1-q)U_{NY}$ 和 $\mu_{i2}=qU_{NY}+(1-q)U_{NN}$,从而得共享与不共享策略的平均期望收益为 $\mu_i=p\mu_{i1}+(1-p)\mu_{i2}$ 。同理,系统*j*中某个创新主体采取共享和不共享策略时,其期望收益为 $\mu_{j1}=pU_{YY}+(1-p)U_{NY}$ 和 $\mu_{j2}=pU_{NY}+(1-p)U_{NN}$,从而得共享与不共享策略的平均期望收益为 $\mu_j=q\mu_{j1}+(1-q)\mu_{j2}$ 。因此,可得系统*i*中某个创新主体复制者动态方程:

$$F(p) = \frac{dp}{dt} = p(\mu_{i1} - \bar{\mu}_i) = p(1-p)[q(U_{YY} - N_{NY} - U_{YN} + U_{NN}) + (U_{YN} - U_{NN})] \quad (10)$$

同理,系统*j*中某个创新主体复制者动态方程:

$$F(q) = \frac{dq}{dt} = q(\mu_{j1} - \bar{\mu}_j) = q(1-q)[p(U_{YY} - N_{NY} - U_{YN} + U_{NN}) + (U_{YN} - U_{NN})] \quad (11)$$

令 $\frac{dp}{dt}=0, \frac{dq}{dt}=0$,进而得出当 $p^*=0$ 或1或 $q^*=0$ 或1时是稳定状态。此外,当满足式(12)时也处于稳定状态:

$$\begin{cases} q^* = \frac{\lambda_1(\alpha+\beta)K_1 - K_1bs^{1+\varepsilon} + R_s - C_1}{K_1bs^{1+\varepsilon} - R_s + c_0} \\ p^* = \frac{\lambda_2(\alpha+\beta)K_2 - K_2bs^{1+\varepsilon} + R_s - C_2}{K_2bs^{1+\varepsilon} - R_s + c_0} \end{cases}$$

根据微分方程的稳定性定理和进化稳定策略的性质,仅当 $F(p)=0$ 且 $F'(p)<0$ 时两系统主体进行开放共享活动博弈演化状态才能形成进化稳定策略。

当 $q > \frac{\lambda_1(\alpha+\beta)K_1 - K_1bs^{1+\varepsilon} + R_s - C_1}{K_1bs^{1+\varepsilon} - R_s + c_0}$ 且 $F'(0)>0, F'(1)<0$ 时, $p=1$ 是进化稳定策略;当 $q < \frac{\lambda_1(\alpha+\beta)K_1 - K_1bs^{1+\varepsilon} + R_s - C_1}{K_1bs^{1+\varepsilon} - R_s + c_0}$ 且 $F'(0)<0, F'(1)>0$ 时, $p=0$ 是进化稳定策略;当 $p > \frac{\lambda_2(\alpha+\beta)K_2 - K_2bs^{1+\varepsilon} + R_s - C_2}{K_2bs^{1+\varepsilon} - R_s + c_0}$ 且 $F'(0)>0, F'(1)<0$ 时, $q=1$ 是进化稳定策略;当 $p < \frac{\lambda_2(\alpha+\beta)K_2 - K_2bs^{1+\varepsilon} + R_s - C_2}{K_2bs^{1+\varepsilon} - R_s + c_0}$ 且 $F'(0)<0, F'(1)>0$ 时, $q=0$ 是进化稳定策略。

将两系统主体开放共享活动博弈的复制动态关

系用坐标平面表示,如图3和图4所示。图中, U_1 、 U_2 、 U_3 和 U_4 分别表示当 $p>p^*$ 且 $q>q^*$ 、 $p<p^*$ 且 $q<q^*$ 、 $p<p^*$ 且 $q>q^*$ 、 $p>p^*$ 且 $q<q^*$ 时系统*i*中创新主体的收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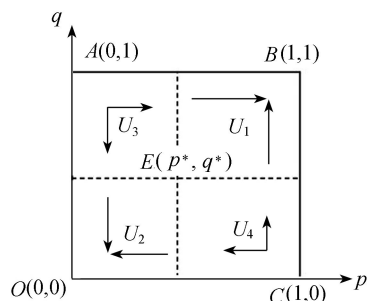


图3 两系统主体进行开放共享活动的路径演化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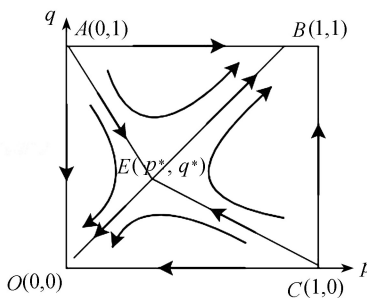


图4 两系统主体进行开放共享活动的策略动态演进

由图3和图4可知,在演进博弈模型中存在5个平衡点,即 $O(0,0)$ 、 $A(0,1)$ 、 $B(1,0)$ 、 $C(1,1)$ 、 $E(p^*, q^*)$,其中 E 点为鞍点, A 和 C 具有不稳定性,而 O 和 B 为进化稳定状态。当系统中的创新主体进行开放共享活动时,两系统主体进行开放共享活动的长期进化最终策略是(共享,共享)和(不共享,不共享),即当 $p>p^*, q>q^*$ 时,系统*i*中的创新主体进行开放共享活动的收益大,系统*j*中的创新主体共享收益要大于违约收益,(共享,共享)成为演化均衡策略,并最终在 B 点达到稳定状态;当 $p<p^*, q<q^*$ 时,无论系统*j*中的创新主体选择什么策略,系统*i*中的创新主体都会选择不共享策略,此时共享收益要小于违约收益,所以(不共享,不共享)成为演化均衡策略,系统间的开放共享活动陷入“囚徒困境”,最终在 O 点达到稳定状态。根据演进博弈的对称性,此结论也适用于系统*j*中的创新主体。

三、仿真结果及分析

1. 研究设计

通过2020b版Matlab的Simulink平台,分别就

“系统内部不同创新主体之间开放共享关系的影响因素及其对创新收益的影响”以及“不同系统的创新主体之间开放共享关系的影响因素及其对创新收益的影响”等方面编写仿真代码,并通过设定不同的变量参数值来对仿真结果进行比较。根据研究中博弈模型构建中设立的基本假设进行参数设定,设定参数的取值范围根据模型分析的结果确定。

2. 系统内部创新主体间开放共享关系仿真分析

根据不同创新主体开放共享行为之间的博弈关系,可对模型参数进行不同的设置来对其进行分析;在前文的模型分析中,可以发现模型参数对于各创新主体间开放共享创新资源所获收益的影响机理基本一致,因此,本部分主要围绕创新主体 1 进行讨论。

一方面,在 c_{21} 一定时,观察 Q_2 的变化对创新主体 1 收益的影响。 Q_2 分别取 20、40、60、80 以及 100, $c_{21}=10$, 可得仿真结果如图 5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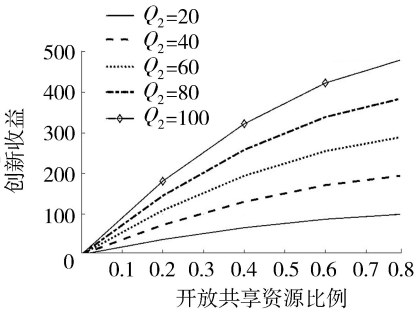


图 5 基于资源总量变化的创新收益变化趋势

图 5 中,随着创新主体 1 分享创新主体 2 开放的资源比例逐步提升,创新主体 1 所获得的创新收益也在逐步凸性增加,创新效益边际增长率在下降,这主要是由于随着共享创新资源比例逐步增多,所花费共享成本在边际增长;随着创新主体 2 创新资源总量不断增加,创新主体 1 在共享同等比例的创新主体 2 开放的创新资源时,所得创新收益也在增加,因此,创新资源共享成本与创新主体开放创新资源总量无相关性,而与开放创新资源比例正相关。

另一方面,在 Q_2 一定时,观察 c_{21} 的变化对创新主体 1 收益的影响。 c_{21} 分别取 10、20、30、40 以及 50, $Q_2=100$, 可得仿真结果如图 6 所示。

图 6 中,创新主体获得的创新资源价值越多,开放共享资源比例与创新收益之间正相关性越强。综合图 5 和图 6 的仿真结果,可以发现,相对于创新资源总量,创新资源价值在开放共享资源比例与创新收益关系中的作用更大。因此,可以得出结论:系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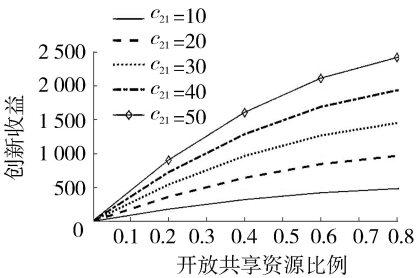


图 6 基于获得创新资源价值变化的创新收益变化趋势

内部不同创新主体之间开放共享中,开放共享资源比例的增加会促进创新收益的提升,但其边际效益在下降;随着创新主体拥有创新资源总量以及从开放共享行为获取创新资源价值的增加,开放共享资源比例增加对创新收益的提升作用逐步增强,但后者的“价值效应”大于前者的“数量效应”。

3. 不同系统的创新主体间的开放共享关系仿真分析

根据上述博弈模型分析结果可知,在不同的创新生态之间,决定创新收益的主要因素,是创新主体采取共享策略与否的概率,而概率是由众多因素所影响,其中包括“创新收益的分配比例”“系统影响因子”“资源吸收能力系数”等方面。因此,“概率-收益”关系研究可以转变为“因素-概率”关系研究。根据前文中博弈模型的分析结论可以得知,不同创新生态的创新主体采取共享或不共享策略时所受影响的机理基本一致,以“系统 j 中的创新主体”为例,来分析“概率 q^* ”的演化过程。为更好体现仿真结果,根据各参数的特征与宋砚秋等^[16-17]的研究结论,对各参数值进行设定: $\lambda_i=0.08, \alpha=0.05, \beta=0.07, K_i=0.2, S=25, b=0.4, \varepsilon=0.6, R_s=20, c_0=12.6, c_i=5$ 。

第一,分析分配收益比例 K_i 和创新主体影响因子 b 对 q^* 的影响。根据上文博弈分析结果,可以发现 K_i 和 b 对 q^* 的影响机制基本一致,可以用来做对比分析(图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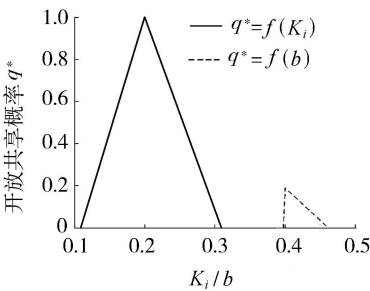


图 7 分配收益比例与创新主体影响因子的影响

图 7 中,由于系统 i 中的创新主体在开放共享行为中获得的创新收益比例不断增高,系统 j 中的创新主体开放共享创新资源的意愿由强变弱;这可能是由于在开放共享的“初期”,两个系统的创新主体都能从开放共享行为中获得收益,但随着双方博弈程度的加深,某一方获得收益的能力开始下降,双方关系逐步接近“零和博弈”,因此,获得收益能力下降的一方开放共享资源的意愿也逐步下降。

创新主体影响因子 b 对开放共享概率具有“跳跃式”的影响趋势;这可能是由于影响因子是创新主体“非理性因素”的综合体现,其对开放共享行为具有“试探”效应,即在开放共享的“初期”阶段,如出现“亏损”“负外部性”或者“搭便车”现象,便快速将资源“收回”,进而结束开放共享活动。

第二,分析 λ 、 α 和 β 对 q^* 的影响。根据上文博弈分析的结果,可以发现 λ 与 α 或 β 对 q^* 对 q^* 的影响机制基本一致,可以用来做对比分析(图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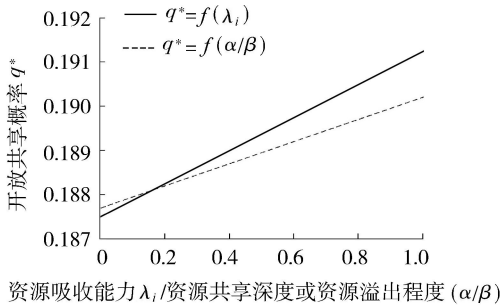


图 8 资源吸收能力、共享深度和溢出程度的影响

图 8 中,①系统 i 中创新主体创新资源吸收能力越强,其对系统 j 中创新主体加速开放共享创新资源的要求越强烈,基于违背对方“要求”而失去创新合作方所可能形成的“专有性成本”的提升,系统 j 中创新主体有可能会“被迫”开放共享创新资源。②双方在共享对方核心资源时,开放共享意愿更强;核心资源能够使创新主体弥补自身创新不足,提升竞争力,加快技术更新周期。③创新资源溢出程度越深,双方从开放共享活动中“搭便车”进而无偿获取对方创新资源的动机越强,双方开放共享意愿越强。④相对于资源共享深度和资源溢出程度,资源吸收能力等要素更能提升创新主体进行开放共享活动的概率。

第三,分析 c_0 和 R_s 对 q^* 的影响。图 9 和图 10 中,违约成本越高,开放共享意愿越低;违约收益越高,开放共享意愿越高;违约收益对于开放共享的促

进效应低于违约赔偿,即“违约成本效应”大于“违约收益效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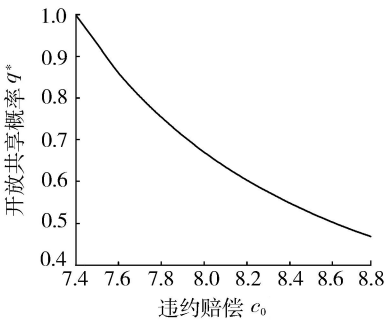


图 9 违约赔偿对开放共享概率影响的演化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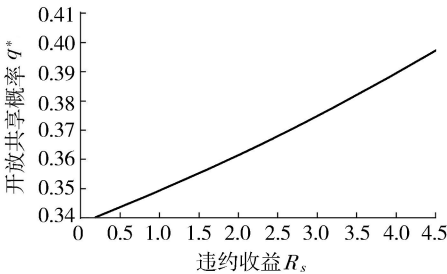


图 10 违约收益对开放共享概率影响的演化趋势

第四,分析 C_i 和 s 对 q^* 的影响。由图 11、图 12 可知,系统 i 中创新主体开放共享成本的提升,会限制其参与开放共享活动,这会进一步加大系统 j 中创新主体的“搜寻成本”,进而限制其开放共享创新资源;而合作创新主体数量的增多,不仅可以减少“搜寻成本”,而且也可以为找到更“合适”的合作伙伴创造空间,这都有利于提升创新主体的开放共享意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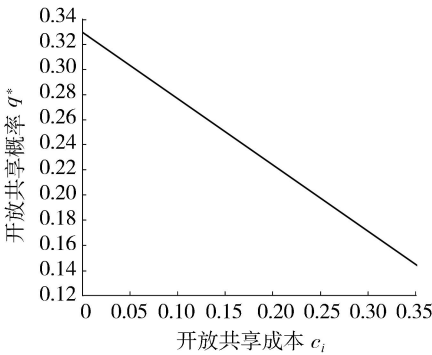


图 11 开放共享成本对开放共享概率影响演化趋势

第五,分析 ε 对 q^* 的影响。由图 13 可知,随着创新生态的不断发展,创新活动的外部环境逐渐完善,创新主体的开放共享活动的环境限制减少,这快速促进了创新主体间开放共享活动的频率和深度,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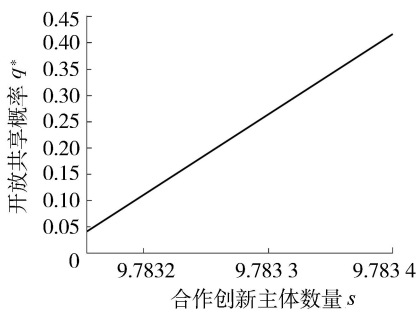


图 12 合作主体数量对开放共享概率影响演化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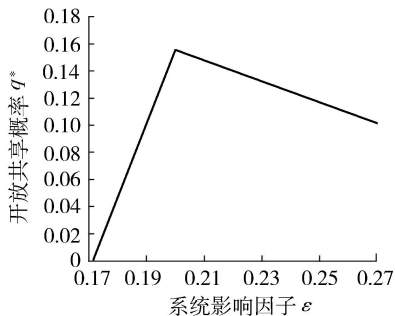


图 13 系统影响因子对开放共享概率影响的演化趋势

随着创新生态发展所带来的“外部性”和“溢出效应”逐步增强,开放共享活动所带来的成本逐步大于效益,因此,创新主体的开放共享意愿开始缓慢下降。

四、结论与讨论

1. 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演化博弈视角从“系统内部不同创新主体间”以及“不同系统的创新主体间”两个方面构建了创新生态的开放共享博弈模型,并通过 2020b 版的 Matlab 的 Simulink 平台编写仿真程序,在给定变量参数值的基础上,分析了影响开放共享关系因素的演化趋势。

仿真结果表明:第一,在系统内部的开放共享博弈关系方面,创新主体选择合作方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从合作方获得的创新资源价值”和“合作方的创新资源总量”,两者对开放共享活动收益都具有正向影响,前者的促进效应高于后者。

第二,在不同系统的开放共享博弈关系方面,创新主体选择合作方的主要影响因素更加多元化,其中,创新主体间的合作共享关系会由“双方共赢”向“零和博弈”转变;创新主体的“非理性因素”会造成开放共享意愿“短期形成”并“快速消失”;“被动压迫感”比“主动控制感”更能使创新主体开展开放共享行为;合作双方的“违约成本效应”对于开放共享

关系的削弱作用大于“违约收益效应”对于开放共享关系的促进作用;基于寻找合作方的“搜寻成本”与开放共享意愿的形成成为正比关系,其对于开放共享意愿的形成十分重要;在创新生态发展的过程中,由于交易成本逐步大于合作收益,合作双方的开放共享意愿经历了由“快速上升”到“缓慢递减”的过程。

2. 实践启示

针对前文的仿真结果,可以就如何改善单个或者多个创新生态中创新主体间的开放共享关系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创新主体应在加速积累创新资源的同时,努力实现创新资源的多元化,提升创新资源对于其他创新主体的价值效用,进而“吸引”其他创新主体与其合作,实现创新资源的价值共享;另外,创新主体在选择创新合作方时,在关注对方资源“数量”的同时,应更加关注资源的“质量”,分析对方的资源是否会为自身创造价值。

第二,在双方就开放共享关系达成共识后,当创新主体发现边际利益递增而合作方边际利益递减或者利益亏损时,应摒弃自利追求的短视行为,及时调整创新合作关系由“竞争合作”向“共生合作”转变,以避免由于合作伙伴丧失而带来“搜寻成本”等交易成本的增加。此外,应尽量避免“非理性因素”在开放共享决策中的干扰作用,减少不必要和无意义的交易成本,发挥“有限理性”作用,客观公正地选择相对最优的合作伙伴,最大限度发挥合作方创新资源在促进自身创新发展中的作用。

第三,加强与合作方在核心创新资源共享方面的交流与合作,有条件地公平地促进合作双方创新资源的流动和溢出,这有利于推动创新主体“主动”地进行开放共享活动;创新主体不断提升自身资源吸收能力,以此作为“逼迫”合作方加深开放共享关系的动力,并在开放共享关系中增强专有性创新资源的控制力度,提升合作方解除开放共享关系的成本,迫使合作方保持开放共享关系。

第四,通过“契约”建立开放共享关系,并尽可能地提升“违约成本”,这有利于限制合作双方破坏开放共享关系的行为。尽可能地提升创新生态的规模,增加系统中创新主体的数量,减少创新主体选择合作的“搜寻成本”;创新主体在减少开放共享成本的同时,尽可能地与合作方建立“共生合作”的关系,协助其减少开放共享成本,避免其因成本提升解

除开放共享关系。在完善创新生态的同时,创新环境在不断开放并且知识流动成本会降低,但也要注意其带来的“创新溢出”以及“负外部性”等效应。创新主体在进行开放共享活动时,需要建立一定的“边界”和“制度”,防止创新资源“无交易条件”和“无交易成本”的流动。

3. 局限与未来研究

尽管本文得到一些有价值的结论和启示,但存在以下局限有待未来进一步研究:首先,本文是在设定前提条件的基础上,提出创新生态开放共享的博弈关系理论模型,模型的建立限制了研究结论的普适性;其次,模型的建立没有深入结合实际调研,研究结论的实际意义有待进一步提升。未来研究可在充分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相依的研究假设建立模型,并可尝试以制造类企业等为研究对象,通过收集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以期提升研究结论的实际意义。

参考文献:

[1] CHESBROUGH H. Open innovation, the new imperative for creating and profiting from technology [M].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2003.

[2] LAURSEN K, SALTER A. Open for innovation: the role of openness in explaining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mong UK manufacturing firms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6, 27(2):131-150.

[3] LICHTENTHALER U. Open innovation: past research, current debates, and future directions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Perspectives, 2011, 25(1):75-93.

[4] 任之光,高鹏斌. 双向开放式创新及其协同、商业模式和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研究 [J]. 管理评论, 2020, 32(8):116-130.

[5] 刘志迎,沈磊,韦周雪. 企业开放式创新动力源的实证研究 [J]. 科学学研究, 2018, 36(4):732-743.

[6] WEST J, WOOD D. Creating and evolving an open innovation ecosystem: lessons from Syrabian Ltd [M]. St. Gallen: University of St. Gallen, 2008.

[7] ROHRBECK R, HOLZLE K, GEMUNDEN H. Opening up for competitive advantage-how deutsche telekom creates an open innovation ecosystem [J]. R&D Management, 2009, 39(4):420-430.

[8] MOSKOWITZ H, SAGUY I. Reinventing the role of consumer research in today's open innovation ecosystem [J]. Critical Reviews in Food Science & Nutrition,

2013, 53(7):682-693.

[9] 吕一博,蓝清,韩少杰. 开放式创新生态系统的成长基因——基于 iOS、Android 和 Symbian [J]. 中国工业经济, 2015(5):148-160.

[10] 解学梅,王宏伟. 开放式创新生态系统价值共创模式与机制研究 [J]. 科学学研究, 2020, 38(5):912-924.

[11] FUSFELD I, HAKLISCH S. Cooperative R&D for competitors [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1985, 63(6):60-76.

[12] 张利飞. 高科技产业创新生态系统耦合理论综评 [J]. 研究与发展管理, 2009, 21(3):70-75.

[13] 李煜华,武晓锋,胡瑶瑛. 共生视角下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生态系统协同创新策略分析 [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4, 31(2):47-50.

[14] 欧忠辉,朱祖平,夏敏,等. 创新生态系统共生演化模型及仿真研究 [J]. 科研管理, 2017, 38(12):49-57.

[15] 李晓娣,张小燕,侯建. 高科技企业技术标准化驱动创新绩效机理:创新生态系统网络特性视角 [J]. 管理评论, 2020, 32(5):96-108.

[16] 宋砚秋,李桂君,张亚宁,等. 创新项目成员绩效与团队产出间动态关系——基于知识共享的系统动力学建模与仿真研究 [J]. 软科学, 2018, 32(5):75-80.

[17] 王瀚,韩毅. 合作信息查寻与检索中知识共享的演化博弈研究 [J]. 图书情报工作, 2018, 62(19):86-92.

(收稿日期:2021 - 10 - 08 编辑:张志琴)



On the Core Meaning and Epoch Value of Xi Jinping's Concept of People's Happiness/DING Min, et al (School of Arts and Scienc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Defens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angsha 410073, China)

Abstract: To make people live a happy life is of vital important to the nation. Xi Jinping's concept of people's happiness stems from Marxist theory, and the CPC's value concept of "people first", reflects the fundamental requiremen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and opens up a new real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ts elaboration proposed perseveres the original intention and mission of seeking happiness for the people, and from the insistence take the people as the main body, take the happy life needs as the power, take the arduous struggle as the way, to persist leadership of the CPC as the fundamental guarantee, to achieve the happiness of all the people through common prosperity, solves the world difficult problem by the human destiny community, answered the question of seeking happiness for who and how, has formed the systems science people's happy view system. This system provides the legal basis for the long-term ruling of the CPC, provides the value lead for the realization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points out the direction for the common happiness of human society, highlighting the unity of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values, domestic significance and international significance.

Key words: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eople; happiness;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Time Value of Xi Jinping's Important Expositions on Youth Work/AI Chujun, et al (School of Marxism, Changsh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angsha 410114, China)

Abstract: Xi Jinping's important expositions on youth work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Xi Jinping's thoughts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Xi Jinping grasped the background, group characteristics, and value status of the youth in the New Era, and established a new orientation for youth development in the interweaving period of the "two overall situations"; from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theory, history and reality, he opened up a new path for youth growth in the intersection of "two centuries"; he made full use of strategic thinking, developmental thinking, dialectical thinking, and systemic thinking to open up new thinking for youth work during the important strategic opportunity period; and he clarified the strategic position of youth work, the theme of the times, path and method of youth work, and the reform strategy of the Communist Youth League, initiated a new achievement

in youth work in the new stage of development; made new contributions to the Marxist outlook on youth, and contained rich values of the times.

Key words: Xi Jinping; ; New Era; youth work; time value

Discussing the Party's overall Leadership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dur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Taking the Fundamental Basis, Institutional Mechanism and Ability Requirements as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ZHOU Xiangning, et al (the School of Marxism,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8,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the primary principle that must be followed in China'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s to uphold the party's overall leadership. It is based on the fact that the Party's leadership over all work is the fundamental foundation for all our undertakings, provides preconditions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such as political stability, social progress, national unity, and cultural prosperity, a political process that runs through the entire process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various historical periods, and the fundamental guarantee for the complex situation facing my country'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dur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To uphold and improve the institutions and mechanisms for the Party's overall leadership over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dur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it is necessary to implement the "two maintenance" requirements in all areas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give full play to the party's role as the core of leadership in overseeing the overal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coordinating all parties, uphold and strengthen 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s rigorous organizational system, inherit and develop the party's scientific system for leading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o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party's ability to promot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dur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it is necessary to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party's political ability to lead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e ability to systematically promot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e ability to lead economic and social work in a scientific and legal manner and the ability to promote high-quality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with the party's high-quality construction.

Key words: "14th Five-Year Plan";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verall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The CPC's Values of Promoting Mass Sports in the Past Century/TANG Peng, et al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8, China)

Abstract: Strengthening physical exercise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way to achieve their own healthy development, but also an important way for national prosperity and social progress. Therefore, mass sports has been a cause continuously promot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for a century. Over the past century, the CPC has always followed the value characteristics of promoting people's all-round development, realizing the Chinese dream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undertaking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sports culture of the Chinese nation; Always follow the value standard with "people's position" as the basic yardstick, the unity of "human development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s the basic law and "national health" as the realistic demand; It has always followed the value practice of diversified coordination, regional coordination and resource optimization. This has important experience and theoretical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sports power" and "healthy China"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one hundred year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art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mass sports; value following

Study on Policy Instrument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ealth Servic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Healthy China/ZHANG Hongru, et al (School of Chinese Medicine, School of Integrated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Nan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policy instruments, the architecture of Chinese medicine health service and the 52 policy documents issued by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in the field of Chinese medicine health service, a two-dimensional analysis framework was constructed to show the distribution of policy instruments in different service systems. Th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policy instruments were summarized. Text analysis was used to extract keywords and analyze keyword distance from policy documents.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 network of high-frequency keywords of Chinese medicine health services was built, the construction focus and key suppliers of Chinese medicine health services were summarized. The form of policy instruments was abundant, but the structure was unevenly distributed; In content, the policy support of Chinese medicine health service system has been basically formed, and the supply of Chinese medicine health service was the result of multi-agent cooperation. In the future, it is necessary to enrich and optimize the types of policy instruments, improve the implementation rules at the operational level, and strengthen the policy support for the cooperation of service supply agents.

Key words: Chinese medicine health service; policy instruments; service system; Healthy China

Subject Driving Factors of Supply of Internet Medical Services/ZHANG Zehong, et al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and Management, We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Wenzhou 325035,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of more than 230,000 online docto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rvice supply, the disorderly mult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 method is used to analyze the main driving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supply of services. Compared with offline medical, the obje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gnitive shortcut attributes of online doctors, including gender, age, professional title, hospital, and region, have a greater influence on service provision. Unlike offline medical, which pays more attention to the quality of medical results, the subjective construction of service provision in online medical pays more attention to the quality of medical process. Online doctors with high emotional and cognitive identity are more conducive to promote service provision. It is necessary to design an incentive system based on service-led logic, establish an online reputation mechanism regulated by the government, and attract and motivate online doctors to provide more and higher-quality Internet medical services.

Key words: internet medical; service provision; online doctors; subject characteristics

Role Conflict Analysis of Local Government in Risk Society Governance/ZHANG Guangli, et al (School of Social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200237, China)

Abstract: The key to improving local governments' risk governance capacity lies in properly managing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government, market and society, especially in clarifying the objectiv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oles of local governments in the risk society governance. Most of the existing studies are normative analyses of governments' roles, and fail to give adequate attention to the special interests of local governments, with the public good and self-interest roles constantly intertwined. Based on the resettlement houses property rights disputes in city X, this article conducted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ocal government's role in risk governance and its conflict changes, and found that the local government has four roles in different stages: cooperation-regulation, conspiracy-permissiveness, and negotiation-governance. This article concludes that the roles and requirements of local governments in risk society governance need to be practically defined, and the behaviour of local governments needs to be systematically regulated and adapted.

Key words: risk governance; local government; role conflict; dispute

The Construction and Mediation of the Issue of the River Chief System by New Medi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ZHANG Jie, et al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211100, China)

Abstract: As an environmental issue, the production of river chiefs involves complex linkages among various actors in the new media environment. This study selects three types of new media platforms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and based on actual data, takes reports on the issue of the river chief system from People's Daily Online, China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Network and Weibo Da V as samples, and establishes a research model based on actual data to discus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of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the three types of river chief system issues, and analyze the process of the new media's construction of the river chief system issues.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issue-building capabilities and methods of the three new media actors complement each other, and each has its own emphasis. On this basis, the study believes that as a media actor, new media should play the role of mediating perception and exercise the function of mediating behavior, so as to better exert its own function, so that the actions of multiple actors can be coordinated and promote the issue of the river chief system efficient construction and dissemination.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river chief system; new media; issue construction; mediation

Research on the Judicial Application of Punitive Damages for Environmental Tort/CHEN Guanghua, et al (School of Law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8, China)

Abstract: Article 1232 of the Civil Code stipulates in principle the system of punitive damages in the field of environmental tort, but the subject of the claim right of punitive compensation, the ownership and calculation standard of compensation are not involved. By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analysi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nnotation of environmental tort and the uniqueness of environmental tort,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of the first case of punitive damages in this field in China, it can be seen that punitive damages for environmental tort belong to a special civil liability and should not be "homogenized" with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damage compensation. In terms of the subject of claim right, punitive compensation litigation should not be attached to civi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In terms of ownership, punitive damages should not be brought in civi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and the compensation should belong to the infringed and should not be included in the local financial budget; the calculation of the amount of compensation should be based on the basic amount plus the amount of punishment.

Key words: Civil Code; environmental tort; the punitive damages

A Two-Dimensional Decoupling Analysis of Grey Water Footprint and Economic Growth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HE Weijun, et al (Business School,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211100, China)

Abstract: Decoupling water pollution from economic growth is the key to drive the coordinated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water resources and economy. Based on 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EKC) and Tapio decoupling theory, the grey water footprint (GWF) of 11 provincial areas along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YREB) from 2003 to 2018 was firstly calculated. Then, an econometric model was constructed to identify the EKC pattern of the GWF and economic growth. Finally, the two-dimensional decoupling analysis was conducted hierarchically by combining the EKC hypothesis and improved Tapio model.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GWF varied significantly among provinces in the YREB. Except for Yunnan, the GWFs of other 10 provincial areas showed an overall downward trend. The EKC of GWF in the YREB presented an N-shaped change, and the per capita GDP at two inflection points were 36,700 CNY and 103,400 CNY, respectively. The proportion of agriculture and the degree of opening playe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GWF. Except for pseudo-decoupling in Jiangxi, Chongqing and Guizhou, there were 7 kinds of two-dimensional decoupling states between GWF and economic growth in the other 8 provincial areas. Provinces with high level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have achieved more strong decoupling, while those with low level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have achieved more weak decoupling. This study not only expands decoupling theory and research method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ut provides pivotal implications for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YREB.

Key words: grey water footprint; water pollution; economic growth; decoupling theory; EKC hypothesis

The Effect of Stock Market Liberalization on Firms' Internationalization Strategy/DAI Bin, et al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31, China)

Abstract: The "Shanghai-Hong Kong Stock Connect" program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of stock market liberalization. Based on the DID model, we use Shanghai A-share listed firms from 2010 to 2019 as samples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capital market opening on the firm internationalization strategy. The empirical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nnect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scope, internationalization speed and regular

internationalization rhythm. Further studies show that international board of director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apital market libera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strategy of micro enterprises. The mechanism of above effect is through improving the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and relieving the financing constraints of the company. This study revealed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conne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provided theoretical evidence and empirical reference for the follow-up implementation of connectivity mechanism.

Key words: capital market liberaliz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strategy; international board of directors

Digital Economy and Corporate Risk Taking: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Managerial Discretion/GUO Jitao, et al (School of management, Qil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handong Academy of Sciences), Jinan 250353, China)

Abstract: Digital economy, as the core driving force of China's high-quality economic growth,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important for micro enterprises' investment decisions. Based on the data of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in China's Shanghai and Shenzhen stock markets from 2011 to 2019, we empirically examine the impact and mechanism of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on corporate risk-taking. We find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significantly improves the level of corporate risk-taking. By analyzing its mechanism of action, we find that managerial discretion plays a positive moderating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gital economy and corporate risk-taking. Among it, organizational autonomy and special situational autonomy play a positive moderating role. However, the moderated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autonomy is not significant. Further heterogeneity analysis finds that the role of digital economy in increasing the level of corporate risk-taking is stronger in emerging advantageous industries. This paper theoretically enriches related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digital economy and corporate risk-taking and provides useful suggestions for promoting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digital economy and real economy in practice.

Key words: digital economy; risk-taking; managerial discretion; emerging advantageous industries

Prevention and Promotion: The Role of Interpersonal Harmony in Employee Voice Behavior/LIU Xiaojuan, et al (School of Management, Shanghai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1620, China)

Abstract: Voice behaviors have been studied by many organization management scholars as an important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However, the

motivation of voice based on fear and obedience has not been paid enough atten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ividual motivation, this paper focuses not only on prosocial voice, but also on defensive voice and acquiescent voice. And it examines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regulatory focus on employee voice behavior, i. e., explores the mediating role of interpersonal harmony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psychological safety. The results of the survey of 550 employees in 17 private enterprises show that interpersonal harmony plays a mediating role between regulatory focus and voice behavior, that is to say, disintegration avoidance medi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evention focus and defensive voice and acquiescent voice, and harmony enhancement medi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motion focus and prosocial voice. Psychological safety negatively regul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sintegration avoidance and defensive voice and acquiescent voice. The findings have some implications for enterprises to stimulate or decrease specific employee voice behavior.

Key words: voice behavior; regulatory focus; interpersonal harmony; individual motivation; psychological safety

Research on Evolutionary Game and Dynamic Simulation of Open Sharing Relationship in Innovation Ecology/YUAN Qigang, et al (Business School,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211100,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ingle system and double system, the evolutionary game model of open sharing relationship of innovation ecology is established, and its dynamic simulation is carried out.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in a single system, compared with the total amount of innovation resources, the value of innovation resources plays a stronger role in the process of the proportion of open and shared resources affecting the innovation benefits of open and shared resources; in the dual system, the cooperation and sharing relationship changes from "win-win" to "zero sum game"; "irrational factors" will make the willingness of open sharing form and disappear in a short time; compared with the "sense of active control", the "sense of passive oppression" stimulates the willingness of innovation subjects to open and share; compared with the promotion effect of "default income", the weakening effect of "default cost" on open sharing relationship is stronger; the higher the "search cost", the stronger the willingness of open sharing; there is an asymmetric "inverted triangle" structural relationship between innovation ec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open sharing willingness.

Key words: innovative ecology; open sharing; evolutionary game; dynamic simulation

河海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Hehai Daxue Xuebao

Zhexue Shehui Kexue Ban

(双月刊 1999年创刊)

第24卷 / 第1期

主管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单位：河海大学（地址：南京市西康路1号 邮编：210098）

编辑出版：《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编辑部

编委会主任：徐 辉

主 编：王慧敏

印刷单位：江苏省南京市鸿润印刷有限公司

发行单位：《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编辑部

发行范围：公 开

电话 / 传真：025-83786376

网 址：jour.hhu.edu.cn

中国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1671-4970
CN 32-1521/C

定价：20.00元



ISSN 1671-4970



02>

河海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Hehai Daxue Xuebao
Zhexue Shehui Kexue Ban

(双月刊 1999年创刊)
第24卷 / 第2期

主管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单位: 河海大学 (地址: 南京市西康路1号 邮编: 210098)
编辑出版: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编辑部
编委会主任: 徐 辉
主 编: 王慧敏
印刷单位: 江苏省南京市鸿润印刷有限公司
发行单位: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编辑部
发行范围: 公 开

电话 / 传真: 025-83786376
网 址: jour.hhu.edu.cn

中国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1671-4970
CN 32-1521/C

定价: 20.00元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二十四卷 第二期

二〇二三年四月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
AMI综合评价(A刊)核心期刊
全国高校社科名刊
中文核心期刊
第三届江苏省新闻出版政府奖

ISSN1671-4970
CN 32-1521/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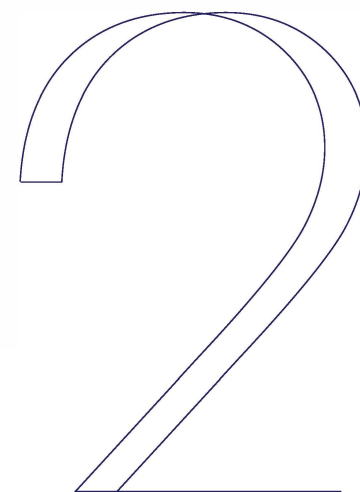
河海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Hohai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Vol.24 No.2
2022年4月25日出版



河海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Hehai Daxue Xuebao
Zhexue Shehui Kexue Ban

(双月刊 1999年创刊)
第24卷 / 第3期

主管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单位: 河海大学 (地址: 南京市西康路1号 邮编: 210098)
编辑出版: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编辑部
编委会主任: 徐 辉
主 编: 王慧敏
印刷单位: 江苏省南京市鸿润印刷有限公司
发行单位: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编辑部
发行范围: 公 开

电话 / 传真: 025-83786376
网 址: jour.hhu.edu.cn

中国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1671-4970
CN 32-1521/C

定价: 20.00元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二十四卷 第三期

二〇二三年六月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
AMI综合评价(A刊)核心期刊
全国高校社科名刊
中文核心期刊
第三届江苏省新闻出版政府奖

ISSN1671-4970
CN 32-1521/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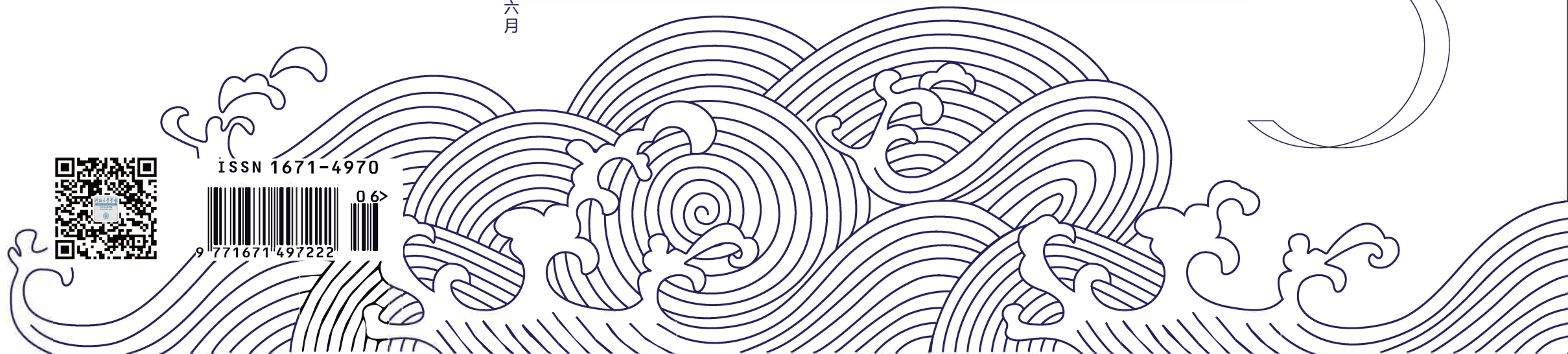
河海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Hohai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Vol.24 No.3
2022年6月25日出版



河海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Hehai Daxue Xuebao
Zhexue Shehui Kexue Ban

(双月刊 1999年创刊)
第24卷 / 第4期

主管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单位: 河海大学 (地址: 南京市西康路1号 邮编: 210098)
编辑出版: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编辑部
编委会主任: 徐 辉
主 编: 王慧敏
印刷单位: 江苏省南京市鸿润印刷有限公司
发行单位: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编辑部
发行范围: 公 开

电话 / 传真: 025-83786376
网 址: jour.hhu.edu.cn

中国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1671-4970
CN 32-1521/C

定价: 20.00元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二十四卷 第四期

二〇二三年八月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
AMI综合评价(A刊)核心期刊
全国高校社科名刊
中文核心期刊
第三届江苏省新闻出版政府奖

ISSN1671-4970
CN 32-1521/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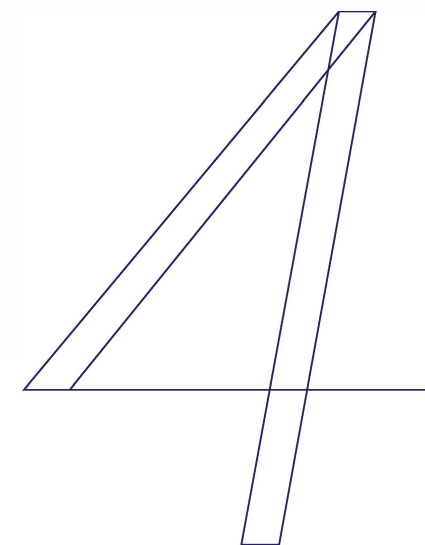
河海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Hohai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Vol.24 No.4
2022年8月25日出版



河海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Hehai Daxue Xuebao
Zhexue Shehui Kexue Ban

(双月刊 1999年创刊)
第24卷 / 第5期

主管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单位: 河海大学 (地址: 南京市西康路1号 邮编: 210098)
编辑出版: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编辑部
编委会主任: 徐 辉
主 编: 王慧敏
印刷单位: 江苏省南京市鸿润印刷有限公司
发行单位: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编辑部
发行范围: 公 开

电话 / 传真: 025-83786376
网 址: jour.hhu.edu.cn

中国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1671-4970
CN 32-1521/C

定价: 20.00元

河海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二十四卷 第五期

二〇二二年十月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来源期刊
AMI综合评价(A刊)核心期刊
全国高校社科名刊
中文核心期刊
第三届江苏省新闻出版政府奖

ISSN1671-4970
CN 32-1521/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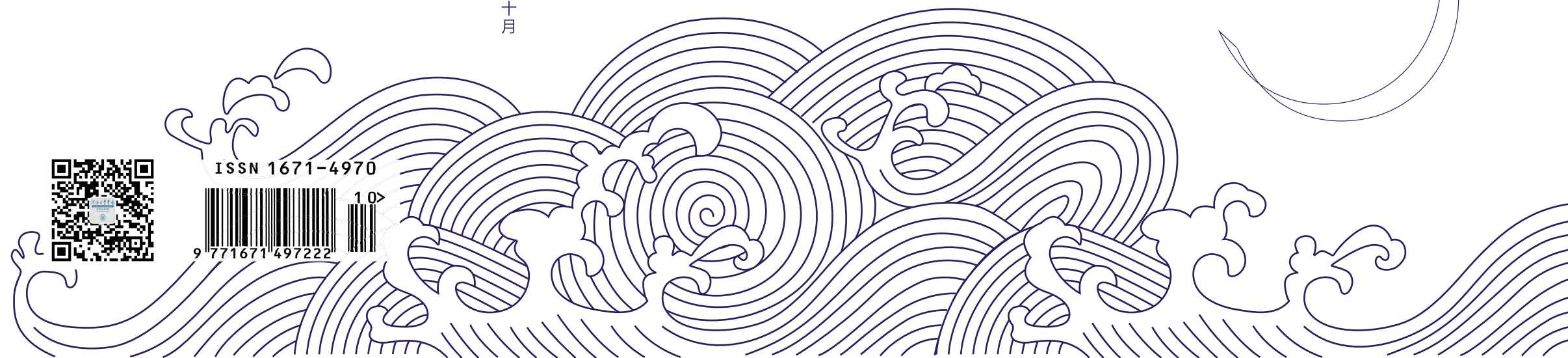
河海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Hohai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Vol.24 No.5
2022年10月25日出版



河海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Hehai Daxue Xuebao
Zhexue Shehui Kexue Ban

(双月刊 1999年创刊)
第24卷 / 第6期

主管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单位: 河海大学 (地址: 南京市西康路1号 邮编: 210098)
编辑出版: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编辑部
编委会主任: 徐 辉
主 编: 王慧敏
印刷单位: 江苏省南京市鸿润印刷有限公司
发行单位: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编辑部
发行范围: 公 开

电话 / 传真: 025-83786376
网 址: jour.hhu.edu.cn

中国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1671-4970
CN 32-1521/C

定价: 20.00元

河海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二十四卷 第六期

二〇二三年十二月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来源期刊
AMI综合评价(A刊)核心期刊
全国高校社科名刊
中文核心期刊
第三届江苏省新闻出版政府奖

ISSN1671-4970
CN 32-1521/C

河海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Hohai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Vol.24 No.6
2022年12月25日出版

